

本书回顾冷战较量美苏两大国的目标和恐惧，
凡亲历者和重大决策参与人，至今犹惊心动魄

冷战史

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 著
伍牛 王薇 译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RAYMOND L. GARTHOFF

新 华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1950年起在美国头家“思想库”兰德公司研究苏联军事，作为“苏联问题专家”崭露头角。1957—1979年先后任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高级官员及驻保加利亚大使，直接参与苏欧情报收集与分析，古巴导弹危机处理和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等重要工作。1980—1994年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仍置身于美苏、美俄关系的事态演变之中。作为冷战全过程的重要参与者，通过本书，他披露了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当年对苏联形势的估计、争论及应对谋略等鲜为人知的内幕。

ISBN 7-5011-6222-0



9 787501 162222 >

责任编辑：阎秋华

封面设计：伍民力

ISBN 7-5011-6222-0/D · 987

定价：30.00 元

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 著
伍牛 王薇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美)加特霍夫著;伍牛,王薇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7
ISBN 7-5011-6222-0

I.冷… II.①加…②伍…③王… III.①美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①D819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784 号
图字:01—2003—3522 号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by Raymond L. Garthoff

Copyright © 2001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opyright © 2003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美] 雷蒙德·加特霍夫 著

伍牛 王薇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320千字
2003年8月第一版 200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22-0/D·987 定价:30.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 65895562 65897685

目 录

序 为什么写这本回忆录	(1)
第一章 冷战开始：成形的岁月 1945—1950	(1)
第二章 从思想库看世界：兰德公司的苏联问题专家	(9)
第三章 解冻：观察斯大林之后的苏联	(25)
第四章 中央情报局及情报分析和国力估计	(41)
第五章 五角大楼的“外事顾问”	(66)
第六章 访问苏联的情报旅行	(77)
第七章 间谍游戏	(99)
第八章 国务院：肯尼迪年代（一）	(118)
第九章 国务院：肯尼迪年代（二）	(135)
第十章 古巴导弹危机：冷战的转折点	(162)
第十一章 国务院：约翰逊年代	(184)
第十二章 东西方关系的外交	(210)
第十三章 战略武器谈判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237)
第十四章 在美苏关系中发展缓和	(279)
第十五章 视察美国驻外使团工作	(296)
第十六章 驻保加利亚大使	(307)
第十七章 20 世纪 70 年代缓和的衰退和没落	(333)
第十八章 目睹冷战的结束：1980—1990	(348)
第十九章 对冷战的反思	(391)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序 为什么写这本回忆录

我的职业生涯，包括我成年以来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与冷战密切相连的。此外，正如我下面将简略叙述的那样，我的经历涉及安全领域许多方面的分析工作、幕僚工作和外交使命，这包括了情报收集和分析、处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关系、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和更广泛的东西方外交以及西方联盟内部关系。这样的经历使我处于各种有利的地位，能观察到冷战历史的方方面面。

虽然任何回忆录都只能是以政治和历史进程的一个片段为依据，而编写历史则仍然需要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然而写回忆录的人曾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身处政策过程的内幕，能够对特定的事件或事态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说明。身处内幕而又有广泛经历的观察家的回忆，可以从侧面对历史提供一些新的趣闻，也许还有助于理解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其角度不同于那些最高层人士的观察，可作为对后者的补充。我除了自己的直接经历和观察以外，还多年研究美苏关系的发展史，就冷战的若干方面写过几本书。不过，我这次写回忆录，仍是从一个内幕人的有利地位，或者说一系列的有利地位出发，谈冷战往事。虽然这比起常规的历史分析来还不够全面，但却是从一个不同的方面，即某些事件的身临其境者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来看待美国的政策这一主题。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将简略地说说我的职业生涯，当然只是简述一下我的经历和我曾经身处过的一系列有利地位，至于

我在那些地位的所见所闻、所接触过的具体事件，则放在回忆录正文中再加以叙述。

从 1945 年到 1950 年，我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勤奋攻读国际关系课程，尤其是与俄国有关的课程。因此，我的学业成形的阶段恰好与冷战的成形时期相吻合。

从 1950 年中期到 1957 年中期，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任务是研究和分析苏联事务。兰德公司当时还是一个新型的研究安全问题的“思想库”，其调研内容既有公开的，也有保密的。在那里，我对研究苏联的军事学术有了一个难得的入门机会，掌握的专业知识在此后多年中均有助于我参与撰写这一方面的一些书和论文以及在一些军事院校等场合发表演讲。在 1957 年中期，我又有幸获得当时很好的一个机会，到苏联国内走访了两个月，然后转入政府部门工作。

从 1957 年末到 1961 年秋季，我在中央情报局（CIA）各国国力估计处工作，具体职责是对苏联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草拟情报文件。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一时期，我的“掩护身分”是国防部的“外事顾问”，这使我得以继续公开论述苏联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及美国的军事政策。我的掩护身分还从另外一个方面使我受益：1959 年，我得到两次非常有意义的赴苏联出差的机会，一次是作为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访苏的随从人员，一次是为约翰·麦科恩率领的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当翻译。这两次出差使我得到了两个方面的亲身经历，即收集“公开”情报，以及将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与政策的应用结合起来，使二者不再脱节。我还完成了一项漂亮任务，成功汇报了瑞典一个访苏军事代表团获取的重要情报。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曾给我交待了一项任务，即对美国在苏军中搜罗到的最重要情报员奥列

格·彭科夫斯基上校 进行评估。然而，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工作始终是分析和评估苏联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情报。

尽管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四年工作很有意义，但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我急于更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这时我可以从两个职务中挑选一个，一是国防部的国际安全事务署的政策规划员，另一个是参加国务院新成立的政治军事事务班子（G/PM）。我选择了后者，担任苏联集团政治军事事务特别助理。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六年多，负责办理的事情不少，其中包括在军备控制和裁军事务方面直接为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当参谋，在当时绝对保密的一个跨部门的处理航天侦察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委员会担任执行秘书，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处理 1961 年的柏林危机，以及直接参与处理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我还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争取苏联领导人同意举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且在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全过程中担任美国代表团的主任参谋和国务院高级顾问。

与此同时，尽管在 1969 年和 1970 年大部分时间里，我办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事务，但是从 1968 年起，名义上直到 1970 年秋季为止，我还担任了美国派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使团的政治军事事务顾问。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盟国间的协商和盟国外交。这也使我处于一个有利地位，来观察东西方之间外交关系的演变。

除了 1969 年 11 月至 1973 年 1 月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任职以外，从 1970 年中期至 1973 年中期我还担任过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的副局长。从 1973 年到 1974 年，我担任国务院的高级进修班主任，还到几个国家（德、法、意、英和苏联）就政策规划方式做采访，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比较调研报告。从

彭科夫斯基（Penkovsky），有的资料中曾译作“佩尼科夫斯基”或“潘科夫斯基”。本书第七章中对此人有详细论述。——译注

1974 年到 1977 年，我担任国务院驻外机构事务局的高级督察，曾率视察组到一些国家（包括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近东的以色列、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亚洲的泰国和菲律宾，中非和南美的几个国家，以及加拿大），视察我们的使馆的工作以及驻外人员对美国与驻在国关系的处理情形。在每一地都要逗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几个最大的使馆的视察均长达三个月。这些视察使我得以非常密切仔细地了解各驻外使团的业务和整个驻外机构事务的运转，还在一定程度上更广泛地了解美国对外关系，包括国务院之外另一些部门驻外机构的运转情形。我还对国务院内部高层工作运转情况作了一次敏感的调研。（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由于我历次视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提出了相应建议，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最初反应竟是要求撤销整个监察署！）

从 1977 年到 1979 年，我担任驻保加利亚大使，这个差事相对说来较平静，然而它让我有机会实地观察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运转以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还有美国与东欧的关系）和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活动。到 1979 年底，从年龄和工龄来讲，我有资格提前退休，就决定离开政府机构，从而将全部时间用于学术研究。

从 1980 年到 1994 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当高级研究员，主要是研究冷战后期的美苏关系，并就此发表了两本著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些岁月中，我访问过苏联十来次（还访问过中国和古巴）。我参加过一系列国际会议，与苏联和美国的外交官及其他官员保持了联系，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得益于查阅前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档案。此外，我还通过其他方式对我感兴趣的有关学术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因此，在冷战的最后十年，我虽然不再供职于政府部门，却仍然积极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以上就是我的简历，我正是根据这些经历编写了这部回忆录。当然，在美国当今外交关系史以及冷战历史中，有许多重要

的领域是我未曾涉足过的，我对它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直接的体验（这包括经济关系、越南战争、美国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等等）。对其中某些事情，我只能谈一点观感。然而，我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全面，而只是想要就我直接经历和了解的那些事件和情况，对人们已知的史料作一点补充。

回忆录能起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让人们注意到当年流行的理念和见解，通过讲述轶事、反思和分析，帮助人们重新看到当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观点、立场和行动，因为过去有些观点、立场和行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是难以理解的。这也许正是回忆录所能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能让读者移情地了解往事。这样做的目的既不是批评也不是辩护，而只是争取理解——尽管在反思中也许会作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辩护。

写回忆录的一个有利之处，是有机会根据我在政府部门中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对事物作出我个人的判断。在冷战结束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评价美国的安全政策，这总的说来是我们大家面临的一项全新任务，也是一个机会。回忆录可以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一条补充途径，对比较常规的历史学和分析评估有所裨益。现在大家都在努力重新思索当年安全政策的得失，不只走为了研究过去，而且也是着眼于未来，而回忆录可以给我们的磨房送来新的谷粒。经历过往事的人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对将来仍有价值的结论。

我的回忆录主要是聚焦于美国的政策制定，尤其着重于美国当时对苏联这个敌手的见解和判断，以及美苏之间的互动。我对美苏关系史的研究著述一向注重这样的见解和互动，但在这部回忆录中，根据冷战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回顾美苏关系，则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这样做。当年，我是一个政策分析员和情报分析员，以后参加了谈判，还与当代苏联人士有过其他往来（这种往来今天仍在继续，因为我常与一些前苏联高级官员一起回顾和分

析往事），因此，我一直有许多机会来观察和体验美苏之间的互动。在回顾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及美苏互动情形时，有一个反复得到确认的重大结论，这就是我们在采取行动时很难想见这些行动对于苏联这个敌手的想法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的决心和行动会产生何种影响。（当然，反之亦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有时即使是承认了，也很难把它用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它太容易遭到误解，或者被误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是缺乏坚定不移追求美国利益的精神，然而，要真正客观地、顺利地推进自己的利益，就往往需要正确地理解别人的利益和想法——对于一个敌手尤其是如此，因为彼此利益相左或相悖。这样的结论，在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可以得出来，可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感受会体会得更深。

总之，这一部回忆录是叙述了一个人的冷战之旅。写它，是因为我相信它对读者来说是有兴趣和有价值的，读者之中的多数人不曾生活在我那样的岁月，他们当中谁也不会像我那样在美国安全系统内部经历那样一些事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我能如实地按照我的所见所闻，唤醒人们注意我们历史之中不久前刚刚翻过去了的这重要一章，把它看做是“活”的历史，会觉得这比读一般历史书时的感受更有趣一些。

第一章

冷战开始：成形的岁月 1945—1950

冷战究竟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其说不一。它出现于 1945 年至 1947 年之间。也许不无道理的说法之一是，1946 年 3 月 5 日，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宣布一道“铁幕”已降临于欧洲大陆，表明冷战业已开始。在丘吉尔演说之前不到一个月，苏联领袖斯大林将两次世界大战都归咎于资本主义，暗示了苏联和西方之间将存在持久的冲突。而两星期之后，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发回了他那封在后来出了名的“长电报”，分析苏联政策的缘由，其词语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有些持不同意见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美国 1945 年 8 月使用原子弹就预示了冷战的来临，说美国此举当时从打败日本的军事上看并不是必要的，其意图是抬高美国在战后对付苏联的地位。更有道理的一种看法则是，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之后，这一成就引出了战胜国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数年之间，冷战就出现了，一边是苏联及其卫星国构成的“东方”，另一边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那几年正是冷战成形的岁月。它们也是我职业生涯成形的时期。不论冷战开始于哪一天，当时我都是在上大学。从 1945 年 6 月到 1948 年 6 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随后我上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直到 1950 年 6 月。在普林斯顿（我到那里比乔

治·舒尔茨晚 6 年，比詹姆斯·贝克早 4 年)我就读于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进耶鲁则是进修国际关系，重点是研究俄国。从我少年时候起，现代史和世界政治就一直对我有吸引力，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将这一兴趣应用于战后出现的主要挑战，即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在两个大学期间，我研读了许多科目的课程，重点是现代史、外交史和俄国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对政治学读得不多，对经济学则接触得更少了。

这本回忆录不是自传，总的说来将很少提及我的个人生活。然而有一点似乎是例外，这就是在以下的几段简单说一下我早年对世界事务之所以感兴趣的背景。

我是 1929 年 3 月 26 日出生于埃及的开罗。我父母是美国艾奥瓦州人，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后五年，我父亲是开罗的美国大学的财务主管。从童年到上中学，我是在美国国内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当时我父亲在华盛顿的美国农业部工作（后来有几年他担任了国际小麦理事会的美国代表，随后担任该理事会主席）。我虽然没有生活在国外，但家庭环境中关注世界事务的气氛是很浓的。我在邻近首都华盛顿的地方长大，这也促成我关心国事和天下事。

我于 1945 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中学，大约 40 年后，该校于建校 50 周年时给四名老校友授奖，我是其中之一，是表彰我在国际事务中的工作成就，另三位受奖者是一名宇航员，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作家，以及校友中名气最大的电视人物威拉德·斯科特。

1945 年 6 月，我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是按战时的学制，一年有三个学期，享受奖学金。所以，我是以一名 16 岁大学新生的身分欢庆了日本战败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随后的三年则看到了冷战带来的那些事件。作为一名攻读世界政治的大学生，我比大多数同学更关注全球各地的事态，但是我们当时

并没有完全懂得冷战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当时的大人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当时那些事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不那么近；另一方面，当时只有最尖锐的对峙，例如 1948 年的柏林封锁及空运，才让人想到冷战有可能变成热战。直到 1950 年爆发朝鲜战争以后，“热战”的危险才朦胧浮现。

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时，我还是刚进大学不久。这种新式武器的可怕威力预兆了一个危险的未来，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是迫使日本早早投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我仍然对此深信不疑）。随后，当冷战双方敌意加剧时，它又是维持力量均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它不是制造这种敌意的首要因素。普林斯顿大学在研制原子弹的物理研究方面起过重大作用，有好几位教授和毕业生参加了曼哈顿工程，后来普林斯顿大学在这方面继续作出了贡献。我在 1945 年—1946 年期间曾有幸目睹新原子时代的两位巨人玻尔和爱因斯坦的风采。

当时我的政治倾向是温和自由派。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 1948 年 5 月刊载于自由派校园杂志《新世纪》，标题是《对个人权利的挑战》，内容是反对当时刚露头的麦卡锡主义（这个名词那时尚未出现）。我参加了新成立的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它的全国领导人之一是退伍老兵科德·迈耶。若干年以后，当迈耶在中央情报局主持国际组织部工作、稍后又领导全部秘密活动时，我跟他直接交往过。

在 1946 年以前，我对俄国或苏联或共产主义都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早年，关于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我记得只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件是 1939 年—1940 年冬季苏军入侵芬兰，给我留下了坏印象。另一件是俄国人抵抗德军的进攻，与我们结成了反纳粹同盟，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战后，苏联的行为使我（以及别的许多人）深感震惊的最早事件之一，是苏联军事情报官员伊戈尔·古任科 1945 年 9 月在渥太华叛逃后透露，苏联一直在对

我们搞间谍活动。我还读到过另一些叛逃者的自白，例如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亚瑟·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

冷战初期我经历过的对民众最起动员作用的一件事，是 1947 年围绕着马歇尔计划而展开的大辩论。我记得只有这件事促使我们许多人上街游行，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我是赞成者之一。马歇尔计划是面对冷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的意义首先在于美国拒绝了孤立主义，投身到世界之中。接着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不只是具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而且实际上还确立了总的遏制政策，但是就我记得的情形而言，它在国内引起的争议要小得多。

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我探讨了苏联政策的两面性，具体事例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苏德两国的军事勾结，它显示出苏联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俄国民族利益二者混到了一起。我的正式课程包括近代外交史、国际组织、国际法、国力基础等等，大都集中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当然也论及一些当今事件，例如联合国的成立、讨论欧洲战后和平条约的那些外长会议，等等。我学的东西主要是“现实派”政治学，强调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经典课本包括 E. H. 卡尔的《二十一年危机 (1919—1939)》，还有当时新出版、至今仍屡屡修订再版供大学生学习的汉斯·摩根索的《国家之间的政治》。

我那时急迫地想投身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经商，对国际商务也不感兴趣。我期盼着加入美国的外交人员队伍。

在我以优异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和进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之间的 1948 年夏季，我到西欧旅行了一圈，头次看见法国和意大利有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参加竞选。我毫不怀疑他们得到了莫斯科给的经费，只是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意大利的对手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的经费。这一次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对我的学

习很有帮助。

我很喜欢我在耶鲁的进修课程。到 1950 年 6 月，我学完了必修的课程，博士考试也通过了，只缺一篇博士论文，它可以在离校后再写。虽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已重点研读了俄国有关的课程，但我在那里还没有学习俄语。耶鲁大学在战争期间已与另几所大学一起率先采用了新的外语教学方式，大量聘用了相关的外籍教师进行强化训练。我在进修学校一面学我的进修课程，一面学习俄语。在第一学年我就学完了强化的俄语一年级课程，暑假期间突击学完二年级课程，所以在第二学年我已跳级到俄语四年级课程。到 1950 年，我的俄语已能用于读和写，口语也相当流利。

在学习俄语以及随后研究俄罗斯文化的过程之中，我结识了不少“白俄”侨民，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之后直接流亡到美国，有些人则是先在欧洲或中国生活多年然后转来美国。我结识的俄国人当中，有一位是杰出的哲学家尼古拉·洛斯基，还有一位是天才的飞机和直升机设计师伊戈尔·西科尔斯基。我还认识了几位新的 DP（流亡者），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苏联，辗转而来。

最重要的是，我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瓦西利耶娃。她出生于拉脱维亚的一个白俄家庭，1939 年 12 月，当战争来临、苏军即将接管拉脱维亚之际，她全家人来到了美国。她的父亲是俄国贵族出身，在沙俄军队、后来内战期间又在白军中当过军官，到美国后当俄语教员，是我在耶鲁最敬重的俄语教师。

在普林斯顿时，我当过步枪手枪俱乐部主任，结识了该校后备军官训练队负责人福克斯上校。经他安排，我在 1947 年对后备军事情报课程有所了解。1949 年，我在耶鲁大学进修时加入了后备役军事情报组。我还动员了一位教授参加这一活动。我所在的单位叫做第 469 战略情报小组，任务是利用图书馆资料研究

苏联的军事潜力，主要是为了培养我们的调研能力，不过也为建立庞大的苏联资料库作一点点贡献。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一位年轻的陆军后备役上尉戴维·查夫查瓦泽，他出身于沙俄格鲁吉亚皇亲贵族，战时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担任美国援俄军事供应事务联络官。他和我还都参加了耶鲁的一个非正式的俄语合唱团。后来他到中央情报局，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个案研究。有一次我们小组听过一位情报专家讲课，他就是谢尔曼·肯特，战前是耶鲁教授，战时去战略情报局工作，回耶鲁不到一年，又去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我当时完全不曾料到，几年之内，我就会到中央情报局在他手下工作。在战后返回耶鲁的这段短暂时间里，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谈战略情报，被用作标准教材。

1948年，我曾与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有过联系。跟我面谈的那位官员表示我可以马上进该局工作。我说我想先完成研究生院的学习，他表示同意，说我以后随时可去。

我跟国务院几位负责苏联事务的官员也接触过，其中有的人，即比尔·克劳福德、迪克·戴维斯和杰克·麦克斯威尼，后来成为我的同事，还到东欧国家当过大使。他们鼓励我先完成学业再申请到外交部门工作，还建议我读读《外交季刊》刚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是国务院的乔治·摩根用笔名“Historicus”发表的一篇分析意识形态对苏联外交政策影响的文章，它虽然不如乔治·凯南用笔名“X”发表的那篇文章轰动一时，但论述得也很精细，有学术深度，其分析方式正是当时我研读的内容。摩根在国务院外事部门工作，是一位哲学博士，写出这样的文章很简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喜欢我在耶鲁攻读的功课，尤其是其中的外交史（老师是哈约·霍尔本和乔治·维尔纳德斯基）、政治学（老师是塞西尔·德赖弗）、国际关系（老师是伯纳德·沃尔弗斯、弗雷德里克·邓恩和威廉·福克斯）、安全事务研究（老师是伯纳德·布罗迪和克

劳斯·克诺尔)以及苏联问题研究(老师是弗雷德里克·巴洪和内森·莱特斯)。对我思想最有影响的,大概就是沃尔弗斯教授讲授“现实政治”的课程。在普林斯顿时,我就受过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另一位名家哈罗德·斯普劳特的教诲,对此有所领会。耶鲁大学有几位教授在1946年就发表了有关核武器影响的一本论文集,即布罗迪主编的《绝对武器》。

我在耶鲁的这两年,即1948年秋至1950年中,冷战已形成了持续对抗的局面。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1948年—1949年苏军封锁柏林和美国实施空运,但这场危机的解决表明,虽然双方的对峙继续存在,冲突却不至于失去控制。1949年西方国家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和成立北约组织虽肯定意义重大,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美国会因此而在欧洲保持大规模的军力,觉得这主要是巩固西欧政局的一步。

人们感到冷战预兆不祥,不仅是因为看到敌意会长久不散和害怕共产主义,而且还因为斯大林展现出一种神秘莫测、令人恐怖的形象。苏联和斯大林手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似乎构成一种空前的威胁,比希特勒的威胁更严重。

冷战在当时不但是主宰世界政治的因素,而且还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和价值观所受到的最大威胁。它实质上看来是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对于美国和西方而言,冷战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在我们这些当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人看来,我们显然要为冷战消耗毕生的精力。许多人还为它献出了生命。后来,世界起变化,冷战自身也起变化,它的挑战也就随之改变,然而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我们都是聚精会神于怎样最有效地把冷战进行下去。

就冷战的出现来说,苏联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是共产党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它也引起了美国国内政界最激烈的一场辩论。这时,

西方似乎面临着铁板一块的“中苏集团”。在这之前，铁托的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一道裂缝，但中国的事态使 1948 年的那道裂缝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是苏联 1949 年 8 月成功试验了它的原子弹。当然，人们估计到苏联早晚会掌握核武器，第一次试验成功只是迈向真正核武器能力的一步，但这一步来得这么快，却是人们没有想到的。公众突然意识到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了，这在心理上产生了强有力的震动。

把上述事件凑在一起而大大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事态，则是 1950 年 6 月南韩遭受入侵。这时，亚洲似乎正在转向共产主义，加上斯大林的暴君形象和苏联军事力量的加强，使美国人忐忑不安，而且揭开了冷战的新的篇章。恰好在这时，我从耶鲁转到华盛顿，从大学转入了一座国家安全“思想库”。

在耶鲁给我们讲授“克里姆林宫学”的老师内森·莱特斯让我了解到当时新成立的这座“思想库”，即兰德公司，又让该公司了解了我的情况。莱特斯在耶鲁是兼职教授，但在兰德公司设在华盛顿的社会科学部，他是一位专职的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当时还只为美国空军服务。1949 年，兰德公司表示愿意聘我当一名苏联问题分析员，其年薪将大大高于我留校任教的收入，跟我去政府部门任职的待遇则至少相当。耶鲁表示过我可以留校当助教和助理研究员；1949 年末，又有人介绍我去中央情报局从事苏联问题分析。我考虑了这三条路，最后觉得兰德公司的工作最合适，既可以按政府的需要作保密性调研，同时又作学术研究，有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何况在兰德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还可以再转回到学府或者进政府部门。此外，我到兰德公司研究苏联军事学术，还可以结合这工作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华盛顿是首都，工作方便。于是，我决定到兰德公司，定于 1950 年 7 月 7 日开始上班。

第二章

从思想库看世界： 兰德公司的苏联问题专家

兰德公司成立于 1948 年，其起源则更早一些，源于美国空军 1946 年一项代号为 RAND 的科研项目。当时领导美国空军的阿诺德上将、他的科学顾问西奥多·冯·卡曼以及另几位有远见的空军将领决定设立这一机构，是为了在刚露头的原子时代和航空时代就军事技术和战略全面发展新思想。兰德的研究人员来自物理、数学、航空、工程、经济学等许多学科，还有少部分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研究人员。公司总部和绝大多数分支机构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公司提供的薪金和工作条件是很优厚的，尤其难得的是人人都可以独立思考，无拘无束。工作人员是年轻的（平均约三十来岁），但许多人有高等学位。公司鼓励大家发挥想象力。

兰德公司是后来大量出现的“思想库”的原型。成立兰德的最初动力是人们看到了战争期间军事技术的进步，然而兰德的成长壮大则是由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出现的冷战的推动。在这种形势下，还成立了许多的模仿兰德并与之竞争的科研机构。关于思想库的起源及其发展情况，一位观察家保罗·迪克逊在其《思想库》一书中作了论述，他指出，“兰德公司是美国对潜在敌人

加强研究的冷战科研机构先驱”。^①正是这点把我吸引了进去

兰德的第一个报告完成于 1946 年 5 月，标题是《试验性绕地球飞行航天船的初步设计》。在随后的岁月中，兰德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研领域包括侦察卫星的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兵力结构及其作战方式的重新设计，防空司令部的预警系统及其他设施的建立，还有“博弈论”的战略运用，“系统分析”理念的创立（“系统分析”这一名词就是在兰德形成的）以及运筹学的应用。1961 年，国防部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领导下采用了系统分析和按照项目预算进行管理的方法，在查尔斯·希奇和阿兰·恩索文等兰德高级研究员的帮助下，大见成效。

兰德公司更重要的贡献，是它在伯纳德·布罗迪、汉斯·斯皮尔、赫尔曼·卡恩、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弗雷德·伊克尔和亨利·罗恩这样一批杰出学者带领下，发展了军事战略思想，尤其是威慑理论及有关的美国政策。对当时的学术思想辩论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大概就是沃尔斯泰特 1959 年 1 月发表在《外交季刊》的《微妙的恐怖均势》一文。他指出威慑是脆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战备才能使威慑得到保证。卡恩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在兰德公司（以后又在他自己领导的赫德逊研究所^②）研究了威慑因素分类学，提出了共 44 级阶梯的“逐步升级”模式，最后还提出了“末日机器”，即确保在一旦遭到核攻击时即自动回击从而同归于尽的态势。他的这些论述使当时的公开辩论达到了终极地步。

^① Paul Dickson, *Think Tanks* (Ballantine Books, 1971), P.69. 迪克逊书中指出，我在兰德公司出版的《苏联军事学术》（*Soviet Military Doctrine*）一书是“同类著作中的第一部”。

^② 赫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亦译“哈德孙研究所”。——译注

在我看来，兰德公司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耶鲁学派”学者（包括 1951 年到兰德公司的伯纳德·布罗迪，还有先给兰德公司当顾问、1956 年正式加入兰德的威廉·考夫曼），其观点要实际得多，考虑的是现实战略决策问题。虽然兰德公司的目标是要把各学科专家的研究结合到一起，但社会科学部（1957 年以前它一直设在华盛顿）的人数很少的几位苏联问题专家的工作并未纳入威慑理论研究，我们的看法实际上还是与威慑理论相背离的。

当我 1950 年 7 月开始在兰德公司工作时，威慑战略辩论尚未展开。经公司与我商定，我的任务是研究苏联军事学术——奇怪的是，这一课题当时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而我在耶鲁时实际已开始有关的研究。1950 年 10 月，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苏联军事战略及能力》刊登于《世界政治》季刊。

我刚开始在华盛顿工作，我所在的陆军后备役战略情报组就奉召到朝鲜战场服现役。这时，兰德公司认为我在该公司的保密研究要比我去陆军担负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让有关部门撤销了对我的征召，因此我得以集中精力研究苏联军事学术。

这年 9 月，我和薇拉在康涅狄克州斯特拉福德市的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们都是 21 岁。我们最初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套公寓房内，但很快就搬到了华盛顿。1956 年 3 月，我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出世了。

1951 年春季，我完成了我的研究报告文稿。经耶鲁大学与空军商妥，我的文章虽然尚未销密，仍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上交，通过了答辩，我于 1951 年 6 月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论文经过我加工定稿后，完成了销密手续，作为兰德公司的题为《苏联军事学术》的报告，以书册形式于 1953 年 3 月由自由出版社出版。

在我研究苏联军事学术及有关问题期间，我与政府部门，尤

其是陆军和空军情报部门的人员建立了良好关系，与国务院当时的情报与研究署（OIR）的关系也不错。我和兰德公司其他研究苏联问题的人自然还与学界，尤其是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同仁来往密切。然而，当时还没有别的研究苏联军事学术的专家有几个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其中，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项目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哈佛还有一个庞大的采访计划。采访由苏联迁居美国的人们，以增进我们对苏联体制运转情形的了解。（还有政府的保密情报，是从政治逃亡者和变节者身上挤出来的，特别是有关军事目标和经济工业目标的情报，这方面最大的一项是美国空军的“挤水果汁”计划。）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做法有所不同，是侧重于了解苏联陆军的作战理论。战后，美国陆军弄到了一批前苏联校级军官，让他们看苏军的新条令、教范和其他有限的情报，从中了解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变化。这批军官中，有些人来自“弗拉索夫军”——安德烈·弗拉索夫原系苏军中将，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投降，由他牵头成立了一支为德军效劳的“俄罗斯解放军”，这支军队瓦解后，有些军官逃到了西方。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另一些前苏联军官，其中一位是原苏联空军上校，当过远东边疆和中亚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于1941年驾驶轰炸机作战时被击落。他到美国后，最初在美国陆军的蒙特里外语学校当俄语教员。我早在1951年就认识他了，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情况，后来让兰德公司请他按合同完成一些任务，然后又介绍他到陆军情报部工作。联邦调查局了解到我跟他的关系后，曾要我了解这个人在行为上是否有情绪苦闷的表现，是否还与苏联特务有接触。（我给联邦调查局的惟一报告是他去世的消息。）那些在弗拉索夫手下干过的人以及另一些叛逃过来的人的确有时感到有压力，为变节而苦闷。但是我说的这位先生虽然反苏，却始终忠于俄罗斯。有一次，美国空军的人员找他谈话

一再追问西伯利亚金矿的位置，他非常生气，拒不作答。

为了我的研究工作，我采访过一些很有趣的前苏联官员、外交人员、军官和情报官员。（有一次我要采访一名前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官员时，先到联邦调查局查考他的身分，我发现他也通过联邦调查局查考我的身分以及兰德公司的情况。）我见过的这些人，有的很有名，例如前外交官和将军亚历山大·巴尔迈因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是公众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其中之一曾是苏联派驻意大利的高级外交官，于 1940 年叛逃，战争期间被艾伦·杜勒斯的战略情报局人员收罗进来。到 1952 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身分，成了纽约的一位很成功的商人，但仍与艾伦·杜勒斯保持着友谊。

兰德的几名苏联问题专家研究的课题，还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按照合同进行非保密性研究的课题，都取决于美国政府最关心的事项，包括苏联的控制体制及其弱点。更具体地说，这涉及苏联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阶层、经济和制度等方面。民族分歧，官场竞争，共产党内的派系争斗，军界和情报界各机构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十分关心的，但在冷战早期的 50 年代又是非常缺乏了解的。空军特别关心的一个方面是苏联军事目标。我们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和平时期的心理战。还有一个重点是为支持美苏关系的运作而建立资讯网，这在 50 年代还很薄弱，但后来逐渐得到充实。

兰德公司从几个方面为心理战研究作了贡献。其中之一是理论研究，即在分析战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推断。例如，有一项重要研究报告是保罗·凯克斯凯梅蒂撰写的《战略投降：胜败政治学》，它考察了有哪些因素会诱发投降，有独到见解。该报告 1958 年发表后，招来了一些人毫无道理的抗议，有些人居然怀疑“华盛顿”在搞阴谋，雇人研究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下投降。

杜鲁门政府 1951 年设立了一个跨部门的机构，叫做“心理战略委员会”，负责协调政府冷战活动的计划与实施。我认识它的一些委员和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杰出者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位以“Historicus”为笔名的乔治·摩根。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这一机构改组，叫“行动协调委员会”，任务实际上未变，但结构更严整一些，被置于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之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并肩工作。这里有过一段故事：1953 年 3 月，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去世，当时刚就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想立即看看针对这一情况的应急行动计划，可是各有关部门除了一堆备忘录以外，拿不出任何计划。艾森豪威尔很生气，要知道他是军队指挥和参谋工作的楷模，一向习惯于司令部制订种种应急行动方案。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计划人员及有关情报人员在斯大林死后五天才拿出一份估计报告，只是说斯大林离开舞台以后，事态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究竟怎样，无从得知。兰德公司未曾直接参与这一研究，但美国空军司令部的心理战部门自作主张，准备了一些传单，打算散发到苏联国内号召民众起来革命。我清楚记得，当时负责心理战部门的格罗弗上校对说过，传单都已经作好了装上轰炸机的准备，却被上级下令停止了。

冷战时期，政治和心理战方面最怪诞的事例，是雷蒙德·斯利珀上校，战略空军的一位在空军学院任教的军官，在 50 年代初提出的叫做“控制工程”的计划。该计划的实质是要用迫降代替威慑，主张动用美国占优势的战略空军核力量，迫使苏联降服。按照该计划，美国将单方面采取行动，向苏联出动装备有核武器的空军兵力，迫使苏联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苏联撤出东欧。奇怪的是，这样的主张居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美国空军领导人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亚瑟·雷德福的支持，另一些军界和政界领导人也没有马上表示反对。1954 年 7 月 14 日，斯利珀上校到兰德公司宣讲他的那项计划，我可以肯

定，兰德公司人员当时的反应是怀疑和震惊。（斯利珀自己却在事后说，他的“印象”是得到了兰德的支持，只不过听众“对计划及其建议的行动的规模之大有点惊奇”。）在国务院，主持政策规划工作的罗伯特·鲍伊断然拒绝了斯利珀的计划，说它“不过是预防性战争论的另一个版本而已”。该计划始终未获批准。^①

“预防性战争”就是主张趁苏联尚未强大到足以威胁或进攻西方之前，美国就决定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时机对苏联实施核攻击。在今天看来，这一主张似乎是怪诞和不负责任的。可是在冷战早期，从 1949 年（苏联第一次试验其原子武器）到 1954 年（斯大林已不在人世，战争不再显得是那么不可避免），这一点并不是这样不言自明。1952 年，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休斯和空军退役少将欧维尔·安德森公开主张打“预防性战争”，受到杜鲁门总统驳斥。然而，在政府内部，这一主张虽未获采纳，但也未被完全排除。直到 1954 年末，艾森豪威尔总统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440 号文件中明确否定了预防性战争的主张。^②

1950 年至 1954 年期间，兰德公司也不是没有人考虑预防性战争，但虽有少数人赞成，多数人却表示反对，分歧尖锐。赞成者主要是那些对博弈论及其战略应用作出了贡献的数学理论家，其中突出的一位是约翰·威廉斯，他是约翰·冯·纽曼——参加过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老数学家，博弈论之父——的朋友和门生，还在兰德公司成立之初请纽曼来给兰德当顾问。他还请来了另一位数学家埃德·帕克森。帕克森将“系统分析”应用到军

^① 有关“控制工程”的 22 卷文件现已解密。详见 Tami Davis Biddle, “Handling the Soviet Threat: ‘Project Control’ and the Debate on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2, no.3 (September 1989), pp.273 – 302, quotations cited from pp.291 and 301.

^② 见 Nsc 5440,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ol.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4), p.815. For the best review of the subject, see Russell D. Buhite and William Christopher Hamel, “War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an American Preventiv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1945 – 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14, no.3 (Summer 1990), pp.367 – 84.

事计划工作，也赞成预防性战争。但是，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他的学过或研究过政治、历史、社会科学和军事战略的人，几乎都反对预防性战争。

兰德公司从未宣布过支持预防性战争。然而，兰德公司有力地带头将博弈论和系统分析应用于军事计划，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军事计划工作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还有一点——也许是好，也许是歹，也许好歹兼备——那就是有几位军事理论家，如数学家出身的沃尔斯泰特和核物理学家出身的卡恩，有力地促使人们为威慑提出构想和作好准备，还为核战争的实施而设计相关的兵力兵器和战法，以备一旦威慑失灵而核战争真正来临。兰德还对心理战作了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此外，兰德还从一系列方面大力支持了冷战的实施。

5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实施宣传战和政治战，红红火火。兰德公司虽未直接参加，但我们与那些活动保持了接触，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支援。1949年，有一个非政府机构，即全国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还有一个与它平行的机构，即全国争取解放苏联各族人民委员会，在乔治·凯南的鼓励下成立了。当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和当时尚未返回政府情报部门的艾伦·杜勒斯都是这些机构的理事会成员。“美国之音”1947年初开始了它的俄语广播，但它代表美国官方的观点。1950年7月4日，全国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成立了“自由欧洲电台”（RFE），向共产党统治下的八个东欧国家进行广播。

三年以后，“解放广播电台”（RL）开始用俄语广播，并向苏联境内十四个非俄罗斯民族广播。（为了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这一电台后来改名为“自由广播电台”。）

中央情报局通过它的国际组织部（1954年至1962年部长为科德·迈耶）监控以上这些宣传活动，这一点在华盛顿是许多人都了解的，但未公开，直到70年代初才予以承认。有几位美国

教授，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廉·格里菲思教授，给自由欧洲电台当过顾问。负责政策指导的，是心理战略委员会（后来则是行动协调委员会）。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的总部设在慕尼黑，其活动经费在 1950 年为 1000 万美元，到 50 年代末升到了 5000 万美元。

对于自由欧洲电台来说，最困难的时期是匈牙利爆发起义的 1956 年 10—11 月。该电台内部的人曾对美国的援助抱有过高的期望，这也感染了它的几百万听众。虽然美国的“指导方针”排除了直接号召暴动，但自由欧洲电台转播了匈牙利一些造反的地方电台号召起义的节目，许多听众就误以为这是美国的立场了。

中央情报局通过“全国争取解放苏联各族人民委员会”还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苏联研究所，其工作人员是前苏联公民，大部分是学者和专业人员，待遇优厚。这个研究所有助于增进西方公众对苏联体制的了解和散发反苏宣传材料。华盛顿大学的威廉·巴利斯教授为该研究所当顾问达一年之久，回国后曾要求我去接替。我考虑过，兰德公司大概也同意给我放假一段时间，但最后我决定不去。在兰德公司，我们与一些逃亡来的侨民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不直接起作用。有一次，我们从一个战前叛逃出来的前苏联情报官员那里了解到有些苏联特务在 50 年代中期打进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中央情报局。但这是捎带干的，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 1948 年通过空军要求兰德公司研究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涉及的范围很广，兰德公司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美国不掌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指数，而苏联的统计数字既不完整又不可信。因此，兰德公司（尤其是艾布拉姆·伯格森）关于苏联国民收入的研究成果就为后来美国学术界和中央情报局有关苏联经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分析苏联政治和军事事态方面，我和我的兰德公司同事们

（还有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俄国问题研究人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所干的这一新的工作领域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苏联学”（Sovietology），其中研究苏联领导人的那一部分被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最早从事克里姆林宫学研究而且比较有成就的人士当中，有些人曾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敌，尤其是一些流亡的孟什维克党人（例如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还有一些是变节而来的前共产党人（例如弗朗兹·博克瑙）。在兰德公司、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尤其是该局的外国广播信息处）和各个大学，这方面研究的重点不是苏联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们言论的弦外之音和“伊索式的语言”，即隐语。当然，这二者都是克里姆林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兰德公司的一些人，首先是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过九年的罗伯特·塔克，运用这种研究方法颇为成功，在 1955 年 2 月曾抢在情报部门之前预言了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即将下台。苏联学和克里姆林宫学并不是障眼术，它们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却仍不失为有用的分析工具。我与战后早期一代的一些苏联问题专家结下了友谊，并因此而与国务院及另一些政府机构建立了联系。附带说一句，早期研究苏联问题的单位，包括兰德公司在内，都有一些人在战争期间曾在战略情报局的苏联研究分析处工作过。

上面我谈到兰德公司及另一些单位研究苏联问题，是出于哪些政策目的，但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要加深我们对苏联利益及其目标的认识。兰德为此做了不少工作，突出一例就是内森·莱特斯 1951 年发表的《苏共政治局的行动规则》。我在 50 年代早期和中期也写了一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苏联出于其意识形态目的而在对外政策方面追求什么利益，并强调他们在推进其利益时仍是谨慎从事，适可而止。当时有些人认为苏联的扩张攻势是鲁莽而又毫无节制的，我们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但也支持了当时已占上风的一种判断，即：遏制苏联扩张是长久

的，与苏联不存在共同利益，顶多只是在力量对比处于暂时均势时迁就一下。这种看法在当时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没有反映出苏联基于其国家利益而推行其政策的全貌，因为苏联尽管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棱镜看问题，但在政策上仍是以其国家利益为依据。从美国的政策考虑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当时的那种分析就日益显得不够全面了。

我在兰德公司期间，东欧发生了几次造反：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我密切注视过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很快写出一篇题为《匈牙利的悲剧》的文章，其中有一条论断是，在10月31日之前，苏联领导人还不曾下决心干涉和镇压匈牙利的起义，这一看法在当时得不到认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与苏共政治局10月30日和31日会议有关的苏联档案材料，它们确实表明苏联领导人在10月30日曾决定不作干涉，只是第二天才改变主意，决定干预。^①虽然这一次我主要是分析了苏联的决策过程，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涉足东欧事务。

兰德公司希望用更佳的办法作政治分析，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为此而想出的做法之一，是政治“演习”，就是安排两组人员，分别代表美国和苏联双方（有时还安排更多的人员分别代表冲突的有关各方，也许还有北约盟国），按照军事演习的样子，在设立的冲突中彼此采取行动和对应行动，直至解决冲突，或是让危机拖延下去而得不到解决。

早年这类政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56年春季在圣莫尼卡举行的，兰德公司人员以外，还有国务院的官员参加，两组人员各自代表美苏双方，按假设的情况演习整整一年内可能

^① 我1956年的那一分析发表在兰德公司1956年11月的一份文件中，以后又作为一篇文
《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1957年1—2月的一期。苏共主席团（政治局）会议有关纪录见 *Istoricheskii arkhiv* (Historical Archives), Moscow, March - April 1996, pp.73 - 104, and May - June 1996, p.87.

出现的事态。演习进行了整整一个月。演习有一定规则，但双方都有充分的发挥主动性的余地，而不仅仅是在时间紧迫的危机情况下对事态作出相互反应。这次演习并没有完全“预见”到1957年实际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充分“预见”到演习结束之后在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事态，但是演习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到未卜先知。我体会到这种演习是一种很有益的锻炼，演习的大多数参加者亦有如此体会。

政治演习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有些人把博弈论的某种理论作为行动的依据，有些人则是要模拟现实生活中的谈判、危机处置和政治互动，这两种人之间出现了实质性分歧。博弈论，像下棋或打扑克一样，其原型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在这种竞争中，行动的选择取决于理论上的逻辑和一种互动“模式”。政治模拟也可能利用博弈论，但还有另一种考虑，即力图接近现实，模拟美苏两国政府之类的现实政治实体，引进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的因素，而不只是运用完全依据数学逻辑的抽象模式。这两种做法，兰德公司都采用过，然而它的演习及重要分析报告往往是把博弈论应用于威慑政策及假想的美苏互动。我认为这对战略思想、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种不良的影响。^①

在兰德公司1956年春季那次大规模政治演习中，我在苏联一方，曾发挥主动性，从军事技术的发展角度，预想苏联在1957年中期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演习裁判官（汉斯·斯皮尔）却不允许我提出发射人造卫星，而且把

^① 可进一步参阅 Thomas B. Allen, *War Games: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Creators, Players, and Policy Makers Rehearsing World War III Today* (McGraw-Hill, 1987), in particular chapter 7, pp. 141-60; see also Lincoln P. Bloomfield, "Reflections on Gaming," *Orbis*, vol. 27, no. 4 (Winter 1984), pp. 783-90; Bloomfield and Cornelius J. Gearin, "Games Foreign Policy Experts Play: The Political Exercise Comes of Age," *Orbis*, vol. 16, no. 4 (Winter 1973), pp. 1008-31; and Robert Mandel, "Political Gaming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during Crise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July 1977), pp. 610-25.

洲际弹道导弹降级为中远程弹道导弹。尽管我坚持认为我假设的两个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于 1957 年，裁判官仍然否定了我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当时我预想苏联发射卫星的日期为 1957 年 7 月 4 日，实际的日期仅晚三个月，为 10 月 4 日）。我并不是神人，但只要认真注意情报，就可以看出苏联打算在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 年中期至 1958 年）发射卫星，很可能还试验洲际导弹。可是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到苏联 1957 年 10 月发射卫星和 8 月试验洲际弹道导弹时，都大吃一惊。

其实，兰德公司一直在注视苏联导弹、核武器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我们几个人除了能看到绝密级和 Q 级（原子能）情报以外，还能了解某些特殊的情报。苏联 1957 年发射人造卫星一事本来是可以预料到的（而中央情报局从 1954 年起就估计苏联会发射卫星）。我在兰德期间（1950—1957 年年中），美国对苏联军事科技发展情况所掌握的情报已逐年增多，当然还不充分。兰德公司不可能为改进情报工作直接作贡献，但是我们尽力扩大情报分析效果。例如，我在 1955 年分析了苏联在什么情况下透露或不透露其新式武器发展情况，它是同类分析报告中的第一份。

兰德公司，尤其是在圣莫尼卡的那几个部门，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如何为加强美国军事实力而提出新的要求和采用新的技术。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兰德就研究空军怎样运用航天技术，随后又研究导弹。正是根据兰德的研究成果，加工了的钛开始应用于制造飞机和导弹。兰德 1953 年的研究表明，有可能给洲际导弹装上核弹头，这是总统 1954 年决定开始研制“宇宙神式”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个重要依据。兰德也带头研究怎样将计算机应用于决策程序。（最奇怪的例子之一是 1955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书名是《100 万个随机数字及 10 万个正态离差》，几百页上全是外行人莫名其妙的数字。）当武器技术出现新发展时，我们就迅速跟上，例如布罗迪的《航空兵力时代的战略》书稿到

1959 年正式出版时，就改成了《导弹时代的战略》。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兰德公司逐渐引起公众注意，也引起苏联人注意。1951 年底，苏联有一篇谈兰德公司的文章，标题是《死亡与毁灭学府》。再晚些时候，美国国内出版的一本主要谈兰德公司人员的书，标题虽然客观一点，但也不无批判之意：《研究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奇人》（著者是弗雷德·卡普兰）。诚然，兰德公司——还有后来出现的另一些思想库——是以研究“最坏情况”的威胁为己任。然而，那种威胁确实是冷战初期的最大挑战。兰德公司并没有将苏联对手妖魔化，也没有号召打仗。从最坏处说，兰德公司帮助了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军事竞争，集中于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最严峻形势，从而损害了追求政治关系改善的努力；从最好处说，则是兰德公司帮助确保了强有力的威慑力量，从而使最严峻形势未能出现，同时也使这里的冷战狂人未能为所欲为。归根结底，兰德公司也许是帮助了冷战的延长；或者，它也许帮助我们赢得冷战的胜利。也许，这二者兼而有之。在冷战的后三十年来，还有许多事情相继发生，兰德公司还继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尽管不是中心的作用。

我觉得兰德的工作环境和同事关系是很激励人心的。我能有机会于 20 世纪 50 年代头些年在兰德工作，当时高兴，现在也依然感到高兴。我们在那里的处境很有利，既是置身于政府事务之“中”，又是处于政府机关之“外”。在 50 年代中期，兰德也受到过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但很轻微。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事们被关在华盛顿的兰德公司办公室内收看电视转播的麦卡锡听证会，然后又各自回头干自己的工作，考虑怎样跟现实的苏联敌人斗，而不是跟想象出来的内部敌人斗。

兰德还让我有机会获得头等苏联军事问题专家的声誉（最初还几乎是惟一的这种专家，当然还有军队情报部的专家，但他们是不公开露面的）。人们开始请我去讲演，先是 1953 年在陆军学

院，接着是 1955 年在国防学院。我还到一些大学和会议上作报告，讲苏联军事思想和战略。我的《苏联军事学术》一书受到广泛引用（例如，亨利·基辛格 1957 年在他的第一本书《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就作了引用）。我这本书在英国也出版了，书名改成《俄国怎样进行战争》；它还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在巴西）、中文（在台湾）和土耳其文。尽管未经授权，莫斯科的军事出版社也出版了此书的俄文版本，内部发行。国内外一系列书评对此书作了肯定评价，还有一些前德国将军给我来信称赞此书。由于这本书的缘故，英国的军事作家利德尔·哈特与我保持了多年通信联系，他主编的论述苏军的书以及阿舍·李主编的论述苏联空军的书都约了我参加撰文。最后，我还因此结识了不少外国驻华盛顿的武官，并且在瑞典和瑞士两个中立国的武官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过苏联的武官，当然我在事后充分汇报了会见的情况。

然而，在兰德研究苏联军事学术几年之后，我感到进一步的发展有点问题。兰德对冷战的研究偏重于技术问题，或者说是军事技术问题，我们在华盛顿这里的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不属于兰德的中心工作，而我认为冷战的中心问题不是技术，而是政治，或者说是政治军事问题。1957 年，兰德公司决定把社会科学部搬到圣莫尼卡，使之更紧密地与公司的中心工作结合到一起。这时，我决心变换一下工作，转到政府部门中去。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普林斯顿的同学，一个是耶鲁的同学，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们建议我去那里。他们两人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但是我的推荐材料报上去以后，有关负责人建议我去参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工作，而不是参加秘密情报工作。我可以得到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职位，不仅作情报分析，还作为各国国力估计处（ONE）的估计员，负责估计苏联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央情报局负责各国国力估计工作的副局长谢尔

曼·肯特的助理比尔·邦迪，还有各国国力估计处的苏联东欧组组长约翰·休伊曾加，约我去谈过几次话。肯特副局长愿意接受我，但有一点保留意见，问我是不是只打算干一两年取得经验，然后又回兰德公司？我保证不会那样，于是事情就定下来了，但是邦迪告诉我审批还得过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朋友在国防部的陆军情报部工作，建议我去那里，在詹姆斯·加文中将手下当参谋。我敬佩加文，对他略有所知，而且当时传闻他即将升任陆军参谋长（后来实际情况是他在1957年底退休了）。我考虑过这一方案，但决定不去，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工作是比兰德公司更加偏重军事技术问题。我也考虑过去国务院，但外交工作我得从底层干起，将来发展怎样，也没有把握。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老师西里尔·布莱克教授还曾建议我去跟他一起教书。但想来想去，还是各国国力估计处对我最有吸引力。

我知道，要进中央情报局，审批得过一段时间。恰好在这之前一年，苏联开放了旅游。我的几位大学同学打算在1957年夏季访问苏联。他们跟我一样，都从未去过苏联，研究苏联都只是从远处眺望。我想，与其留在兰德公司等候中央情报局审批，不如到苏联亲眼看看，实地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但是我在兰德有保密身分，只有离开兰德，才好以普通公民和私人旅游者的身分去苏联。我把这想法对邦迪说了，他很赞成，说我在进中央情报局之前去苏联看看，对我本人以及对下一步的工作都有好处。

就这样，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七年以后离开了，先是去苏联旅游，然后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出力，直接评估苏联的意图和能力，而且参与政策的拟订。

第三章

解冻：观察斯大林之后的苏联

我们这些在华盛顿观察苏联事务的人只是逐渐地看出——许多人甚至是很慢很慢地看出——斯大林死后的苏联起了变化。当然不是一切都变了，也不是所有变化都对西方有利，因为赫鲁晓夫及他的继任人更来劲地从事全球抗争。然而，斯大林那种类似偏执狂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内外巨大压力毕竟是大大减轻了。

战时同盟国首脑会议最后一次是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那是杜鲁门与斯大林仅有的一次会晤，代表英国的则先是丘吉尔，后为艾德礼。而战后的头一次首脑会议则比这晚了差不多整整十年：1955 年 7 月，美、英、苏三国都是新领导人，再加上法国总统，相会于日内瓦。除了开会这件事本身以外，这次会议并没有什么成就。艾森豪威尔提议“开放天空”，明知苏联不会接受，只是想揭露苏联社会的封闭性质而已。尽管如此，国际气氛的改善仍令大家感到满意，形成了一个口号，叫“日内瓦精神”。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把这说成是苏联领导人“在外交战线上的一大突破”。苏联还跟原先闹翻了的铁托的南斯拉夫讲和。

赫鲁晓夫在这种新的自信心和另一些因素鼓舞下，开始冒险在国内搞变革，其标志是他 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报告。这一行动的反响之一，是部分地放松了对东欧卫星国的控制，随后导致波兰人自发变更了领导

班子，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发生了一次短命的革命。当莫斯科出兵恢复它对匈牙利的控制时，美国和北约均未加干涉，这就暴露出共和党人早先说什么要“解放”东欧人民纯系空谈，这还表明铁幕两边再次确认了遏制的地理界限。“日内瓦精神”的光彩消退了，但在分裂的欧洲内，东西方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仍在继续。

在1956年末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前不久，有一个苏联代表团访美，使我头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苏联人。美国红十字会与苏联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安排互访，在筹备接待苏联代表团时，红十字会总部通过某种途径了解到我会讲俄语，想请我去当翻译。兰德公司没有参与接待，但不反对我请假去干翻译。于是，在苏联红十字和红新月会主席格奥尔基·米捷列夫率代表团来美国作为期17天的访问时，我和我妻子薇拉就去参加了翻译工作。

这次访问中有一些小事能说明当时苏美在相互了解方面差距不小。红十字会的活动能勉强扯得上的一个敏感方面是它与民防活动的关系。苏联代表团会见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埃尔斯沃斯·邦克及其他官员，在主人方面介绍情况后问对方还有什么问题时，米捷列夫跟他的同事尼古拉·契卡连科（此人显然是代表团的监护人）商量是否提出民防的问题，两人决定不提。我当然没有翻译他们的话，但是我听见了他们的全部对话。但后来契卡连科又措辞谨慎地提出了民防问题，美方代表说明美国红十字会只参与急救训练和救灾活动，然后问苏联红十字会是否对民防感兴趣，米捷列夫和契卡连科立即否认，我们也就不再问了。但我们知道苏联的民防手册明文规定苏联红十字会要进行民防训练，米捷列夫自己的刊物上还有些文章谈核战争时的医疗救护。

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例如，苏联代表团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所负责人芬斯顿向客人介绍情况而我迅速作翻译时，客人们面部露出困惑表情，眼睛盯着楼下交易场地上活跃的人群，

仿佛在寻找我翻译中说到的“熊市”和“牛市”的熊和牛在哪里。参观交易所董事会的会议厅时，芬斯顿骄傲地指着一个大花瓶说那是沙皇送的礼物。当过苏联卫生人民委员（即卫生部长）的米捷列夫惊讶地问：“是我们的沙皇，俄国的沙皇吗？”芬斯顿说明那是该会议厅 1904 年举行落成典礼时收到的尼古拉二世沙皇的礼物，这时米捷列夫对俄国的花瓶有这样荣耀的展示地位感到骄傲，契卡连科则似乎确信他找到了美国巨额融资的资本主义与俄国王室秘密勾结的证据。对华尔街的访问使客人们惊讶不已。相比之下，他们对白宫和华盛顿的故居及墓地芒特弗农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俄国的宫殿的确要气派得多。

我们陪客人访问了艾奥瓦州的埃姆斯，在到达得梅因机场时，恰好碰见正在忙于竞选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夫人乘机离开该地。一名记者问米捷列夫对艾森豪威尔有什么看法，米捷列夫说艾森豪威尔是著名的战时杰出将领和爱国者。他准备接着讲下去时，美国红十字会官员让我提醒他，艾森豪威尔此刻只是两名候选人之一。后来，契卡连科向我抱怨说，美国红十字会那个官员准是民主党人，所以不让米捷列夫为艾森豪威尔说好话。我作了一点解释，只是没有指出，一位来访的苏联官员表示的支持恐怕对竞选者帮不了什么忙。

第二天早上的事更说明问题。《埃默斯每日论坛报》9月22日在头版刊登一张照片，标题是《俄国红十字会官员早餐》，画面却是艾森豪威尔夫妇告别的镜头；下一版的照片是苏联代表团头一天进早餐，标题却是《艾克和老伴向人群挥手》。我们在场的几个美国人觉得这种做法很好笑，俄国人却不以为然。米捷列夫把我叫到一边，很严肃地问：“报社主编会怎么样？”我请他放心，说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不信：“这是一个政治错误，涉及的是总统呀！”他肯定是联想到他的国家，据说有一次一家报纸无意中把一句坏话跟斯大林的像并列在一起，该报主编为此送

了命。

代表团按原先的安排应会见田纳西州长和艾奥瓦州长，但这两次会晤都取消了，大概是由于竞选的关系。然而，代表团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像是不了解这一安排，并未打算会见任何政府官员。但苏联大使扎鲁宾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索波列夫为红十字和红新月会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宴会。

代表团的这些苏联人到美国，对自己见到的景象，尤其是对处处显示出的人们的富裕，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尤其惊讶的是见到美国黑人生活得不错，有些人还很富，并不像他们原来听说的那样受苦受难。然而偏见只能慢慢消失。在芝加哥，有一对衣着讲究的美国黑人夫妇从代表团身边走过，我听到这些俄国人悄悄议论这对夫妇准是埃塞俄比亚外交官！一路上，他们都摆出立场坚定的样子，但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流露真情的时候。在埃姆斯，我们看了一个不大的现代化奶牛场，50头奶牛，3人管理，这时米捷列夫悄悄对契卡连科说，“这样一个奶牛场在我们那里该有50个人。”

如果说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在这些来访者看来像是难解的谜，因为他们对此很不熟悉，那么他们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也难以理解，因为那一套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太熟悉了。9月底《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谈苏联改变了对铁托的态度，从而猜测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力量对比可能起变化。我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告诉米捷列夫，他惟一的反应是一本正经地说：“我还没有看《真理报》呢。”政治讨论也就到此为止。我们向客人们谈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报告，他们只是笼统地证实有这一回事，但不再多说一句。只是在一次私下的交谈中，代表团的一个人承认斯大林的（但不是列宁的）统治不好，在东欧的那一套做法也可能是不得人心。

美国最后给他们的印象如何，是无从得知的。当然，各个人

的反应会是不同的。并没有一个人“皈依”资本主义，但他们不会看不到，美国老百姓并不是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并不是被阶级斗争斗得四分五裂。有一位客人在头几天见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但后来显然想减轻他内心的激动，看到新事物时老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或者“我们的更好”。坦率地说，这样的话也有些是挑衅引起的。有些美国人无意间惹得他们生气，问一些天真无知的问题，例如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冰淇淋，是否看过电视，甚至问苏联有没有剧院！有一个愣头愣脑的人还问俄国的房子是不是全是洋葱顶的。

我们陪客人在圣路易看了一家现代化的超级市场，但他们显然认为这并不是典型的。类似的是，当我们访问埃默斯时，契卡连科发现有一个苏联农业代表团早几个月也去那里访问过，他马上得出结论说埃默斯是一个示范乡镇，是装饰门面做给外国人看的，类似于沙俄时代那个出了名的“波将金村”。（三年后，赫鲁晓夫也去访问过，他无疑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示范农场”的概念已是他们体制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自然也会搬到这里来。那个契卡连科还时刻保持警惕，见到民防掩蔽部（Shelter）的标志 S 就说这证明美国在准备战争。

苏联来访者始终理解不了的一件事就是新闻自由。他们在即将到外地出访之前，一家报纸报道了他们的记者招待会，标题是《俄国大夫说吸烟致癌》，这引起了一场麻烦。问题不在于报道失实，报道写得没有错。但米捷列夫指出，吸烟致癌的话并不重要，是回答一个记者提问时附带提到的。他讲话的中心是强调苏美两国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和爱好和平的性质。主题是和平，而不是癌症。他说那篇报道扭曲了他的讲话。我们解释说报界有新闻自由，他们认为什么重要和什么有意思，就可以怎样报道。但是我们说服不了他们。

陪同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团看看美国，挺有意思，然而这替代

不了自己去苏联看看。上文中说过，我在离开兰德公司而尚未进中央情报局之际，得到了一次以旅游者身分访问苏联的机会。

当时，苏联的做法是发放 30 天的签证，而不是后来那样按具体情况安排时限。我签了一个旅游团的合同，是 7 月上旬出发，为期三周。为了利用我签证上 30 天中余下的 10 天左右时间，我又签了一个 8 月初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的旅游团合同。我的签证下来晚了，只好一个人飞到莫斯科，追上我头一个旅游团，再到基辅和敖德萨，乘船访问克里米亚和索契，再返回莫斯科。

我们乘船从敖德萨到索契途中，船上舱位有限，旅游团的人无法全部安排在一起。我会说俄语，所以让我和几个俄国人住一个舱房。那三个俄国人是一位空军少校及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路上我跟他们聊天，没有听到军事秘密，但从少校夫人嘴里了解到不少军人生活状况。后来，在索契的海滩上，一大群俄国人围着我，打听美国的事情，这时一位上校约我第二天再见面谈点更有趣的事。第二天，我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了他，但他却装作我们从未见过面的样子，从我身旁走开了。这很有道理：头天在海滩上，我已看到有一个并未穿泳衣的男子鬼鬼祟祟地给我们拍照，然后又走过来问我是什么人，说 he 自己是记者。我问他是哪家报纸的记者，他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这时周围的人群都赶快走开了。

在第比利斯，我们旅游团的一个加拿大人在列宁广场（四年前叫贝利亚广场）照相，没有意识到他想拍摄的对面的大楼是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若不是我帮他作解释，他就会遭逮捕了。也是在第比利斯，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包括两位金发女郎，到一个餐馆就餐。这时有几个格鲁吉亚人被两位金发女郎吸引，给我们餐桌送来一瓶香槟。他们以为我们是德国人，建议为“格鲁吉亚德意志友谊干杯”。我照样翻译过来，有几位同伴坚持要我向他们说明我们是美国人。我照译了，但他们却仍然认为我是德

国人，只是另几位是美国人。他们举杯为“格鲁吉亚美国友谊”祝酒，然后又悄悄对我说他们为格鲁吉亚和德国的友谊祝酒是完全真心实意的。于是，那一天晚上我只好充当德国人的角色。照苏联的习惯总是为和平与友谊干杯，他们却根本没有这一套。他们是共产党员，属于当地的上层人士，然而流露出浓厚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丝毫不加掩饰。后来我又去参观了斯大林的诞生地哥里镇的博物馆，尽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格鲁吉亚人仍然把哥里奉为圣地。

我们返回莫斯科时，那里正为 8 月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作准备。这时我参加的第一个旅游团已结束访问离开了莫斯科。我有 30 天的签证，就留了下来，住进了我的好朋友、美国空军武官托姆·沃尔弗上校的公寓（他这时恰好出差了，房子空着）。然后我到列宁格勒加入了第二个旅游团（从斯德哥尔摩来的），设法把我的签证延长了 30 天。此后，我就呆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直至签证到期。

我曾试图直接联系去采访朱可夫元帅，当时他是国防部长，6 月刚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成员，在赫鲁晓夫 6 月击败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为首的政治对手这件事上，朱可夫起了重要的、可能还是决定性的作用。他那时气势正旺，公开宣布“代表武装力量”支持赫鲁晓夫。既然他能宣布代表武装力量支持一位领导人，那就可以设想他也能为一个领导人做同样的事。10 月，当他出国访问时，他就被免职了。当然，我在 8 月设法见到他时，他还处于权力的顶峰。我向国防部外事处提出我的要求，那里的一位上校答复说，朱可夫读过我写的书（《苏联军事学术》），很愿见见我，遗憾的是他“现在军政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这种说法倒挺有意思。尽管我有点失望，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我去了苏共一个研究单位，叫做“基本社科资料馆”。在那

里少见得到了一些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的目录。我见到了《历史问题》杂志——史学界的主要刊物——的主编。我还弄到了伏罗希洛夫总参谋部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出版的几本保密的军史著作但这些只是凑巧的收获。我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此，而在于亲眼看看和更好地了解苏联社会

我与苏联官方没有联系，惟一的熟人是红十字会的米捷列夫教授。他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欢迎我，请我吃午饭。谈起话来，他比访美时敞开得多。他对苏联领导班子的动荡感到不安。此外，尽管他是 1947 年被斯大林撤去卫生部长一职，他说起斯大林时仍然流露出尊敬和近乎怀念之情。他说战争期间他负责整个后方的医疗卫生工作，完成任务毫无问题。斯大林批准的事都得办。我问道如果斯大林没批可是又需要办，怎么办。他说那就得另想办法，但官员们懂得自己处在什么地位。言下之意显然是事情只好到此为止。他说到斯大林时挺有感情地称之为“老人”，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把斯大林叫做“老板”。

我交谈最多也最有趣的对象，是苏联大学生和其他年轻人。有一些人是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及其以后遇见的。最难忘的一次则是在列宁格勒郊外的普希金镇的一所农学院，会见大约 150 名大学生。我和刚从斯德哥尔摩到达列宁格勒的一位朋友亚历克斯·达林乘市郊列车到达那个学院，学生们知道我们是会说俄语的美国人，立刻汇集拢来，在我们每一个人周围形成了一个圈。多数人问的是美国人生活状况。但跟别处的俄国大学生一样，他们也询问“匈牙利事件的真相”。我如实相告，只是对苏联的行动不加评论。我刚说完，就有一个大学生对苏联政府的行动表示道歉！只有一个人为苏联的立场作辩护，但别的人马上把他轰走了。当我们不得不赶末班车回列宁格勒时，他们硬是体护送我们到车站。

在莫斯科，我会见过许多苏联青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有些

人参加过官方未作报道的大学生游行，据说许多城市都发生过这种游行。有的报刊上甚至提到过“游行”（有时称之为“流氓行为”）。有些年轻人说，学生们常常在听报告时追问匈牙利事件的真相。有一次报告人拒绝回答，听众就全部退场了，另一次是报告人自己逃开了。我听说莫斯科发生过一次绝食抗议，还有得到证实的消息说大批学生被开除，其中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开除了大约 140 人。

当局显然看到，莫斯科 1956—1957 年一些自发冒出来的议论团体并不是与布达佩斯的裴多菲俱乐部毫无相似之处。有些大学生告诉我，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有些人甚至热心地向我打听布达佩斯的学生和工人是怎样合作的。我在莫斯科遇见过曾在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充当非正式“联络员”的年轻工人。1956 年 11 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一次青年集会上生气地冒出一句话，威胁说要把那些捣乱不听话的大学生送到工厂去劳动，就是这个政权已在意识形态上破产的例证。他在一个理论上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里说这种话，是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工人的侮辱，也是对大学生的侮辱。苏联政策自相矛盾的一个例子，是当时作出了一条新的（也是短命的）规定，要求中学毕业生先参加两年生产劳动才能再上大学。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减轻大学的压力以及让青年体会工厂劳动。但这样一来，就让工人和学生靠得更近了，让工人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中间蔓延的不满情绪的“沾染”。学生们也更加懂得了普通工人的生活艰难，看到官方宣传与现实的矛盾。有几个大学生硬拽我去看看普通工人可怜的宿舍，那种景象跟我几星期前作为外国旅游者被带去参观的示范住宅形成了可怕的对比。最后，这些大学生也知道苏美两国工人住房条件之间的巨大差距，但还是一而再地向我打听一些细节。

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环境下与我交谈过的青年大致有几个类型。第一类是那些天真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刚从中学毕业出来

的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好奇心强，求知欲高，但对于他们听到的宣传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缺乏体会。这是苏联宣传能见效的最大群体。但这一群体的人员会不断流失，因为这些青年很快就会转入以下三种类型之中的某一种。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政治上早熟的怀疑派。第二类是官方宣传的信徒，他们相信官方的神话，是出于爱国心，或是出于对自己前程的考虑。这类人是少数派，即使在共青团内也是如此。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则是第三类，即逍遥派。逍遥派中的精英是党政军和官方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娇生惯养的子女。命运不济的逍遥派青年则会沦为黑市商贩、游民或流氓。还有些人成为奇装异服派，想逃脱官方主张的生活方式的束缚，追求享乐和西方流行的（往往是经过夸张变形的）装束和派头。最后的一类则是日益对现实不满的、心怀警觉的知识青年，尤其多见于大学生之中。

这些青年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情况，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从课堂上听到的以及从《真理报》看到的许多东西有怀疑和不信任。他们对美国的生活、世界政治和苏联政府的事态都提出很多问题。他们对官方宣传有怀疑，但对这种宣传的谬误却了解不够。例如，他们感到真正困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把预算的一半花在军备上？”我解释说，美国的国家预算与苏联预算不同，不包括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等经济部门。如果把经济各部门都算上，那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美国的军费预算还不到它的 10%。这样一说，他们才明白了。当然，在那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全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官方宣传只说军费在预算中占多大比重，却不说预算与预算的差别，有意造成了误导。

谈到裁军问题时，这些青年往往提问：“为什么美国不同意禁止核武器？”我得说明两点。第一，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而美国的军事实力有赖于核武器，因此

削减或禁止核武器，会使军事力量的对比严重失去平衡。我们对苏联领导人缺乏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禁止核武器是不妥和不负责的。第二点则是俄国青年很感兴趣的一场对话，即我们为什么不信任苏联当局。我说，美国人民懂得俄国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但我们有理由担心，既然一个政府不是人民自由选举出来，不是向人民负责，那么它的政策和行动就不一定会反映人民的真正利益和愿望。我回顾了冷战的历程，从 1945—1947 年的东欧说到 1956 年 10 月和 11 月的东欧，这当中说到 1948 年的捷克政变，1948—1949 年的柏林封锁，尤其是说到朝鲜战争。俄国大学生一般都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往往把过错全归咎于斯大林。但说到匈牙利，他们就沉默了。有时他们承认苏美两国应共同为紧张局势负责。像这样承认事实，哪怕是有保留地承认苏联负有一半责任，这在当时的青年俄国人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他们常问到的另一件事是“为什么我们俄国旅游者不能去美国？”我说，能啊，问题是苏联政府拒绝当时美国法律所要求的按手印留指纹。这种要求在苏联只适用于罪犯，被认为是可耻的。但是我指出，出国旅行总得尊重别国的法律和习俗。例如，在美国，我们没有任何的国内通行证或护照，任何人在美国不需要通行证或护照就可以在各个城市和各州之间走动，变换工作等等，用不着到警察局登记。可是我作为一名访问者在苏联，每到一家旅馆、一个城市，都得把我的护照交到内务部门登记。在美国，只有假释的犯人才需要到警察局登记。这样一对照，听众马上就明白了，知道所谓指纹问题不过是苏联当局的一个宣传花招。（此后不久，留指纹的规定取消了，缺乏旅行自由的罪过再也归不到美国政府头上了。）

以上都是他们常常问到的问题。当然还经常问到“美国普通工人能挣多少工资？”“他拿这些钱能买到什么？”“美国不是存在着广泛的失业吗？”“对黑人的歧视呢？私刑呢？”如此等等。我

总是尽量如实回答。他们听到美国并不是十全十美，反而觉得我的话更加可信。但有些人听了实话反倒不舒服，因为他们对美国充满幻想，以为美国是人人享福应有尽有，似乎那里人人都有仆人侍候，可是没有一个人当仆人。

195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是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 动，集合了来自 131 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 34000 名青年（15—35 岁）。我是一个外来的旁观者，主要关心苏联方面的反应。但我也捎带着看到，一些来参加联欢的西欧人本来是热情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同情者，却失望而归，但颇受优待的非洲人和南亚人却大多满意，对莫斯科、俄国人和苏联的宣传留下良好的印象。

苏联人为筹备联欢节可谓不遗余力。我在联欢节开幕前两周到了莫斯科，看到惊人之多的修缮和粉刷工程——全是在主要街道的建筑物正面。莫斯科本是景色如画，但房屋大多年久失修，显得破破烂烂，早该整修，却拖到这时才急忙装饰门面。（有哪个国家的城市能像莫斯科那样，在 1957 年骄傲地宣布修整了建筑物正面达 160 万平方米？）“大扫除”还有进一步的内容：黑市商贩和妓女以及诸如此类的不良分子凡是已知的都抓捕起来，使之退出流通。商店的货物先收起来储藏几个星期，等到联欢节即将开幕时才拿出来，于是货架上有货，老百姓原先无货可购，手里攒下了钱，这时也有钱购物了。

我弄到了一本由苏共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宣传鼓动部编发的、不公开的《联欢节鼓动员手册》。它的资料包括联欢节的组织安排、有关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以及有关英、法、德等国工人和大学 生的所谓苦难（这一部分内容的效果适得其反：这几个国家的青年来了以后，听到别人说他们在国内吃不饱穿不暖，都笑掉大牙，把这种宣传货色笑得无影无踪）。那手册除了“和平与友谊”的官方口号以外，在头一页上还有针对西方的一句话：

“战争贩子们在继续进行其危险活动，企图取消缓和紧张局势的最初成果，加剧战争歇斯底里和军备竞赛，镇压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平是主题，但这是很单方面的和平，把莫斯科装扮成世界的和平首都（在开幕式上，各代表团进场时都高喊“和平”、“友谊”，有些人还按照共产党的习惯高举着拳头，喊着“莫斯科—河内”、“莫斯科—阿尔及尔”、“莫斯科—伦敦”等等）。

联欢节期间的弄虚作假，大多数来宾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俄国人明白。有几个俄国人带我去美国非官方青年代表团住地附近的一个报刊摊位，那里摆放着一大堆美国政府办的俄文《美国》画报。但没有人买它。有关当局给俄国人打过招呼，不许买那画报。我早先多次听说《美国》画报在这里很抢手，一拿出来就卖完了，有人拿它到黑市倒卖，价钱是原价的十倍。那么这里的画报为什么不卖呢？原来苏联当局要让来访的美国年轻人看到这情景，回国后就会说俄国人对它不感兴趣。（每个月，苏联当局都把一大堆“因无人想看而滞销”的《美国》画报退还给美国大使馆，用这种办法把它的销量压低，使之与英文的《苏联》画报在美国的销量相当，而那个画报是真因为没人想看而卖不动。）俄文《美国》画报 1944 年起好不容易才办起来，1952 年斯大林下令禁止进口，到 1956 年才获准重新运进来。

联欢节来了这么多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使苏联青年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大开眼界，看出了苏联宣传的许多骗人假话。因此，联欢节最后算总账，苏联当局大概是吃亏的。美国政府总的说来是不赞成美国人参加这一活动，但最后还是来了大约 160 人。事后听说，其中有些人的路费是中央情报局出的，当然不是让他们来当间谍，而是让他们观察一下各国来的人，并参加宣传辩论。表现最出色的是耶鲁大学的俄语合唱团，上文中已说过我是它的创始人之一。但在 1957 年，我不知道当时有一批成员已

被中央情报局录用。中央情报局一项内部报告中将这个合唱团说成是“我局的一重要资产”。^①

联欢节的开幕式使我想到了塞西尔·德米尔导演的那些影片中的壮观场面以及希特勒 1936 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大游行。然而，这情景并不完全是“表演”。普通俄国人的友谊十分真诚，希望和平的愿望也令人难忘。只是这些诚挚的感情被当局利用以求达到其阴险目的。在联欢节期间，俄国人与外国人的接触自然是频繁而又自由的。但俄国学生们知道，联欢节一过去，当局又会加强控制；有些学生当时就这样对我讲过。联欢节结束以后，我在那里还停留了几天，亲眼看到了这一点。有几个俄国年轻人因为跟我谈过话而被拘留和审查。他们的朋友告诉了我，有几个大学生是放出来以后亲自告诉了我。当局追问我跟他们谈过些什么，尤其是追问我问过他们一些什么。在追问过以后，一般也就放他们走，但警告他们别再跟外国人混在一起，有的人还被特别警告别再见我。在列宁格勒，有个年轻人向我谈了这些情况以后，说“但是我不怕”。我告诉他，虽然我愿跟他再谈下去，但他显然还是照办才好，就主动停止谈话，不再见他。

我在莫斯科见过几个青年，他们是显然已初露头角的持不同政见者。很快就看出他们受到了监视。（就我自己所能觉察的情形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没有受到监视，但有一次我见过几个年轻人以后，发现有“尾巴”跟踪。）我跟他们接触时，只是听他们说，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美国的问题。我给过他们所要的几本美国《时代》周刊，那是我从美国使馆拿到的。仅此而已，别无其他。这些俄国青年当中有一位当时 20 岁，在那以后成了一个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20 年中多次进出监狱，直到 1979 年终

^① “Covert Action Operations: Soviet Russia Division, 1950 - 1968,” CIA Clandestine Services History 335, p.30; quoted in Evan Thomas, *The Very Best Men, Four Who Dare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IA* (Simon & Schuster, 1995), pp.62 and 362.

于被允许移居美国。他就是亚历山大·金兹伯格。他和他的几个同学是在莫斯科的索科尔尼基公园会见我的，我给过他们《时代》周刊。但后来他被捕不是因为见过我，而是因为他一直未断的持不同政见的活动。

在 1959 年和 1963 年，我正式访问苏联，又有机会观察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俄国人民，但那两次（以及后来的多次）访问中，我主要是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苏联官方的思想趋势，但再也没有机会像头一次那样接触俄国青年或持不同政见者。我在 1957 年见过那些青年，多数人自然并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苏联社会条件下过着谨慎小心的正常生活，并不期待那环境出现剧烈改变。然而，1957 年的环境与斯大林时代相比已有若干重大变化。由于与西方的往来逐渐增多，某些方面已有所不同，尽管在其他方面多年之内还不会改变。

能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一下苏联政府机构的运作，对我很有益处，加深了我早先研究苏联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时所得到的认识。苏联这个冷战的敌手不是抽象的铁板一块的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它是可以变化的，最终它也会变化。

在回国途中，我在华沙逗留了几天。那里最有趣的一次谈话，是我跟波兰两位新闻工作者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主要是谈当时东西方之间的解冻，以及苏共开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所谓反党集团一事暴露出来的苏联领导层的内斗。那次交谈很有意思，他们知道的事挺多，思想也开放。他们中的一位是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当时是波兰很有影响的《政治》周刊的评论员。不久，他就担任了该刊主编，而 30 年后成了波兰的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和党首。我第二次见到他，竟是差不多 40 年以后，在华沙。

我 8 月底回国，立刻投入写作，继续写我早先已开始的一本

论苏联战略的书，但我也期待着早点进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工作。可是他们对我的安全审查拖延时日。我自从 7 月初离开兰德公司以后就没有收入，我访苏的来回费用全是自理，我还得养活我的妻子和一岁大的儿子。我需要找一个临时职业挣钱过日子。这时，中情局的邦迪救了我，介绍我到联合报业研究所翻译俄文稿件，挣点稿费。我顺利通过了该研究所的翻译水平考试，开始在自己家里做稿件翻译，三个月后，中情局的审查才终于结束。其实我早就通过了该局对新雇员进行的测谎器检验，但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我交待与外国人的联系。我尽力回忆，充分报告，但仍没个完。后来我才知道问题何在：1946 年在纽约一次阿拉伯国家联盟招待会上，我见过一位中东国家大使，后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母亲为我的婚礼给他去过信，他就给我发来了一封贺电。这位大使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也忘了贺电的事，更想不到这算个什么“联系”。中情局的审问者不提此人此事，不给一点提示，却认为我有所隐瞒。此外，我这次访苏之行尽管事先征得邦迪的同意，审问者却也认为有可疑之处。拖了三个月，审查才完。

就这样，从 9 月到 12 月，我写完了论苏联战略的书，写了几篇文章（包括有关苏联导弹情况的文章，因为正是在此期间苏联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和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为联合报业研究所翻译了几篇文章和一本书，稿费够用于交房租了。12 月末，中央情报局终于通知我去报到了。

第四章

中央情报局及情报分析和国力估计

1957年12月27日，我到中央情报局（中情局）的各国国力估计处报到。该处设在华盛顿特区西北部 E 街 2430 号一座小山上的中情局总部内。这个处有一个国力估计委员会，由十来位老政治家、前大使和将军及教授组成。处内有几十名专业分析员，负责起草估计报告，按地理区域分工，分管苏联和东欧（我在这一组工作）、西欧、中东和远东，还有人负责“世界”综述。处长由中情局负责各国国力估计工作的助理局长谢尔曼·肯特兼任，驻委员会的副处长是后来接替他的阿伯特·史密斯，管我们这一摊的副处长是威廉（比尔）·邦迪。这个处不算大，总共 60—65 人。（肯特的前任是威廉·兰格，他战时曾主持战略情报局的研究与分析工作，战后到哈佛大学教历史，1950 年奉召回中情局筹建各国国力估计处，当时中情局领导说他需要多少人就给多少人，一千人都可以，可是兰格说他不要那么多，20 人就行，最多 60 人。）

中情局像它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一样，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是不无道理的。美国东部社会上层，尤其是常春藤名牌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不仅有着教育和社会方面的背景，而且还掌握语言技巧以及出国旅行和经商的经验，因而胜任外交和情报工作，擅长于跟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打交道。此外，这些教授彼此熟悉，而且了解他们教过的学生。常春

藤名牌大学一般还集中有历史、国际关系和地域研究方面的成果。所以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这些大学的师生很自然地形成情报队伍的骨干。^①在我进中情局的时候，这骨干包括艾伦·杜勒斯、罗伯特·艾默里、理查德·比谢尔以及肯特和邦迪等人。

在冷战的头 10 年至 15 年，美国许多年轻人乐意到中情局工作，认为那里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前线。他们尤其向往秘密情报战线。当时各大学培养出了新一代苏联问题专家。乐意从事情报工作的还有白俄移民的下一代。中情局秘密情报领导人之一哈里·罗齐茨克在退休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曾写到白俄的新一代，说他们“参加中情局的行动，将其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头一仗。他们富有活力和才干……决心为捍卫自己的理想和抗击这一理想所受到的威胁而战斗。”^②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如此。

进入中情局情报分析部门的人较少，因为政治分析员数量有限。我是其中一员，所以我能证明中情局当时确实士气高昂。我们认为自己是为支援冷战而献身，而且在所有政治部门中，只有我们才是一心追求真理而不追逐本部门利益。艾伦·杜勒斯对此了解得很透彻，所以当中情局的新楼 1961 年在兰利落成时，他规定大门口的题词是“你应知道真理，真理将使你自由”。

艾伦·杜勒斯自 1953 年至 1961 年任中情局局长（在这之前，自 1951 年至 1953 年是担任副局长，先主管秘密情报工作，后主管全盘情报工作。1949 年，正是他与人合作写出了那份要求成

^① 请参阅 Robin W. Winks, *Cloak and Gown: Scholars in the Secret War, 1939 - 1951*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7. 该书以大量事例谈到耶鲁校友在情报界所起的重要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利平科特也介绍了大批同学进中央情报局。亦可参阅 Evan Thomas, *The very Best Men: Four Who Dare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IA* (Simon & Schuster, 1995), especially pp.9 - 6.

^② Harry Rozitske, *The CIA's Secret Operations*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7), p.26.

立中央情报机构的著名报告。) 我在他手下工作时间不是很久，对他了解还不够深，然而就我知，我是尊敬他的。他一向最关心间谍工作，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 1919 年的巴黎和会时，他就以年青外交官的身分从事情报活动。但与此同时，他也支持和关怀情报分析和估计。在 50 年代初麦卡锡企图迫害许多人时，艾伦·杜勒斯坚决保护了“他的人”，尤其是保护了比尔·邦迪（迪安·艾奇逊的女婿）。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比他哥哥约翰·杜勒斯强，因为他哥哥并未有力地保护国务院那些无辜受害者。^① 正如艾伦·杜勒斯的传记作者所说，他是“绅士间谍”的典型。^② 当然，他不是没有缺点，这特别表现在他过分热衷于隐蔽的政治行动，然而在中情局的整整头十年，他仍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人。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情局的衙门气息比其他多数政府机构轻得多（在这一点上，它与如今的中情局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它的上层和内圈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形势是紧张的，工作也很艰苦，中情局的生活总的说来受到保密方面的自我约束，然而内部的气氛却是相当松快和开放的。这在颇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常春藤名牌大学出身的，艾伦·杜勒斯本人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此外，它的高层核心成员都是战时的战略情报局的同事。即使是我们这些较年轻的新人也以自己作为中情局的一员而自豪，至少期盼着有朝一日也加入到这一俱乐部之中。中情局当时还真有一个“俱乐部”，叫 *Alibi Club*，那里常举行一些非正式的社交活动，甚至是半官方的活动。我有幸到那里参加过几次非正式的聚会，有一次艾伦·杜勒斯也在场，大家一

^① 尽管如此，中情局仍然有些人因遭到匿名诬陷而受到迫害，科德·迈耶即是其一例，见 Cord Meyer, *Facing Reality: From World Federalism to the CIA* (Harper & Row, 1980), pp. 67 - 84.

^② 见 Peter Grose, *Gentleman Spy: The Life of Allen Dulle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边喝白兰地和吸雪茄，一边听老秘密情报工作者讲“战争故事”。

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第七章中再谈间谍活动以及其他的隐蔽活动，但我在中情局的工作主要是情报分析和处理，供政策制定者考虑，为政策服务。这里我仅仅指出，中情局最著名（也是恶名远扬）的活动正是各种隐蔽行动，那是艾伦·杜勒斯以及另外许多（但决非全部）老情报工作者所偏爱的事。有些隐蔽行动成功了（至少在短期内看来是成功），例如 1953 年推翻伊朗的摩萨台政权和 1954 年推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权；有些行动却失败了，例如 1949 年支持西藏的叛乱，和 1958 年企图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而未达目的。总的说来，这类隐蔽政治行动的效果如何，是可疑的。最后，1961 年 4 月，中情局策动古巴流亡者到猪湾登陆，遭到惨败，这导致了艾伦·杜勒斯退休，“老人们”对中情局的领导也由此告终。

尽管公众的注意力后来集中于中情局的隐蔽行动，中情局头一代领导人（还有别的政府部门的人，如乔治·凯南）也过分关注隐蔽行动，但中情局的业务却主要是情报收集和加工。我的任务主要在最后一项，即情报的分析和估计，这与政策相关，因此本章下文中将集中谈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中情局的工作中，对于情报，有几个基本的而又彼此有所重叠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国家情报，表示情报关系到总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仅关系到某一部门的利益，例如仅与海军有关的海军情报。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基本概念是从组织上来说的中央情报，即情报既关系到国家利益，又关系到个别部门或若干部门的利益，因而在一个情报机构内或几个情报机构之间加以协调，以确保能相互通报和加以评估。第三个概念，即战略情报，是最基本的概念，从情报的功能来看，它不但关系到情报涉及的范围和组织，而且关系到情报的目的。总的说来，它是指为国家战略需要服务的情报，其首要目的是确保国家安全。它涉及国际

关系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各个方面。战略情报包括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敌国——在冷战期间首先是对于苏联——的意图和能力的了解与评估。

谢尔曼·肯特在一本书中为美国的战略情报思想奠定了基础。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写出此书初稿，但直到 1949 年，在他已离开战略情报局而尚未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此书才得以出版，书名叫做《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的战略情报》。另有几本书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① 因此，当组建中央情报局时，该局工作的顶端是为国家情报出力的战略情报分析组织，请肯特来领导这一部分工作，是很恰当的。他负责这一工作达十余年之久。肯特认为，对政策制定者最有力的情报必须是客观的和无偏见的，而不能是为某项政策主张制造理由。

肯特强调，情报的应有作用以及对政策制定程序和决策人的最佳帮助，是如实反映情况，“是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情报分析的结论与现行政策或拟议中的政策不相符，那更应如此。在情报界，特别是在中情局，这一观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一直占上风，在后来也通常居主导地位，但有时遭到非议，首先是在里根时代，威廉·凯西任中情局局长和罗伯特·盖茨任副局长时，这一观点受到过非难。

国家情报估计报告 (NIE)，是由中央情报局在情报界（包括政府各部门和各军种所属的情报机构）各单位参与下起草的估计报告。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有一个协调机构，叫做美国情报委员会 (USIB)。后来有些机构变化。1973 年，各国国力估计处改为由各单位的国家情报官员松散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

^① Sherman Kent,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Roger Hilsman,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Decisions* (Free Press, 1956); Harry Howe Ransom, *Centr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and Bruce D. Berkowitz and Allan E. Goodman,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NIC)，但基本的工作程序未变。我这里将谈谈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的运转情形。

在进一步介绍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之前，我要指出，各国国力估计处除了依靠自己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外，还依靠中情局其他各处室所提供的分析，而我们这些情报分析均综合取材于各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和秘密渠道所收集的情报。例如，了解苏联政策的一个窗口，是苏联与外国共产党的联系。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盟国和友邦的情报机构，派人打进了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上层，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头目。由此而来的情报很有用，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苏联如何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有时还可以了解到苏联与东欧诸国以及特别是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情况。在跟踪 1958—1959 年日益加深的中苏摩擦方面，中情局的分析员一直居于最前列，而到了 1960—1963 年中苏公开分裂时，中苏两方面都向别国共产党诉说对方的种种恶劣行径，我们通过渗进各国共产党的人，对世界共运那场大论战有了更深刻得多的了解。

在分析苏联政治和军事意图及能力这一点上，尽管我们对情况多多少少有所了解，但仍然有必要作出估计。正如肯特所说，“当你不知道时，你就得估计。”

编写估计报告，是年年都需要完成的一项持续不断的作业，同时，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及其所属的计划局、中央情报局或政府其他部门（通常是国务院）都要求我们提供估计报告。报告提纲由各国国力估计处拟出，分别送交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及稍后成立的国防部各自所属的情报机构传阅。凡是能就某一具体问题提出意见的其他单位以及中情局其他各处室，也都征求他们的意见。下一步，是各国国力估计处的成员写出估计报告稿，送交国力估计委员会（BNE）审查。从其他单位征求来的意见均由报告起草人酌情吸纳。初稿完成后，提交美国情报

委员会（USIB）所协调的各个单位，各单位代表再聚到一起讨论修改，争取提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报告文本。文本接近定稿时，国力估计委员会（BNE）再议一次。报告的最后一稿再交美国情报委员会（USIB）讨论后，即形成国家情报估计报告的最终文本，此时尚剩下的不同意见以脚注形式附在文本内。报告文本由中情局长签发，呈交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此外，还根据报告内容，送交各有关政府官员。因此，报告有时共达二三百份之多。每当发生新情况或危机时，则需要立即提交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SNIE）。

我在中情局工作的那四年期间，对于苏联、东欧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平均每个月要提交 1—2 项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其中至少一半是关于军事题材的。但这些报告是相互有所重叠的，完成一项报告大多需要几个星期，有的甚至要几个月才能完成。例如，有一项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是要估计苏联今后五年的政策。（比方说我们在 1958 年提出的这一报告，编号为 NIE 11—4—58，标题是《苏联能力与政策的主要趋势，1958—1963》。）像这样一项报告要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方面面，厚达 80—100 页，有时甚至更长。这种做法在 1961 年才取消了。然而，即使在取消它之前，尽管有一项全面的报告，仍然需要就军事政策的各主要方面写出更详细的补充报告。

我起草的第一份报告内容较窄，是《苏联对美国可能在南极洲采取的行动的的反应》，编号为 SNIE 11—3—58，日期为 1958 年 2 月 11 日。写这项报告，是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要讨论美国是否应对南极洲的一部分提出领土要求，以及是否应邀请苏联参加计划召开的讨论南极洲问题的国际会议。我起草的报告要供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作参考。在研究情况以后，我的结论是：苏联正积极从事南极洲科研，而且像美国一样尚未提出过领土要求，因此应当邀请它与会。此外，美国最好是不提领土要求，以免促使

苏联也提同样的要求。我的见解得到了国力估计委员会（BNE）、中情局局长和美国情报委员会（USIB）的批准，而形成了正式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这最后也成了美国的政策。当然，美国政策的制定不一定只是依据国家情报估计报告的见解，但在我这一次的报告中至少没有提出任何可能导致不同决策的信息或意见。附带说一下，1959年的南极洲条约规定了南极洲的非军事化，是冷战时代达成的第一个军备控制协议。几个月后，我又起草了头一个谈苏联对待裁军的态度的估计报告（SNIE 11—6—58，1958年6月24日），该报告引起了一些军方人士的反对，空军情报人士尤其反对该报告中的如下判断：苏联会考虑那种有可能遏制它追求军事优势的势头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

由于1956年末东欧爆发的变化和暴力事件受到持续不断的关注，1958年有三项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是审议该地区的政治动态，它们是：《东欧卫星国稳定前景》（NIE 12—58，1958年2月4日）、《波兰前景》（NIE 12—6—58，1958年9月16日）、《中苏集团内反共抵抗运动的潜力》（NIE 10—58，1958年3月4日），这第三项是50年代同一内容的几次估计报告中的最后一次。

北约考虑在欧洲部署美国中远程弹道导弹，此事引出了一项特别估计报告：《中苏两国对美国在苏联集团周边部署中远程弹道导弹可能作出的反应》（SNIE 100—4—58，1958年4月15日）。台湾海峡的金门危机引出了两项估计报告：《中国和苏联在台湾海峡地区可能的意图》（SNIE 100—11—58，1958年9月16日）和紧急情况估计报告《中苏和自由世界对美国在远东有限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反应》（SNIE 100—7—58，1958年7月22日）。赫鲁晓夫对西柏林发出最后通牒所挑起的柏林危机引出了一项特别估计报告《苏联在柏林危机中的目的》（SNIE 100—13—58，1958年12月23日），此后直到1962年每年均就此提出估计报告，仅1961年有关柏林的估计报告就有6项之多。在这些估计报告中，

我们中情局作出了正确的估计，认为赫鲁晓夫将会打退堂鼓，这与国务院的看法形成了对比。

在柏林之类的问题上估计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是，往往有人认为它是“进攻性”的，有人则认为是“防御性”的，辩论不休。我们在各国国力估计处起草报告时，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把两方面的论据结合起来，遇到情况，尤其是苏联主动造成的情况时，把苏联决策人可能考虑的目的从最低限度到最高限度列出一系列的方案。最低限度通常是指防御性的目的，然后由低到高，估计他们可能随情况演变而求达到较高目的，直到估计他们可能追求的最大目的是什么。有些军方人士，特别是空军人士，往往认为苏联领导人只会是追求最高限度的进攻性的目的，而较低的可能性均不足信。不过他们要么是不吭气，要么是把他们强调威胁严重的不同意见写成脚注，附于报告之中。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有几项国家情报报告谈到 1959—1961 年时曾闹得人心惶惶的“导弹差距”问题，即人们担心苏联在建造洲际导弹方面跃居领先地位。1958 年有一项报告分析苏联远程轰炸机的兵力，则使 1956—1958 年的“轰炸机差距”争论归于平息。

附带说一下，这些估计报告现在均已撤销密级，在国家档案馆可以查阅。然而在当年它们是严格保密的。它们的密级是机密或绝密，但起草报告的关键人员在调研过程中能看到更严格保密的和“特封”的情报，如电信情报和信号情报以及 U-2 飞机和后来的侦察卫星得来的图像情报。国家情报估计报告除了通常是作为机密和绝密情报以外，有时还作为特殊情报，限制在更严格的范围。

我进各国国力估计处后，在初期也与处里绝大部分人一样，未获准调阅 U-2 情报，直到 1959 年由于承担了其他特别任务，才批准我看它。我的一位同事霍华德·斯托茨主要是负责军事方

面的估计，他自然是一直获准看 U—2 情报的。

我清楚地记得，1960年5月1日，斯托茨和我突然获悉一架 U—2 飞机在苏联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了。我们本来焦急盼望这次侦察飞行的结果。假如 U—2 没有击落，它带回的情报就会证明，在普列谢茨克导弹发射场只部署有四个发射场，跟秋拉塔姆试验场上的部署相等，同时还会证明人们怀疑的另外两个大发射场纯属子虚乌有。总之，当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们对“导弹差距”的疑虑，而不必再等一年多让卫星照片来证明这一点。可是 U—2 被击落了。

当时对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水平，空军的估计很高，陆军和海军的估计很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则是在这两端之间。我当时深信苏联的导弹部署进展缓慢，我估计的水平低于中情局的估计。尽管当时已知的迹象是倾向于低水平，但在 1959—1960 年尚无法下结论，因此我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一些同事直至艾伦·杜勒斯本人采取了折中立场。在我们处内，我积极参加辩论，发表了我的意见，可是我不是负责这项估计任务的人。

情报估计应比以信息为依据的报告更进一步，要在现有各种情报的基础上对对方的意图或能力作出估计，还要对暂缺信息的情况作出判断。在 1959—1960 年“导弹差距”的问题上，陆军和海军的情报官员无疑是考虑到自己军种的利益，只按照当时信息作出低水平的估计。而空军的情报官员则处于另一种心态，出于其军种利益的考虑，尽可能夸大苏联导弹的威胁，强调苏联的许多情况是我们尚不了解的，把苏联导弹的部署水平尽量往高里估计。国务院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自身利益考虑或偏见，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几个人仍提出高水平的估计，只比空军估计的水平略低一些。在我们处内以及整个中情局内，意见不一，但谢尔曼·肯特和艾伦·杜勒斯采取折中立场，估计的水平是在高低两头中间。而后来事实证明，陆军和海军（以及我个人）的估计是

正确的。

1961年6月至9月，卫星摄影侦察证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尚处于很低水平，“导弹差距”之争才终于结束。通过卫星照片查清了苏联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场。由于地下发射场有18个月的建设周期，通过卫星侦察还可以准确地估计近期将达到的部署水平。至于远期的水平，估计仍可能有偏差，从1963年到1966年，中情局的估计一开始偏低，后来又偏高。

美国各军种的情报部门分别对苏联相应军种的常规兵力作估计，各自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地盘”和特权，艾伦·杜勒斯向来不去碰这些事情。因此，在20世纪整个50年代，对于苏联和华沙条约常规兵力水平的估计，中情局只起协调作用，偶尔还充当“掮客”。然而在“轰炸机差距”问题上，当有关苏联轰炸机生产及部署情况的信息直接表明空军的估计不准时，艾伦·杜勒斯还是站出来说了话的。当然，常规兵力问题不曾像“导弹差距”那样引起恐慌和大的争吵。

1960年1月14日，我正坐在办公室时，电话响了：“雷，苏军有多大？”我马上听出了这是我顶头上司的上司罗伯特·艾默里副局长的声音。这个电话，尤其是这个问题，来得很突然。我开始回答说，这要看怎么算，是不是把边防军和施工部队也计算在内，是要陆军师和主要军兵种部队的数目，还是要兵员数字。我正要讲下去时，艾默里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要学术论文，雷，只回答问题。赫鲁晓夫刚说苏军总共360万人，对吗？局长（艾伦·杜勒斯）来电话要查一下。”我告诉他，我们的情报估计数字略高一些，为400万以上，但这是软数字，我想赫鲁晓夫的数字可能是对的。说到这里，我听到一声“谢谢”，电

话挂断了。

我很快就受领了一项新任务：起草一项关于苏联武装力量规模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SNIE）。^① 就这样，中情局开始涉足一个新的麻烦的领域，要估算苏联陆海空军的兵力。按照惯例，美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先各自对相应的苏联军种作出估计；然后，我作为各国国力估计处的报告起草人，可以利用他们的估计数字，也可以予以变更甚至完全另起炉灶，但需写明我自己的不同估计数字的根据。在国力估计委员会，负责此项报告的委员是空军退役中将厄尔·巴恩斯。这项报告编号为 SNIE 11—6—60，具体任务是“估计 1960 年 1 月 1 日苏联武装力量的兵力”。虽然只估计总的兵员人数，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搭积木”，因此要先估算出苏军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兵力，并说明估算的根据。这就必然要了解苏军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及原先人们不大感兴趣的一些单位。

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是负责情报的陆军助理参谋长办公室（习惯上称作 G—2），它一向很关注苏联陆军的兵力，因为地面部队是苏军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兵员又是它们的关键因素。但 G—2 也很关注苏联陆军师及其他部队的数量，关注其战斗序列编成，却未注意其中每一单位的实有兵员以及后勤、训练等后援单位的兵员。美国空军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办公室（ACS/I）则是一向计算苏联空军的飞机数量和部队数量，而未注意其人数多少，而且力图把苏联的军用飞机说成是至少跟美国空军的飞机一样多。海军情报处（ONI）的做法也是只估算苏联海军的舰艇数量，而不关注其兵员人数，不过他们有这么一条估算兵员的经验法则：首先估算舰员人数，然后估计各类岸勤人员与舰员数额相等，最后——又是一条不成文的经验法则——断定苏联海军兵

^① 有关详情及该报告全文，见 Raymond L. Garthoff, “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Force Leve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Spring 1990), pp. 93–116.

员总数不低于美国海军（尽管苏联海军的在编舰艇比美国少许多）。在 1960 年，国防情报局（DIA）尚未成立。

中情局的早先的估计报告只是简单地把各军种的估计数字综合在一起，具体数字是：苏联陆军 265 万人，海军 60 万人，空军 50 万人，防空军 40 万人。再加上苏联内务部下属的公安部队、克格勃（KGB）下属的边防军以及其他不列入正规军的军事化保安部队共约 40 万人。最近一期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NIE）把苏联兵力总数估计为 426.5 万人。这些数字已为大家所熟悉，年复一年沿用下来，无大变化。在各方代表聚在一起审议和协调国家情报估计报告稿的时候，人们很少再提及它们。

我们起草新的报告时，各军种情报人员交来了他们的估计数字，仔细整理后加在一起，竟然比早先的总数更大。这并不奇怪。我们是在重新估算苏军兵力。我觉得赫鲁晓夫说的数字准确，只是凭感觉，并没有确实根据，中情局并未预作结论。显而易见的是，各军种都认为这是一次挑战来临，正确地预见到会有一场争论，所以为自己留下较大的讨价还价余地。

现有的这些数字，正如我对艾默里所言，是“软”数字，其中有些根本经不起推敲。平心而论，人们过去都不大注意兵员人数，在情报收集和判断中均未对此下功夫。比较起来，陆军的 G—2 干得不错。对于苏军战斗序列中该添哪些部队和删哪些部队，他们一向有明确的标准。但他们也意识到，在估算部队人数这一点上，他们有很大弱点。我们在这次起草特别情报估计报告（SNIE）时才开始注重兵员的估算。一开始，我们把苏军大约 100 个师定为基本满员，将另外大约 70 个师定为严重不满员。后来，又把它们重新分为三类：大约 1/3 的师为满员率 80—85%；1/3 只有编制实力的 60%—65%，战时需补充兵员；还剩下的 1/3 只是“架子”，实质上属于预备役部队。在 60 年代，我们的估算日趋准确，应首先归功于卫星摄影侦察。

到我们协调各方估计数字的工作完成时，巴恩斯将军和我已说服大家一致同意所有修正了的数字（惟一例外是海军情报局最后仍坚持认为还另有岸防部队的一万人）。这次估算花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1960年5月3日，编号为 SNIE 11—6—60 的报告《苏联武装力量的兵力》定稿了，它的结论是：赫鲁晓夫说的 362.3 万人这一数字大致准确，我们仔细估算的新的总数是 362.5 万人。

我们对苏联常规兵力有了一个较精确的数字，而且为以后的估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对此，中情局领导是高兴的。此外，尽管过去沿用的某些估算方法被打破，总数比原先少了几十万人，但是我们还是争取到了情报界各方的意见一致。

艾伦·杜勒斯笑容满面地向我说了一句奇怪的表扬话：“雷，自从希特勒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一次干掉苏联这么多个师！”严格说来，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只是在更扎实的基础上认识到，苏军的 175 个师当中，有许多并未达到战备水平，而且大部分的师相对减员。此后几年，由于有卫星照片及其他新情报可供分析，对苏联常规兵力的估计就更准确、更有用了。

关于军事问题，特别是关于苏联兵力，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影响很大，因为它们对美国防务计划的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提供的是“国家情报”，十分有助于培训军事情报人员，更有助于各军种领导人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正因为如此，它们是经过激烈争论才撰写出来的。从内容来看，它们包括已查明的事实，也包括对另一些情况的最佳估计，还包括对苏联未来军事计划及可能运用其军力的方式所作出的判断。^①

^① 这方面最新和最充分的分析，见 Raymond L. Garthoff, “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in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1947 – 1991*, edited by Gerald K. Haines and Robert Legget (C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001).

正如对情报的用途进行研究的人们所发现的那样，情报估计报告的“消费者”，即决策人和他们的幕僚，更感兴趣的是“事实”和有关敌军能力的估计，而不是有关对方意图的判断和估计。这是谢尔曼·肯特及我们这些献身于情报估计的人所难以接受的，然而多数决策人相信他们自己也能作出“政策”判断，也许比情报官员做得更好。我们煞费苦心地对各种可能性作出估计，决策人却不怎么重视。不过，从整体来看，艾森豪威尔当政的 50 年代那些年仍是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最起作用的时期。^①

秘密情报活动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由两个单位负责，一个是特别行动处（OSO），它组织间谍和情报收集活动，有一些老手，如理查德·赫尔姆斯；另一个是政策协调处（OPC），它组织各种隐蔽活动，如旨在败坏敌方民心士气的宣传，资助我们在某些重要国家（如意大利）的朋友参加竞选，该处的领导人是弗兰克·威斯纳。（它当时处境很特殊，在行政上归属于中央情报局，在多年的工作期间却是接受国务院的政策指导。到 50 年代初，上述两方面的活动渐渐结合在一起，由当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艾伦·杜勒斯领导，下面按职能分工，分别负责特别行动和反情报活动以及按地区分工从事秘密的情报收集。这些单位，特别是秘密收集外国情报的单位，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都积累了它们的行动计划、准备和实施所需要的大量资料。例如，有关苏联的资料不仅包括真实苏联文件的样本，而且还包括苏联当时的列车时刻表、公共汽车时刻表和订票程序。除各种信息以外，还有各种有用的实物，例如苏联的信笺、文具、制服等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为获取苏联各种物品，当时制定了一整套的计划。有

^① 尽管如此，政治领导人在判断敌情时，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只是他们考虑的几种文件之一，而且并不总是最重要的文件。见 Raymond L. Garthoff,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Estimates by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of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Brookings, 1991)。

关苏联风土人情的详细信息都被认为是需要的。

上文中说过，美国人（以及外国人）去苏联访问的事，在斯大林时代很罕见，但到 50 年代后期已迅速增多。通过合法的旅游、观光和采购，可以收集到不少信息和物资样品，以弥补使馆人员和公开来源信息之不足。在我 1957 年访问苏联之前，我的几位朋友就给我打过招呼，访苏归来而尚等待中情局审批的时候，这些朋友又非正式地找我谈访苏见闻（不作记录）。我提供了一些情况和东西。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莫斯科结识的几位激进青年的照片，惊讶地发现他们早已认得其中某些人，知道他们的姓名，包括后来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金兹伯格。

因此，冷战刚开始时确实存在过的“情报差距”在 50 年代逐渐得到了克服。在秘密活动方面，中情局得到了较直接的经验，此外还与某些（但非全部）盟国及若干非盟邦的情报部门建立了联络。在德国，美国在战后重新启用了纳粹德国“国防军”由莱因哈德·格伦将军建立的东线军事情报网，它最初归属于美国陆军情报处（G—2），从 1949 年起交由中情局掌管，到 1955—1956 年才移交给联邦德国的联邦情报局。

中情局的各国国力估计处曾单独地或与中情局其他部门一起参加若干盟国间的联合情报活动，在 50 年代曾对苏联军事力量提出过一些联合估计报告，其中包括美英联合报告、美英加拿大联合报告和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报告。各国国力估计处还曾与各军种情报部门（1961 年以后是与国防情报局）协调美国为一年一度的北约军事情报估计报告提供的材料。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在不同程度上与盟国情报部门分享情报，其中与北约分享的最少，因为我们当时认为苏联及其盟友很可能派人打进了北约总部以及一个或几个北约成员国的政府（后来我们获悉情况确实如此）。我在华盛顿，有一年还在巴黎参加过北约军情估计协调会议。

在更广泛的情报估计问题上，我们处还一年一度与英国同行一起开会，与另外几个亲密盟国也有过类似的安排，但开会较不定期。我 1959 年在伦敦、1960 年在华盛顿参加过与英国同行的会议，还在慕尼黑附近的联邦德国情报局总部以及在华盛顿先后两次会见德国的同行。中情局在一些国家首都设有工作站，北约盟国在华盛顿派驻有高级联络官，因此彼此保持有经常的联络。我跟这些联络官都很熟悉。（在我参加这些工作之前不久，即 50 年代初，英国的金·菲尔比，那个后来暴露出来的苏联克格勃奸细，曾担任英国军情六处驻华盛顿代表。我不曾跟他打交道。但我比较了解的另一件事也表现出情报联络的风险：1960 年在联邦情报局总部开会时，我认识了一名德国高级情报官海因茨·费尔弗，而一年以后，此人被揭露出来，原来也是一个长期为苏联搞情报的“鼯鼠”。）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情报机构的安全审查不严，但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情报分析的水平非常高。他们的分析人员比我们少得多，但提供的分析报告却很周全，很有见地。他们的估计往往偏于保守，但有根有据。德国的情报分析则逊色得多，尽管他们给我们提供过正式的估计报告，我却毫无印象。

我参加的一次与盟国的合作，几个月之后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1959 年初，澳大利亚即将重新开设它的驻莫斯科大使馆（它先前跟苏联断交，是因为一名重要的苏联间谍，弗拉基米尔·彼特罗夫。在 1954 年叛逃后透露了苏联针对澳大利亚政界搞的间谍活动）。两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在赴莫斯科重新开设使馆以前，先到华盛顿来请我们介绍莫斯科的政治（及安全）形势。我和中情局另外几个人向他们作了非正式的长时间的通报。几个月后我居然是在莫斯科的北京餐厅再次见到了他们（在后面的第六章将具体谈到我那次去莫斯科是干什么），这两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没想到会在那里遇到美国中情局的人，大吃一惊，窘迫不堪！

附带说一下，莫斯科的北京餐厅是很有名的，可是那一次我们吃的中餐质量很差，我后来常开玩笑说，在莫斯科吃不上好的中餐，让我第一次预见到中苏关系正在出现严重裂痕。

中情局通过各国国力估计处，还与美国学术界保持各种联络。这个处 1950 年成立后，就请了一些学者当顾问，顾问小组开会的地点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以大家把它叫做“普林斯顿小组”。艾伦·杜勒斯每年都有三四次亲自带我们处的几个人会见顾问小组。我参加会见的次数挺多（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大家始终关注的话题）。顾问成员包括普林斯顿、哈佛和哥伦比亚的一些教授（我在普林斯顿时导师布莱克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有学术地位的前政府官员，如乔治·凯南。（虽然凯南与约翰·杜勒斯有前嫌，但艾伦·杜勒斯对凯南还是很尊重的。）这种会商中，双方的受益有点不对等，因为经过审批的顾问们可以阅读我们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又有机会与报告的作者们面谈，他们由此了解到的东西，比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东西更多。但是这仍然是对双方有益的，而且也很有趣。艾伦·杜勒斯通常都亲自到会，跟经过审批的人聚在一起，轻松地作非正式交谈。他讲过（有时还反复讲过）他经历的一些有趣的往事，在饭后一边饮白兰地和吸雪茄，一边讲他的真实故事。例如，1917 年在伯尔尼，他本来有机会去会见俄国的一位即将回国的反对党流亡者，即弗拉基米尔·列宁，但这一机会却被错过了。又如，1932 年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人们对轰炸机的定义争论不休，有个人建议规定能飞到海拔 10,000 英尺以上高空的为轰炸机，这时，本来一言不发的玻利维亚代表突然起立表示反对，说在他那个多山国家的惟一机场，任何一架能起飞降落的飞机都必须飞过 10,000 英尺的高度。然而，除了讲故事以外，这种聚会确实让艾伦·杜勒斯、我们处里的人和一些学者名流有机会沟通思想，加深共识。

各国国力估计处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中情局另一些单位一

起，为各种外交谈判提供支援。我们处的人不时地要向代表团团长或团员通报情况，我就为参加裁军谈判的代表团作过通报。1958 年跟苏联谈判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新举措。中情局派代表参加代表团，还从科技情报处派去了一位导弹专家，另外又让我写了一份估计报告。事后，中情局首席代表在写给局长的报告中指出，那份估计报告对苏联方面谈判策略的估计非常准确，事实果然如此，应给加特霍夫记一功。

1961 年春天，约翰·麦克洛伊主持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会，为新的肯尼迪政府审议美国在整个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的政策，拟订新的政策建议。我起草了中情局长的意见，表示从总的方面支持这一进程和拟定的新立场，同时提出了几点具体的不同想法。我还指出，“情报是军事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除了核查办法以外，“情报收集也是衡量任何特定裁军措施对美国的利弊时需予以考虑的合理因素”。在具体问题上，我指出，关于禁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轨道和部署于外层空间的主张，措词需严谨小心，不要因此而限制卫星对情报的收集。另一方面，我建议删去关于预先通知飞越北极上空的飞行这一主张，因为这会给情报收集造成妨碍。我还建议局长继续反对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开设直通电话（两年后双方同意开通的热线是电传打字，而不是电话）。最后还有一点，即一旦出现通信失误或“停顿”而有可能启动警报器和引起恐慌时双方将如何交换信息和协商，对于这一点，我指出“注意微妙的情报保密因素”以及“收集情报和澄清模糊警报信号的可能性”，并建议局长要求暂不讨论这一事项，待专家作进一步研究后再讨论。

我为局长起草这些意见，是有点越俎代庖的，因为我原先已奉派参加麦克洛伊领导的起草这些新立场建议的小组。几个月以后，我调到了国务院，以新的身分起草国务院对如何实施这些建议的意见

在中情局内部，情报分析人员与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两部分之间分隔太严，形成并非完全必要的过大的鸿沟。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保持一定封闭状态，从保密角度看有一定理由，但过分了也不见得合适。我跟某些秘密情报工作人员是老朋友，而且还有我在下文中将谈到的某些特别情况，跟他们多多少少还有点接触，可是我的大部分同事却跟他们毫无来往。我们确实从他们那里得到大量的源源不断的情报，然而人员的经验交流却很缺乏。双方的工作角度不同，如果多些往来，对双方都会是有益的。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我快要离开中情局时，我给艾伦·杜勒斯写了一封亲启信，谈了这件事和另外几件事，可是在那以后不久艾伦·杜勒斯自己也离开中情局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即各国国力估计处成立后的最初那几年，人们对苏联的看法由过去那种认为他们好战和侵略成性因而惶恐不安的心情，逐渐转向了一种比较平衡的判断。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坚决干预阻止了共产党人夺占南朝鲜，同时建立了北约联盟，还加强了我们的军力，或者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死了而苏联集团内部又问题不断，苏联的行动看来已较少带有直接的威胁性。当时政府内（甚至政府以外）还没有什么人愿意重新考虑，是不是我们自己在 1946—1952 年的看法把苏联领导人的扩张主义欲望看得过了头。不论怎样，到了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对苏联威胁的看法已经不像杜鲁门政府和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那样严重了。当然，苏联军力的加强，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及其对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让人日益担心，有的人甚至感到惊恐可是人们对苏联意图的评估已变得比较成熟和细致了。甚至在 1958 年苏联向西柏林施压时，人们的反应也不像十年前那样激动，多数人并没有担心那会导致战争。在斯大林 1953 年初死后，苏联领导人尽管仍保持共产主义信念，却显得像政治家而不像狂人，而且也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来追求其目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和后期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反映了而且促进了我们对苏联威胁的性质的这种估价。当我加入各国国力估计处时，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但我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出了力例如，我在快要离开中情局时写了一项预测苏联 60 年代战略态势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即 SNIE 11—14—61，表达了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军事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的这一新的理解“苏联有关军事政策的思想出发点是一种总的观点，即认为历史的力量正不可阻挡地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然而这被认为是靠历史的社会政治运动推进，“而不是靠直接使用共产党集团的武力”。此外，报告认识到苏联领导人不仅有进攻性的目的，而且也有合理的防御性和威慑性的目的。

苏联领导人显然认为，他们现今的战略力量提供着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来慑止西方发动全面战争，并足以支持一种较自信的对外政策……

更广泛地说，他们认为他们的武力的作用

是一种威慑手段，用以慑止西方对中苏集团采取军事行动，约束西方在其他地区进行军事干涉，保持该集团内部的安全，支撑他们的政治要求，以及展示他们的事业的成就和日益增长的实力。

与此同时，我们一直认为苏联领导人是决心要避免全面核战争的。

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近年来的军事计划以及有关他们现今意图的情报都表明，他们并不认为全面战争是

可取的，或西方对他们的进攻是很可能的……从苏联的行为看不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蓄意进攻西方，或者采取那种有导致全面战争的严重风险的局部行动。^①

在今天看来，这些话似乎是明明白白的。可是当我在 1959 年把这种观点写进各国国力估计处一份备忘录中以及在 1959、1960 和 1961 年把它写进几份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时，它们却引起了争议，有的人，尤其是空军情报负责人，还不止一次地以脚注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不同意见。

从 1959 年编号为 NIE 11—4—59 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认为苏联政策追求的目的是进攻性与防御性兼而有之，既包括施加压力，又包括谈判和妥协。那份报告中谈到：

我们估计，将会出现施压与缓和相结合，随机应变……然而，不论怎样变，其摇摆总会在一定幅度之内，既不会存心引起严重的和无法控制的全面战争风险，又不会放弃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继续斗争下去的理念。^②

我们还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必要时将宁愿退却，而不会“冒全面战争严重风险或政治上全输的严重风险”。然而我们指出，危险依然存在，“如果他们仍相信他们占有实力优势而且这一优势不断增强，那么他们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危险就会增大”。^③

^① 见 SNIE 11 - 14 - 61, *The Soviet Strategic Posture, 1961 - 1967* (November 21, 1961), pp.3, 1, 3 (top secret; declassified 1994). Se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vol.8,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198 - 201.

^② 见 Raymond L. Garthoff,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ikelihood of Soviet Intentions of War*, ONE Memorandum, August 24, 1959, 17 pp. (secret; declassified 2001); and Garthoff, "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引文出处见本书上文第 55 页脚注。

^③ NIE 11 - 4 - 59, *Main Trends in Soviet Capabilities and Policies, 1959 - 1964* (February 9, 1960), p.2 (top secret; declassified 1994).

^④ *Ibid.*, p.3.

在估计苏联未来军事计划时，我们认为他们在军事政策上将会力争具备一整套的核能力和非核能力，以便能按照各特定地区求达的具体政治目的而灵活选择其行动手段和规模。苏联领导人很可能相信，在双方彼此威慑而不敢挑起全面战争的形势下，掌握这样一整套能力就更加重要，因为在这种形势下可以比过去更自由和放手地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玩弄花招和策动政变，甚至发动不宣而战的局部战争。^①

然而，我们认为苏联不大可能用它自己的军队发动有限战争，而很可能是在自己不出面作军事干涉的情况下，支持局部战争。

苏联军事学术看来并未设想在远离其领土的地区与西方作军事冲突。那些地区的反西方势力或共产党势力发动的冲突被冠以“民族解放战争”的名称……苏联相当模糊地提供支持，是想起总的威慑作用，但不包含苏联公开的军事卷入。^②

我们的这样一些看法却遇到了争论。一方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我们说的苏联领导人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因为那样说，就意味着美国“缺乏为阻止他们行动而需要的活力”，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相信苏联人会有这样的估计。另一方面，空军情报领导人对美苏相互威慑的看法表示怀疑。^③ 他们也不同意说苏联人会安于相互威慑。这是空军始终坚持的看法，他

① *Ibid.*, p.5.
② SNIE 11-14-61, p.3.
③ NIE 11-4-59, p.5.

们为表示不同意见而对我们的报告所作的脚注中就说到：

美国空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助理参谋长并不认为苏联的行为表明他们的目的将满足于实质性的威慑和先发制人的能力。相反，他相信苏联统治者正力求尽早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这一优势要达到决定性的程度，从而使他们能以毁灭美国的威胁迫使美国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或者真对美国实施毁灭性袭击，以他们自己可承受水平的损失为代价，使美国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①

这些争论关系到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苏联对外政策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美苏关系前景如何？我们的军事政策和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此外，这当然也关系到军备控制的前景，尽管这个问题在 50 年代末尚未受到极大注意。

上文中已提到，我在 1958 年起草了第一个评估苏联对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态度的估计报告。它除了谈一些具体问题外，也谈到苏联决策人对待裁军还持有积极和克制的态度。它指出苏联领导人真心关心其安全，愿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而且日益相信积极的态度有助于他们的“和平竞赛战略”此外，随着相互威慑的到来，“他们可能会认为，跟美国谈判如何将核力量对比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也许是有价值的”。^②这一预见从十年后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得到了证实。对于 1958 年的这一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空军情报首脑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求说明苏联即使愿签订任何裁军协议，其意图仍将是“进一步推动走向统治世界”，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因此而放松他们争取尽早拥有压倒性核武器

^① Ibid., p.9.

^② SNIE 11-6-58, *The Soviet Attitude Toward Disarmament* (June 24, 1958), p.5 (secret; declassified 1993).

运载能力优势的努力”。

1961年9月，当我离开中情局时，导弹差距争论快告结束，柏林危机还闹得很欢，在相互威慑形势下苏联如何在局部战争中提出挑战的问题又引起新的辩论。在后面几章中我还会谈到其中一些事情。不过，我在各国国力估计处已工作将近四年，与我的同事们，尤其是与约翰·休伊曾加、约翰·惠特曼和霍华德·斯托茨一起，对苏联政策进行评估，为较成熟和较客观地看待苏联的能力和意图，作出了我的一份贡献这时，我希望转入政策制订领域去工作了。

① Ibid., pp.2, 5.

第五章

五角大楼的“外事顾问”

当我进中央情报局工作时，我得到一个“掩护身分”，这样，在社交场合、银行信贷及各种非中情局专业来往中，我不以中情局人员身分出现。在我们这些从事情报研究和分析的人员当中，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安排，但比尔·邦迪建议我具有这样一个掩护身分，以后办事会更灵活一些，我同意了。中情局，尤其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当时大多具有国防部文职人员的身分，所以，我的头衔是“国防部外事顾问”。我在五角大楼没有办公桌，然而我有那里的一个邮政地址，有五角大楼的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收话和转接），自然还有相关的身分证件。如果有人要查我的信用程度或者我需要办理旅行证件等等，五角大楼都有人为我办。我的文职级别一开始是 GS—14，有一个特别护照，以后升为 GS—15，有一个外交护照。这在后来起了大作用。

这一掩护身分的用处比原先料想到的用场更大。好处之一是公开发表文章。作为中情局人员，我本来是不能自由地就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尤其是苏联问题发表文章和出书的。有了掩护身分就方便多了，尽管公开发表的作品必须预先经过审批。

我进中情局前等候审查的那段长时间内，有机会写作，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一篇是谈苏联研制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发表时正值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即 1957 年 10 月。还有一篇是根据苏联出版物中的讨论，预言卫星能担负的军事侦察任务

和可能执行的攻击任务。^①我还写了一本论苏联战略的书和另外几篇文章，大都已经交稿等待出版，但我进中情局时尚未出版。因此，我到中情局报到的第一天就上交了一大摞手稿，这样就不需要在以后再报批，也不会有人怀疑我利用了局里的情报。其中多数作品在后来出版时，都像我进局之前发表的作品一样，注明著者系《苏联军事学术》一书作者及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但有的文章后来发表时是注明著者系五角大楼“外事顾问”或“国防部分析家”。

我还继续参加外面的学术会议和演讲，而且活动比过去更频繁，所到之处包括美国国防学院、陆军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加拿大国防学院，有几次是到国务院高级人员学习班、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学校和外交关系协会。在这些活动中，我的身分是我那些书和文章的作者，是苏联问题权威人士，有时也被介绍为国防部外事顾问。1959年年中，我就是以后一身分应邀参加了外交关系协会。我还以这一身分参加了罗伯特·鲍伊、爱德华·卡曾巴赫和亨利·基辛格在哈佛主持的国防研究学术研讨会。1958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跟我在耶鲁和兰德时的三位老朋友凑到了一起：我讲军事战略；比尔·福克斯（耶鲁大学，后去哥伦比亚大学）讲军事政策规划；伯纳德·布罗迪（耶鲁，后去兰德）讲新式武器决策；汉斯·斯皮尔（兰德）谈军民关系。

在1958—1959年间，战略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伦敦成立了。它的一部分起因在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同时人们对战略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它最初的经

^① Raymond L. Garthoff, "Russia... Leading the World in ICBM and Satellite Development?" *Missiles and Rockets*, vol. 2, no. 10 (October 1957), pp. 72 - 76; and Garthoff, "Red War Sputniks in the Works?" *Missiles and Rockets*, vol. 3, no. 5 (May 1958), pp. 134 - 36, final portion not printed.

费则是来自于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赠款。我不曾参与该所的筹建，但该所成立后，我成了它的一名热心成员。1959年，该所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谈苏联与北约“军事力量对比”，可惜它是用已发表的良莠不齐的各种材料拼凑而成，错误不少。我向该所所长阿拉斯泰尔·巴肯指出了这些问题，他为此深感不安。1960年11月，这本小册子出了新版本，质量大有改进，但有些内容还没有反映出最新的信息。我又向巴肯提了意见。此后，他认真仔细地与英国有关当局核对资料，这本每年更新一版的《军事力量对比》迅速成为学者和评论家所能利用的最可靠和信息量最大的非官方、非保密的资料来源。

在这些岁月，我以掩护身分参加政治性和军事性的与冷战相连的活动，包括官方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很广泛的。在这些活动中我都不提我在中情局的工作，但有时也会弄得很尴尬。在我以五角大楼外事顾问身分参加外交关系协会以后不久，有一次出席该协会在纽约举行的晚餐会时，艾伦·杜勒斯也来了，他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一些事——是有关间谍活动的很秘密的事。当时他的老朋友汉密尔顿·菲希·阿姆斯特朗和另一两个人也在场，他们本来只知道我是五角大楼顾问，但一听艾伦·杜勒斯找我谈这些事，就会马上看出我是在他手下干活

1958年我应邀参加美国陆军学院一年一度的国家战略研讨会，可是该会的主旨讲演人是艾伦·杜勒斯为了保持我的掩护身分，我只好避开他讲话的那一天，等到第二天再赴会。

要保持我的掩护身分而不把它跟中情局扯到一起，有时是难以办到的。除了上面说到的情况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有人要我以中情局人员的身分去做演讲或参加会议。中情局负责情报研究和分析的副局长艾默里有时还要我代替他去给一些军事院校做演讲。结果弄出很不正常的局面：在一年之内到同一单位讲演两次，头一次我是国防部的专家，第二次却又是代表中情局

副局长的中情局高级分析员。

1959 年春季，有几位民主党参议员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以非正式的和不做纪录的晚餐会形式，约请专家座谈对外政策和战略问题。他们请的第一位客人是当时执教于哈佛的亨利·基辛格。一周以后，即 1959 年 4 月 14 日，他们请的第二位客人就是我。中情局允许我在不涉及保密情报的前提下去赴会。我跟参议员们谈了苏联对外政策和总的军事与政治战略，大家座谈得很好。当时在座的参议员有阿尔伯特·戈尔、尤金·麦卡锡和斯图尔特·赛明顿等人（当时还是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本来也打算参加，因临时有事而未能到会。）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导弹差距”问题，赛明顿跟我辩论得很热烈。几天后，他又约我进步谈谈这一问题，这次谈话高度保密，但是我仍未能引用 U—2 飞机和卫星摄影以及通信情报的信息。这次讨论双方仍意见不一，其实当时在情报界内部也是意见不一。可以理解的是，中情局对这类非正式讨论提心吊胆，幸好我的这一活动也就到此打住了。

除了以掩护身分活动以外，中情局也派我参加领导上认为需要我参加的活动例如，副局长艾默里与来访的法国战略思想家皮埃尔·加卢瓦将军共进午餐时，叫我以局内战略评论员的身分参加，我们就威慑问题谈得挺欢。

掩护身分问题，还有别的保密问题，有时也被忽视了例如，有一次，中情局负责秘密情报工作的苏俄处长杰克·毛里他的前任但仍在中情局做研究工作的达纳·杜兰特和我一起请刚刚访苏、访华归来的德国教授克劳斯·梅纳特共进晚餐，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大家谈话都无拘无束，这时梅纳特说对不起他要去一趟洗手间他不在场，毛里突然想到一件事，问我们两个人：“你们查过这个人吗？”就是说是否查过他与德国（东德或西德）、苏联、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有无关系？我们谁也没有查过梅纳特是名人，可是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他可能有些什么关

系。我不记得这次晚餐是谁安排的，但肯定不是我这个级别最低的参加者。我们没有谈保密情报，但我们的谈话肯定反映出中情局所了解的情况和持有的看法。然而中情局内做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大多是小心谨慎，不轻易与“外人”接触。

我进中情局之前就跟报界一些人有往来，跟其中某些人还成了朋友。进中情局之后，我对他们都是用我的掩护身分。但报界有些人后来知道了我在中情局，因为我有时是作为一名情报分析工作者参加一些经过批准的非正式吹风会。有一个新关系比较特殊：1958年，报界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记不清他是不是把电话打到中情局，但更有可能是打到我家里，但肯定不是打到我那个掩护身分的电话。1958和1959年，我跟他在他家里见过几次面，一面吃午饭或喝点饮料，一面聊天。谈话的情形我当然都汇报过。艾尔索普的表现真叫我弄不懂。他并不想从我嘴里捞信息，我沉默寡言，他也无所谓，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向我叙述他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我对他的言谈总是心存戒备，反应谨慎，所以我那时不明白，今天也仍然不明白，他找我谈，有什么用处。最后我的上司认为，我与艾尔索普的来往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公开出去，可能引起误解，于是这一来往就断了。（比尔·邦迪直接请艾尔索普别再找我，此事遂告了结。）

我在中情局工作几个月以后，我作为五角大楼外事顾问的公开身分突然被大肆宣扬，因为《时代》周刊用了一整页篇幅报道我那本刚出版的书《核时代的苏联战略》。^①《时代》周刊称我为“国防部分析家和苏联军事问题专家”（我的书则被称为“冷静透彻研究现代苏联军事学术的作品”）。^②我的掩护身分受到如此高度曝光，这是始料不及的。

^① 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Praeger, 1958) .

^② “What the Russian Generals Think,” *Time*, July 21, 1958, p. 16.

我写《核时代的苏联战略》，是在离开兰德公司而尚未进中情局的 1957 年下半年。该书很受欢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以及国内外一些学术和军事刊物均作了评论。它有好几种外文版本。它入选“历史书俱乐部”和“空军读书俱乐部”，而且列入了美国陆军参谋长“推荐书名单”，被说成是“参谋长认为凡欲掌握基本军事史知识……为培养陆军领导人员所需阅读之书”。^① 该书曾一度列入首都华盛顿地区的畅销书名单。

此后一年多，我又写了几篇论文，经局里审批同意公开发表，就合成一册书，书名《苏联对未来战争的设想》，于 1959 年出版。^② 陆军退役中将詹姆斯·加文为此书写了序。这本书的出版单位名气小一点，所以它的影响也不如前面的书。但是局里的保密主任却很恼火，因为我送他审批的是一篇篇的文章，而不是书，认为我做得不对。^③

我公开发表的这些著作都是谈苏联问题和军事问题，这与我的掩护身分相吻合，也是与我早先的著作一脉相承的。我进中情局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还直接涉及了美国各军种之间关于美国战略的争论。那篇文章刊载于 1957 年 11 月一期的《陆军》月刊，标题是《我们打得起的惟一战争》，主要思想是主张我们加强有限常规战争的能力，以应付全面核战争门槛以下的挑战。

在该文中，我指出，“当我们拥有核垄断乃至核优势时，‘大规模报复’也许还是应付多种挑战的有效答案；但是，当它开始实际上意味着虚张声势或同归于尽时，它就起不了这种作用了。”我强调，虽然我们需要拥有进行全面核战争的能力，但那只能是“最后一招”。核大战是“我们打不起的”，我们实际上打得起的

^① 见“Chief of Staff's Contemporary Reading List,” *Army*, September 1958, p.60.

^② Raymond L. Garthoff, *The Soviet Image of Future War*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9).

^③ 我还做了同样的一件事，翻译出版了一位苏联将军写的书《现代战争中的科技》，但未遭非议。那本书是 Major General G.I. Pokrovsk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ntemporary War*,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aymond L. Garthoff (Praeger, 1959).

只能是有限常规战争。^①

当时，在美国的战略问题上，全国范围内正展开一场辩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公开宣称要依靠核威慑，即“大规模报复”。陆军觉得自己利益受到威胁，对此提出最直接的挑战。马修·李奇微将军（1956年）、詹姆斯·加文将军（1958年）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1960年）都在退役后出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是在分析实际情况以后，支持他们的意见。当时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曾经比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打不起有限战争。我们只打得起一场大战。”我的文章的标题就是直接针对这一言论而来的。这篇文章曾被用作美国军事学院教材。

1960年8月，在美国陆军协会——陆军军官退役后组成的类似于“校友会”的半官方组织——的年会上，我应邀作了主旨发言，谈“苏联的挑战”。首先，关于苏联的目标，我说：

让我们先弄清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是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他们的理想为促进这一理想，他们企图把他们的影响和力量扩展到共产党国家集团以外。但他们首先注意的是维持苏维埃国家自身的安全和实力。

我指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的看法：

第一，这意味着，苏联领导人断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蓄意发动全面战争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第二，这意味着苏联将力图避免全面战争的危险。第三，这意味着

^① Raymond L. Garthoff, “The Only Wars We Can Afford,” *Army*, November 1957, p.52.

苏联人将继续以除大战之外的手段推行其扩张势力的政策。他们大概将继续标榜自己的理想是和平、裁军和民族解放等等，因为这些在世界上很得人心。最后，在这一总的政策的范围以内，他们仍将警惕地寻找机会，当他们认为风险低的时候，利用某些局部的挑战，使我们的威慑力量起不了作用。

当时，兰德公司的沃尔斯泰特及他的一些同事认为威慑是“微妙的”，已处于受威胁状态，我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由于美国和苏联先后掌握了全球热核打击力量，相互威慑局面业已形成。有人说相互威慑是“微妙的恐怖均势”。这一均势虽然绝非持久不变，但却并不是脆弱的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全球热核浩劫的危险及其后果，因而力求避免任何“冒险主义”赌博……总体核战争看来已越来越不会成为苏联推进其立场的理性手段。

我认为不应当老是辩论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和全面核战争的威胁有多大。。虽然我估计不会发生一场美苏战争，但我确实相信有必要作好准备来应付可能的有限战争，包括常规有限战争乃至核有限战争，以便能更好地遏止或应对它们。因此，我强调需要对付有限军事威胁。

苏联人往往在他们的书报中低估甚至否认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种言论是否代表苏联的真正看法或预示着苏联未来的行为。他们是想要防止美国发动这种战争或作好对付这种战争的防御准备，想要防止美

国以这种战争作为必要时采用的一种手段来加强我们的外交立场他们想让美国陷入要么实行大规模报复、要么毫无有效对策的境地。但是苏联今后主动或被动采取的行动都必将是经过权衡得失利弊的算计。有限战争是共产党人为求达有限目的和冒有限风险而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典型方式。

与此同时，我并不认为苏联领导人正计划发动有限战争，所以我说“不应由此而推论苏联将放弃其总的方针，即以‘和平的’政治的手段在世界各地扩展其势力”。然后我谈到美国应有什么样的战略。

倘若美国的国家战略及由此而具备的军事和政治能力仅仅是遏止敌人发动总体战争，以总体的——但也是相互的——毁灭相威胁来威慑敌人，那么苏联人就可能由此推论，如果不是直接进攻美国，而是较小的挑衅，美国就不会实行总体的报复。威慑必须是可信的，而苏联人不论对或错，都可能认为美国不至于为拯救一个遥远的盟国而让自己蒙受核毁灭……我们需要的军事政策和态势应能保证我们能根据具体情况依靠有限使用核武器或常规兵力来应付局部的侵略和挑衅。

今天，美国战略正由依赖大规模报复转向承认有必要对我们面临的各种不同的威胁作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我们正在明白，平衡的军事力量——不是说大家都从预算蛋糕切下相等的一块，而是说各种能力和各种需要之间保持平衡状态——是无可争辩的道理和无可替代的方针。我们正在明白，战略必须使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的使用相对应于我们所求达的政治目的。我们正在明白，

威胁的性质是决定我们作何反应的重要根据。我们正在明白，相互威慑要求我们保证我们的战略报复力量高度安全稳固。我们正在明白，我们必须考虑一旦对威慑可能失灵的情况估计不当而出现有限战争时，如何有效地予以处置。最后，我们正在明白，战略必须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而不只是武器研制和预算限制的产物。^①

我引证这几段话，就足以说明当时战略辩论的性质，同时也说明，除了我在中情局内部的正式文件中表明的观点以外，还作为一名非官方撰稿人参与这场辩论所表明的观点。

莫斯科也注意到我在这场辩论中所起的作用。苏军总参谋部的内部刊物《军事思想》杂志在 1960 年 3 月的一期中谈到美国陆军领导人力争加强陆军力量，而一批“颇有影响的理论家”——“R. 加特霍夫、J. 加文将军、W. 怀曼将军和 W. 考夫曼”——在为这种立场提供理论根据。该文作者说，“在美国人士中最得人心的主张就是国防部专家加特霍夫提出的见解”^②（这未免言过其实了）。

我作为五角大楼外事顾问的掩护身分，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达到了它的顶点。1959 年，我再次应邀参加了美国陆军学院一年一度的国家战略研讨会。该年的主旨演讲人是陆军部长威尔伯·布鲁克。学院的院长威廉·恩尼斯少将自然以为布鲁克跟我很熟悉了，所以在把我介绍给布鲁克时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当然用不着介绍啦”。偏偏布鲁克从未见过我，也从未听说五角大楼有我这样个人，只是他很有礼貌和小心谨慎，没有吭气。我赶紧找了一个机会向他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很有幽默感地

^① Raymond L. Garthoff, “The Soviet Challenge,” *Army*, September 1960, pp. 30–32.

^② B. Pyadyshev, “On the Socio-Political Essence of the U.S. Armed forces,” *Voyennaya mysl'* (Military thought), no. 3 (March 1960), p. 37.

笑置之，到会议结束时，他友好地邀请我跟他一起乘坐他的直升飞机，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军营飞回华盛顿，一路上与我作了很愉快的交谈他显然很高兴跟我谈，因为不久以后他又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再作深谈。最后，他问我是不是愿意调动一下工作，真正去当他的外事顾问！我深感荣幸，但婉言谢绝了。不过我还有他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快离职时送给我这个“外事顾问”的纪念品，上面的题字说“感谢你为祖国做的出色工作，并致以最衷心的祝愿。陆军部长威尔伯·布鲁克，1961年1月19日。”瞧这掩护身分多有趣！

第六章

访问苏联的情报旅行

1959年5月或6月的一天，谢尔曼·肯特突然问我：“你能去俄国给副总统当翻译吗？”在这之前已经宣布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访问苏联，但肯特提出的问题是我不曾料想到的。我回答说，行，我能应付，但我不是职业翻译，不会是尼克松能用的最佳人选。原来，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海军陆战队准将罗伯特·库什曼正在物色俄语翻译，肯特向他推荐了我。于是，我和另外两个人接受了面试和口语翻译测验。我虽然被认为是合格的，但恰如我所预料到的，另一个人比我更加胜任，他就是我的朋友亚历山大·阿卡洛夫斯基，他出生于南斯拉夫一个白俄家庭，在美国生活了多年，是职业翻译，在国务院翻译处工作。他理所当然地被选中了。但几天以后，肯特又把我叫去说：“你可以去啦！”尼克松听说挑选翻译时的第二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就说他要带艾伦·杜勒斯的人也带上。所以我就列入了名单，身份是“顾问”，没有具体任务（将近35年以后，我在莫斯科前苏共中央档案中看到了当年苏联外交部关于这次尼克松之行的报告，其中把我的身份升了级，说成是“尼克松的顾问”。）

于是，我作为代表团中的中情局代表，里里外外，为筹备此行忙个不停。情报准备工作涉及好几个方面。首先，要在出发前以及访问过程中向副总统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汇报情况，提供背景信息、第二，要参加拟订向苏方提出的访问日程及活动计划的建

议，然后定出访问计划。此外，还要参加起草重要的讲话稿，我自己还得作好充分准备，以便随时为副总统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同时充分利用访问中可能出现的机会尽量多收集一些情报。

7月13日，艾伦·杜勒斯带着我和另外几名高级情报官员向尼克松作了长约两个小时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苏联当前形势、科技、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然后，艾伦·杜勒斯又把我作为他派到代表团的代表，介绍给尼克松，三个人进一步谈了一会儿。尼克松听汇报非常认真。他很坦率地说，他对苏联知之不多，希望多了解一些。这一次，以及在后来的接触中，我都发现尼克松善于学习，听得仔细，还认真看书面材料，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三天后，我们又补充汇报了副总统特别关心的一些情况和苏联人物背景，并针对赫鲁晓夫可能提出的论点，提出了副总统将如何应对的建议。我们还应尼克松的要求，对赫鲁晓夫近两年来会见美国及其他外国官员时的谈话作了简明扼要的综述和分析（总共有赫鲁晓夫的8次会谈，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当年6月23日会见纽约州长哈里曼）。7月16日，我们又向陪同尼克松出访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弟弟）作了同样的汇报。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他所有的出访和会谈中，他为这次访苏“作了最细心的准备”，还特别提到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等单位对他的汇报和提供的材料。^①我可以证实他的确如此。显然，他决心要好好完成这次访问，既与赫鲁晓夫见面，又要向俄国人民致意。

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尼克松表明他这次出访不是一项外交使命，也没有谈判事项。赫鲁晓夫也明白这一点。有人说派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同行是为了“制约”尼克松。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有两位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先后访美，所以尼克松

^①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Grosset & Dunlap, 1978), pp.201 - 14; quotation from p.203.

此行是一次回访，同时又是为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可能的互访作点准备。恰好在尼克松即将出发时，艾森豪威尔得知，由于一场误会，副国务卿墨菲已通过科兹洛夫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访美邀请，而没有以日内瓦谈判取得进展作为条件，赫鲁晓夫已欣然接受这一邀请。在尼克松刚离开莫斯科后，华盛顿就宣布了赫鲁晓夫即将访美，这使尼克松及其一行人感到震惊，尼克松觉得这一时机安排使他自己的访问大为失色。

尽管如此，如果不算罗斯福总统战时 1945 年初在雅尔塔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秘密会晤，尼克松这次访苏就是到当时为止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对苏联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权威的美国人士利用这一罕见的机会越过苏联当局而直接会见苏联人民。尼克松还想让苏联领导人明白美国的决心，同时通过此行加强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从我所代表的中情局的狭义利益来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到平日看不到的一些地区和设施看一看，在环境许可而又不违背这次访问的主要政治目的的条件下，获取一些情报。

首要的情报目标是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艾伦·杜勒斯向尼克松汇报时强调指出，有关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发展方向及其导弹系统的情况，能有任何一点澄清，都将是重要的。我们希望——但并不抱多大希望——赫鲁晓夫会让尼克松看看洲际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场或制造厂。（正是着眼于此，我们请科兹洛夫参观了“雷神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制造厂。我们还曾建议他到卡拉维拉尔角或范登堡空军基地参观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但他谢绝了。）

第二个最重要的情报目标是核能。访问日程中包括了两个有关项目，一个是正在列宁格勒一家造船厂进行装修的“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另一个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正在建设中的别洛亚尔斯克核电站为了利用这两项参观的机会，同时也为了与

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总局局长叶麦利扬诺夫继续商谈美苏两国核专家互访的计划，有“美国核潜艇之父”之称的里科弗海军中也将也参加了副总统为首的代表团。他在几周之前曾陪同来访的科兹洛夫参观费城附近的希平波特核反应堆以及参观核动力货船“萨凡纳号”。苏联的核潜艇也是我们首要关注对象，尽管他们不会让我们直接去看，但里科弗去了总会了解到一些情况。

艾伦·杜勒斯带着我和局里主管苏联核事务情报的人去见了里科弗，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此后，在出访前和访问期间，我一直与里科弗保持密切联系。

除了苏联导弹和核能以外，我们另一个主要情报对象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为了获取有关苏联态度、目的、计划和能力的政治情报，都首先要以赫鲁晓夫为主要目标。我们关注的还有他与苏联其他政治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举止及身体状况。

尼克松这次访苏有一项活动，是主持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开幕式这是美国在苏联举办的头一次正式展览会，是 1958 年签订的美苏文化交流计划的一部分。它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在 6 个星期的时间里让 270 万苏联公民看到了一些从美国运来的展品，尤其是接触到 75 名会说俄语的年轻美国“向导”（讲解员）（他们是从 1000 名申请者当中挑选出来的，年龄在 20 岁至 35 岁之间，俄语流利，而且愿意不领薪金，只有数额很低的按日计算的津贴。）我的妻子薇拉是其中的一员。他们比副总统出访日期早一个月出发。当我随尼克松抵达莫斯科时，在尼克松所有随行人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有幸在那里与妻子会面。

7 月 23 日，我们乘坐新的波音 707 飞机经过创纪录的短短 9 小时飞行直达莫斯科。从抵达那一刻起，接待就是冷淡的。不久，在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第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就猛烈抨击艾森豪威尔总统几天前在一年一度的“被奴役国家周”发表的谴责

苏联东欧卫星国共产党统治的讲话。总统的讲话和副总统的访问在时间上相接这么近，这是偶然的，但也是不幸的。尼克松一到莫斯科，美国大使汤普森就向他报告了苏联方面对总统讲话的反应，但赫鲁晓夫挑起这一话题，尼克松也没有办法，只能重申对苏联的含蓄批评以维护总统的立场。当两位领导人一起参观美国展览会时，舌战又继续进行。尼克松起初曾试图降低调门，但赫鲁晓夫的抨击越来越凶，尼克松不能示弱，于是又辩论起来。这场交锋的一部分是发生在标准厨房的展厅内（那里的讲解员恰好是我的妻子薇拉），所以美国报界报道此事时把它称为“厨房辩论”，这成了尼克松这次访问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原因之一在于尼克松利用这次交锋的机会，声称他斗败了赫鲁晓夫（碰巧有一张照片展示出尼克松把手指头指向愁眉不展的赫鲁晓夫）。其实，这场“辩论”不过是两个人各说各的，各自声称自己的社会制度比对方的优越。尼克松是被迫应战，但维护了美国的立场，表现得不错。^①

尼克松这次访问（以及那一次美国展览会）的主要效果，无疑就是有机会让千百万苏联公民对美国人的生活有一个较清楚的概念。另一个重要收效就是让俄国人通过尼克松看到了美国领导人是真诚要和平的，而这正是俄国人最珍视的东西。他们从苏联当局的宣传中看不到这一点，可是尼克松利用各种机会，用相当清晰的俄语呼吁要 *mir i druzhba*（和平与友谊）确实打动了俄国人的心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城这样通常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外省城市，更是如此。一位美国领导人如此现身说法，有力地反击了苏联说美国反对和平和反对缓和紧张局势的宣

^① 有关尼克松这次访问的详情，见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The Education of a Politician, 1913 - 1962* (Simon & Schuster, 1987), pp.515 - 34. 在“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说“被奴役国家周”讲话是“马粪”，比什么都臭。尼克松想起了中情局给他的材料中说到赫鲁晓夫年青时打扫过猪圈，就说他自己年青时在农场劳动过，知道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我们的详细情报材料发挥了作用！

传。

我在访问结束后写给艾伦·杜勒斯的总结报告中谈到，尽管苏联当局竭力冲淡尼克松副总统此行对苏联人民的影响，但此行仍有力地展示了美国的善意和真诚希望和平与友谊的态度。美国展览会在这方面也起了辅助作用，让苏联民众头一次有机会看一眼美国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我也指出，俄国民众对美国的好奇心和真诚同情并不一定表明他们不支持苏联当局，因为他们相信苏联当局也是真正要和平与友谊的。

我指出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我跟美国展览会的许多向导交谈后也得到同样的印象。他们大大接触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其中自然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中央情报局得到的第一份持不同政见者地下刊物就是通过展览会向导弄到的。

苏联当局也力图消除美国展览会的影响。他们说这展览只是给外国人看的样子货，跟美国实际生活状况相差很远。他们不断派人来提出一些刁难性的问题，如打听美国“私刑”的情况。他们在附近举办了永久性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此外又展出了1958年9月在亚美尼亚上空击落的一架美国 RC-130 式侦察机的残骸，以展示美国的敌对性情报活动。最后，美国展览会的许多门票是通过党团组织发给他们认为最忠诚可靠的人，但这种做法也适得其反，因为这些人看了展览以后大都得到了良好的印象。

除了宣传上的较劲以外，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一次长谈具有情报意义。那是在7月26日，即访问的第四天，地点是赫鲁晓夫的别墅，活动安排是下午3点半开始的“午餐会”，但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在开头半个来钟头的闲谈以后，赫鲁晓夫自己把话题转向了苏联的导弹，透露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包括他承认一个月之前一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出了毛病，导弹飞向阿拉斯加，幸好半路上掉下来了。尼克松提到科兹洛夫访美时，曾邀请

他去参观一次导弹发射，但他自己谢绝了。赫鲁晓夫说苏联认为这种事情的时机还不成熟。尼克松还提到据报道赫鲁晓夫 6 月向来访的哈里曼谈过，在一年前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苏联向中国提供过导弹。赫鲁晓夫说，哈里曼显然是误解了他的话，他的原话是如果中国受到攻击，苏联将会给中国提供能打到台湾的导弹。赫鲁晓夫还引出了外国导弹和轰炸机的讨论。在尼克松说到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造价相当于 153,000 台电视机（言下之意是该少点导弹多点民用消费品）以后，赫鲁晓夫说苏联导弹造价低一些他还贬低轰炸机和水面舰艇的价值（半年后他又公开发表了同样的言论）。虽然赫鲁晓夫说的某些事情令人感兴趣，但情报价值是微乎其微的。这并不奇怪。我应该说，尼克松是为了我们的情报需要作出了努力的。

这次长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始于尼克松的一句话，即他不会公开谈论美苏两国的军力对比，因为两国都是强大的，两国都必须确保和平，而不是战争。赫鲁晓夫表示完全同意这一评价。他否认苏联将军说过有能力摧毁对方，这不同于美国的某些将军。他透露他实际上起草过一段文字说明任何新的全面战争均具有毁灭性，这段文字发表于空军主帅维尔希宁署名的文章中（见 1957 年 9 月 8 日《真理报》），这一事实原先不为人知，我和我们的分析家们都对此感兴趣。但更重要得多的，是此话的言下之意，即承认苏美相互威慑。诚然，赫鲁晓夫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让步，因为在洲际兵力对比上苏联仍不如美国。当艾森豪威尔总统 9 月在戴维营作了类似的发言后，赫鲁晓夫又加以抨击而宣称苏美处于均势。但不幸的是，两国军力对比的优势在美国这一边，就使得我们这里的许多人更难以看到苏联领导人已意识到，任何一方的优势在战争中都将是虚幻的优势——这一点，在我们争吵一个又一个“差距”的那几年间，许多人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这次马拉松会谈之后，代表团到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城及其附近几个地方作为期五天的旅行。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已恢复旧名叶卡捷琳堡）和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伯利亚城都是大城市和外省行政中心，但不对外国使馆人员及其他外国人开放。这次美国代表团来，受到当地民众非常热情的欢迎。例如在新西伯利亚城的歌剧院，有一大堆人未能进场，就在门外等候三个半小时，只是为了在尼克松离开时看他一眼。在我们访问过的城乡各地，都有人群夹道欢迎。

这次访问的行程是双方预先商定的，但苏方多次改变计划，有时甚至是在最后一分钟变卦。让我们参观到的工厂大多没有什么情报价值。但有几次还是挺有益的。例如在乌拉尔山区的第一乌拉尔斯克，我们参观了一座大型轧钢厂，该厂生产的小口径不锈钢管可用于核设备和导弹，它生产的大口径钢管也让我们感兴趣，可据以推算他们建造输送天然气和石油的管道的能力。那天碰巧有两名随行采访的美国记者知道我的底细，愿意合作，我就把我自己不便于提问的问题告诉他们，从而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情报。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别洛亚尔斯克核电站，我们原先估计的该厂建设拖后两年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了解到该厂到 1961 年才能建成两座反应堆，而不是原先计划的到 1959 年建成四座反应堆。尼克松和代表团主要成员在那里仅仅停留了 45 分钟，但海军中将里科弗留下来达数小时之久，我则为他当翻译。我们对这座核电站以及苏联的核电计划了解到较多情况，知道了他们的整个计划正在铺开。

在列宁格勒参观“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时，代表团又是只停留了 45 分钟，其中还有 20 分钟是一边吃水果喝香槟，一边看介绍该船建造情况的宣传影片但是按照尼克松事先向科兹洛夫

提出的要求，里科弗和我又留了下来逗留了 3 个小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次经历。

当时在船上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有即将担任船长的海军上校波诺马廖夫，造船厂厂长克洛波托夫和负责建造该船的首席工程师切尔维亚科夫。还有几个小职员，另外有几个显然是多余的人，里科弗断定他们是秘密警察“爪牙”，坚决要求把他们给撤走了。然后，他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看，尤其是看了核反应堆舱的里里外外。接着，他开始提问题，问得很细。苏联人答非所问时，他就尖锐地指出刚才的答复不对，再重述一遍他的问题，要求正面回答。他对那位造船厂厂长克洛波托夫尤其厌烦，对他说，“明天我将见到赫鲁晓夫”——其实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要我告诉赫鲁晓夫，科兹洛夫已答应让我们参观全船，可是你克洛波托夫却不让我们看？”他说，当科兹洛夫访美时，他请科兹洛夫看了“萨凡纳号”核动力货船和希平波特核反应堆的每一个地方（事实的确如此，里科弗当时向苏联代表团讲解之细，连在场的美国核能专家都感到惊讶），现在，他要求苏联人也这样做。那几个人，尤其是克洛波托夫，急得冒汗，左右为难。他们奉命要像对待贵宾一样接待这头一回来访的外国要员，但他们无疑也奉命要“保密”。如今这位美国将军要求了解的东西比苏联将军要求的还多。在难堪地停顿了好一会儿以后，有一个人进来对克洛波托夫说了几句，显然是他的上级叫他去让里科弗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又不要说什么该“保密”的东西。结果是里科弗在核反应堆舱、涡轮机舱和各种管道周围爬来爬去，爬了三个小时，看了他想看的每一个地方，即使没有了解到他想要了解的一切，收获也超出了苏联人的最初设想。他还看出了“列宁号”在设计上的一些问题，从而推测到苏联核潜艇将会遇到的困难。例如，他看到三座反应堆都设在同一个隔水舱，只要一座停转维修，另两座也无法继续运转。同时，一旦出现放射性污染，都无法将其

局限于一座反应堆。此外，一回路中的高压会加剧不锈钢管道的腐蚀，到一定时候可能出现渗漏。从保养维修的角度看，他们的设计是差劲的。

这一次我只是给里科弗当翻译，但无意中瞥见了涡轮发电机的生产厂家是哈尔科夫涡轮机厂，这是我们原先所不了解的。不久后，在美苏电力专家代表团的互访中，哈尔科夫涡轮机厂的总工程师来访问美国，我们就预先知道他的底细了。对“列宁号”的这次访问后来还引出了一段意料之外的故事，将在下文中叙及。

尼克松副总统及其一行 7 月 31 日回到莫斯科时，中情局已给我发来了美苏两国报界对尼克松此行反应的综述报告。这是我们出发之前就安排好的。尼克松不出所料果然对这一报告很感兴趣。美国报界的报道很详细，而且评价相当高，这令尼克松得到一些宽慰。

尼克松结束访苏时，在苏联电视台向俄国人民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稿是我们在华盛顿拟定的，但临发表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助手及美国大使汤普森又作了修改补充。

在这之后，尼克松及其一行到了华沙，那里的民众普遍显示出了对美国的友谊。除此之外，在华沙的两天期间，尼克松与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总统扎瓦兹基、总理西伦凯维兹和外交部长拉帕茨基。

哥穆尔卡像赫鲁晓夫一样，也提到了“被奴役国家周”问题。当尼克松说双方应有思想交流时，哥穆尔卡攻击“自由欧洲电台”做的事不是思想交流，而是“间接侵略”。他又说波美贸易之类的事是双边的事，而不是莫斯科的事。哥穆尔卡主要关心的一点，是在签订对德和约之前，争取美国对波兰现有边界给予某种支持。总的说来，哥穆尔卡对西德态度表示了很深的关切。

在华沙，我与波兰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博齐沃夫斯基中

将的一次谈话很有意思。令我惊讶的是，他在与我交谈时贬低他的上司国防部长斯佩哈尔斯基是一名“政客”，“建筑师出身的人”，只有他自己才是“老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苏军派来的苏籍波裔人，为首的一位是战功赫赫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但是作为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罗科索夫斯基等人过于张扬，所以哥穆尔卡 1956 年上台以后，把他们都轰回苏联，只留下了一个博齐沃夫斯基，这也是为了让苏联领导人放心，保证波兰不会采取反苏路线。博齐沃夫斯基一直留任到 1965 年退休。

在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前，尼克松曾问我是否应安排他会见波兰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他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波兰裔美国人的反应。但我为他权衡利弊以后，建议他不作这一安排。最后尼克松没有会见维辛斯基，因为那位红衣大主教自己到外地去了——他大概跟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他若会见尼克松，会过分突出显示波兰天主教会与美国的联系。

附带说一下，我们的驻华沙大使杰克·比姆后来指出过，千千万万波兰人自发欢迎尼克松所迸发出的巨大亲美热情，反而使得当时策划的加强波美经济文化联系的努力一度受挫，因为波兰领导人对民众这种热情奔放的情景感到惊恐和担心。

我们回到华盛顿以后，我向局长作了书面汇报，除了在各地厂矿、“列宁号”破冰船和别洛亚尔斯克核电站所得到的情报以外，我还谈到我们在各处的大量摄影。尽管我们没有见到我们最想参观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有些照片仍颇有价值。例如，我拍摄到的一张照片显示的是我们原先不知道的新西伯利亚城附近的一座巨大军火库。我还从飞机上拍摄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两处新式地对空 SA—2 导弹发射场，而在莫斯科附近，我们原先只知道有六处较老式的 SA—1 导弹发射场，这次我也拍摄到一处 SA—2 导弹发射场。九个多月以后，1960 年 5 月 1 日，弗朗西

斯·鲍尔斯驾驶的 U—2 高空侦察机就是在斯维德洛夫斯克上空被科苏尔莫发射场发射的 SA—2 导弹击落的。^①

在附带的收获中，还有我在新西伯利亚城、别洛亚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第一乌拉尔斯克等地采集的土样、水样和松果样品，这些东西可用于放射性分析，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苏联在这些不对外开放的关键地区内的核活动情形。

除了给局长艾伦·杜勒斯写报告以及向有关人士作口头汇报以外，我还应尼克松的要求，给他写了一个报告。尼克松复信对我表示感谢，说“由于你的背景和现场经验，你的意见和见解格外有价值”，表示希望跟我进一步细谈。我们见过一次，但此后就各忙各的了。

我忙的一件事是为赫鲁晓夫访美作准备，接着又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计划的访苏之行作准备。我们 8 月 5 日由华沙回华盛顿之后刚过两个星期，局长就要我就 9 月中旬的赫鲁晓夫访美之行提出我的看法。两天后，我写了一项备忘录交给他，指出行动协调委员会(OCB) 的“苏联及相关问题特别委员会”已开始考虑此事，而且访问日程业已拟定。我是就一些具体事情提出了建议。这次苏联人来访，除了从交谈中了解一点情况以外，谈不上获取情报的事。（后来才有人透露，还有一项计划是利用机会获取赫鲁晓夫的尿样做医学分析！）^②所以我强调了要利用这次访问来影响赫鲁晓夫本人。要让他不仅看到美国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而且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和整个经济的活力。要让他看到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享有民众的全力支持，而且看到美国

多年以后，当年审讯鲍尔斯的一位苏联军法官在书中证实，U—2 飞机正是从我发现和拍摄到的科苏尔莫发射场发射的导弹击落的。见 Lieutenant General of Justice N.F.Chistyakov, *Po zakonu i sovesti* (By law and conscience) (Moscow: Voenizdat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 1979), p.144.

^② 首次透露 赫鲁晓夫尿样一事见 Michael Beschloss, *Mayday: Eisenhower, Khrushchev and the U-2 Affair* (Harper & Row, 1986). pp.206-07.

如今的资本主义已大大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当年见到的那种资本主义。

我还强调，最好是让赫鲁晓夫通过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改变他自己的看法。赫鲁晓夫是多疑的，会怀疑美国只给他看好的一面。他还可能突然要改变计划，要去看一些计划之外的地方和接触普通的民众。一般说来，这反而是可取的。

最后，我还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接待赫鲁晓夫，让他看到缓和必须是双向的和有来有往的，让他明白要有一段稳定的竞争性共处，苏联就应拿出更多的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笼统地谈谈“和平与友谊”。我希望与赫鲁晓夫接触的美国人不要对他抱敌视态度。

赫鲁晓夫访美，我没有参加陪同，但自始至终关注了访问的全过程。遗憾的是，赫鲁晓夫遇到的美国人当中，不少人对他采取了刁难和敌对的态度。

1960年3月末，我按照局长的要求，就艾森豪威尔总统计划于6月中旬访问苏联一事，从情报方面考虑，写了一项备忘录。我当然也希望陪同总统出访，中情局还有另一个人，比尔·科比根，俄语也很流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列入了名单。4月，先遣组已去莫斯科，但是5月1日发生了U—2侦察机被击落的事件，总统的这次出访随之取消。这样，在苏联举行的美苏最高级会谈就又等了12年，即已担任总统的尼克松到1972年5月才访问了莫斯科。

再回头说1959年的事。在尼克松访苏归来而赫鲁晓夫尚未访美时，有一天谢尔曼·肯特问我是否可以跟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科恩率领的该委员会代表团访苏当翻译。我一开始有点发憊，因为我的核知识很有限，但很快还是承担了这一任务，只是多下了一番苦功夫，后来实际干起来，也不是像我最初担心的

那样困难。^①

这一次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苏联反情报机构通过它的秘密代理人获悉了我的中情局身分，对我倍加注意，而当时我们还不了解这一变化。不过这次出访还是挺顺利的。

赫鲁晓夫访美时，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总局局长叶麦利扬诺夫院士也跟着来了。1959年9月15日，他会见了麦科恩，讨论了麦科恩的访美安排。叶麦利扬诺夫表示麦科恩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想看什么都可以。双方商定，军民两用的核反应堆以及其他生产军用浓缩铀和钚的设施不列入访问计划，双方也不讨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但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据叶麦利扬诺夫说，都可以看可以谈。麦科恩表示想看看研究所、实验室、实验反应堆、原型反应堆、发电反应堆以及像“列宁号”那样实际采用的核动力反应堆。叶麦利扬诺夫不仅表示赞成，还主动建议参观一个正试验可控热核聚变的设施和一个铀矿。麦科恩很快表示对二者都感兴趣。叶麦利扬诺夫又提议两国交换“列宁号”和“萨凡纳号”的推进系统的资料，还谈到在可控热核反应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他指出，被允许参观“列宁号”的外国专家迄今为止只有里科弗一人。（说到这里，他小声对麦科恩说里科弗“脾气暴躁”，麦科恩说里科弗对他的同事也是那样。）叶麦利扬诺夫又说，除了互访和交换资料以外，双方还可以考虑某种合作项目，例如建造可控热核反应堆，但麦科恩对此没有表态。

总之，这次会见和后来的互访表明，苏联方面是愿意作相当深入的交流和接触的。

麦科恩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于10月9日抵达莫斯科，访问头尾共10天，活动很充实，收获颇丰，它是两国在实质性交流方

^① 关于这次访苏的详情，见 Garthoff, "Intelligence Aspects of Cold War Scientific Exchanges: U.S. - USSR Atomic Energy Exchange Visits in 195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pring 2000), pp. 1 - 13.

面迈出的一步，更何况这还是在在一个敏感的、涉及安全的领域内迈出的一步。

代表团首先从莫斯科飞到塔林，乘坐“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在波罗的海试航。大约一个月以前，苏联方面突然宣布“列宁号”开始试航，比原计划提前了。据叶麦利扬诺夫后来私下说，提前试航是为了抢在美国“萨凡纳号”之前。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我们在中情局还了解到，“列宁号”下水，还有月球探测器的发射，都是要赶在赫鲁晓夫访美的时机，想以此抬高苏联技术威力的形象。但我不记得这两件事在美国有多大影响。

参观核动力破冰船在海上航行三四个小时，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看。但是通过他们的情况介绍，尤其是通过船上一顿晚宴时的交谈，我们还是了解到一些新的事情。有两点使我们感兴趣，一是他们没有陆基原型反应堆，一是他们正研制另一种反应堆供潜艇使用。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我跟那位“老朋友”克洛波托夫的很不愉快的重逢。他清楚地记得7月份我跟着里科弗到他的造船厂参观这艘船的情景，当时憋了一肚子气，这时在宴会上借酒装疯，把气撒到我的身上，大概因为上次参观时一切话语都是通过我用俄语说给他听的，所以他认为那次与里科弗的麻烦都该怨我。最后别人把他架走了。我们回华盛顿后，我把这段故事说给里科弗听，他听得乐开了心。

我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了六七个研究所和实验室，其中最重要的是著名科学家库尔恰托夫院士领导的莫斯科原子能研究所。我们所到之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介绍自己的工作时都相当坦率，但不愿多谈更多的事，显然怕言多语失，说漏了嘴。

下一步，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去参观两座核发电反应堆，麦科恩则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参观乌克兰境内的一座铀矿和铀矿石加工厂。我们先乘飞机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然后乘车行程两百

多公里到五一城附近的一座铀矿，从那里再转到若尔特耶沃德（“绿水镇”）的铀加工厂。此行听起来很简单，但一路上遇到的保密观念过分的事例令人难受。（后来叶麦利扬诺夫私下告诉我们，这一参观项目是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才得到批准的。）首先，在从莫斯科飞赴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时，临登机，几名苏联随行人员拖住我不停谈话，直到别人都上了飞机才让我走，飞机上靠窗的座位都已坐满，只剩下一个中间靠过道的座位。可是我事先留了一个心眼，拜托同行的一位美国朋友在右侧远离机翼的地方帮我占一个靠窗座位。我登机后，这朋友把那个座位让给了我。当飞机飞到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上空盘旋准备着陆时，又有几名苏联陪同人员凑过来跟我聊天，企图防止我朝下观望，然而我还是瞥见了下面那座巨大的南方机械制造厂——我们知道该厂是苏联一个重要的导弹生产设施，当时是制造 R—12（SS—4）中程弹道导弹和第一个系列的洲际弹道导弹 SS—7。后来，该厂又生产了较先进的 SS—9 洲际弹道导弹，最后还生产了著名的 SS—18。

R—12 中程弹道导弹射程 1020 海里，当时刚投入使用，开始部署在苏联西部地区，1962 年又部署在古巴，触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假如说我们在 1959 年尚不知道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的那座工厂是一个首要情报目标，那么苏联陪同人员如此处心积虑妨碍我观察该厂，倒反而证明了该厂的重要性。他们虽未能阻止我观察，但却阻止了我拍照。不过，我们的 U—2 飞机早已拍摄过该厂，我关心的事主要是趁这次难得的低空观察机会，看看该厂附近铁路上有没有装车待运的导弹。

我们从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到铀矿和铀加工厂时，汽车绕来绕去走了好久，显然是防止我们看出路线、距离和位置。我们确实被转晕了。可是当我们抵达铀加工厂附近一个村庄时，有几个俄国人，包括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凑过来观看坐在擦得亮亮的

黑色“伏尔加”小汽车里的陌生人。我走出汽车用俄语问那几个孩子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马上回答说“若尔特耶沃德”（“绿水镇”），正是一点也不错。

参观行程中，除了标示牌写明不许拍照的几个实验室以外，通常都是允许我们照相的。我带有两台照相机，一台是局里的，装着黑白胶卷，另一台是我自己的，装着彩色幻灯片胶卷，可以随心所欲地拍照。有一次，同行的几个美国人拍摄了景致独特的乌克兰茅屋村庄，陪同的苏联人员就对麦科恩说别照这些“没有意思的东西”（意思是说这太落后了）。这时麦科恩就对我这个最活跃的摄影师说，他们是下了非正式的最后通牒了，叫我也暂停一会儿。我顶嘴说，这儿又没有禁止拍照的告示，何况这里的矿山和工厂都挺有意思，所以我还得照。麦科恩就不再说我了。众所周知，麦科恩是从来不许他手下的人顶嘴的，但他显然知道我还另有任务在身，所以没有生气，而且始终对我挺和善

我从地平面上照了矿山的一些“边边角角”，这些照片对空中拍摄的照片是很有用的补充，专家们从中可以更好地估算这些“边边角角”的高度，从而供分析家估计该矿的累计产量。在铀矿和加工厂，他们提供的具体信息包括矿石的含铀浓度、分离过程和产品（氧化铀 U^2O^8 ）的纯度，但是他们绝口不谈现产量或累计产量或者在苏联总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后来叶麦利扬诺夫答应等他回访美国时再给我们提供补充材料（他的确带来了一些）。

我在参观过程中忙于翻译，但我也时时留心代表团成员们不会注意的东西，例如办公室甚至走廊上的各种内部告示、领导人员办公室内的电话设备，等等。如同在“列宁号”破冰船上一样，我还注意某些设备上标示的生产厂家和批号，这些细节有助于分析家判明某些厂矿企业的隶属关系等等。我通过这种观察提供的某些信息后来证明是很有用的。

这里说说前一年的故事：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利用一个完全公开的信息来源，在苏联核武器情报方面取得一次重大的突破。苏联 1958 年 7 月的一份公开刊物刊登了乌拉尔地区电力主管人的一篇对记者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当然是经过仔细审查，毫无情报价值。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出这位负责人背后的墙上有一张模模糊糊经过淡化处理的图表，原来那是整个乌拉尔地区的电网图。中情局分析人员把这电网图照下来放大，使之与该地区详细地图相套叠，再与 U-2 飞机和高空气球拍摄的照片及其他信息精心核对，就对应出各城镇和厂矿中心的用电情形，并对应出从车里雅宾斯克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一片地区内一些电力供应紧张的地点，那些就是地图上未标明的秘密核武器研制生产中心。其中有一些是我们根据其他情报来源已知的重要目标，从这张图上又得到了证实，而另一些地点是未知的，就成为今后严加注意的对象。这番情报收获真是奇迹。

再附带说说，这一地区内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苏联为早期核武器提供裂变材料的克什特姆钚加工厂，它是中情局分析人员研究历史资料而确认的，因为有一位美国矿业工程师在 1917 年革命以前曾经随一家英国铜矿公司在该地工作过。他的所有档案资料早已交给斯坦福大学保存。经过他允许，中情局人员查阅这些资料，从里面找出了当年为采矿而在克什特姆地区拍摄的照片以及文字记载和地图。这些资料极其宝贵，和较新的地图和照片相对照，就找出了克什特姆钚加工厂的位置，还发现了另外几处核设施。就这样，一位已退休多年的矿业工程师那堆早已被人遗忘的资料竟提供了宝贵信息。这位老工程师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

麦科恩率领的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访苏归来后，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我也向局长艾伦·杜勒斯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局长把它复印了一份转给了麦科恩。麦科恩尚未见到我的备忘

之前于 10 月 27 日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访苏之行时，就说过“此行中还有中央情报局的加特霍夫，相信他一定得到很多信息”。^①

麦科恩还向总统指出，苏联核科学家是相当优秀的，从战前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苏联原子弹之父一代的科学家大多是这样的老资格。他指出，“很显然，他们的成就决不能归因于‘偷窃我们的秘密’，尽管他们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得到一点好处。”

这以后还不到一个月，叶麦利扬诺夫院士率领的苏联核科学家代表团就来到美国进行为期三周的紧张访问，到美国各地参观二十座设施，在规模上与我们对苏联的访问相当，但内容更广泛。苏联代表团中有几位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其中之一是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院士，还有几位研制核反应堆的冶金学家和工程师。我又以翻译身分全程陪同，由于代表团人多，我的妻子薇拉也来当翻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苏联的几位顶级核科学家。

访问计划包括参观一些核电站和新泽西州卡姆登的“萨凡纳号”核动力货船。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冶金方面的情况，从他们的提问可以看出，他们在精确焊接的可能性以及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热交换器的耐磨蚀性方面遇到了困难。我们正确地由此推论，他们的核潜艇计划很可能面临着这种性质的难题。

苏联代表团还参观了爱达荷的国家反应堆试验中心，那里的景色好像是月球上一般，各种反应堆设施散落于其间。他们在一天之内参观了那里的十座反应堆，对该中心的规模之大显然印象深刻，他们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

他们看到的设施，大部分都是头一次让苏联人参观的，但他

^①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October 27, 1959,” p.3. Memorandum signed by Brigadier General A.J. Goodpaster,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ans. (declassified).

们看得最来劲的显然是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和阿贡内的实验室，当然都是非保密和非军用的实验室。他们对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和劳伦斯·利弗莫尔这几个实验室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所进行的可控热核反应研究工作十分感兴趣。叶麦利扬诺夫几次表示苏美两方最好联合起来作这一研究，以代替各搞各的做法，但我们总是客气地一听了之。

上面已说到，苏联科学家通过提问，力图学到一些东西。有时，他们提的问题是出了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企图了解我们的反应堆使用的高度浓缩铀的确切浓缩度。我方的回答总是笼统的“90%以上”。另有一次，美国方面的人无意之中说出了“萨凡纳号”货船使用的核燃料的产地。这一点是保密的，我在翻译中把这一点省略了，苏方翻译似乎没有听出来。还有一个例子：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到橡树岭参观时，显然是存心要打听与核科研有关的生物科研情况。午餐时，他和苏联代表团中一位会说英语的团员有意坐在橡树岭生物实验室一位美国科学家的两边。我当时忙着别的事，顾不上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我还是听到一句半句，听出了亚历山德罗夫是在打听那个实验室是在研究什么病毒。到了晚餐时，他惊喜地发现那位美国科学家还给他带来了病毒样品。这项研究并非保密项目，但却是苏联代表团访问日程之外。幸好，这样的事情仅此一次。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11月11日，代表团在旧金山时，大家正在旅馆餐厅进早餐，我发现当地一家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赫鲁晓夫刚刚宣布苏联核潜艇已经下海。我立刻拿着这张报纸给亚历山德罗夫和另一位核反应堆专家雷彭斯基看看。他们证实苏联核潜艇已经下海，其发动机功率比美国的大许多。刚说到这里，叶麦利扬诺夫走过来，不让他的这两位团员再说下去。实际上，那条新闻是编造出来的，但却让苏联两位专家（其中的亚历山德罗夫还是研制第一艘核潜艇动力装置的主管人）说出了真话。后来

的确切消息证明，苏联第一艘核潜艇的确是在 1959 年 10 月下水。我听到那两位苏联科学家的话以后，打电话向中情局总部作了报告，第二天中情局两种每日要闻简报都登载了这一消息。我有时琢磨，苏联的反情报专家会不会推断说旧金山早报那条假新闻是中央情报局故意编造出来，让苏联科学家失去警惕而说出实情。

美苏代表团的互访对双方都有益，而且双方都有一些情报收获。有些情报是无意中听来的。例如，我有一次跟一位苏联科学家闲谈，他说到他刚访问过中国，说中国科学家有水平，预言中国的核计划会成功，从而透露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一些核科研合作的情况。（这一合作在 1959 年以后急剧缩减了。）

苏联代表团的访问即将结束时，11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接见了叶麦利扬诺夫院士。陪同的人有麦科恩，我是翻译。叶麦利扬诺夫说，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规模之大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邀请总统在计划的访苏之行中去参观苏联的一些设施。麦科恩扼要汇报了双方进一步来往和合作的安排。总统表示赞成双方在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上开展合作。这次会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它是总统亲自决定作出的一个友善姿态。麦科恩访苏时未曾受到赫鲁晓夫接见，所以艾森豪威尔接见苏联代表团团长是一个新的上升举动。

我得以参加美苏高层互访中的情报工作，尤其是核领域的情报工作，这一年是非常有意义的。中情局主管中央情报参考工作的助理局长保罗·鲍勒尔给我的上司谢尔曼·肯特写了一个备忘录，标题就是《雷蒙德·加特霍夫提供的情报的杰出意义》。他表示感谢“有关苏联科研人物和机构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信息“范围之广和内容之细均很可观”，尤其是各核科研生产机构隶属关系的情报是过去所缺乏的。此外还有一些信息已印发情报界各单位。

局长艾伦·杜勒斯也通过他个人的一个姿态表示了积极的评价，邀请我跟他的另一些客人参加他在乔治敦 Q 街的家里举行的一次午宴。他向人介绍我时说“这是我的人，刚访问莫斯科归来”，这说明我的出席也是对他有用的。但无论如何，我是深感荣幸的。

第七章

间谍游戏

许多人一想到情报工作，就会想到间谍活动。事实上，间谍活动只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而且获取的信息还需要加以分析，才能产生情报。此外，许多有经验的高级情报官员都指出过，多达 95% 的情报是通过除间谍活动以外的其他各种手段取得的。然而，那 5% 的情报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别的任何手段所无法获取的。间谍活动还带有密谋的气氛和危险的色彩，因此引人注目。在艾伦·杜勒斯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尤其是这样。

间谍活动是很严肃的事；对于某些人来说，更是严肃得要命的事。它违反国际法和通常的文明行为准则。然而，它又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人们认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间谍活动产生它自己的规则以及它自己的动力。因此，从这一章也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游戏，不过它不是闹着玩的游戏，而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游戏。

随着冷战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逐渐展开，就有许多原因促使美国开始建立秘密的情报（及反情报）组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日趋紧张，人们随之日益担心现时的共产党颠覆的威胁和模糊浮现的未来战争的威胁。另一个因素是发现苏联正积极进行针对我们的情报活动（还有可疑的颠覆活动）。最重要的一点也许还在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

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敌手是保持着一个封闭的社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渗透铁幕去评估这威胁，从而让我们作好准备来防止或对抗这一威胁。

中情局在苏联集团内建立秘密情报组织的努力，最初主要是着眼于建立一个预警网，以便在苏联一旦向西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方时，能及时向我们发来警报。在东欧，主要的“资产”是纳粹德军撤退时留下的潜伏情报网的残余人员，当时受德军东线情报头目莱因哈德·格伦将军控制。格伦在 1945 年投靠美国，受美国陆军情报部门保护。1949 年，格伦本人及其档案和情报网络均移交给了中情局。但格伦在苏联国内几乎一无所有。

1949 年，中情局开始执行一个五年计划，招募和训练由苏联出来的公民，通过夜航和空投把他们送回苏联。多数人均被立即逮捕，只有少数人得以潜伏于苏联机场和铁路枢纽附近，观察和报告苏军的调动情况。这少数人的价值也变得可疑，因为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多数人，沦入苏联控制之下，成了“双料”货色。中情局还支持过英国秘密情报处（SIS）通过海路送特务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执行类似的任务。

美国军方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执行一项计划，派飞机沿苏联边界飞行和浅近潜入苏联领空。到 50 年代，这种活动更趋频繁。这些侦察飞行的目的主要是启动并从而发现苏联的雷达、机场及其他防空设施，使用的手段包括电子情报（“Elint”）传感器、观察和摄影。总之，技术情报手段也跟空投特务一样，是主要针对苏联本身，以备一旦发生战争时能及早发出警报和确定目标

中情局确实联系过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的流亡分子组织，在 1953 年以前支持过他们骚扰苏联国内的苏维埃当局（如果说还不是颠覆它们的话）。在“乌克兰起义军” 1952 年被镇压以前，中情局曾派一个无线电小组随该组织在乌克兰西部

活动，但不论对该组织或对美国而言，这一小组都没有起到什么真正作用。此外，从 1949 年到 1952 年，还曾经派人试图推翻阿尔巴尼亚当局以及在波兰建立地下抵抗运动。派特务到阿尔巴尼亚策动起义的活动完全失败了，原因之一在于，由英国秘密情报处和中情局共同实施的这项活动的英方负责人之一金·菲尔比原来是苏联克格勃的一名秘密特务。在波兰，中情局曾大力支持一个叫做“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地下抵抗组织，但 1952 年末波兰政府透露出这整个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波兰保安部门策划的一场大的挑衅。

策动颠覆和国内抵抗运动的做法，主要是为了政治和宣传的目的。也有几次试图利用这些人搞间谍活动，但从来没有成功，没有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例如有一次，1954 年，中情局通过英国秘密情报处安排拉脱维亚境内的一名潜伏特务从一个被怀疑为核设施的机构附近的河里取一点水样，以检测怀疑是否属实。那个人提供了水样，但它的放射性太高，只可能是直接取自核反应堆的冷却塔，而不可能是河水。显然这是克格勃弄巧成拙，除了证明那个人已变成“双重特务”以外，别无价值。

上文中说过，冷战局势的挑战对新一代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常春藤名牌大学战时就与情报界有联系，战后，许多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自然又继续保持这种联系。例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我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许多同学以及大量大学生都直接进入了新成立的中情局。其中的一个就是威廉·伯克利（1950 年届），在中情局干了几年之后才当了《国民评论》双周刊的主编和著名的保守派发言人和评论家。他的导师之一霍华德·亨特参加过那次企图推翻阿尔巴尼亚当局的失败行动，后来又卷入了水门事件丑闻。

伯克利的两名同学，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两人均为 1951 年届），却不如伯克利走运他们进入中情局的秘密情报部

门后，于 1952 年被空投到中国东北，任务是监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东北境内的动静，但是他们乘坐的飞机被击落，两人遭中共逮捕，分别被判处终身监禁和 20 年徒刑。直到 1972 年和 1973 年中美关系转暖，他们才获释。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参加中情局秘密情报工作的另外两个人是斯隆·科芬（1949 年届）和科德·迈耶（1942 年届）。科芬在战争期间学习俄语后，曾按分配当过驻苏军联络官，战后参加过一项痛苦的差事，即强迫那些战时投降到德国方面在弗拉索夫将军手下当过差的俄国战俘返回苏联。他进中情局后的任务是派遣俄国流亡者空投到苏联。三年以后，他回耶鲁当牧师，在 60 年代末卷入过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迈耶的情形则不相同，是长期留在中情局，多年主持过国际组织秘密情报工作。两人都出版了回忆录，谈及当年是如何被中情局吸引的。^①

上文中，我谈过我在耶鲁参加的后备役军事情报组的领导人是戴维·查夫查瓦泽（1950 年届）。他进入中情局后从事针对苏联的隐蔽情报工作达二十多年。他也写了回忆录。^②

在间谍活动方面，美国情报官员的工作当时有四大项：一、物色和招募特务人选及信息来源，其对象首先是苏联外交官和驻外情报人员；二、以个案官员身分管理这些特务；三、担任报告员，编写供分发的原始情报材料；四、在中情局总部主管各处室工作以及在外国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主管中情局的工作站和基地。

冷战初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尚未充分形成美苏之间默契的“游戏规则”之前，出过几次人命案，但后来双方情报部门在整个冷战期间达成了一项相互谅解，即彼此不杀对方的情报人

^① 见 Cord Meyer, *Facing Reality: From World Federalism to the CIA* (Harper & Row, 1980); and William Sloane Coffin Jr., *Once to Every Man: A Memoir* (Atheneum, 1977).

^② David Chavchavadze, *Crowns and Trenchcoats: A Russian Prince in the CIA* (Atlantic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0).

员。这条规则不适用于叛徒（叛变苏联的人）或两方各自掌握的第三方特务，但它确实适用于美国和苏联自己的个案官员及其他隐蔽情报官员。整个冷战期间（1947—1991年），中情局在行动中损失了 59 名官员，但没有一个人是死于苏联情报部门之手。

美国情报官员在苏联积极从事“合法”的情报收集活动（上一章中所述即是一例），但几乎从来没有自己在苏联当特务（苏联的做法则不同，常常派自己的国民在西方国家潜伏从事“非法”情报活动）。此外，美国曾经派少量不享受外交豁免权的人到苏联从事非法的情报观察，但 1961 年一名美国大学生马文·马基宁在乌克兰东部企图观察苏联中程导弹部署情况时被捕，被判处 8 年徒刑，此后，这种做法就基本上放弃了。它风险太大，而卫星摄影可以做得更好。

情报活动和间谍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有关苏联意图和能力的秘密情报。从人员消息来源获得的情报叫“Humint”（“人工情报”），相对应的有“Comint”（“通信情报”）、“Elint”（“电子情报”）、“Sigint”（“信号情报”）、“Photint”（“摄影情报”）、“Imint”（“成像情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情报。但“人工情报”即间谍情报有赖于接近潜在的消息来源。冷战期间，尤其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这种接触大体上仅限于苏联驻外人员。与已招募的特务的联系在苏联国外也比在苏联国内困难少一些。最后，给美国当特务的苏联公民及苏联叛逃人员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志愿者（在中情局行话中，这叫“Walk-ins”）。

反情报工作的焦点则在于防止敌对的情报部门的渗透（同时防止我们方面的人志愿给外国情报部门效劳或叛逃，对苏联尤其如此）。

苏美两国的情报部门彼此向对方采取行动，其后果之一是它们注意力的重点逐渐从满足最高的政治或军事需要转向瞄准敌方

的情报部门。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一点，但在实际上，它们的精力越来越多地消耗于彼此间的斗法。连它们的情报信息库也优先注意尽可能弄清对方情报和反情报部门的每一个细节。

诚然，双方仍继续搜寻战略性的政治和经济情报以及各个层次上的军事情报，“人工情报”之外的许多情报手段都投入到这些方面。然而，“人工情报”的大部分精力却转向了双方的间谍和反间谍战的“游戏”。

后来，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反情报心态中的严重疑心病几乎使中情局针对苏联的秘密情报工作陷于瘫痪。从 1954 年到 1974 年主持反情报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尔顿老是怀疑中情局内部有潜伏的苏联“鼯鼠”，弄得人人自危，几乎再也顾不上针对苏联的秘密情报工作。^①这种疑心病最后走向了极端，以至于安格尔顿手下的一名打手断定，既然安格尔顿给中情局的工作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那么他本人一定就是一个“鼯鼠”！安格尔顿的疑心病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他从来不承认苏联和南斯拉夫真的有分裂，也不承认真的有中苏分裂。幸好他没有管过战略情报评估工作。直到 1974 年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把安格尔顿撤职以后，中情局内部形势才稳定下来，使针对苏联的秘密情报工作慢慢得到修复。

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中情局针对苏联（及东欧）的间谍活动还是很有成效的，主要是通过那些“自己找上门”的。早期这种投靠者之一是苏军中校彼得·波波夫，他是苏联军事情报组织总参情报总局（GRU）1953 年派驻维也纳的人员，从那时起他向中情局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达 6 年之久，直

^① 见 Tom Mangold, *Gold Warrior: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s Master Spy Hunter* (Simon & Schuster, 1992).

到他于莫斯科被捕为止。^① 在 1953 年贝利亚被处决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苏联情报部门进行清洗，这时有一批克格勃官员投靠了西方。此后，还有一些苏联官员被招募过来或自己找上门来。苏联方面当然也有成功事例。

下面讲一个事例。 1958 年 11 月，我在苏联军报《红星报》上看到，有一个瑞典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当时拉拢瑞典这样的欧洲中立国，争取它们减少亲西方的倾向，所以殷勤接待瑞典军事代表团，请他们参观了苏军模拟使用核武器的野战演习。我注意到代表团成员之一是我的老朋友斯蒂格·文纳斯特伦上校，他从 1952 年到 1957 年中期是瑞典驻美空军武官（在这之前是驻苏空军武官）。我要在 1959 年 1 月到伦敦参加一次英美联席情报会议，所以想乘这机会再去瑞典见见这位老朋友，了解一下苏军演习情况。谢尔曼·肯特同意了。

我 1958 年 12 月给文纳斯特伦写信，说我 1959 年初要去欧洲，希望见见他。我在信中只是捎带提了一句说得悉他访苏，那访问一定很有趣。他回信邀请我到他家作客。 1959 年 2 月 2 日至 6 日，我到了斯德哥尔摩，住在他家，他和他夫人对我非常友好热情。他还陪我拜会了瑞典外交部、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的一些头面人物，这些人都看过我发表的有关苏联军事问题的著作，把我看作是一位专家。

我会见瑞典这些要员时，跟他们讨论了不少事情，主要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导弹差距”和柏林危机，以及瑞典是否打算拥有核武器。文纳斯特伦每次都事先给我打招呼，让我了解瑞典人士的想法。他也积极参加了讨论。

我有意多呆几天，等文纳斯特伦主动谈谈他的访苏之行。等

^① 见 William Hood, *Mole——The True Story of the First Russian Intelligence Officer Recruited by the CIA* (W. W. Norton & Co., 1982)。胡德说波波夫是少校，但波波夫实际上是中校。

到第三天午餐时他开口了，谈得很详细，特别是谈了使用战术核武器条件下的野战演习。苏联人说除了瑞典军事代表团以外，还从来没有让外国人了解这些信息，所以要求瑞典人保密。

我在出发去瑞典之前曾设法了解瑞典代表团参观那次演习的情况。美国驻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和武官处报道得很少。我在伦敦时听说英国驻瑞典武官发回过一个“不供外传”的内部报告。经过英国军情六处（MI6）安排，我到斯德哥尔摩后，从英国武官那里见到了这个报告。我还单独会见了一位参加过瑞典访苏军事代表团的瑞典军事情报官员，听他谈了参观演习的情况。所以我心里有底，能作核对和比较。然而，对比之下，只有文纳斯特伦谈得最细，最全面。

他提供的信息在今天看来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是相当有情报价值的。这包括苏军战术核武器的当量（从 2000 吨到 50000 吨 TNT 当量）和投掷手段（战术火箭和图 16 “獾式”中型轰炸机）。演习部队为第 2 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塔曼师），配属 6 枚战术核武器，在 7 公里宽的正面上实施进攻。从战略上看，最令人感兴趣的信息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讲话。他指出，为核战争作准备的同时，不应削弱常规战争的兵力和兵器。他说北约采取了不同的观点，是犯了错误。他说苏联这一方针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他还指出，有限战争，包括有限核战争，是完全可能的，对此必须作好准备。苏联公开发表的军事著作当时却否定有限战争的可能性，但我们有些人已断定苏联的真正观点是承认要为有限战争作准备。马林诺夫斯基说，尽管北约一心准备打核战争而不加强其常规兵力，但苏联仍需保持足够的常规兵力。

瑞典人认为，是赫鲁晓夫授权马林诺夫斯基来决定让瑞典代表团看些什么和听些什么，其指导原则是要让瑞典人觉得他们的访问有军事价值，不虚此行，但又不要让他们看到战略能力的秘

密或战斗序列的信息。因此，在访问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和全程陪同代表团的陆军副总司令波波夫大将都挺坦率，但其他的军官却小心翼翼，生怕泄密；后来显然是在上述两位领导人的敦促下，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要让瑞典人感到他们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

我回国后，除了写一份有关斯德哥尔摩之行的报告以外，还专门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汇报了我从瑞典军事代表团了解到的有关苏联战术核武器、战术、军界人物及其他有军事情报意义的信息。这一备忘录分送到了各情报部门，局长艾伦·杜勒斯阅后批上了“很好”，真叫我高兴。

但四年以后，斯蒂格·文纳斯特伦上校竟被查出是苏联间谍，在斯德哥尔摩被捕了。我也像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一样，大吃一惊。倘若在 50 年代有人要我猜猜我认识的外交官朋友当中谁是苏联间谍，我恐怕会把我认识的人都数遍了，最后才会数到他。这正好说明他为什么能做得如此成功和如此之久。早在 1948 年，他第二次派驻莫斯科出任空军武官时，就被苏联情报机构拉过去了。至于他开始玩间谍游戏，那就更早了，1940 年他头一次到莫斯科，就给德国人送过有关苏联的情报。战后，他给美国驻苏武官提供过情报，帮过美国人的忙。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他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例如，他开出清单，列出有意思的事项，先给美国人看，对美国人感兴趣的事项，他给美国人提供一些材料，然后把美国人感兴趣的事项及要求报告给苏联军事情报机构。1952 年至 1957 年他担任驻美空军武官，除了与美国空军高层人士来往以外，他还办理瑞典空军的采购，因此从那些急于推销其产品的厂家了解到大量情况。他协助过瑞典采购“响尾蛇式”空对空导弹的谈判，得以将这一种和另几种武器系统的秘密资料交给莫斯科。以后在斯德哥尔摩，他又弄到过“鲍马克式

导弹的秘密资料以及有关瑞典防务的大量资料。^①

为什么他这样做？首先，情报“游戏”吸引了他。同时，他也是为了捞钱。此外，他在瑞典空军中的地位停留在较低水平，感到不得志，所以想使自己感觉到是一个更重要的人。他还自称他扮演的角色有助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平衡。苏联情报机构成功地利用了他的名利欲和虚荣心，给他取的密码名字是“雄鹰”，还给了名义上的苏联少将头衔，给他发了勋章（自然是保存在莫斯科）。苏联指定跟他接头的人（据说是一位将军）表面上装作爱听他对宏观政策问题的见解，而实际上是鼓励他提供技术情报和军事情报，主要是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后期也要瑞典防务情报。在审讯中，文纳斯特伦承认自己有罪，表现出合作态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服刑 12 年后获释，现已 90 多岁，仍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老房子里。

附带说一下，虽然我去拜访文纳斯特伦时，只告诉他我从兰德公司转到了国防部，也就是只说了我的掩护身分，但瑞典情报部门无疑让他知道了我实际上是在中央情报局，所以他把这一点通知了莫斯科。因此，等到 1959 年稍晚些时候我随尼克松副总统访苏以及随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再访苏时，苏联情报部门已掌握了我是中情局的人。

回想起来，尽管文纳斯特伦是效忠于苏联，然而他转告我的有关苏联军事发展的那些详尽的信息仍然是全面的和正确的，所以我写的备忘录才受到艾伦·杜勒斯的表扬。他提供的有些信息在当时或后来都得到了证实。

文纳斯特伦向我提供瑞典人所了解到的全面而且准确的信

^① 文纳斯特伦一案审判结束后，瑞典政府公布的材料细述了他为苏联当间谍的活动，但不提他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为瑞典自己的情报机构所做的工作。主要根据该材料编写的书是 Thomas Whiteside, *Agent in Place: The Wennerström Affair* (Viking Press, 1966)。一位瑞典记者 Anders Sundelin 根据文氏回忆录写成一书 *Fallet Wennerström (The case of Wennerström)* (Stockholm: Norstedts Förlag, 1999)。

息，是完全有道理的。他自己以及他的苏联情报机构接头人懂得，他对我合作，也就是对中情局合作，只会抬高他的亲美名声，而任何含糊其辞、故意歪曲或重大省略却有可能引起他被怀疑和暴露的危险。所以他让我得到了好的情报。

下面再谈另一件事。

恰好在文纳斯特伦被逮捕之前一个月，另一名间谍在莫斯科被宣判和执行了死刑。那个人就是苏军上校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他是自己找上门来投靠西方的，为了与美国情报部门取得联系，从 1960 年到 1961 年冒了巨大风险，几次在苏联国内找过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他的间谍活动由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掌握，从 1961 年 4 月直到 1962 年 10 月他被捕为止，这一活动持续了大约 18 个月。彭科夫斯基是苏军总参情报总局 (GRU) 的资深上校，其掩护身分是国家科研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针对西方搞情报。他与西方科技组织和企业保持来往。最后，他通过英国商人格雷维尔·温跟英国秘密情报处 (SIS) 拉上了关系。在莫斯科，与他保持联络的是英国和美国大使馆的情报官员。^①

像文纳斯特伦一样，彭科夫斯基也是自视甚高，却不得志。他有一点更超过了文纳斯特伦，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想让西方警觉起来，而且设法阻止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追求强权的危险野心。如同苏联方面迎合文纳斯特伦的自尊心一样，英美负责此案的官员在彭科夫斯基几次因公出国旅行时会见过他，送给他英军和美军的上校制服，还安排英国秘密情报处头目迪克·怀特 (“C”) 接见了他 (不过他最初提出的要亲自见见肯尼迪总统

^① 有关彭科夫斯基一案的主要公开著作是 Jerrold L. Schechter and Peter S. Deriabin *The Spy Who Saved the World: How a Soviet Colonel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Cold War* (Charl., Scribner's Sons, 1992)。该书书名过分夸张，对彭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缺乏中肯的估计。在彭科夫斯基被处决后不久出版的一本书 *The Penkovskiy Papers* (Doubleday & Co 1965) 给人印象似乎那是彭科夫斯基写的日记，其实是编造出来的。

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要求被拒绝了)。彭科夫斯基仇恨苏联当局，这有时使他的报告带有色彩和偏见。

要评估彭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还有另一些困难。他传来了苏联国防部的大量小道消息和别的许多成问题的材料。例如，他说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许多配置地点都是错误的，尽管他以为是真的。然而，有一些类似的说法却是可靠的。在苏联情报界尤其是军事情报界的人物、工作程序等方面，他提供了许多信息。他提供的大量文件，包括机密和绝密的军事文件，则是最有价值的。

问题马上出现了：他提供的信息也许属实，是新的和重要的，然而又不能肯定是如此，而且还往往与我们掌握的其他信息有出入，因此对他提供的信息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碰到的难题。1961年5月，局长艾伦·杜勒斯突然召见我，要我审阅和评估中情局从苏联这一新的信息来源得到的、当时还只有中情局见到的一些材料。这些信息是否可靠，是否应分送各个情报单位和政策制定者？局长要我提出意见。

彭科夫斯基提供的信息——或者说至少是他提供的说法——与华盛顿当时占优势的见解不相符合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状况到底如何。他的说法是苏联在这方面遇到了巨大麻烦，实际上还不具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打击能力。当时在美国，尽管卫星摄影情报已经开始驱散“导弹差距”的恐惧心理（完全消除则是在1961年9月以后），但许多人仍然认为，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虽说不是像原先担心的那样快，但仍是当真的和成功的，并不像彭科夫斯基说的那么糟。即使是我们有些人认为我们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状况的估计（至少是到1961年9月为止）依然偏离，但对于彭科夫斯基那种笼统的和未经对证的说法，也无法加以信赖。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苏联陆军的状况。彭科夫斯基说苏联

1960 年宣布的裁军是一场骗人的把戏（我们的可靠情报证明并非如此），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说苏联陆军只有大约 50 个师，这就与美国情报界认为的 175 个师相差太远。

局长艾伦·杜勒斯对这一类出入甚大的问题感到担心。彭科夫斯基的说法倘若属实，那就表明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估计严重偏高。彭科夫斯基还有一点说法值得注意：他说苏联军方及政治领导人并未作好战备，他们在柏林施加压力不过是虚张声势。这关系到美国的对策，不可忽视。

艾伦·杜勒斯既不愿意发布可疑的材料，也不愿扣留可能重要的信息。他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信息究竟有无价值。这还关系到这一新的情报来源是否可靠和可用。我们的情报收集者坚持认为这一情报来源可信，认为他提供的信息重要。但局长不愿轻信而陷于被动。

我的评估结论是，这一情报来源大概是真诚的，他提供他认为真实的信息，但这可能只是真实情况的一部分，或者是从一个角度看到的情形。他认为西方严重过高估计了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想把它往下压一压，这可能影响到他总的描述，同时他的信息并不完整，也不总是准确，然而仍反映出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不是像中情局原先估计的那样顺利，其部署规模也更加有限得多。美国空军原有的估计就差得更远了，但陆军和海军的估计还差不多。此外，新的卫星摄影情况是我们修改原有估计的主要依据，其反映的趋势与彭科夫斯基的说法是相吻合的。

至于苏联陆军是否只有 50 个师的问题，我指出，我们原先估计的苏军满员师大致上也是这么多，至少另外 100 个左右的师都是严重减员，甚至只是“架子师”，不能算是战备师，所以彭科夫斯基没有提到它们。

我认为彭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可以分发，只需提醒各有关单位注意这一情报来源对他谈及的事情的了解有深有浅，因此应有

保留地看待他的具体论断。

艾伦·杜勒斯采纳了我的建议。此后，从彭科夫斯基那里源源不断流来大量信息，其中包括苏联军事思想方面的大批文献材料。这些信息在分发时用了几个不同的化名，例如文献材料的来源化名是“桉树”，而转述的小道消息来源化名则是“山雀”。政治性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柏林危机的信息，分发时未用化名，只提信息来源为能接近军方高级领导人的有地位的人士。

彭科夫斯基有关柏林危机的信息都经过仔细整理于 1962 年 7 月报告了总统和国务院。他不曾预报过修建柏林墙的事，他也不知道苏联要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8 月以后，他就无法再递送情报了，因为他已受到怀疑和监视，然后，恰好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即 1962 年 10 月 22 日，他在莫斯科被捕了。

彭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包括苏联一些导弹系统的性能，其中就有后来部署在古巴的那种 SS—4 (R—12) 导弹。这些情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是很有用的。

彭科夫斯基提供的信息中，最重要和最大量的，是 1960 年至 1962 年苏联《军事思想》杂志一批机密和绝密的文章。该杂志的绝密版是 1960 年才开办的，发行范围仅限于集团军司令及国防部上层领导人。彭科夫斯基是靠了炮兵元帅谢尔盖·瓦伦佐夫的庇护才得以见到它们。这些绝密文章的翻译，第一批完成于 1961 年 8 月，我对开头的几篇写过分析。后来，大量的分析是由国防情报局完成的。苏联开办该杂志绝密版，是为了在苏军高层就核时代军事学术问题展开辩论。这一辩论中的“激进派”，例如总参军事学院的加斯季洛维奇上将，认为在欧洲中线只需要 30 到 40 个陆军师，配属以大量坦克，在密集使用“数以百计”的核武器的条件下，就能一日推进 100 公里，尽管北约共有 60 个师的兵力也抵挡不了。“保守派”则认为双方都会伤亡惨重，

所以需要更多的师。^①

我们当时在公开刊物上写文章评论苏联的军事战略，尽管熟悉彭科夫斯基提供的这些绝密材料，但在自己的文章中当然不能加以引用，然而我们掌握了这些背景材料，就能更透彻得多地理解苏联的公开军事论述及苏联国内更广泛范围内的争论。我们为美国政府提供的情报分析也不能直接引用这些材料，但可间接加以利用。例如我在中情局最后几个月当中，由我们起草，然后于 1961 年 11 月 21 日发文的一项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 SNIE 11—14—61，《苏联战略态势，1961—67》，就是利用这些材料分析了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势。

了解苏联军界的内部讨论情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出苏联对西方的理解和误解。例如，苏联总是担心北约会进攻他们，心存恐惧。苏军总参作战部部长西蒙·伊凡诺夫上将在 1960 年和 1961 年绝密版《军事思想》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是根据他所理解的“事实”认为北约会先下手向华约进攻。^②

像这样一些似乎以事实为依据而断言美国和北约在策划第一次打击的绝密分析材料，提供给苏联军政领导人阅读，其影响自然是很严重的。彭科夫斯基弄到的材料仅限于 1960 年和 1961 年，但他们这种看法并不是仅限于这一时期。苏联的公开宣传当然是歪曲事实和夸大其词的，但从后来的苏联内部军事材料也可以看出，这种歪曲和夸大并不完全是蓄意而为的。

当时，只有分析苏联军事思想的情报专家看到这些材料，谁也没有从政治误解的角度加以考虑。我有几次在写报告时谈到这

^① 加斯季洛维奇的文章见 Special Collection: Colonel General A. Gastilovich, “The Theory of the Military Art Needs Review,” *Voyennaya mysl*, no. 1 (1960), pp. 6–20 (top secret).

^② Colonel General S. Ivanov, “Some Conclusions on the NATO Armed Forces’ Exercise Side Step,” *Voyennaya mysl*, no. 2 (1960) (top secret); and “The Fallex – 60 Maneuvers of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NATO Aggressive Bloc,” *Voyennaya mysl*, no. 4 (1961) (top secret).

一问题，但始终不能引证彭科夫斯基送来的绝密材料。有几次我向有关部门指出，苏联对北约的误解是有危险的，要求将这些材料销密以便引用，但遭到拒绝。只是到了如今才不再受约束。

当年，在对彭科夫斯基这一情报来源的掌握上，中情局与英国秘密情报处有过争论。有一件事值得回顾。鉴于彭科夫斯基在莫斯科所处的地位以及能接触高层情报的有利处境，中情局认为应作出安排，让他一旦获悉苏联决定发动进攻时，就给我们发出警报。英国人尽管最初提出了警报系统的想法，但觉得彭科夫斯基此人仇恨苏联领导人，而且总想给西方敲警钟提防苏联的危险，若安排他发警报，也许还招来很大的风险。然而中情局仍坚持作此安排，而且要求不待美英联合评估，就发警报。倘若彭科夫斯基确实知道苏联即将发动进攻，这样安排是合逻辑的，但风险也确实不小。

这一警报系统的代号为“遥远”，做法很简单：彭科夫斯基拨使馆的一特定电话号码，一听到对方接电话，就朝话筒吹三口气，等一分钟后再重复一遍。这就是全部动作，不用说一句话。然后，若时间许可，就到约定的情报秘密放置地点放一纸信，说明警报的具体内容，再在一根电话线杆上留一记号，表示已留下纸信。中情局派驻莫斯科的站长一收到电话传来的警报信号，应立即报告华盛顿，甚至不等查看纸信就报告。

1962年11月2日，古巴导弹危机的高潮刚过而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之际，使馆收到了电话传来的“遥远”信号，电话线杆上也出现了记号，使馆随员、中情局工作站的理查德·雅可布到约定的秘密地点去取信时，在现场被苏联保安人员抓住，随后获释回使馆。从雅可布一被拘捕，使馆立刻明白彭科夫斯基并未发警报信号，而是被捕了，将信号安排告诉了苏联保安当局。现在仍不清楚，他是否曾告诉苏联官员这是表示苏联可能发动进攻的预警信号，或者，他是否想孤注一掷，让大家同归于尽。幸好那最

初的电话信号没有被当作苏联真正即将进攻的警报。倘若这件事发生得更早一周，恰好发生在古巴导弹危机的高峰之际，那又会招致何等后果！

彭科夫斯基是一名工作很有成效的间谍，提供了大量的苏联军事情报工作的细节、大量的有关苏联军事思想的文件以及一批近程和中程火箭和导弹系统的信息。但在苏联的政策和较广泛的意图方面，他提供的信息却用处小得多，因为他自己有偏见，其信息又带有道听途说的性质，报道的内容是高级将领对苏联政策的想法和说法，而不是政治领导人的实际想法和做法。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还有另一些苏联情报人员和官员叛变过来充当间谍，但其中许多人像中情局的某些人一样，成了安格尔顿的反情报部门的怀疑对象。^②

1962 年 4 月在日内瓦，美苏两国代表团谈判期间，我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在酒吧偶然遇见了苏联代表团成员尤里·诺森科。与我一起的是国务院一个年轻有为的官员托姆·皮克林（他后来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大使和副国务卿）。诺森科跟我们谈话时，表现得出奇地强硬，甚至说斯大林在 1945 年不该让红军停下，应继续向西方进军。关于这次谈话，我写了一个报告，指出诺森科大概是苏联情报官员。他确实是克格勃派到苏联代表团的人，但他的“强硬”言谈是装出来，说给窃听者听的，实际上他已决心投靠西方。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他就跟美国代表团另一成员联系上了，成了中情局在克格勃内部的“卧底特务”。两年后，他叛逃到美国，不久就成为安格尔顿 1964—1974 年的纠缠

^① 我在 1987 年就首先透露过彭科夫斯基警报安排一事以及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它被利用过，见“Cuba: Even Dicer Than We Knew——Details of the Missile Crisis,” *Newsweek*, October 26, 1987, p.34; and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rookings, 1987), pp.39-41. 但当时我把日期弄错了，说成是 10 月 22 日，还说信号报告华盛顿，其实是报告过。关于此事的最充分叙述，见 Schecter, *The Spy Who Saved the World*, pp.262, 284-87, 304-05, 346-47, and 397.

^② 详见 David C. Martin, *Wilderness of Mirrors* (Ballantine Books, 1981).

不清的反情报游戏的受害者。

我还见过另一名命运乖舛的苏联叛逃者，海军上校尼古拉·阿尔塔莫诺夫，他在 1959 年 6 月从海上叛逃到美国，提供了有关苏联海军的大量情报，但在其他方面知之甚少。我当时找他，听他谈过苏联军方对突然性因素日益重视的情形。1966 年我第二次遇见他时，他已经成了美国公民，改姓沙德林，为国防情报局工作，并从事写作，论述苏联海军。

1975 年 12 月，他奉命去维也纳会见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却失踪了。原来当时有一名苏联情报官员伊戈尔·科奇诺夫已在暗中为美国效劳，但需要做点事情表示他依然忠于克格勃，以减轻克格勃对他的怀疑。1966 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作出决定，让沙德林接受科奇诺夫的招募，答应充当苏联的间谍，在双重间谍的状态下继续为美国服务。沙德林不乐意干这件事，他并不了解真情，不知道科奇诺夫的底细，更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场更大的双重间谍游戏中被当作一名小卒加以利用。但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再动员下，他只好同意了。头些年，他一直住在美国，没出问题。1975 年，他到维也纳与一名苏联特务接头时，失踪了。此后音讯全无，也没有苏联审判“美国特务”沙德林的消息。美国查询过美国公民沙德林的下落，苏联方面仅声称他们没有见过该人。^①

10 年之后，另一名苏联叛逃者维塔利·尤尔琴科（此人后来又回头叛到了苏联一面）告诉美国方面说，沙德林是遭绑架时死亡。迟至 1994 年，原克格勃将军奥列格·卡卢金在他的书中证实，克格勃人员 1975 年 12 月是想把沙德林从维也纳绑架到布拉

^① 见 Henry Hurt, *Shadrin: The Spy Who Never Came Back* (Readers' Digest/McGraw Hill, 1981).

迪斯拉发，但无意之中给他服药过量而致途中死亡。^①就这样，在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游戏中，一名小卒又成了牺牲品。

间谍活动是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是收集情报或者挫败对手收集情报的企图，但间谍游戏却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它不仅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而且还成为敌对双方情报部门大体上为玩间谍游戏而玩间谍游戏的一种秘密冷战游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形成的这一格局，在70年代和80年代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本书下文中还会有所述及。此外，还有一部欺骗战和假情报的历史，双方都利用双重间谍，提供虚假信息，以误导和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在某些情况下还误导和扭转对方的政策。欺骗和假情报，若是其后果尚可预料而且尚可控制的话，那也许还是有理的。可是，将情报斗争推向极端，过分热衷于间谍游戏，以至于它不再是为政策服务的一种手段，而是变成它自身的目的，那么它的效益就会消失，甚至产生负效益，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了。

^① 见 Oleg Kalugin, *The First Directorate: My 32 Years in Intelligence and Espionage Against the West*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94 - 97.

第八章

国务院：肯尼迪年代（一）

1961年9月17日，我到国务院报到上班。三天以后，我原先所在的各国国力估计处和中情局其他一些处室就搬迁到了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最初，我的一些朋友以为我只是改变掩护身分，可是我这次是真的换了工作。我在国务院的新上司 U. 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批准我兼任中情局正式顾问，1962年我还帮助我的老同事们起草第一份关于华沙条约军事力量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有时，尤其是我每次从苏联和东欧旅行归来，我也非正式地列席国力估计委员会会议。然而，从1961年9月17日起，我已是国务院的一员，而且在国务院一干就是18年多。

当时，美国有了一位新的朝气蓬勃的总统，他许诺要推行更积极的政策。像许多人一样，我为自己能在他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工作而兴奋。我已经干了好几年情报工作，希望能更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所以，1961年刚过了半年多，我就得到了这样做的机会。

肯尼迪政府上任后，气象一新，组织机构方面也有一系列变动。原先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许多臃肿机构取消了，提高了工作灵活性和效率。当然，这也带来了对问题的方方面面可能考虑欠周密的风险。古巴流亡者冒险到古巴猪湾登陆而失败即是一例。

有一项成功的改革，是在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

办 U. 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人数很少的政治军事事务参谋班子。与这一班子相对应的国防部一个机构，是人数多得多而且历史悠久的国际安全事务署；当时，国防部助理部长保罗·尼采被指定为兼任署长，副署长之一是我在中情局时的老上司比尔·邦迪，另一位副署长哈里·罗恩是我在兰德公司时的老朋友。他们建议我去他们那里担任政策规划处负责人。我认真考虑以后，最后决定到国务院工作。

我们这个新设立的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小组的头头是杰弗里·基钦。小组的代号是 G/PM，G 代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PM 代表政治和军事事务。我的头衔是中苏集团（后改称苏联集团）政治军事事务特别助理，这一职务名称既广泛又笼统，但我很快体会到，即便是这样一个头衔也只能涵盖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G/PM 担负着双重任务：对内，它在各种政治军事事务上，在国务院各主要地区司之间起协调作用，为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以及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当参谋；对外，它代表国务院参加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作为一个“七层楼上”的班子，我们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各个地区司和职能司局，当然这也要看事情性质如何，还要看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活动劲头如何。此外，有的部门本来就有处理政治军事事务的班子，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负责处理北约事务的欧洲司地区政治军事事务处（EUR/RPM）它们一般都继续发挥作用。我们的 G/PM 对北约事务也起一定作用，但并不取代原有的 EUR/RPM，而只参与军火控制，检查军火销售是否符合美国的法律和政策。被派到军队各大总部担任政治顾问的外交官均属 G/PM 管理。G/PM 还积极参与美国海外军事基地谈判，在这方面与有关的地区司密切配合。G/PM 与国防部的国际安全署相协调，确保海外的军事活动与外交政策的要求相适应，例如，当需要用军事活动来支持外交

政策时，就派军舰去当地访问；当外交政策上要求不出现美军活动时，就防止军舰无意间出现。其他的职责还包括代表国务院参与民防政策以及海外的反叛乱计划。在下文中，我还会比较充分地谈到我作为 G/PM 的一员所执行的一些任务，尤其是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扩散以及外层空间活动政策方面的军事和情报问题。

1961 年 1 月，肯尼迪总统刚刚就职，即下达一道指令，规定所有将领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的公开言论均需经过事先审批。负责审批的机构是国防部的国际安全署和国务院的 G/PM。许多将领都发表演讲或文章谈论苏联的威胁，所以我审读过好几十份这种演讲稿或文稿，以确保它们与政策相吻合（例如，不以预防性战争相威胁）。这种做法不曾引起重大争议，也不曾向报界泄露过，回想起来，我真感到奇怪哩。

1961 年 10 月，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发表演讲，干脆脆一劳永逸地否定了“导弹差距”的说法。他强调了美国的战略优势，指出即使对方先对美国实施突然袭击，美国也仍有至少同样强大的威力进行还击。这篇讲话是总统肯尼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一起商定的，他们的决定是，这篇讲话必须是权威的，但又不要显得那么有挑衅性，所以由国防部副部长出面，而不是由总统或国防部长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出面。讲稿是由国防部的部长办公室和国际安全署起草，我则是代表国务院参加了审议。

在叙述我参与处理的一些政策之前，先讲一件事：我曾经发挥主动性想办成一件事，却在国务院“体制”内部通不过而告吹。美苏之间本来保持着高层军事互访，但自从 1956 年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访苏以后，由于发生了苏军镇压匈牙利起义、U—2 飞机事件和反反复复的柏林危机，这种高层军事接触中断了。到了 1962 年，柏林危机看来已趋向冷却，我觉得该恢复高层军事接触了。国防部的国际安全署表示赞成，国务院负责欧

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和一批苏联问题专家也表示同意。这时我起草了致驻苏大使汤普森的电报稿，这本是平平常常的一道手续，但我忽视了一点，没有请欧洲司苏联处的处长马尔科姆·图恩审阅。我并不是有意绕开他，而只是碰巧有事找到图恩的上司科勒，就请科勒签发了电报。这一下子把图恩给得罪了，因为我没有先去找他，而且他认为美苏一切事务均应由使馆办理，不应再搞别的联系。在他的强烈反对下，科勒向他让步了，我的倡议也就夭折了。这是一个教训，让我明白了国务院内办事的某些规矩。

20 世纪 60 年代，我在国务院工作，得以熟悉冷战期间整个一代苏联问题专家，在工作中与他们密切合作。这些专家包括汤普森大使、查尔斯·波伦、福伊·科勒和雅各布·比姆。还有乔治·凯南，他虽于 1953 年离开政府，但 60 年代又回来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我 1962 年到南斯拉夫时拜见过他。我进国务院以前就认识他们，但这时已有幸跟他们共事。通过工作，我还熟知了另一些人，例如我的上司约翰逊大使、国务卿腊斯克和副国务卿鲍尔。

我记得有一件有趣的事，颇能说明冷战岁月的气氛。1962 年 8 月，福伊·科勒准备去莫斯科当大使时，让我陪同他到奥马哈拜访战略空军司令部。那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战略空军司令部向他详细介绍情况，其中有一位空军上校指点着墙上一幅巨大的莫斯科及其周围地区的地图，指出一旦发生核战争，那里共有 60 个应予以炸毁的目标。本来一直静静听取情况介绍的科勒，听到这里忽然插话问道：“顺便问一声，美国大使馆在哪里呢？”其实，他当然很清楚我们的大使馆是在市中心，这一提问不过是流露出他当时不安的心情。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两个月。

我在业务上对外联系最多的是国防部，尤其是该部的国际安全署。其次是中情局。此外还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

治·邦迪领导下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邦迪虽然不如他的后任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那样声名远扬，但办事能力很强，是总统的得力顾问，又能保证各种意见均上达总统，渠道畅通。

当时我开始在公务上跟一些国家驻美大使馆的代表建立联系，其中主要是英、法、德、意四国使馆，还有其他北约国家及若干中立国的使馆。因此，与这些国家及另一些国家的外交官都有社交往来。在下一章我将谈到与苏联大使馆一些人员的交往。最后，我与报界，尤其是采访国务院的记者，还有采访白宫和国防部的记者，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外交政策和防务，有时也涉及情报问题。

1961 年的主要对外政策问题是柏林危机。当时有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工作组频繁开会，处理有关事务。我在 1961 年夏季是作为中情局观察员参加一些会议，9 月起则是作为 G/PM 代表与会，最初有的人还不知道我的身分变了。我刚进国务院时，就柏林危机写了很长一篇分析报告交给我的上司约翰逊大使，但很快明白了，这样的分析用处不大。G/PM 是为副国务卿的行动服务的一个行动参谋班子，需要的是行动的建议。

柏林危机特别工作组及其下设的几个委员会主要是拟订应急行动计划以对付苏联的压力，但有一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考虑在解决危机的努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东西方安全谈判应如何进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担任过负责政策规划的助理国务卿的杰拉德·史密斯，副主席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副署长艾德里安·费希尔。我是这个委员会中的国务院代表。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后来的谈判可能是有帮助的，但在 1961 年时，我们的工作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危机一直持续到 1962 年末。

柏林危机的高峰始于 1961 年 6 月肯尼迪总统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首脑会议上激烈交锋，随后是 8 月竖起柏林墙，10 月美苏坦克在一个边境检查站上差一点交火。双方的对峙则起源于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的挑衅，而危机的消退是在1962年后期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从1958年到1962年，苏联领导人一直想搞掉西方在铁幕后面拥有的西柏林这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飞地。实际上，早在1948—1949年，斯大林就曾封锁西柏林，当时的目的就是既阻止西德的巩固，也逼迫西方退出西柏林，但未能得逞。赫鲁晓夫曾经形象地将西柏林形容为“如鲠在喉”，不搞掉它就难受。1958年以后，他扬言要把柏林的治权交给东德，以迫使西方承认这一卫星国，同时企图使西柏林变成中立化的“自由城市”，让西方军事和政治力量都撤走。

在柏林危机第一阶段，即1958年末至1960年，我还在中情局的各国国力估计处，我和我的同事们正确地估计到赫鲁晓夫终将退却，但国务院的情报人员对局势的估计更严重一些。到了1961年，美苏双方采取了更积极的行动显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决心。8月，苏联看到既然赶不走西方军政势力，就用柏林墙把东西柏林分隔开，阻挡西方的影响和切断东德人成批西迁之路。

当时美国政界多数人认为，苏联激化危机是政治上的攻势行动，其目的不仅是想迫使西方退出西柏林，而且还想分化西方盟国，考验北约和美国的决心，削弱西方联盟。情报界不少人的看法亦与此相似。这种看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情报界也有不少人苏联的动机看得更透一些。经过多年的观察，我们知道苏联领导人既指望达到上述的攻势目的，也还有守势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企图最低限度要达到的目的。柏林墙清楚表明他们的这一目的是防止东德崩溃而波及东欧各国。

柏林危机在1961和1962年一直闹得挺欢，在1962年以后也仍然拖着，直到1971年，作为欧洲缓和结构的一部分，四大国签署了柏林问题协议，这一问题才算正式解决。然而，1962年末，苏联指望在古巴部署导弹以加强它在东西方兵力对比中的不稳地位的企图宣告完全失败，就使柏林危机实际上告一段落。

而在这以前，1961年秋季，双方曾采取若干步骤减缓柏林紧张局势，最主要的是赫鲁晓夫于10月收回了他提出的要西柏林改变地位的最后期限。可是在10月27日，东西柏林之间一个过境检查站（人们把它叫做“查理检查站”）美苏坦克突然对阵，紧张局势陡然加剧。在那以前的几天，东德当局要求美国官员向他们出示身份证件才可进入东柏林（这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东德主权），遭到美国断然拒绝，于是美国的10辆坦克在查理检查站占领阵地。紧接着苏联也出动10辆坦克，与美国坦克正面对峙，炮口罩都卸下了。像这样的美苏军队对阵，这还是头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但是对阵还不到24小时，苏联的坦克突然撤走了，美国的坦克也随之撤退。

柏林危机的根源可以称之为“客观因素”，即西方远在铁幕以东拥有西柏林这样一块飞地，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局面引起了东西方之间的具体利害冲突。而查理检查站的坦克对阵则表明，“主观因素”，如双方的不同见解和信念，也会使紧张局势加剧，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当时我们在华盛顿的看法是，东德警察在检查站要查看美国官员的证件，表明莫斯科企图逼迫我们间接承认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柏林享有主权，而这样一来就会威胁到西柏林的地位，因为我们西方在西柏林的存在和管辖权以及苏联在东柏林的管辖权，还有四大国在柏林全市自由往来的权利，均来源于战时盟军的占领权。我们部署在那里的坦克只是要支持我们进入东柏林的权利，准备在必要时碾碎任何可能设置的障碍。苏联坦克开到那里则是威胁要以武力相回应。苏联撤退他们的坦克，表明苏联领导人懂得了我们的决心，而且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风险以及他们挑起整个事端的责任，终于决定退却。这就是西方二三十年来持有的看法。

如今，我们对美国行动的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对苏联行动的背景了解得更多了，当时的情况就显得颇不一样了。

首先，苏联领导人并不曾授意东德当局来逼迫我们出示证件；那是东德当局自己为了让人们注意他们争取西方承认他们的主权，而主动采取的行动。第二，当美国出动坦克，其中有些坦克还装上了推土器时，苏联领导人以为美国是打算用武力强行推倒柏林墙，因而派出了他们的坦克来应付这一挑衅。他们这样想，并不只是出于疑心，而是有一定道理的：苏军情报人员观察到（而且拍了照片），美军几辆有类似推土器的坦克曾经在西柏林一片僻静的林区内演习如何推倒一段柏林墙仿制品——可是这一演习是驻西柏林美军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自行下令举行的，华盛顿根本无人知晓。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苏军坦克撤走，美军也随之立即撤走其坦克，并不是苏联领导人决定退却，而是肯尼迪总统通过一条非正式渠道（由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联系一名隐蔽于苏联驻美大使馆内的军事情报官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向赫鲁晓夫提出要求后，双方商定的一种精心安排。这段内情只有总统和他的弟弟了解，没有旁人知道。从苏联方面看，他们可以说派出坦克使得美国不敢再挑衅，不再企图推倒柏林墙了。于是，美苏两方都可以说自己在在这场对抗中得胜，迫使对方放弃挑衅而退却。但是这场危机暴露出，美苏双方当时都对另一方的意图有误解，而这种误解会造成多么危险的对峙。幸好，这种直接的武力对峙是罕见的，在柏林危机中的这一次对峙得到了解决，尽管双方的误解当时尚未消除。^①

回顾当时的情形，可以看出，尽管我方当时对行动方案严加保密，但在北约总部以及北约各国首都仍有潜伏的苏联谍报人员，他们提供的情报使苏联领导人获悉，我方会在必要时作出强

^① 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通过调研和采访苏联方面一些当事人，才握有关这场危机的新信息，先后于 1991 年和 1999 年两次在我的著述中公布了这些信息。见 Raymond L. Garthoff, "Berlin 1961: The Record Corrected," *Foreign Policy*, no. 84 (Fall 1991), pp. 142 - 56; "The American - Soviet Tank Confrontation at Checkpoint Charlie" in *Mysteries of the Cold War*, edited by Steven Cimbala, pp. 73 - 87 (Ashgate, 1999).

有力的反应。这无疑促使赫鲁晓夫定下了退却的决心，而满足于保住柏林墙这一守势目的。这倒是说明，反谍方面的失败有时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结果。

最大的一次意志较量和最危险的一场危机，则是 1962 年发生于古巴，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而引起的。下面的第十章将专门叙述那一事件。那场危机的成功解决也防止了柏林危机的复发。

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初非常担心的另一件事是苏联不那么直接的一项重大挑战，即共产党人在第三世界发动的叛乱。据一位参加过肯尼迪总统就职后会议的官员说，新总统最先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游击战怎么办？”^①他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会后发布的第二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指示国防部长考虑如何加强反游击战能力。早在竞选期间，肯尼迪就批评过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像加强核作战能力一样地加强常规作战能力，“包括与所谓的丛林战和共产党鼓动的叛乱作斗争的能力”，因而没有能力作出“灵活反应”。

1961 年 1 月 6 日，赫鲁晓夫故意在美国新总统即将就职的时机，发表一篇讲话，表示苏联将加强对他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他举例谈到了古巴、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他没有谈到老挝，但是那里的战事再起，引起了美国新老总统二人的注意。前比利时属刚果当时也动荡了一年。卡斯特罗的古巴自然更是美国喉咙里的一根刺。赫鲁晓夫似乎还要更广泛地向我们挑战。他说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和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应当“全心全意”支持这样的民族解放战争。

但是，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除了汤普森大使以外）没有理解到赫鲁晓夫特意说给美国新一届政府听的另一点更加重要的信

^①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 Kennedy* (Doubleday, 1967), P.413.

息，那就是必须防止大国卷入的战争，不只是防止核大战，而且要防止大国卷入的局部战争和有限常规战争。他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起义”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们是当地人们的行动，从外界防止不了，更不应加以干涉。因此，他表示要“全心全意支持”，只是并未许诺给予直接援助，因为他决不想直接陷进去。他作出这种支持的姿态，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攻击他没有尽力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确实相信世界正处于“进步”的革命进程之中，但是他并不是直接向美国及其总统挑战。赫鲁晓夫说的是一套，而真正想要表达的却是相反的信息，这是他惯用的手法。现在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对于肯尼迪没有懂得他的意思深感失望。

肯尼迪总统并未忽视赫鲁晓夫这篇讲话，恰恰相反，他让他的高级政策顾问们传阅并加以研究。但是他由此得到的信息却是：莫斯科将积极推进第三世界中的革命活动，也许还推进局部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

整个 1961 年和 1962 年，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几位主要顾问，尤其是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在国务院政策规划署任署长的沃尔特·罗斯托，从几个方面推动这一工作。本来已退役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又在 1961 年 6 月被召回来担任总统的特别军事顾问。甚至在这之前，在 1961 年 4 月的猪湾登陆失败之后，泰勒就受领任务来研究有限局部战争以及反叛乱作战的需要。

人们的看法最初有些混乱，搞不清楚苏联是否会让它自己的军队参加这些战争，还有些人主张把研究扩大到美苏之间的“有限战争”。我开始参与这件事，是因为当时刚担任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局长的罗杰·希尔斯曼（他曾在耶鲁工作过，毕业于西点

参看 Michael Beschloss, *The Crisis Years :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 - 1963* (Edward Burlingame Books - Harper Collins, 1991) . pp.60 - 61.

军校，战时曾任战略情报局驻缅甸游击队工作组组长）从刚担任国务卿的腊斯克那里受领一项任务，就苏联政策中的有限战争问题提供一项研究报告。希尔斯曼很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认为我是撰写此项报告的最佳人选，就作了安排把我从中情局各国国力估计处“借”过来承担这一任务。我就“苏联政策中的有限战争”这一题目写了一篇较短的报告，同时附上了我早先为一次学术会议撰写的一篇长达 50 页的历史分析文章。希尔斯曼于 1961 年 2 月 20 日将我的文章交给了国务卿和国务院其他负责人，说明他“完全赞成”我的意见。

这里谈谈我当时提出的一些总的看法。首先我指出苏联将战争，尤其是将有限战争，看做是政策的工具。什么时候动用这一工具，则要权衡特定情况下的利害得失。然后，我指出，虽然赫鲁晓夫 1 月 6 日讲话承认有可能出现局部战争，但他认为应避免这种战争。他把这种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起义”加以区别，说后者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应予以支持。

我指出，“如果形势显得有利，苏联大概会用提供物质援助甚或隐蔽干预的办法，或者通过代理人，来煽动和利用局部地区的动乱、暴力或内战。但总的说来，苏联大概不会自己出马发动有限战争，而是会利用别的人，并且把局部地区内部的敌对行动演变成国际有限战争的责任和风险推给西方……但是，如果西方干涉对苏联集团有利害关系的局部战争，共产党人也许会觉得他们可以跟西方的干预比着干，这比他们主动公开干涉要更合算一些。”

在结论中，我还表示赞成肯尼迪政府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灵活反应的军事能力的主张。“如果苏联看到美国和自由世界其他各国有足够的能有效进行有限战争的军事力量，那么，他们在任何特定形势下挑动有限战争的做法就极可能得到遏制。”

我的报告写成于 1961 年 2 月 17 日，希尔斯曼于 2 月 20 日将

它作为备忘录交给了国务卿。^① 像这样的备忘录是否对决策人起了作用，是很难知道的。但有一件事间接说明我的报告起了作用：1961年5月，总统的军事顾问泰勒将军要见我。我们见面时，他要我进一步谈谈苏联历史上卷入有限战争的情况，包括1938年和1939年之交在满洲与蒙古边界地区跟日本交战的情况。他当时受总统委托，正在仔细考察有限战争和反叛乱作战的需要。

当时，政府的主要精力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反叛乱作战作准备。国务院内参加这项工作的主要班子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大使领导下的 G/PM 小组。经过一年研究，根据 1962 年 1 月 18 日的第 124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以泰勒将军为主席的“特别小组（反叛乱）”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副国防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将军，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还有国际开发署署长和美国新闻署署长。其核心成员（包括代表国务院的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内）与早先已成立的负责隐蔽情报行动的特别小组是相同的。1961 年 11 月成立的负责针对古巴的隐蔽颠覆行动的、代号为“獾”的特别小组，其核心成员亦是这些人。负责反叛乱作战的特别小组主要任务是提出总的方针政策，但同时要保证美国政府内部达成如下共识：颠覆性叛乱，包括“解放战争”在内，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军事冲突，其重要性 with 常规战等同”。上述的那项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明确规定，武装部队的组织、训练和作战理论，而且还有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在国外进行的“政治、经济、情报、军援和新闻活动”，均应

^① “Limited War in Soviet Policy,” February 17, 1961, pp.1-8; enclosure to memorandum with the same title from INR - Roger Hilsman to the Secretary, February 20, 1961 (secret; now declassified).

反映有效反叛乱的新要求。为实施这一规定，有关单位都采取了大量措施，其中大部分都未必是有价值的。数千名军官以及国务院等政府部门的数百名中高级官员都参加了反叛乱专题培训班。外交人员学院开办的学习班每期 6 个星期，学员 40—70 人，一年办 8 期到 10 期。在肯尼迪当政时期，这种培训活动一直未断，但肯尼迪遇刺后，培训劲头迅速下降，到 1971 年正式结束。

在军队内部，不少人对于传统军训被削弱有意见，暗中抵制，但特种部队（现俗称“绿贝雷帽”）人数大增，声望日高。“反叛乱训练”通常是更强调机动力，同时常规战训练也更注意提高“灵活反应”能力。

我基本上没有参与这套活动，甚至还借口工作忙而逃避了那为期 6 周的培训班（许多人都以工作忙为借口想逃避，但多数人未能逃脱）。反叛乱是重要的，但搞得过了头。它让大家注意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和防颠覆，从这一点来说，它是有益的。它还促使军队增强了灵活机动性。可是，注意力的对象往往不是放在第三世界，而是放在莫斯科和北京（当时我们坚持把它叫做北平）。担心苏联和中国有可能利用机会牟利，是对的，然而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而忽视了叛乱的当地原因，就走偏了。1961 年起，反叛乱的努力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后来在越南吃了大亏。曾在 G/PM 负责反叛乱政策协调并兼任反叛乱特别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查尔斯·梅奇林在 1969 年发表的文章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一方面把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发动叛乱的威胁看得过重，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世界”的分裂估计不足。对当时所说的“中苏集团”的分裂尤其认识不足。不少人，特别是从杜鲁门政府时期就从政的那些老人，

^① Charles Macchling Jr., “Our Internal Defense Policy – A Reappraisal,”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January 1969), pp. 19 – 21, 27.

总是怕别人低估“共产党威胁”。有的人甚至在认识到中苏闹分裂的现实以后，仍然对这一现象的意义和后果估计偏低，其中地位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国务卿腊斯克。尽管莫斯科和“北平”已是共产党世界中的敌手和竞争对手，腊斯克仍然认为它们是天生的盟友。

肯尼迪政府在注重反叛乱的同时，也强调要建立逐步升级的威慑能力，尤其是用于灵活反应的常规作战能力，例如对付有限战争和柏林危机之类的突发事件的能力。我在进中情局之前发表的著作中就提出过这一主张，因此我赞成肯尼迪政府的上述做法。然而当时还有一种看法令我担忧，那就是人们认为，由于力量对比有变化，苏联有可能向我们提出直接的军事挑战。其实，赫鲁晓夫在上述那篇讲话中，在表示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时，也表示过要避免苏美之间的有限战争，在政策上有克制的一面，而我们的人却对此未加注意。后来，当我们决心参与越南的有限战争时，苏联军队并未出面，而美国的有限兵力却越投越多，总嫌不足。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军备控制开始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又一个重点。美国与别国谈判裁军已有多多年，在艾森豪威尔年代还谈判过禁止核试验的可能性，然而到了肯尼迪时期，军备控制才受到高度重视，1961年从3月到9月对此作了广泛的审议。肯尼迪总统就职后一周，就把著名的大律师、战时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翰·麦克洛伊请来，全面考察裁军和军备控制事宜并在这方面为总统当顾问。从3月到5月，由杰出专家组成了九个小小组，分别进行调研，其中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由已退役的约翰·赫尔将军担任主席，当时还在中情局的我被“借”到了这一个组。

各个组的最后报告和麦克洛伊的总报告于9月完成（这时我正好调入国务院）。结果之一，是成立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它

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在政府里独立发表意见。

这时还成立了一个由各部门主管人组成的重头委员会，国务卿任主席，成员包括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几个部门的副手则组成了一个工作层次的委员会，由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自然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作出相应安排。我所在的 G/PM 自然成为交会点，我则被指定为国务院内负责军备控制的工作人员的协调员，陪同国务卿腊斯克出席重头委员会的所有会议，还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列席了工作层次的副手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

美国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是一大特点。而在国务院内将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放在处理政治和军事事务的班子 G/PM，这也是不同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在那些国家的外交部，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工作责任是由负责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部门兼管。我们把这一工作放在 G/PM（G/PM 在 70 年代初演变成政治军事事务局），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把军备控制谈判从政治考虑和军事考虑上平衡起来，从各个有关司局的谈判意见平衡起来。我受国务卿委托，在各司局间进行协调，军备控制和裁军事务就成为我的主要职责。

9 月成立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以及就“全面彻底裁军”制订美国总的立场，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我们也立即投入了国际谈判。在这之前，麦克洛伊已经与苏联特使、外交部副部长佐林举行谈判，并且于 1961 年 9 月签署了“关于双方商定的原则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的主要价值在于，撇开“全面彻底裁军”的宣传战不谈，提出了美苏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若干领域，而且确立了在多边国际谈判之外进行双边谈判的新格局。

然而，多边谈判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一个新的、有希望带

来成果的多边谈判论坛成立了，这就是 1962 年 3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十八国裁军会议”，最初半个月与会代表团团长是各国外长，由美苏代表共同担任主席。腊斯克国务卿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之久，这是少见的，但除了宣告这一论坛成立以外，无大成果。

腊斯克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在日内瓦开会时，我作为随员也在那里。当时，美国代表与外国代表谈话后，都把谈话内容写成“谈话备忘录”，供美国其他代表和华盛顿的人了解情况。有一次，国防部国际安全署负责军备控制的副署长约翰·诺顿和我跟波兰一位重要外交官曼弗雷德·拉赫斯在一次午餐会上作了长时间的很有意思的交谈，我把谈话内容写成备忘录后，又想象拉赫斯从他的角度会如何理解这次谈话，就编造了一份拉赫斯的“谈话备忘录”，把它跟我们的备忘录放在一起供代表团成员传阅。我想大家都会看出那“拉赫斯备忘录”是编造出来的，绝大多数人确实看出了这一点。可是出了令人尴尬的事：腊斯克把我叫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福斯特也在场。腊斯克说福斯特给他拿来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波兰文件——就是我编造的“拉赫斯备忘录”——问我是怎么搞到这一文件的。我马上如实相告，说明我的用心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谈话的对方可能会有什么不同的理解。腊斯克听了笑一笑，福斯特则表情很不自在。这件事也到此为止。

“十八国裁军会议”从筹备到开会，尽管大家并不指望会议取得多大成果，但工作量仍然浩大，把我们忙得团团转。腊斯克回国后，美国代表团由常驻代表亚瑟·迪安主持。6 月，迪安让我起草他致总统肯尼迪和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我在这一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谈判目标有以下三点：一，保护美国的安全安排，防止任何不利于我们的变化；二，试探和尽量争取在相互有利而又能加强美国安全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可能的机会；三，着眼于

与会的不结盟国家和世界广大公众，从最佳方面阐述美国的立场，从最坏方面揭露苏联的立场。我说，第一个目标是最重要的，但属于“守势”，而后两个目标则是在确保第一个目标的条件下尽量予以争取。我指出，我们达到了第一个目标，今后仍将继续这样做。第二个目标则由于苏联玩弄花招而难以实现，但我们将继续努力。至于第三个目标，我相信美国已有很大成就，已明确显示出我们有寻求公正协议的诚意，并已强调指出苏联在核查措施上的顽固态度。

我发现，有八个不结盟国家代表团出席这一会议，这总的说来是有利的，已迫使苏联少玩弄一些策略手腕，尽管其实质性立场不变，但在谈判中不得不采取比较讲理一点的态度。在会议期间美国进行了一次核试验，遭到了许多批评，苏联企图让批评集中到美国身上，而且扬言要中断会议，但遭到了不结盟国家的驳斥，他们批评了美苏双方的核试验，而且反对会议暂停。

尽管法国和中国最初拒绝与会，十八国裁军会议还是开成了，后来扩大和改名，先改称裁军委员会会议，后又改称裁军会议。裁军会议达成了一些多边协议，而且为较小范围的多边接触和双边接触提供了场所。

除了核试验以外，另一些军备控制问题也继续受到了注意。会议的多半精力消耗在全面彻底裁军的可能性问题上，但美苏双方以及多数其他国家当时还并不打算真正裁军。只是到了后来才出现了限制和减少军备的若干有限的可能性。

第九章

国务院：肯尼迪年代（二）

肯尼迪政府在头一年忙于应付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柏林危机，一是苏联对第三世界共产党叛乱的支持。它还把军备控制列为一个新的政策工具，参加发起了日内瓦裁军会议。1961年6月至1962年7月，“导弹差距”的担忧逐渐消失了，卫星侦察又大大改进了我们掌握的有关苏联所有各种军事力量的情报，这就有了难得的机会来重新审议我们的政治军事战略。

1962年7月10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一项新的有关今后五年苏联战略能力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这一报告表明，美国情报界已一致认为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低于早先估计的水平。按照肯尼迪总统的要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来审议这一新的情报对于美国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涵义。委员会由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担任主席，下设三个工作组：一个组审议美国的防务规划，由保罗·尼采主持；一个组审议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政策，由奇普·波伦主持；一个组审议情报，由谢尔曼·肯特主持。我被指定为特别委员会的执行秘书，与三个组保持联系，并负责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1962年8月23日，《关于最新情报估计报告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的涵义的报告》由国务卿腊斯克签名，呈送给了总统。在报告上签名的还有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

麦科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①

这一报告肯定了美国已有的防务安排是充足的，新的情报并不要求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作什么改变。做出了这一令人放心的结论，报告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完成了使命。当时它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作为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我感到自豪。

但如今回顾起来，我觉得这报告只达到了最低的要求，而错过了再前进一步的重要机会。我们没有考虑我们是否做得太多了；我们已经知道原先对苏联实力及其发展状况的估计过高，那么根据这种严重偏高的估计而制定的美国加强战略力量的计划是否应该予以压缩？是否应在政策上作其他的调整？这些问题均未加讨论，而当时如果提出压缩的主张，那肯定会遭到军方的激烈反对，就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尽管有了更精确可靠的情报估计，却没有对根据原先偏高估计而制定的防务政策和计划提出异议，而只是加以肯定而已。

我们的报告没有强调一个事实，即 1962 年已显然占优势的美国战略实力在报告所估计的五年期间内还将扩大其优势。因此，报告没有考虑相关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应利用这一暂时性的有利形势，抓住时机向苏联施压，或利用我们的实力作为外交上采取行动的基础，促成双方实行军备控制，或者在条件许可时宽宏大度地促进政治和解。报告也没有考虑，进一步扩大美国战略优势的军事计划会对苏联的军事计划（及政治判断）产生什么样的不利于美国的影响。当时我们的决策人只感到原先想象中的

^①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Report on Implications for U. S.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of Recent Intelligence Estimates*, August 23, 1962 (top secret - limited distribution [now declassified]). The text of the main report is given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vol.8,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355 - 78, and see pp.343 - 44, 349 - 51 and 379 - 80. The full text accompanies an analysis I prepared twenty years later; see Raymond L. Garthoff,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and Policymaking: A Decision Point in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Brookings, 1984). In 1985 this study was given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udy Center's award for the best scholarly monograph on intelligence in 1984.

“导弹差距”问题不复存在，而且在他们当政期间也不会再次出现，就心满意足了。总之，回头看看美国享有战略优势的那一所谓黄金时代，就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该怎样利用它，该做些什么。此外，报告既没有从美国政策方面也没有从苏联政策方面考虑缓和的得失利弊，没有考虑如何使军备控制成为美国政策中一个可能起作用的因素。

附带说一下，这一报告是肯尼迪总统决定不再编写基本国家安全政策文件以后，头一次就政策问题组织协调各部门人员参加编写的研究报告。它使美国政府有了信心，得以沉着应付冷战期间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即两个月之后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认识到美国享有战略优势以后，我们还是日益清醒地看到这一优势是暂时的，美苏之间早晚会形成战略均势，要准备予以适应。这意味着我们特别需要修改我们的北约联盟的战略理念，还有整个的欧洲政策。然而，我们当时考虑得最少的，是我们在东欧的政策利益。下面仅就我直接参与的一些事，谈点东欧问题。

1962年3月日内瓦裁军会议开始阶段的两个星期，各国外长都在那里，他们彼此作了一系列的礼节性双边会晤。国务卿腊斯克过去很少会见东欧“卫星国”外长，有的东欧外长甚至是在日内瓦才头一回与他见面。在这些双边会晤中，陪同国务卿的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勒，我则是作笔记和会后写“谈话备忘录”。有一次，在会见保加利亚外长时，我还意外地当了一回翻译——俄语翻译。这些会晤——与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两次，与罗马尼亚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曼一次，与捷克斯洛伐克外长瓦茨拉夫·达维德一次，与保加利亚外长卡尔洛·卢卡诺夫一次——虽然没有谈及特别重要的事情，但仍是有些意思的。裁军问题当然每次都谈了，但都是老一套的话。柏林也是多次会晤中谈及的话题，腊斯克强调了我们在西柏林的决心（态度异常

坚定，以至于拉帕茨基似乎感到震惊)。腊斯克和拉帕茨基还谈到了德国统一问题，波兰外长说两个德国社会政治结构不同，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条约组织，即使撇开这些不说，波兰政府也原则上反对德国统一，他认为多数西方国家也是这种态度。腊斯克向他指出莫斯科追求的是扩张性目标，为此引证了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讲话，而拉帕茨基则反驳说苏联是真正追求和平共处，这是斯大林死后苏联政策的主要变化。腊斯克与卢卡诺夫会见时，除了谈一般问题以外，保加利亚方面还表明了争取改善保美关系的愿望。腊斯克会见曼内斯库时谈到了苏联“集团”，这时曼内斯库说罗马尼亚毕竟是社会主义集团的一部分。（可是一年半以后他们再次会晤时，曼内斯库却表明了相反的态度！）捷克人达维德是态度最冷淡和最敌对的，但当时陪同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副外长伊日·哈耶克后来当了外长，六年之后居然成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的短命的布拉格之春的自由派首领之一。

我在美国代表团中承担的职责之一是跟东欧各国代表团保持接触，与罗马尼亚外长和几位副外长有过几次简短谈话。其中有两个人几年后还跟我叙旧重逢过。十八国裁军会议头三个月我除了几次短期旅行外，一直留在日内瓦，在此期间我跟苏联代表团一些人也有来往，尤其是跟伊戈尔·乌萨乔夫几次共进晚餐，谈话很有趣。

在1962年3月至5月的这三个月期间，我的一次短期旅行是经过我的上司约翰逊批准，以“国务院联络官”的身分，随国防学院院长、空军中将弗朗西斯·格里斯沃尔德率领的该学院代表团访问中欧。代表团先到柏林，听了卢修斯·克莱将军等人介绍情况，随后非正式参观了东柏林。下一站是维也纳，那里的活动高潮是听了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①一次非正式谈话，

克赖斯基在1962年的职务应是外交部长，1970年才当总理。——译注

他对苏联政策有一些独到见解。然后我们到了贝尔格莱德，我拜会了老朋友乔治·凯南大使，在他安排的一次晚宴上，我见到了南斯拉夫副外长列奥·马蒂斯和海军上将布兰科·马穆拉（他后来当了国防部长）。马蒂斯是研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家，谈了裁军和欧洲安全问题，告诉我南斯拉夫在裁军问题上正在“离开东方”，还跟我就苏联政局及其对外政策和共同市场问题交换了看法。我随代表团拜访了南斯拉夫军事学院，这也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因为不少南斯拉夫军人 1948 年以前到苏联军校学习过，他们对学来的东西又作了修改补充，同时他们自己有战时的游击战经验，对“反叛乱作战”也有间接的体会。（附带说一下，我这次贝尔格莱德之行引起了南斯拉夫驻美大使馆的注意。我回国以后，该使馆一位工作人员——显然是情报官员——常常给我发来使馆午餐会的请柬。南斯拉夫驻美武官也给我发请柬。）我随国防学院代表团走访中欧之行的最后一站是罗马。然后我回到日内瓦。

几周之后，到 5 月初，我又一次离开日内瓦，到雅典列席短短几天而又紧张的北约部长会议。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的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著名“雅典指导方针”。我在那里的工作不多：除了向腊斯克作一次简要汇报以外，还负责办理可能提出的裁军与军备控制问题，但这一问题不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所以周围的人忙忙碌碌，我却相当轻松。我参加过美国代表团研究美国与盟国的战略问题的会议。（顺便说一下：美国代表团人数最多，达 130 人！）5 月末十八国裁军会议第一阶段会议要闭幕，所以我又赶回日内瓦。从日内瓦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在伦敦短暂停留，与英国外交部、国防部和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同行们交换过意见。

这里还该提一下我未能成行的一次旅行。上文第四章中已谈过，1958 年我写的一项“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对南极条约

的出现有过贡献。条约签订于 1959 年，1961 年起生效。根据该条约的有关南极非军事化的规定，1963 年该由美国派人对苏联的南极科研设施作第一次实地视察。国务院要派一个人参加视察组，自然选中了我，我已开始为此行作准备。但裁军与军备控制署署长福斯特尽管与我个人关系很好，却担心我去参加视察可能会授苏联人以话柄，因为他们总是说美国要进行视察是为了搞情报，而他们又知道我在中央情报局干过。他的担心有道理，所以我没有去。

1963 年 8 月末到 9 月末，我先后走访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苏联，与这些国家的官员磋商和讨论裁军及有关的政治军事安全问题。访苏期间，我还到拉脱维亚的里加和乌兹别克的塔什干作了熟悉情况的访问。我没有具体的谈判任务，但通过访问了解了东欧“卫星国”处理裁军与军备控制事务的组织机构和内部工作程序（过去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而且了解到每一国家心目中的轻重缓急。在布拉格、索非亚和布达佩斯，都有美国驻当地使馆的一名官员陪同我。在其他几国，我与它们负责裁军的官员早先已经彼此熟识，这包括布加勒斯特的副外长米尔恰·马利查，华沙的曼弗雷德·拉赫斯大使，莫斯科的伊戈尔·乌萨乔夫大使（他是苏联负责裁军谈判的大使西蒙·察拉普金的副手）。我在布加勒斯特还会见了罗马尼亚代理外长杰奥尔吉·马科韦斯库（我在日内瓦已认识他），跟他作了很坦诚的交谈。

这些谈话的细节在今天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我证实了原先的估计，即苏联领导人是不与卫星国盟友磋商的，这些盟友没有独立起作用的余地，只有波兰是例外。经过苏联领导人许可，波兰外长拉帕茨基提出了为保证双方安全而建立欧洲无核区的建议，即著名的“拉帕茨基计划”（这计划的实际设计人是拉赫斯）。我在汇报这次东欧之行的报告中指出，在安全问题上，罗马尼亚也

可能开始发挥某种主动性，这一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在报告中还指出，苏联领导人对某些不涉及现场视察的有限的军备控制措施感兴趣，而且，总的说来，他们做裁军文章固然有宣传目的和分化西方的企图，但也有真想培植缓和气氛的一面。我指出苏联国内存在着压缩军费开支的经济压力乃至政治压力，苏联领导人在当时希望造成有利的政治气候和国际环境，以便能再作一些单方面的削减军备，而不一定是要谈判达成双方重大削减的协议。这些估计后来也都证明是准确的。有一件事，即我在莫斯科与乌萨乔夫就外层空间军备控制问题进行的磋商，可能直接影响了事态的发展，在下文中我将再细说这一点。

在布达佩斯时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在美国大使馆内遇见过红衣主教明曾蒂，他从 1956 年 11 月起就在那里避难，一直呆到 1971 年他逝世为止。^①

我这次东欧之行接触到的官员当中，有些人后来还跟我有过来往。与波兰的拉赫斯大使来往最多。1963 年 11 月 22 日，我和拉赫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共进午餐时，第一次从一位联合国人员那里听说广播电台宣布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噩耗。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与东欧的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事态发展是罗马尼亚 1963 年主动采取的一项秘密行动。直到 1993 年我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透露此事后，它才为人所知。人们只知道罗马尼亚后来一点点与苏联集团拉开距离，但都是在莫斯科能容忍的范围以内。而它 1963 年与美国的那次秘密接触倘若为苏联所知，会是莫斯科绝对容忍不了的。

事情起源于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下一章将专门谈它）。危机期间欧洲气氛十分紧张。尽管北约国家公开支持美国，华约国家公开支持苏联，但它们内心里都惶恐不安，生怕被苏联

^① 此说与事实有出入，明曾蒂 1971 年离开美使馆，先赴梵蒂冈，后居维也纳，1975 年才去世。——译注

的导弹拖进了战争。危机过后，罗马尼亚领导人决定设法防止这种危险再现。

当时，罗马尼亚与美国关系疏远，极少往来。1963年秋天联合国大会开幕之际，罗马尼亚外长曼内斯库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都在纽约，曼内斯库要求会见腊斯克。会见安排于9月30日，这时曼内斯库安排了一次私下会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曼内斯库的翻译在场。

曼内斯库告诉腊斯克，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一事根本未跟罗马尼亚磋商过，因此罗马尼亚跟那场争执没有关系。罗马尼亚政府希望美国明白，在苏联这种行动引发的冲突中，罗马尼亚将保持中立。罗马尼亚希望得到如下保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引起的战争，美国将不会误认为罗马尼亚是苏联盟国而打击罗马尼亚。

腊斯克答复说，任何国家只要不参加针对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军事行动，也不让自己领土被用于这种军事行动，美国均会予以考虑。因此，美国需要知道罗马尼亚领土上是否配置有核武器，若美国能确信罗马尼亚领土上没有核武器，那么美国在确定打击目标时会考虑到这一事实。10月21日，曼内斯库到华盛顿作礼节性回访而再次见到腊斯克时，他回答说罗马尼亚境内没有核武器，愿让美国随时核查这一点。（美国情报证实罗马尼亚境内没有核武器，因此美国没有派人去作核查。）

这次交谈十分敏感，因此在华盛顿严加保密，布加勒斯特方面无疑也是如此。当我1990年向麦克乔治·邦迪问及此事时，他说，他相信腊斯克当时仅向总统作了口头汇报，未让更多的人知晓。腊斯克认为，只要在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中对东欧战略核打击目标作一“选择”就足够了，无需再采取别的行动。罗马尼亚这次交涉的情况未向北约各国政府透露。就迄今所知，苏联领导人当时也未曾获悉此事。保密保了30年。

罗马尼亚实际上是中止了它的华约联盟义务，许诺在苏联的行动引起战争时保持中立。但它名义上仍然是华约成员国，直到华约 1991 年宣告解散为止。然而罗马尼亚这一举动依然是冷战期间一个长久保密的重要历史插曲。腊斯克在 1990 年才同意到冷战结束时公开此事。

注意东欧国家在安全和军备控制方面的观点，这显然是我的职责范围内的一件事，但在当时，华盛顿的注意力和活动的中心却远远不在这一方面。占突出地位的是对西欧的政策。

肯尼迪想给我们与北约盟国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措施之一是坚定维护我们在西柏林的驻军地位，另一措施是力促北约采取新的灵活反应战略。然而有的盟国，尤其是法国，对这一战略以及相应地加强北约常规力量的计划持保留态度。美国有些单方面的决定，特别是在 1962 年底决定取消“空中霹雳式”机载弹道导弹研制计划的做法，也引起盟国的不安。英国本来指望用这种导弹装备它的 V 级战略轰炸机，所以感到十分失望，美国赶紧表示要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式”潜射弹道导弹，这一来又得罪了法国，因为美国没有向法国作同样的承诺。

最根本的问题是，麦克纳马拉要盟国接受逐步升级的威慑战略，但多数欧洲人希望继续用大规模报复战略来威慑苏联的进攻，他们担心改为逐步升级战略，就会再出现战争。麦克纳马拉 1962 年 6 月在密歇根大学发表讲话时强调，一旦发生核战争时，“首要的军事目标”将如同常规战争时一样，“应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消灭其平民”，这篇讲话也引起了争议。

在核战略方面，麦克纳马拉保证美国将继续用核武器保卫整个北约联盟，但呼吁其他有核武器的盟国——当时就是英国和法国——放弃其核武装，别的盟国也不要再搞核武器。他说“有限的、独立行动的核作战能力是危险的，费钱的，易于变得过时，

而且缺乏威慑的可信度”。^① 美国保证继续用核武器保卫盟国，这当然受到欢迎，但英法两国对自己的独立核力量受批评却感到愤怒。

在雅典会议上，美国提出了建立多边核力量的建议，具体做法是建立由多国人员操纵的弹道导弹舰队，但核弹头仍由美国人监控。其他措施包括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配置美国的“丘比特式”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向英国提供“雷神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后两项是在 50 年代末，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引起了“导弹差距”的恐慌之后，就已决定下来，而这时则正在实施之中。

麦克纳马拉这次讲话还初步露出一个想法，即让盟国更多参与制定核政策。这一主张在 60 年代中期和后期大有发展，我在本书下文中还会叙及。但在 1962—1965 年，人们对此未多加注意，因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多边核力量的想法上面。

除了多边核力量的想法以外，当时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想法，即建立北约盟国核力量，它可以把英、法的核力量以及美国配置在北约盟国的核力量包括在内，作为美国洲际核威慑力量的补充。英国人对此颇感欣慰，但法国人十有八九是不会参加的。

麦克纳马拉提出加强非核作战能力的主张也引起了争议。盟国普遍不乐意加强常规兵力和后备役力量，担心这些举措既费钱又不得民心。尽管麦克纳马拉懂得，如果苏联的侵略并未达到全面核袭击的程度，盟国肯定不会乐意用全面核战争来进行回击，但盟国许多人担心，加强常规力量会显得是冲淡核威慑的决心。

在北约盟国对战略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情况下，肯尼迪总统于 1963 年初下令在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审议美国的对欧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是副国

^①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tract], June 16, 1962,” *Documents on Disarmament*, 1962, vol.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p.625 - 26.

务卿乔治·鲍尔。为保密起见，委员会被故意模糊地称作“PR 研究组”，这里的 PR 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而是 policy review（“政策审议”）的缩写。此事倘若在当时泄露出去，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害，幸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我们所知，我这里还是第一次透露这个“PR 研究组”是干什么的。我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执行秘书，这背后还有文章。腊斯克和鲍尔——也许还有肯尼迪总统——不希望让那些负责北约事务的专家来审议他们自己忠实执行的政策，所以自然想到我们的 G/PM。在我们这里，平时处理北约事务的是杰弗里·基钦和西摩·魏斯，他们从来不让别人插手，但这一次要审议政策，他们怕惹出麻烦，所以基钦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鲍尔欣赏我的才干，所以我当了执行秘书。除了这一职责以外，我还参加了 PR 组下设的一个审议军事问题的小组，其主持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来的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少将。这个小组提出了一项关于战略问题及改进方案的报告。

PR 组受领的任务是彻底重新审议我们的对欧政策，但审议后所提出的建议是仍然基本上保持我们已在执行的政策，只是主张减轻要盟国大力加强常规力量的压力，同时建议考虑欧洲核力量不必有美国的正式否决权。有些委员主张我们像支持英国独立核力量一样，也向法国的独立核力量提供同样的支持，但不少人反对这样做，意见未能统一。

到 1963 年 5 月，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力图让北约盟国同意成立多边核力量，以打消他们的疑虑，另一方面又力图缔结一项核不扩散条约（NPT），这一努力始于 1961 年。自从 1959 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已几次通过了爱尔兰发起的禁止核扩散的决议，1961 年那一次还是所有与会国一致通过的。国务卿腊斯克又于 1962 年 3 月在日内瓦发起了美苏双边的核不扩散谈判。此后，核不扩散虽然仍是日内瓦多边裁军谈判的重要议题，

但真正重要的谈判已转移到美苏双边会谈。我们向北约盟国（以及另几个国家）大致通报情况，但又与苏联方面对谈判具体情况保密，以防止双方的意见交换演变成宣传战。与俄国人的双边核不扩散谈判以及我们与盟国就北约核防务进行的谈判这两者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以后几年还变得比较紧张。

1962—1963 年期间，我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理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国际政治和情报方面的事情。这方面有许多事情现在只有我能加以叙述，同时这些事情本身是令人感兴趣的，又是窥视肯尼迪政府内部运作状况的一个窗口，所以我这里将讲得细一些。

1962 年 5 月 28 日，肯尼迪总统通过第 156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 156）指示国务卿腊斯克成立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从政治方面审议美国的卫星侦察政策。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保密的，凡是提及它的职能和工作情况的材料均列为绝密。这个委员会被人们称为 NSAM 156 委员会，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被任命为这一委员会的主席，我被指定为它的执行秘书。委员会的成员有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署的助理部长保罗·尼采（通常由国际安全署副署长约翰·麦克诺顿为代表）、中央情报局负责研究工作的副局长赫伯特·斯科维尔、国家侦察署（也是一个多年保密的单位）署长兼空军部副部长约瑟夫·查里克、国家航空航天局副局长罗伯特·西曼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艾德里安·费希尔。另外还有两名白宫代表只出席会议，但不在报告上署名，一名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副手卡尔·凯森，一名是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委员会于 1962 年 7 月 1 日向腊斯克提交了初步报告，腊斯克再将它转交给总统。这报告是一致通过的，只是在禁止在外层空间配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备控制措施方面还存在不同意见。

7 月 10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 NSAM 156 委员会的报

告，总统随后在第 2454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中批准了报告中提出的 19 项建议中的 18 项，只是将第 19 项关于军备控制措施的建议“退回重议”。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美国空间侦察（情报收集）如何保密。艾森豪威尔总统 1960 年 8 月下达的关于不许公开透露我们的空间侦察能力的禁令得到了重申，但我们建议谨慎地逐渐透露国家航空航天局民用卫星的成像能力，以便让世界公众了解卫星观察对于绘制地图、测量自然资源和气象预报的价值。有些国家当时主张外层空间只许用于“非军事用途”（苏联也曾一度持这种态度），我们表示反对，因为除了侦察以外，卫星还能用于导航、通信和其他军民两用的目的。我们的立场是外层空间应类似于公海，可用于所有各种和平目的，包括和平的军事性目的，而且从外层空间对地球进行的所有各种观测都应是可允许的。这些总的方针后来在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新闻署等机构发布的美国官方声明中都有所反映，对当时的国际舆论和谈判都起了作用。

我们当时伤脑筋的一个难题，是该不该透露空间侦察的成果以及透露哪些成果，以便增强美国公众和盟国的信心，并且让我们的敌手苏联感到畏惧。早先已有过几次有限的透露，1961 年 12 月腊斯克向戴高乐作过的透露是最显著的一例。在第 2454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下达以后，1962 年 8 月和 9 月，我们又有选择地向几位盟国领导人作过一般性的简略通报。在 1964 年 9 月北大西洋理事会开会时，又向若干与会代表作了很笼统的简报。但 1961 年柏林危机期间就已禁止向苏联作直接透露，1963 年 1 月又重申了这一禁令。1963—1964 年期间，为了解决军备控制中的核查问题，曾考虑是否对苏联作若干透露，当时的决定是认为无此必要。但后来事实证明，让苏联了解这方面的能力，对推进军备控制谈判会起很大作用。

1962 年 7 月 10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以后，我们这个

NSAM 156 委员会的任务是按照 2454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的指令，“进一步研究”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配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具体建议。

早在那一年 4 月 18 日，美国向当时新成立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提交的《全面彻底裁军基本条款概述》的第一阶段条款中，就有一条规定禁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上绕地球轨道（苏联于 3 月 15 日提交的条约草案中则措辞笼统含糊得多，只将“空间装置”限定用于“和平目的”）。我们这方面对于怎样实现这一条款，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它列为全面彻底裁军协议之中；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那一总的协议犹如天空中的馅饼，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应将外层空间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单独形成一个文件。6 月 19 日，就后一种“单独禁令”做法的利弊长短，我起草了一个文件。几天后，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费希尔写了一个备忘录给我，要我修改词句，强调“利”的一面。我记得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他还建议将此事转交部门主管人委员会讨论。

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侦察署和中央情报局这几个部门的 NSAM 156 委员会成员都反对“单独禁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甚至认为美国应该保留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选择权。别的人表示反对的理由主要在于视察问题，他们担心视察措施的谈判也许会妨碍我们卫星的军事用途，尤其是卫星侦察。在最后这一点上，大家并无意见分歧，分歧在于对这一提案的利弊见解不一。其实，早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建议仿照南极洲的做法，禁止在外层空间配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定出“相应的核查措施”。苏联当时对此不感兴趣，这事就搁置下来了。

1962 年 3 月，在日内瓦，加拿大外长霍华德·格林事先未跟我们协商，又不听我们最后一分钟的劝阻，就提出了“单独禁

令”的提议，而未提核查问题。美国代表团立刻发言强调核查的必要性，反对没有核查措施的“华丽词藻”。当时美苏之间就是在裁军核查问题上争吵不休，所以对上述加拿大提议的反对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在 NSAM 156 委员会继续研究“单独禁令”问题，大体上达成了意见一致。因此，7月10日下达 2454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以后，我在同一天起草了约翰逊大使致委员会其他委员的一项备忘录《建议美国在禁止外层空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单独禁令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指出在委员们同意之后，此件将由国务卿呈报总统。各部门主管人很快来电话表示同意，此件即于7月12日由腊斯克呈报给了肯尼迪总统。从政府衙门办事的效率来看，这可以说是闪电般的速度。

NSAM 156 委员会 7月12日的这份报告简略回顾了背景情况后，提出了如下建议：反对宣言式的禁令；美国不主动提议作单独禁令；尽量将拒绝这一禁令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强调充分核查措施的必要性；最后，说明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将抓紧研究单独禁令所需要的核查措施问题。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本来就赞成单独禁令，而别的部门有不同意见。这时，不同意见暂时搁下了，而主张下禁令的人只待核查措施确定后，就有机会提出禁令建议了。但这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大约一星期以后，总统国家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副手卡尔·凯森给我来电话，说总统刚刚与他讨论了委员会的建议，问委员会是否真正审议过依靠单方面核查的禁令方案；如果已经议过，总统可接受这些建议；但若未曾议过，总统就要求再考虑这一可能性。凯森认为只有我能回答这一问题。我说，老实讲，我并不认为我们已充分评估这一方案。与凯森的这次电话交谈，我未转告我的同事。

7月23日，麦克乔治·邦迪致信腊斯克，说总统已看过7月

12 日的报告，不拟同意“完全拒绝任何可能的宣言式禁令”。他认为倘若得不到更好的协议，那么这样一种宣言式协议仍可能是对我们有利的，因此要求研究我国能采用的核查手段。此外，若完全不顾宣言式协议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对美国有好处，而要求所有情况下均需实行核查，这样一种总的立场，总统是对它有怀疑的。“总统希望依照这些意见再议此事，并迅速向他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这时，我向约翰逊大使建议，接受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意见，将此事提交部门主管人委员会讨论。他同意了。我继续与费希尔密切合作。

总统拒绝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一致同意上报的建议，这应该说是非同寻常的。但我愿指出，委员们正确理解了总统的指示：它不是强迫人们改变信念，而是要求再考虑另一个方案。

8 月 31 日，供副手委员会讨论的《单独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措施建议》起草完毕。9 月 5 日，副手们作了讨论。我和我在 NSAM 156 委员会工作的大部分同事感到很不安的，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张所有外层空间飞行器的发射都要预先发通知。这虽然有利于核查，但却可能有利于对方干扰我们的卫星侦察。我们把这一点从文件上取消了。

我起草了一项备忘录，经副国务卿乔治·麦吉签署呈交国务卿腊斯克，建议他支持对美国有利的宣言式禁令，因为世界人民担心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顶上，宣布禁令会在政治上收到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三家也在加紧协调。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他们的高级助手们彼此合作紧密，而且往往卓有成效（后来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这种合作也保持了下来）。这三家的领导人往往于星期二共进午餐（后来改在星期四，但人们仍习惯于称作

“星期二午餐”)。陪同人员很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常常也在座。就是在这一场合，这些领导人决定由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发表一篇权威的演讲。演讲稿的主要撰稿人是麦克纳马拉的特别助理亚当·雅莫林斯基，我和白宫的凯森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吉尔帕特里克于 9 月 5 日发表了演讲，权威地声明美国“没有将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轨道的计划”。他指出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无助于安全；美苏两国都能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轨道，但这“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一种理性的战略”。这就是含蓄地邀请苏联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9 月 10 日，苏联在日内瓦提出了一项空间条约草案。它没有具体谈到禁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上空间。但它企图禁止利用空间收集情报，而后来等到他们也掌握了空间收集情报的能力，就不再提此事了。

9 月 15 日，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福斯特向部门主管人委员会提交了《美国对单独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措施的态度》文稿，这是应麦克乔治·邦迪 7 月 23 日备忘录中传达的总统的要求而起草的文件。它表示赞成“宣言式禁令”并用国家自有的手段进行核查。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强烈不同意。它反对就空间武器达成任何单独协议；认为美国不能接受别人的核查，而且不应同意无核查措施的协议；因此，只有在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空间军备控制。国防部国际安全署则赞成与苏联达成私下的非正式的协议，但正式的协议必须是全面彻底裁军协议的一部分，此外，还主张美国发表单方面的政策声明，就像吉尔帕特里克 9 月 5 日的声明一样。

9 月 19 日，部门主管人委员会开会。腊斯克因事未能出席，会议由福斯特主持。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说，他和麦克纳马拉并不反对单独禁令，但从策略上考虑，觉得非正式协议更有利。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会的乔治·德克尔将军有点耍花招，

说“目的”是可取的，但手段应是全面彻底裁军（这实际上意味着否定）。总统科学顾问威斯纳说轨道上的大型武器缺乏军事价值，没有人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吉尔帕特里克要求福斯特保证这一方案将是非正式地向苏联人作试探；福斯特作了这一保证，费希尔插话说需要灵活性。德克尔将军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利兰·霍沃思博士都表示仍然对总的核查原则感到不安。会议没有作出决定。9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书面意见，对方案持否定态度。9月27日，福斯特向总统呈交了备忘录，报告了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一般表示赞成的一致意见，并附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书面意见。

10月2日，总统通过192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指出福斯特的备忘录（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已阅，他赞成福斯特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

10月17日，福斯特在纽约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和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提出了通过一项单独的协议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建议。葛罗米柯说这一建议跟西方1957年的老建议差不多，他玩弄他们的一贯手法，把两件事扯在一起，这次是要求美国撤销海外的导弹和飞机前进基地。

1963年春季，苏联更使劲地宣传美国在搞空间军事化。当然，这可能反映出苏联对美国的太空侦察之类的活动感到不安，但更可能的是反映出苏联误以为美国将把武器送入轨道，他们的宣传就是这样说的；或者是反映出苏联自己想把武器送入轨道，而故意宣传美国要这么做，以掩盖自己的企图，为自己找理由。

这时我们考虑通过两种办法来对付苏联部署空间核武器的可能性。

1963年3月7日，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向腊斯克呈送备忘录《关于禁止空间武器的进一步倡议》，这文件是我起草的。它指出了苏联的宣传活动情形，回顾了美国当时已单方面发表的

三次声明（吉尔帕特里克 1962 年 9 月 5 日的讲话，参议员艾尔伯特·戈尔同年 12 月 3 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由我们在国务院起草的演讲，以及国务卿腊斯克 1963 年 1 月 31 日的讲话），还指出福斯特于 1962 年 10 月向葛罗米柯作了试探（随后 1963 年初又在日内瓦与苏联大使察拉普金谈话）以后，苏联方面未有反应。备忘录建议考虑一种可能的做法，即在联合国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最后，备忘录指出，一旦苏联在空间部署核武器时美国如何作出反应，这方面的应急计划将随后另报。

腊斯克找我谈话，指示我为他起草一封致总统的信，对 192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中提出的指导方针稍作改动。3 月 13 日，我们把它送交 NSAM 156 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审阅。稿子修改了，委员们也表示同意了，但腊斯克 4 月 29 日决定此件不呈交总统而且“暂停”与苏联的进一步交涉。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向白宫的麦克乔治·邦迪通报了这一情况。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有所进展。5 月 8 日，国务卿腊斯克向总统呈送了我修改过的备忘录《美国对苏联部署空间核武器的反应》。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均签名表示同意。此件建议美国尽快研究发展积极的反卫星能力，包括核能力和非核能力。总统批准了这些建议。

1963 年 6 月 21 日，墨西哥在日内瓦提出了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约草案。美国对此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这一提案并未引起相应的谈判。

与此同时，美苏通过“热线”于 6 月 20 日达成协议，随之于 7 月和 8 月进行谈判，1963 年 8 月 5 日签署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正是在这一时刻，我到所有华约国家的首都走了一圈，与当地官员讨论军备控制和安全问题，但没有受权提出建议。在莫斯

科，我会见了伊戈尔·乌萨乔夫大使，他是多年处理裁军谈判的老手，从日内瓦裁军会议时起，我就跟他相识了。9月4日，我们在苏联外交部相见，当时苏联人像我们一样，正在为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作准备。

我问乌萨乔夫，他对单独禁止外层空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我说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该采取行动了。他承认福斯特已与葛罗米柯和察拉普金谈过此事。他也像那二人一样提出了只从外层空间经过的物体的问题。显然，他们考虑的是战略弹道导弹问题。我请他放心，说明我们考虑的禁令不涉及仅仅经过外层空间飞行的导弹，而只涉及送入绕地球轨道而部署于外层空间的武器。乌萨乔夫接受了我这一澄清，然后提出视察问题，认为这将是主要的障碍。我说美国并不需要派人到别国进行视察，用本国的核查手段就可以了。乌萨乔夫解释说，他们对视察问题一直很担心，不愿表现出对这一举措感兴趣，然后又在视察问题上谈不拢而承受谈判失败的责任。（他没有明说，但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他们害怕我们给他们设“陷阱”：美国提出一个好的裁军建议，却让他们扮演障碍设置者的角色，然后以苏联不配合为理由而把我们自己的武器部署到空间。）但无论如何，在我澄清了美国的建议及其目的和我们对视察问题的态度以后，乌萨乔夫表现得很感兴趣，而且很感激。

9月19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他重申了苏联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那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他也讲了一点令人感兴趣的新内容：“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与美国达成协议，来禁止将载有核武器的航天器送入轨道。我们意识到美国政府也对解决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我们认为苏美两国政府将继续在双边问题上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果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能达成谅解并缔结协议，那将会是一件好事。苏联政府已作好准备。”苏联就这样表态了。

第二天，肯尼迪总统作出了积极而又慎重的反应：“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部署于外层空间的安排上，苏联外交部长昨天对这一建议作出了肯定的反应，令人鼓舞，在此情况下，我们应继续寻求达成协议。让我们的谈判代表回到谈判桌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

三天后，福斯特在一份备忘录中请国务卿腊斯克找葛罗米柯再谈此事。不出一周，腊斯克就会见了葛罗米柯，证实苏联愿谈。苏联主张就此签订一项条约或作出别的正式安排。

10月1日，费希尔请各部门副手们讨论“关于禁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轨道的美苏安排方案”。福斯特在致腊斯克的备忘录中将讨论结果归结为以下三种“安排方案”：单方面发表意向声明；美苏双边协议（可采取行政协定方式）；或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我为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起草了一项致国务卿备忘录，主张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同时美国发表一项单方面的解释性声明（这样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敲措辞，而不需要跟别人谈判）。在这之前，还可以考虑发表美苏联合意向声明，或两国各自发表此种声明。我指出，考虑到国内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以及缺乏例外条款，条约或行政协定是不可取的。

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由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签署的备忘录，不仅反对条约，而且也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而主张用联合意向声明的形式。它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军方并不反对这一协议。”然而，它又提出两点奇怪的意见：它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词而不要用“核武器”一词（但未说明为什么）；它还主张有一个退约条款（意向声明中恐怕很难有这么一个条款）。

第二天，10月8日，部门主管人委员会开会。主持会议的国务卿腊斯克首先表明立场：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是最佳形式，同时美苏两国各自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我们可以推敲自己声明的

措辞，使之包含必要的例外条款。他还说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词，应当把它理解为包括所有的核武器。

（我事先向腊斯克说明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主张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为了在将来可以解释说小型核武器，例如反卫星或反弹道导弹用的小型核武器，不算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觉得事后作这种解释未必正当，如果这种解释可取或必要——我对此表示怀疑——那就应该在现时直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腊斯克的立场未提出异议。尽管尼采和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巴克斯代尔·哈姆雷特将军说声明的形式有利，但大家还是同意了腊斯克的意见。这时，刚刚与总统讨论过此事的副国务卿鲍尔进入会议室，传达总统的意见说宜用单独措施的办法，核查靠本国的手段，但考虑到国内政治情况，不宜搞正式的行政协定，更不宜搞条约。总统赞成用联大决议，美苏各自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这样，大家意见一致了。

在联合国大会，原先“单干”的墨西哥这时在事先与美国磋商，同时也征求过苏联和另几个国家的意见之后，于10月15日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10月16日，美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向联大第一委员会重申美国不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绕地球轨道或配置于外层空间或某一星球之上。1963年10月17日，联合国大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第1884（XVIII）号决议，其中注意到美国和苏联的意向声明，呼吁所有各国不要将“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绕地球轨道或配置于外层空间。

就这样，肯尼迪政府力排众议，又避免了核查措施的纠缠，通过“宣言式禁令”的办法，达成了对美国有利的协议，防止了一场昂贵而又令人恐惧的空间军备竞赛。尽管这种协议并没有约束力，然而从1963年到缔结条约的1967年为止，美苏双方都遵守了协议。这是肯尼迪总统的最后一项军备控制成就，它为后来

的 1967 年的条约奠定了基础。

这一段往事在这里讲得这么长这么细，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肯尼迪时期美国政府内部是怎样运作的，也可以看出美苏谈判的互动情形。这也是我自己起了一定作用的一个事例。

下面谈两件怪事。

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伊凡·阿森·克里斯托夫·格奥尔基耶夫对空间法感兴趣，创办了一所国际空间法研究所，他在 1962 年或 1963 年初某个时候（具体日期想不起来了）要求会见我们的副法律顾问伦纳德·米克，要向美国介绍他的研究所并一般谈谈。这是东欧人第一次谈空间法，所以米克让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见。我们谈得很随和，事后我也没再去想它，可是 1963 年 12 月保加利亚突然宣布格奥尔基耶夫是美国间谍，已被逮捕（后来得知他实际上是 1963 年 9 月在莫斯科被捕的，恰好在我访问莫斯科与乌萨乔夫谈空间军备控制的时候）。我原先听中情局的人说过，我们在保加利亚外交界有一名代理人，但我不知道那就是格奥尔基耶夫。更巧的是，招募他当美国间谍的人，据说就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历史教授、后来当了中情局顾问而且曾长时间住在保加利亚的西里尔·布莱克。

大约在同一时候发生的另一件抓间谍事件跟我的关系更近。1963 年 11 月，我在耶鲁时的老师弗雷德里克·巴洪被苏联当作一名美国间谍而在莫斯科被捕了。巴洪 40 年代中期和后期曾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战后曾参加过在西德采访前苏联公民的活动，所以苏联不难把他说成是情报人员，尽管他实际上不是。他的被捕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花招，他们抓他作为替死鬼，想用来交换刚在美国被捕的一名苏联间谍。在华盛顿发出一片抗议声，而且肯尼迪总统亲自致信赫鲁晓夫以后，巴洪获释了。后来我获悉，在巴洪被短暂拘禁期间，审讯他的克格勃官员逼他交代几个人的

背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附带说一下，当时出主意抓巴洪的克格勃官员，就是我一年前见过的尤里·诺森科，此人当时已经与中央情报局有接触，一年后就叛逃过来了。间谍游戏总是怪事不断的。

肯尼迪总统到 1963 年 11 月不幸遇刺为止，执政只有三年，回顾起来，这三年又可分为两段：头二年是柏林和古巴导弹引起的对抗，最后一年则是缓和初露端倪，军备控制有了进展。这一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迹象是肯尼迪总统 1963 年 6 月 10 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重要讲话。堪与之相比的另一篇讲话大概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3 年 4 月在斯大林逝世后发表的讲话。但那一篇过于前瞻，而且不久就被别的一些信号抵消了。美利坚大学讲话是白宫人员（主要是索伦森）按照肯尼迪本人授意的要点而撰写的。

在这篇讲话中，肯尼迪号召美国人“重新审视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他指出，苏联人心中对我们和我们的政策怀着歪曲了的形象，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不要陷入同样的圈套，不要以歪曲和绝望的观点看另一方，不要认为冲突不可避免，通融没有可能而彼此信息只能是以威胁对威胁”。他指出我们在防止战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并提醒注意“具有嘲讽意味但却准确无误的事实，即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恰是面临最大毁灭危险的国家”；“即便是在冷战中……我们两国也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陷于危险的恶性循环，一方的怀疑引出另一方的怀疑，新的武器招来相反的武器”。他还号召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冷战的態度，记住我们并不是在从事一场辩论”。他没有用“缓和，一词，但他呼吁“和平战略”，而且宣布“我们可以在不放松警惕的同时寻求减缓紧张的局势”。^①

^① “Toward a Strategy of Peace, Address by President Kennedy,” June 10, 1963,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49, no. 1253 (July 1, 1963), pp.2-6.

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讲话。当然，它主要是谈当时直接要采取的行动，即在莫斯科谈判核禁试之前暂停核试验。一个月后达成的有限核禁试条约，是最具体而又直接的成果。然而，这篇讲话的潜在影响却更加深远得多。与肯尼迪总统 1961 年的就职演说以及 1961 年和 1962 年的国情咨文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相比，态度的转变尤其显著。它显示出一种更加成熟和具有更广阔历史眼光的境界。

最令人鼓舞的，大概要算苏联方面的反应了。甚至在多年之后，苏联一些资深外交官还向我说过肯尼迪这篇讲话当时在莫斯科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赫鲁晓夫的反应是 7 月 2 日发表了讲话，并在接见美国哈里曼大使时告诉他，他们认为这是罗斯福逝世以来最好的一篇美国总统讲话。

肯尼迪——以及赫鲁晓夫——在此后几个月确实有所进展，不仅避免了新的严重摩擦，而且达成了三项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第一项是 1963 年 6 月达成了美苏政府之间开通“热线”的协议。第二项是 1963 年 7 月美、英、苏三方谈成了有限核禁试条约，将核试验限制于地下试验。第三项是上面说过的 1963 年 10 月达成了不将核武器部署于外层空间的协议。

哈里曼率代表团到莫斯科签订有限核禁试条约时，还负有一项秘密的使命。在了解到中苏之间出现分裂后，肯尼迪要求哈里曼转告苏联领导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研制核武器感到日益不安。哈里曼还要试探苏联的不安程度，并试探苏联是否可能与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做法，可能的话，甚至用军事行动剥夺中国人构筑核设施的能力。即使是在美国政府内部，这一敏感话题也是严加保密的，在通常的绝密文件中也不得提及。哈里曼执行了他的任务，几次试图让苏联领导人谈这一问题，但他回来后报告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苏联方面对此似乎并不关心，除了表示支持核不扩散条约以外，不愿再讨论任何种类的联合行动。

我没有随哈里曼代表团去莫斯科，因为国务卿要我留下协助准备应付更头疼的事，即争取有限核禁试条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最后是通过了，但来之不易，事先不得不作一系列的“保证”，确保核能力继续强劲不衰，才换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默认。其中的一项保证是，一旦核禁试结束，美国应能迅速恢复大气层试验。这样留一手以防不测的做法，在 1963 年也许还是稳妥的，然而要随时作好恢复大气层试验的准备，是要花钱的，这钱竟然一直花了 30 年，直到 1993 年有人发现这是浪费，这时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内，大家才一致同意停止相关的活动，其实早就该停止的。

如果说 1963 年 6 月至 11 月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上述进展是标志着缓和时期的开始，那应该是不算过分的。然而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遇到了反对缓和的势力。肯尼迪本来打算在 1964 年赢得连任后更大胆地前进，他和赫鲁晓夫在秘密通信中均对未来抱有希望。赫鲁晓夫 1963 年 10 月 10 日一封来信是令人鼓舞的，肯尼迪 10 月 20 日写了回信——这是他致赫鲁晓夫的最后的一封信——说他“相信改善国际形势的可能性是现实的”，但需要抓紧。可惜此信未能发出，国务院文书工作出了差错，直到肯尼迪 11 月 22 日遇刺身亡以后，这信才被发现。^①一年后，赫鲁晓夫也被赶下台了。

这几年，我在国务院工作很忙。尽管如此，我仍然积极参加院外的学术活动和写作，为一系列学术著作撰稿。1963 年 9 月我结束东欧之行后，参加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会，与迪安·艾奇逊在同一个研究组，我过去对他仅略有所闻，但我们相

^① See Michael Beschloss, *The Crisis Years: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 - 1963* (Edward Burlingame Books - Harper Collins, 1991), pp.662 - 63. Khrushchev's letter of October 10, 1963, is printed in the official U.S. diplomatic record, but because the last letter from Kennedy was never sent, it is not. Se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vol. 6, *Kennedy - Khrushchev Exchang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309 - 11.

处得很好。1962年，我在柏林会见了久闻大名的德国苏联问题专家理夏德·洛温塔尔，1963年，我到英国著名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家乡拜会了他。瑞典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斯特兰·博姆于1962年中期访美时，我安排他会见了一些美国学者，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和赫尔曼·卡恩。有好几个学术单位想拉我去，我虽然与学术界保持积极联系，但对政府工作还是安心的。

肯尼迪总统不在了，但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尤其是缓和对抗的平衡，仍有工作要做。我仍是全力以赴。

第十章

古巴导弹危机：冷战的转折点

1962年10月16日早晨，肯尼迪总统听到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报告说，在古巴刚发现了苏联中程导弹。这一消息是相当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只有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及另外几个人例外）。9月19日编发的一项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SNIE 85—3—62）曾考虑到这一可能性，但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人大概不至于将进攻性核导弹部署在古巴（中情局发这份报告时，麦科恩出国了）。但这一可能性存在，美国不得不出动U—2飞机到古巴上空飞行。10月14日的一次侦察飞行拍摄到的照片显示出正在构筑中的导弹发射场，到10月15日上午已肯定他们准备部署的导弹是SS—4中程导弹（射程1100海里）。当天夜间这消息报告给几位高级领导人，到16日晨此事的分析报告定稿，就报告了总统。

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战略核导弹，这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一个严重的事态发展。他们举动鬼鬼祟祟，问题就更大了。肯尼迪总统早在9月4日和13日两次公开宣布这样的行动将会是不可接受的，而此后苏联高层人士作出了一系列欺骗性的保证，说没有这回事。在这之后真相大白，一场危机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是碰巧在10月16日上午得知古巴导弹一事。作为中情报顾问，我正在帮中情局的人整理一篇关于华约的情报报告，那天

我到中情局副局长雷伊·克莱因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执行助理，我说克莱因要告诉我一点新的情况，他以为那是古巴导弹一事，就告诉了我。几小时后，我回到国务院，见到我的上司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我说在古巴发现了导弹，他一听有人向我泄密，脸一下子都变白了。总统当时决定只在很小范围内传达此事，亲自审定了一个名单，名单上没有我。我向约翰逊说明了我是从哪里听来的，并且保证我不曾向别的人说过，也不会再向任何人说。几分钟后，克莱因的执行助理打来电话问我对别人说过没有。我说没有，而且不会说。几天以后，约翰逊把我和另几位同事叫去，传达了这一新情报，跟我们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直到这时，仍是严格保密的。为处理这一危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括国务院的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以及约翰逊。危机的处理由此开始。^①

在华盛顿，这场危机的紧张的 13 天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0 月 16 日晨至 10 月 22 日晚，是在保密范围内考虑如何处置这一情况。第二个阶段是从肯尼迪总统 10 月 22 日晚向全国和世界发表讲话开始，直到 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接受肯尼迪的建议：苏联撤走导弹，作为交换，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

这笔交易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建议实际上是下了最后通牒，但又附上一点“甜头”：秘密地保证美国在 5 个月之内从土耳其撤出导弹。所以双方都作了让步。

这笔交易又缺了一点东西，当时只有总统的高级顾问们知道这一点：对于苏联撤出导弹的情况如何进行核查，没有达成共同的谅解，而且对于哪些“进攻性武器”应予撤出，也没有明确的协议。美国坚持除中程导弹外还要撤出轻型喷气式轰炸机，此事

^① 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始末，我写过一本书。见 Raymond L.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 ed. (Brookings, 1989)。这里不细谈危机过程，只说说我的第一手印象及该书中写到的若干结论。

直到 11 月 20 日以前一直悬而未决（“隔离”亦未撤销）。所以在这场危机高潮已过而且原则上达成了解决危机的协议之后，危机的最后阶段又拖了三个星期。10 月 28 日的协议还缺了不少东西，从危机的余波阶段，即 1962 年 11 月至 1963 年 1 月 4 日这一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美国甚至没有作出有约束力的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下面将谈到这些事情。

在美国，这场危机从一开始就被称作“古巴导弹危机”，被看做是由于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导弹而引起的一场突然的、紧张的然而又明确界定的对抗，它又由于苏联撤出这些导弹而得到解决。在苏联，它则是称作“加勒比海危机”——这一名称不但不点出导弹，而且还意味着它有更深的原因，即美国对古巴构成侵略性威胁，苏联部署导弹则只是一个对策。在苏联人（及古巴人）看来，导弹不是紧张局势的原因，而是它的一个后果。他们持这种看法，是出于自我利益——这尤其表现在后来赫鲁晓夫声称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证明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是有理的。其实古巴和苏联军政领导人都很明白这是一次丢脸的退却，但却用上述说法为自己保全面子。可是从更深层次看，苏联说这场加勒比海危机起因在于美国对古巴的威胁，这也确实表现出他们的观点。

现在很清楚，苏联要在古巴配置中程和中远程导弹，是想同时达到两大目的。一个是阻遏他们所担心的美国对古巴的入侵，以捍卫西半球这惟一的“社会主义”政权。另一个是加强当时仍然很弱的苏联核威慑力量，以阻遏美国对苏联自身的可能袭击。然而这里有一点区别：苏联领导人的确担心美国入侵古巴，但他们并不预料美国将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可是他们在苏美战略对比中地位软弱，影响到他们在苏美外交和政治竞争中也地位软弱。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不安的一点是，倘若不扭转战略对比上的软弱地位，他们就难以抗御西方的政治压力，他们在各地，尤其是

在柏林，推进自己政治阵地的努力就会受阻。他们的洲际核力量尚弱，要扭转这局面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时人们已看出“导弹差距”实际上是苏联弱于美国，这使他们感到局促不安。他们在苏联国内用洲际弹道导弹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威慑力量，还得几年时间，而在这一关键的间隔时期，在古巴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弹，会有助于弥补战略对比中的弱势。他们 1962 年计划在古巴部署 40 个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场，有了这支力量，苏联能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就可以增加一倍多。

至于美国方面，1962 年 10 月在华盛顿，人们不大顾得上考虑苏联的动机是什么。首先，人们感到惊愕，除了情报和军事部门极少数人以外，大家都感到突然。人们作各种猜测，主要是估计苏联要在柏林问题上施加新的压力，也许还向我们的海外基地施压。但是肯尼迪及其顾问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很明确，那就是要使这些导弹撤出古巴，讨论的问题只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是冥思苦索导弹为什么部署在那里。甚至在这些导弹是否严重增加了美国受到的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他们也见解不一。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白宫的若干助手认为威胁没有增大，而助理国防部长尼采、泰勒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持相反意见。但这一分歧并没有成为问题，因为大家一致认为，由于整整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原因，美国——尤其是肯尼迪政府——经不起让那些导弹留在那里而无所作为，因为总统在 9 月已发出过庄严的警告，说如果苏联在那里部署导弹，就会“引起最严重的问题”（9 月 4 日），接着又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及盟国的安全”（9 月 13 日）。此外，共和党人攻击肯尼迪政府未认识到来自古巴的威胁，政府正在抵御这一攻击。因此，形势关系到肯尼迪总统在国内的信誉以及美国在盟友和敌手心目中的信誉。我们不能不“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我上面已经谈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

其成员的态度分成了“鹰派”和“鸽派”，前者认为我们应该轰炸那些导弹发射场并出兵古巴，后者则主张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最初多数成员倾向于出兵，但经过几天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先实施海上封锁，防止导弹再运进古巴，以此作为第一步以争取导弹撤走。空袭或出兵古巴岛则保留作为下一步必要时采取的行动方案，在军事上为此积极作好准备。外交谈判作为首选行动方案，但谈判之前，美国必须表明目标是撤走进攻性武器，而且以封锁古巴岛的行动显示出我们的决心（由于“封锁”从严格法律上讲是一种战争行动，所以采用了“隔离”一词）。波伦大使，起初还有汤普森大使等人，在冲突之初曾建议秘密与赫鲁晓夫交涉。我认为如果在当时那样做，会是一个错误。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及其多数顾问都没有同意这一建议。波伦大使不久就按照原先已宣布的新的任命出使巴黎。汤普森大使则在整个危机期间给执行委员会当参谋，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防部忙于实施对古巴的隔离，并准备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军事情况，我们在国务院则忙于许多必需的外交行动。这包括准备争取美洲国家组织（OAS）各成员国对隔离行动的支持；与各个重要盟国进行紧急磋商；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在国会内与各位关键人员协商，等等。例如，从10月20日午夜到10月22日午夜这48个小时之内，国务院就向441人发出了15种不同文稿的总统信函，并对传递方式作出相关的指示，向95位外国大使作口头通报（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在总统发表演讲前一小时向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作口头通报），起草和分发了美国致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书面建议，给美国各驻外使馆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这还包括向134个驻外使馆和领事馆发出警告，要它们注意在总统演讲后，防范当地可能发生的反美示威游行。）

这些准备工作非常成功。例如，国务院当时已有信心，相信

美洲国家组织会有多数成员国——可以高达三分之二的多数——认可隔离措施，但估计在 10 月 23 日开会表决一项谴责这些导弹是对和平构成威胁并要求将其撤走的决议时，不会是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来事实上果然如此。

美国派出的高级外交和情报使者向一些重要的盟国领导人展示了古巴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照片，后来又向联合国安理会和公众展示了这些照片。美国提出的证据很有说服力，使苏联否认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谎言不攻自破；后来，苏联又辩称这是它向一个友邦提供的正常军事援助，可是他们行动的诡秘使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10 月 23 日，两个非洲左翼国家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拒绝让苏联飞机使用科纳克里和达喀尔的机场，这样，苏联就无法再向古巴空运重要军事装备。

关键的问题自然还是苏联的反应。他们虽然严词谴责对古巴的隔离，但他们正在向古巴运送武器的 16 艘船只却全部掉头返航了。

接连四天，赫鲁晓夫竭力想达成一项妥协，让美国默许一个新的既成事实，即在古巴保留已经部署的导弹，包括约 24 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和 36 枚 SS—4 导弹及其核弹头。这大致上是他们计划部署的数量的一半。他们原计划部署 SS—4 中程弹道导弹和 SS—5 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场共约 40 个，其导弹共约 60 枚。SS—5 导弹当时尚在向古巴运送途中，古巴受隔离后，就进不了古巴。

到 10 月 26 日，赫鲁晓夫已经确信美国不会默许导弹的部署，而时间正在迅速流逝，若再不抓紧时间达成以撤出导弹换来一定交换条件的协议，美国就会动武，摧毁那些导弹，大概同时还摧毁卡斯特罗政权。这里没有必要细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交换意见的过程，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够了：美国已摆开大规模轰炸和出兵古巴的阵势（头一天出动飞机 1190 架次，连续轰炸一

周，然后出动 14 万名伞兵、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入侵该岛），在这种形势下，肯尼迪总统明确点出了赫鲁晓夫一个含糊的表示，即苏联撤出导弹以换取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同意了这一点。仅仅在几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虽然美国的建议是实际上的最后通牒，但它还包含了一项秘密的保证，即美国将在 5 个月之内从土耳其撤出美国的导弹。可是当时在华盛顿知道这一点的人是屈指可数的。

谁也不知道，倘若赫鲁晓夫拒绝了肯尼迪 10 月 27 日的建议，肯尼迪会怎么办，尔后的事态又将会如何。在当时，围绕着这场危机而忙碌的我们这些人，大多认为肯尼迪总统会在 10 月 29 日或 30 日批准实施空袭。现在，我的看法是，肯尼迪大概会继续寻求外交解决办法，尽管与此同时会加强封锁（拦阻一切石油和汽油运输，让古巴承受真正沉重的压力）。现在我们知道了，肯尼迪当时正考虑通过秘密渠道作出安排，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出面，呼吁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和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对于肯尼迪来说，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同时向苏美双方提出的要求，要比公开接受赫鲁晓夫提出的要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容易得多。

人们无法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原因之一在于，有些事情并不是领导人控制得了的。10 月 27 日，苏联一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美国一架 U-2 侦察机（造成了这场危机中唯一的战斗伤亡）。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司令自己下的决心，并未向莫斯科请示，未经莫斯科批准（而且还违背了他自己早先的指示）。此外，卡斯特罗曾命令他的部队向美国侦察机开火。当时，我曾经与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协调应急行动计划，准备一旦飞机被击落时即进行有节制的还击。肯尼迪总统批准了这些计划，但 U-2 飞机被击落时，他却决定不按计划进行还击，而是等待赫鲁晓夫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在当时的形势下，

他这样做是明智的。

在 10 月 22 日至 28 日这 6 天期间，“鹰派”与“鸽派”之间又在辩论，而且更趋激烈。隔离阻止了古巴导弹基地的扩大，但并未制止已经在建设之中的导弹基地的完工。据估计，到 10 月 28 日，已有的 24 个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已可投入使用（即可以发射导弹，但从未装上导弹准备发射，因为那样一来就可能引起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在华盛顿，紧迫的问题是隔离之后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以说服赫鲁晓夫撤走导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又是否应该以及何时应该发动空袭和出兵，以消除导弹威胁。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当时本应当更多地考虑苏联在古巴配置导弹的动机。1962 年 9 月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下结论说苏联领导人不会下决心在古巴配置进攻性导弹，是估计错了。我没有参与这项估计报告的编写，因为我离开中情局一年多了；然而，假若我参与了编写，我大概也会作出那种估计。那项估计报告的某些作者（谢尔曼·肯特和约翰·休伊曾加）事后痛苦地申辩说，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赫鲁晓夫，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他们估计的苏联做法比赫鲁晓夫的做法更符合苏联的利益。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作为借口而原谅自己未估计到苏联领导人（或任何一国领导人）犯错误的可能性——对于决策人而言，重要的是他们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本来应该怎样做。

那些认为苏联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人，也跟那些错误地估计苏联不会那样做的人一样，错在他们论据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即认为苏联的主要目标在于支持他们在世界上的政治推进，尤其是力图将西方排挤出柏林。这当然是苏联的一个目标；赫鲁晓夫原拟于 11 月公布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几乎肯定也是企图利用这一点施加新的压力，来推动他对柏林已陷于停顿的企图。但我不记得——从回顾当时文献记载也看不出——当时在华盛顿有谁

认识到，赫鲁晓夫及其同僚是多么担心他们已看出的战略地位的脆弱和担心西方的压力，因而是多么急迫想要加强他们的战略处境。我在 10 月 23 日写给当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署署长罗斯托的备忘录中，指出过自从 1960 年人们以为苏联占有战略优势（“导弹差距”）以后，“1961 年末以来，军事力量的对比已日益显出对苏联不利，首先是公众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我强调的也是苏联力图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进攻性威胁，说“莫斯科可能认为，在古巴建导弹基地是他们的第一个、大概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来对欧亚大陆边缘的美国实力地位安置一个杠杆。”^①

华盛顿在应付危机期间，对苏联的第二点主要动机，即保卫古巴阻遏他们预期中的美国进攻，也完全未作考虑。近年来，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及另一些人在回首往事时谈到，虽然美国政府在 1962 年春夏无意出兵古巴，但古巴和苏联领导人不难想到我们可能会进攻。1962 年 1 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美国成功地让该组织停止了古巴的成员资格，接着说服了 15 个拉美国家跟古巴断交。美国加紧了经济战，于 1962 年美国商品对古巴实行了全面禁运，并拒绝别国向古巴运货的船舶在来回途中到美国港口停泊。美国实行了针对古巴的大规模隐蔽行动计划，其目的在于颠覆卡斯特罗政府，同时鼓动怠工破坏和策划暗杀活动。（这计划虽是保密的，但这些活动却是古巴和苏联当局不会不知道的。）在美国支持的古巴流亡者 1961 年 4 月猪湾登陆作战失败以后，美国进行了一长串的军事演习，检验各种进攻古巴的紧急行动方案。可是，当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我们却没有看到，美国针对古巴当局这整整一套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心理、颠覆和军事活动很可能促使

^① Memorandum from G/PM Raymond L. Garthoff to S/P Mr. [Walt W.] Rostow, Subject: “Reflections on the Confrontation over Cuba,” October 23, 1962, p.1 (top secret; declassified November 30, 1981). Cited from the text reproduced in Garthoff, *Reflections*, p.195.

古巴和苏联认为需要加强古巴的防御以阻止预期的美国进攻，而办法就是让苏联军事力量进驻古巴，建立威慑能力。

我们未能正确评估苏联部署导弹的原因，后果之一，就是从10月22日到10月27日，我们一直未能提出一个利于谈判的建议。只是在苏联含糊表示了愿以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作为它从古巴撤走导弹的交换条件以后，肯尼迪才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建议，而立即被对方所接受。

鹰派与鸽派的分歧不仅是因为对苏联的目的见解不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对我们自己的目的见解不同。例如，有些人最热心于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他们也最强烈地主张美国出兵。最希望通过国际外交解决危机的人则最急于避免单方面的美国军事行动。有些人关心美国在我们盟友心目中的声誉，主张美国表明不允许苏联导弹留在古巴的决心，但又不过分急于诉诸军事行动，同时又避免作任何有损于我们对盟国义务的交易，例如拿我们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交易。在执行委员会中有两位共和党人，即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和财政部长狄龙，原是鹰派，但在10月20日与其他委员一起同意实行封锁，10月27日又同意了最后的建议。委员会中最顽固不化的鹰派是迪安·艾奇逊，他也是委员会中惟一的非在职官员，当委员会10月20日决定不实施空袭而只实行封锁时，他就退出了执行委员会。

危机期间，我的任务是给领导人当参谋出主意，一直主张坚定不移地迫使导弹撤出古巴，最好是通过谈判做到这一点，但若必要就采用军事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说，我的立场可以说是“温和的鹰派”。我强烈反对以美国从土耳其撤导弹作为交换条件来换取苏联从古巴撤导弹，认为这对北约联盟有损害，而且并没有必要。我相信，即使不作这种让步，也可以迫使赫鲁晓夫撤走导

弹。^① 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另一方面，我虽然主张必要时使用武力，但我并不赞成用这种手段达到更深远的目的，例如消除古巴的共产党政权。

古巴境内的苏联导弹在军事上有多大意义，这在当时虽不是中心问题，但人们对此有争议。在 10 月 26 日执行委员会会议后，我受领任务，就此问题作出评估。我在呈交执行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古巴的这些导弹“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苏联打击美国大陆本土的战略能力”。他们若发动第一次打击，其导弹齐射的威力将至少提高 40%（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那幅度比这更高），而且，由于苏联的战略导弹数量在当时很有限，他们利用在古巴配置的导弹，就能打击他们本来无法打击的更多目标。我的结论认为，在古巴的导弹虽然扭转不了总的战略力量对比，但却会减弱我们现有的战略优势。^② 我不知道我的这项备忘录当时有何影响，但委员们在辩论中确实提到了它。尼采曾援引这一备忘录以证实他的观点，而另一方面，麦克乔治·邦迪几年前曾告诉我（后来又在他的书中写到过），这一备忘录并未改变肯尼迪总统或他本人（或麦克纳马拉）的总的判断。^③

在危机期间，我跟国防部的代表以及国务院各司局的人协商应付危机的紧急行动计划，并在后期协商执行协议的措施。例如，我协调过近期和远期的核查安排的方案，以监督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并确保这类武器不会再次引入古巴。情况有变化，例

^① See Memorandum (for U. Alexis Johnson from Raymond L. Garthoff), Subject: "The Khrushchev Proposal for a Turkey - Cuba Tradeoff," October 27, 1962 (secret; declassified November 20, 1981). Full text reproduced in Garthoff, *Reflections*, pp.200—01.

^② Memorandum [for the Ex Comm], Subject: "Th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the Soviet Missile Bases in Cuba," October 27, 1962 (top secret; declassified November 23, 1981). The full text is reproduced in Garthoff, *Reflections*, pp.202—03, and discussed on pp.204—11.

^③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Random House, 1988), pp.451—52; Nitze is quoted in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A.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Hill & Wang, 1989), p.150.

如古巴坚决拒绝我们派人到它的领土上进行实地视察时，我们的应急计划也就随之作相应改变。当时与我一起安排行动方案同事之一，是一位杰出的海军上校埃尔莫·朱姆沃尔特，他当时是保罗·尼采的助手，后来是一位曾引起争议的海军作战部长。

在 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接受了肯尼迪的建议，即苏联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而美国则停止隔离并答应不入侵古巴之后，危机的高潮就过去了。但除了几个小的问题以外，还剩下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必须撤走的“进攻性武器”应包括哪些东西。中程导弹及其核弹头和相关装备自然包括在内。苏联领导人大概以为美国坚持要他们撤走的就只是这些。但美国人最初列出的东西还有伊尔—28 轻型喷气式轰炸机、携带近程导弹的岸防艇以及陆基近程战术导弹，后来则明确至少要将伊尔—28 轰炸机撤走，这显然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意外。苏联的立场硬不起来，因为赫鲁晓夫在他的电报中说的是同意撤走“你们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

美国决策人及其顾问们对于在这一问题上要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我们真正担心的是导弹，把导弹撤走就行了，何必再穷追不放，把伊尔—28 和别的东西都扯进去。另有一些人却主张乘胜追击，把所有的苏联军事力量全部轰出古巴。再一种意见则是至少要把伊尔—28 包括在内。

执行委员会 10 月 28 日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肯尼迪总统同意我们力争将伊尔—28 包括在内，但会议纪录表明他的态度有点模棱两可：“他不希望让我们显得说话不算数。伊尔—28 轰炸机不像战略导弹那样重要。”当然，只有最直接参与危机处理的很少几个人了解总统这一含糊态度。这次会议也没有明确，如果苏联在伊尔—28 问题上硬不让步，我们要施压到何种程度。因此，政府内部意见继续有分歧

在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以后，我在国务院受领任务就这一问题起草一项文件。10月29日，我向我的上司约翰逊呈交了题为《关于何种武器必须撤出古巴的考虑》的备忘录，约翰逊又将它发给了正在纽约的副国务卿鲍尔。我在此文件中指出，“我们固然愿意看到尽可能多的武器撤出古巴，但我们也必须能提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我认为有些武器，如米格战斗机、岸防巡航导弹和携有导弹的巡逻艇，很难把它们说成是进攻性武器，而且总统在9月4日和13日两次警告中，对这些东西是默许过的。但我指出，除了中程和中远程导弹以外，我们还应当坚持把伊尔—28也撤走。^①我认为，总统10月22日已将轰炸机列为进攻性武器，在这一点上我们应立场坚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一俟苏联方面愿意接受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再试图扩大我们的要求。

总统决定采取这一立场。我当时就相信赫鲁晓夫会让步而撤走轰炸机。更重要的是，汤普森大使亦持同样观点，他的判断对肯尼迪总统有很大作用。最后，俄国人让步了，而且说服了卡斯特罗接受这一协议。因此，肯尼迪总统于11月20日宣布苏联同意撤走轰炸机，美国结束对古巴的隔离。双方随之结束军队戒备状态。至此，危机才算真正完结了。

此后，美国曾试图说服苏联从古巴撤走我们在危机期间发现的那四个团的苏联陆军部队。顺便说一下，其中一个团的团长是季米特里·亚佐夫上校，此人在大约30年后当了苏联国防部长，于1991年参与了那场未遂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八一九政变”。当年在古巴的那四个团，有三个在几个月之内陆续撤回苏

^① Telegram no. 1133,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U.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hereafter, State to USUN), Eyes Only, Under Secretary Ball from Alexis Johnson, October 29, 1962, pp. 1—2 (secret; now declassified). This telegram, via State Department “backchannel,” transmitted the full text of the memorandum I had prepared titled “Considerations in Defining Weapons Which Must Be Removed from Cuba.” It is reproduced in Garthoff, *Reflections*, pp. 212—13. The entire II—28 issue, and other matters noted here and on the pages following, are discussed more fully in Garthoff, *Reflections*, pp. 97—129.

联，但卡斯特罗说服了苏联领导人把一个团留下来，改编成一个旅。这时局势已经平静下来了，但迟至 1979 年，美国忽然发现古巴有一个苏联战斗旅，误以为是苏联作了新的兵力部署，因此而触发了一场喧嚣，热闹了一阵子。

在 1962 年 11 月 20 日以后，古巴导弹危机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苏联要求美国正式保证不入侵古巴，为此又折腾了一个半月。双方无法达成协议。1962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交换过信件，最后肯尼迪又作了口头保证，这件事当时就搁下来了。美国本来愿意保证自己无意入侵古巴，但不愿意给古巴和苏联开出空白支票。假如情况有变化——比如说古巴被用作侵略某一领国的基地——那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的里约热内卢条约关于集体自卫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美国有权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坚持保留自己这一权利。从实际上看，情况是否变化因而是是否应采取军事行动，都要由美国单方面作出决定，所以，作出空洞的保证没有意义。最后，苏联无可奈何，只好满足于肯尼迪总统信件中作出的含糊保证了。

肯尼迪总统很明白，尽管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是一个胜利，他手下的人也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说这是总统的胜利，美国的胜利，但这样的胜利决不是他情愿再重复的。负担太重，风险太大，形势变幻太难以把握。危机的解决实际上也靠了相互妥协，其妥协的程度超出了公众当时所了解的情形。尽管许多人都以为危机的解决是靠了新的高压外交手腕，肯尼迪个人威望因之上升，但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多少新的高招。

肯尼迪总统 1963 年 6 月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正如上一章中已说过的那样，为美苏关系定出了新的正确的基调，它寻求的是双方共同努力改善关系。我没有参与这篇讲话的酝酿和起草，但我在沃尔特·罗斯托指导下参加了危机之后的政策规划，

但愿这一工作为新的方针出了力。上一章已说过，1963年达成了几项军备控制协议，缓和初露端倪。然而美苏双方都还对关系缓和小心翼翼。赫鲁晓夫由于在古巴冒险失败而地位遭削弱，两年之内被人赶下了台。肯尼迪总统在危机结束后刚一年即遇刺而逝。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首先是越南问题。

尽管如此，对于美苏两国及其关系而言，古巴导弹危机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在这以后，巨大的和尖锐的分歧仍不时发生，利益的冲突引起过反复不断的局势紧张乃至对抗。然而，再也没有一场危机带来过美苏战争威胁。从这一意义上说，冷战虽仍在继续，古巴导弹危机却不失为冷战的一个转折点。

在1962年10月，确实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这一危险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当时的当事人看法很不一致，即使在事后，这些人以及历史学家们依然见解不一。各人在当时有各自的反应，后来也有不同的判断，都提出了许多的理由。即使在最高层领导人和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军界的高级专家中间，分歧也不小。肯尼迪总统、副国务卿鲍尔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还有白宫一些高参，如特德·索伦森，认为战争危险很严重。国务卿腊斯克是否亦持同样观点，我还说不准。而尼采、麦科恩和狄龙等鹰派人物大体说来则观点有所不同。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尤其是分析研究苏联政策的人员，大多认为战争危险虽然加剧了，苏联向美国开战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美国若空袭和入侵古巴，苏联领导人会作何反应，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从当时一直到今天始终有分歧。例如，麦克纳马拉和索伦森从1962年至今始终认为苏联领导人会被迫在某个地方作出军事上的反应。尼采、麦科恩和狄龙等鹰派人物则认为不会。我和当时的多数专业人员也认为不会。俄国方面当年的一些当事人对这一点的判断也有分歧。有的人，尤其是某些军人，如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会作出某种军事

反应。另一些人，包括赫鲁晓夫当时的对外政策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则认为不会。从俄罗斯现今仅部分开放的档案来看，当年苏联似乎并没有军事反应的应急行动计划。我们还听说，赫鲁晓夫当时曾对另几位领导人及顾问说过，无论如何都不可开战。当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建议在柏林采取某种非军事性反措施时，赫鲁晓夫也生气地予以拒绝了。

近年来，我们在研究那场危机时，许多人都惊讶地发现，尽管双方最高层领导人都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却依然发生了他们未能控制住的一系列意外事件。因此，局势失控的危险无疑是很大的。然而，双方领导人的坚定决心和慎重态度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大概可以说，最重要的结论是，不论 1962 年战争危险大小如何，双方领导人的基本决心都是不让战争爆发。使这一决心坚定不移的一个因素，就是麦克乔治·邦迪所说的“基本的核威慑”，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任何核威慑力量对比的计算。美国当时的战略力量占压倒性优势，赫鲁晓夫不敢开战，并不奇怪。对核威慑抱传统观念的人感到奇怪的是，既然美国占如此压倒性优势，为什么肯尼迪总统也同样害怕局势升级到核战争。

我清楚地记得，在危机高峰时，一位空军三星将军告诉我，只要美国发动第一次打击，我们有 90% 的把握消灭苏联 99% 的战略力量，有 99% 的把握至少消灭苏联 90% 的战略力量。他的估计是可信的，但不论这估计数字精确度高低如何，美国当时对苏联的战略优势之大都显然是空前的，而且也是后来不再有的。在 1962 年末，美国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可以一次齐射和投掷 3000 枚战略核武器（此外还有大量核弹留作后备）。而苏联方面即使能调动它全部的有限的洲际打击力量，它对美国的第一次打击能力也不会超过 300 枚核武器。肯尼迪总统并未考虑过发动第一次打击，但假设美国实施第一次打击，按照那位空军高级将领

的乐观估计，苏联能还击美国的核武器将只有 3—30 枚。从任何军事演习理论或威慑战略的计算数字来看，美国都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然而美国的任何一位负责的总统或政治领导人（或苏联的政治领导人）只要仍有避免战争的可能性，都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胜利。核战争对大家都是危险的，这一因素对危机局势的克制潜力超过了军事力量对比和威慑力量对比的任何计算标准。肯尼迪总统宁愿作出某些让步以求达成谈判解决，也不愿利用当时的压倒优势发动一场核战争。

在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对抗之后，人们，首先是双方负责的政治领导人，都认识到必须避免核战争，或任何有导致核战争的严重风险的行动。这是大家吸取到的这场危机的一条根本教训。

还有本应吸取、但可惜未被吸取的第二条重要教训，那就是：威慑可以依靠相对说来规模有限但却稳妥安全的战略反击能力。有的人煞费苦心反复计算，在几个回合的热核交锋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核弹头和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以后，谁还拥有最强的剩余力量，像这样晦涩难懂的计算其实是根本用不着的。可是美苏双方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相反，这两个超级大国又搞了二十多年的劳民伤财、代价高昂和不断激起紧张局势的军备竞赛，似乎数量上多多益善，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最后达成了战略均势和僵持，这样的“加强”的威慑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战略或政治收益。

我对这些战略问题的思考自然是受到我在危机期间亲身经历的影响，然而在当时我还无法像如今这样清醒冷静地得出这些结论。那时我跟大家一样陶醉于我们击退了苏联挑战的胜利喜悦之中。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归根结底，我们坚定不移总会迫使苏联人从他们的鲁莽举措中退缩回去，”说事态的结果证明“苏联人并不打算在苏联势力延伸的问题上，冒险跟美国作决定性的军事摊牌。”我推测“从长远看，后果之一可能是，当我们将整整

一系列世界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时，有可能促使苏联采取更加负责得多的态度，”当然我强调这只是长远来看能争取到的前景。与此同时，在近期内，我建议美国“采取主动，表示愿就东西方之间的重大问题举行谈判。”^①正因为如此，我衷心欢迎肯尼迪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演说，因为它开诚布公表明愿在苏联能配合的程度上改善美苏关系。

后来，国务院为表扬我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作出的贡献，给我颁发了最高荣誉奖和银质奖章。我为此而感到惊喜和自豪。

在 1962 年那场危机期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30 年后，我竟然有机会跟菲德尔·卡斯特罗、安德列·葛罗米柯以及当年我们曾惊心动魄面对面生死较量的其他苏联和古巴军界和情报界领导人坐到一起，共议那场危机。

事情起于 1987 年：古巴导弹危机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冷战气氛又逐渐融化，我们一些人决定发起一场从未有过的实验，即美苏双方尚健在的危机参加者及一些历史学家联合起来，共同回顾古巴导弹危机的史实。这时已有大量的美国文件解密，使我们能对 60 年代和 70 年代已大量涌现的回忆录和转述材料作必要的补充和修正。苏联方面的文件当时还很少公开，但点点滴滴已开始透露。谢尔戈·米高扬——那位老米高扬的儿子（老米高扬是一位关键人物，1962 年曾代表赫鲁晓夫到古巴，硬是说服了卡斯特罗接受和平解决方案）1986 年曾要求我为他主编的俄文《拉丁美洲》杂志撰稿。我同意写，但条件是他自己也根据他父亲生前对他讲过的情况写一篇。他同意了，还约请了一位古巴分析家同时撰稿。这样，这家苏联学术杂志 1988 年第一期出

^① Memorandum for U. Alexis Johnson, Subject: "Significance of the Soviet Backdown for Future U.S. Policy," October 29, 1962 (secret; declassified June 10, 1977); from the full text in Garthoff, *Reflections*, pp.214 and 216. I was the drafter of this memo, sent by Jeffrey C. Kitchen.

现了几个“第一”：第一次有美、苏、古巴三方著者同谈一事；第一次有老米高扬的回忆材料；第一次在苏联刊物上登载出美国方面的观点。^①

此后，我决定写一本书，更充分地回顾那场危机，既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同时也尽量利用美苏双方的资料，包括已解密的美文件，而且还比以往的著作更广泛地注意古巴的观点。^②

与此同时，1987年3月在佛罗里达州霍克礁城举行了由哈佛大学主办的学术会议，接着在10月又于坎布里奇举行了续会，这一次到会的有几位苏联人士，包括谢尔戈·米高扬，但他们不是危机的直接参加者。此后三次会议先后在莫斯科（1989年）、安提瓜（1991年）和哈瓦那（1992年）举行，与会人士包括了美、苏、古巴三方面的危机参加者。^③

在莫斯科会议上，一大批亲身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的苏联人，还有许多苏联政治观察家和历史学家，参加了讨论。他们当中有葛罗米柯、多勃雷宁，1962年担任驻古巴大使的阿列克谢耶夫，还有1962年担任克格勃驻华盛顿的工作站长的费克利索夫，1961—1962年期间为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互递信息充当秘密渠道的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官员博利沙科夫。1962年曾在卡斯特罗身边工作的几位古巴人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解密文件当时还不多。

^① Raymond L. Garthoff, “The Caribbean Crisis (Cuban Missile Crisis) of 1962: Reflections of an American Participant,” Rafael Hernandez, “The October Crisis of 1962: Lesson and Legend,” and S. A. Mikoyan, “The Caribbean Crisis in Retrospect,” *Latinskaya Amerika* (Latin America), no.1 (January 1988), pp.40—80.

^② Raymond L.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rookings, 1987). A later revised edition (1989) has been cited earlier in this chapter.

^③ For accounts, including edited transcripts, of the Hawk’s Cay and Cambridge conferences, see Blight and Welch, *On the Brink*; for the Moscow conference, see Bruce J. Allyn, Blight, and Welch, *Back to the Brink: Proceedings of the Moscow Confer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January 27—28, 1989*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and for the Havana conference, Blight, Allyn, and Welch,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Pantheon, 1993).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oth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under various auspices.

1992 年 1 月，苏联刚解体不久，菲德尔·卡斯特罗积极参加了在哈瓦那举行的会议。会议期间，我向他提出了有关危机过程及其后果的几个具体问题。他的讲话总的说来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例如他说在听了我在会上的发言以后，才头一次获悉苏联的战略洲际导弹力量在 1962 年尚如此薄弱。他挺乐意与我们交谈，特别是与麦克纳马拉交谈。在会议之外，他还与我和 1962 年担任中情局副局长的克莱因谈过话。我把我带去的中情局 1962 年制作的一大张古巴当时全部领导成员的彩色照片送给他，他挺感兴趣，还追问一句那照片是否可以由他保存。一天晚上，他的弟弟、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把我和麦克纳马拉、克莱因、威廉·史密斯将军和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等人请到他的办公室，还请我们参观了他专用的与莫斯科通话的热线密室。他想让谢尔盖拿起电话用俄语说“我是赫鲁晓夫，请回话”，但谢尔盖对这整个场面有点发憊，拒绝了。劳尔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古巴当时（1992 年，而不是 1962 年）为随时迎接美国入侵而采取的战备措施，可是麦克纳马拉和我们大家的惟一反应只是认为这纯属浪费资源，倒使得劳尔有点难堪。

关键的问题自然是：档案开放了，当年危机的美苏双方（若把古巴单算，则是三方）如今交换意见了，那么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呢？上文中已谈到，我们现在澄清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机，以及危机期间赫鲁晓夫终于决心撤回导弹的原因。美国当时无论如何要让这些导弹撤走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现在了解到，肯尼迪总统当时还准备继续争取谈判解决，必要时大概还会作出进一步的让步，而军事手段只会到最后万不得已时才予动用。美苏领导人和双方多数（虽非全部）顾问人员都很懂得战事一开，就会有失控升级的危险。现在我们获悉，当年卡斯特罗曾向赫鲁晓夫建议，一旦美国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应抓紧战略主动权，用苏联核武器向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一建议只

是进一步促使赫鲁晓夫下决心马上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结束危机。卡斯特罗当时也许认为社会主义、古巴和苏联三者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但赫鲁晓夫并不这样想，他决不允许苏联的安全成为古巴危机输赢结局的人质。^①

1962年，那些导弹的核弹头是否已在古巴，我们当时还无法确认，只是为慎重起见，假定它们已在那里，而现在这一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除此以外，我们只是在不久以前才获悉，当时在古巴还有大约一百枚战术核武器准备用于抗击入侵者。美国一些谨慎的军事计划人员当时认为不应排除古巴境内有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但肯尼迪及其他决策人（还有情报估计人员）并不相信这一点。倘若当年决定向古巴出兵，那么在登陆前的七天轰炸以后，大概仍会有若干战术核弹头残存下来，经过或不经过莫斯科批准，它们都有可能用于抗击美国入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几乎肯定都会防止核战事升级到古巴之外，但危险之火仍将超出当时预计到的程度。^②

与危机有关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次要问题的答案现在也得到了澄清或修正。例如，克格勃的华盛顿工作站站长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当时化名福明）曾通过美国新闻工作者提出建议，这建议受到美国决策人重视，曾认为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条件，但现在查明这只是一个未经授权的试探，又向莫斯科作了歪曲汇报，赫鲁晓夫在解决危机时根本未加以考虑。另一方面，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当时以苏联大使馆公关官员的身分作掩护，通过美国新闻工作者构成了苏美领导人相互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而现在我们确知，早在危机初期，

^① See Blight, Allyn, and Welch., *Cuba on the Brink*, pp.360—64, on Castro's urging of a preemptive soviet nuclear strike on the United States if cuba were invaded.

^② See Raymond L. Garthoff, "U.S. Intelligence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Intelligence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edited by David A. Welch and James G. Blight, pp. 18—63 (Frank A. Cass, 1998).

罗伯特·肯尼迪无疑是经过他哥哥授权，动用博利沙科夫这一渠道向苏联方面暗示说，有可能安排一项交易，美国不事张扬地从土耳其撤出导弹，换取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这些细节对于当时的危机而言都不是关键，但它们表明，要历史地再现当时的事态，是多么地复杂和难以把握。

然而，最主要的结论依然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冷战期间最危险的一次对抗，而且在于它构成一个转折点，使美苏两国领导人都尖锐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绝对的重中之重。地缘政治竞争和军备竞赛又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双方都谋求利用每一次出现的机会，但两国都再也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曾经让局势危险到彼此有可能直接动武或使用核武器的地步。

第十一章

国务院：约翰逊年代

1963年11月，风华正茂的年轻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他立即强调了政府及其内外政策的连续性。虽然他无法填补那光彩照人的前任留下的神话般形象的空白，但一开始他至少基本上做到了沿用原先的领导班子和政策。一年后，约翰逊通过自己竞选而当上总统后，开始在对内政策上力图对华盛顿打下自己的印记，提出要把美国建成“伟大社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寻求冷战局势的缓和，只是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很快由于越南的战争而变得黯然无光。

对外政策方面，肯尼迪时代的三驾马车，即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一开始都继续留任，而后来人事变动时，新上来的人大多仍是肯尼迪时代的老人，例如沃尔特·罗斯托三年后接替了邦迪。约翰逊政府头一年，对外政策确实没有什么变化，但已开始对越南局势作出反应，后来就愈陷愈深了。谁也不知道倘若肯尼迪在世是否会采取同样的方针。无论如何，越南问题后来几乎压倒了一切，最后还导致约翰逊总统争取不了连任。

越南战争对于美国政策和约翰逊政府的荣辱盛衰十分重要，但在本书中将很少提及，这是因为我曾未曾参与越南政策事务，没有多少话可说。我惟一的一次短暂涉足，是在1965年初，当时正头一次酝酿轰炸北越和美国出兵的关键决策。与后来许多人的

说法相反，事实上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并不是缺乏了解越南情况的专家，这些专家一致反对美国直接参战，更重要的是，反对将越南战争视作美国抵制世界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和能力的考验。可是，他们的意见跟多数决策人的先入之见不相吻合，因而受到忽视（后来这些专家也遭到这种命运）。政府在下决心出兵和逐步升级之前，曾听取过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其中之一就是我）和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但决策人提出的问题未切中要害，他们只想知道，如果我们出兵干涉，苏联或中国是否会直接参战。我的回答，以及我们当中多数人的回答，都是认为它们不会。但我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接着指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军事干涉能否成功，我们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保持一个自由的和有力反共的南越）。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一问题超出了我们对苏联、中国或越南事务的专业知识范围，而且涉及到美国的决心和能力问题。关于越南局势的性质，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性质，关键的不同意见都被撇到一边。决策人认为有必要和有义务显示美国的威力和决心，有的人也许还认为这是该这样做的一个机会。他们认为美国面临着挑战，非应战不可，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许多决策人，包括腊斯克，大概还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持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和苏联领导人是将越南视作共产党人能否通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实行扩张的考验。如果共产党人在南越得手，那么不仅在东南亚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还会更加情不自禁地想在世界各地发动或利用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多数的苏联和中国事务专家不赞成这种看法，而新的“反叛乱”专家和老的“世界共产主义”问题专家则坚持这种看法。总统觉得，既然由他掌舵的美国受到挑战，那就该应战。尽管约翰逊政府本想集中精力在国内建设“伟大社会”以及在东西方关系中推行缓和，但却让越南战争左右了

美国的政策。

有关约翰逊政府对外政策的历史著述都不曾提到约翰逊接任总统，尤其是自己当选为总统之后，有过一个愿望，就是会晤苏联领导人和发展美苏关系的缓和。但多数著述承认约翰逊曾愿继续推进肯尼迪政府 1963 年在军备控制和美苏其他安全合作方面的努力。约翰逊刚接任总统时，美苏高层往来陷于停顿，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但双方都表示过发展关系的意愿。苏联副总理米高扬来美国参加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并与约翰逊交谈，双方都保证要发展关系。1963 年 11 月 26 日，约翰逊致函苏联总理柯西金，重申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可是再没有进一步的举措，而美国的新政府已面临其他的任务了。

约翰逊政府曾保证要作出新的努力，来推进肯尼迪政府 1963 年已开始的美苏军备控制协议谈判。^① 第一个重大倡议是企图与苏联达成“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冻结”协议，就是争取双方对各自现有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的数量和性能实行封顶。几个月之前，肯尼迪总统已认定这一冻结要比削减易于实施，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略运载工具方面占有优势。约翰逊总统于 1964 年 1 月把这一建议作为他的第一项军备控制倡议提了出来。但这一倡议对苏联领导人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会把一套核查机制塞进封闭的苏联社会，最重要的是它会把苏联冻结于战略劣势地位。

我们尝试过的另一些方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未能成功。例如，有一项建议是美苏两国在一对一的基础上销毁中程轰炸机。这显然行不通，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已决定淘汰它的中程 B—47

^① By far the most thorough account of arms control in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in particular on nuclear testing and nonproliferation, is the detailed memoir of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Glenn T. Seaborg, with Benjamin S. Loeb, *Stemming the Tide: Arms Control in the Johnson Years* (Lexington Books, D.C. Heath, 1986). Many of the key documents are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11,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hereafter *FRUS, 1964—1968*.

轰炸机，而苏联的中程图—16 轰炸机当时却是它的轰炸机队的主力。美国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这是美国军方所能接受的惟一方案，而且军方还要求销毁中程轰炸机的规模和进度必须与美国自己的既定时间表相吻合。这样的建议自然不会为对方所接受。我们在日内瓦的谈判一直在继续，可是熬了三年之后，美国政府才开始提出严肃认真的军备控制建议。

再一件事，是美苏双方同时采取非正式商定的削减军费预算的行动。1963 年夏季，苏联提出了削减军费的可能性，肯尼迪总统于同年 8 月向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谈到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共同示范”。当时我们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苏联公布的军费预算与我们的预算不是一回事，并没有可靠地反映他们的军费开支水平。但是美国已经决定要削减军费，所以让苏联也相应降低军费，总是好事。1963 年 11 月底，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不久，腊斯克告诉多勃雷宁说，我们将非正式地向苏联通报我们削减的军费预算。到 12 月初，我们就通报了；几天之后，多勃雷宁答复说，苏联将按照几乎相同的幅度降低军费。12 月中旬，两国宣布了各自削减军费预算的行动。1964 年 11 月和 12 月，美苏又一次各自采取了这一措施。

然而，到 1965 年，美国由于越南战争而重新增大军费预算。苏联领导人指责美国违背了自己承担的“义务”，腊斯克则指出，这本来是美国自己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协议”。这一“共同示范”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与此相类似的事：约翰逊总统于 1964 年初宣布要削减核武器用的浓缩铀和钚的产量，并在当年 2 月私下通知赫鲁晓夫，削减的比例为 25%。赫鲁晓夫表示苏联也愿采取相同措施，但不一定是相同的比例。经过沟通，美国和苏联于 4 月 20 日同一天宣布了这一举措。后来的情报表明，苏联在一些老厂降低了产量，但又开设了新厂。当时美国储备的裂变物资已有富

余，反正要减低生产，所以对于苏联的减与不减，反正也无所谓。这件事到此为止，第二年就不见下文了。

在此期间，我继续担负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事务，还出席过北约总部讨论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的七次专家会议。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军备控制问题，是防止核扩散。在 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次核武器试验以后，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美国事先已获得中国准备核试验的情报。为了减少这一事件对舆论的冲击，国务卿腊斯克在 9 月 29 日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预先布置的一位记者的提问时，指出美国已知道中国将进行试验，不会感到惊讶。10 月 18 日，在中国核试验两天以后，约翰逊总统指出腊斯克已经“及时预告”这一事件。

这时，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主持之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跨部门的委员会，其非正式名称是“约翰逊委员会”，负责研究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中国核武器计划，历时将近两年。它曾经考虑过的方案之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一方案被否定了。早先，1961 年 9 月，政策规划委员会曾建议考虑帮助印度抢在中国前面掌握核试验能力，但腊斯克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它不符合我们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总的利益（但奇怪的是他在 1964 年又考虑过这一想法）。在防止核扩散方面，1964 年 8 月又成立了一个高级跨部门的委员会，由汤普森大使任主席，我当了这一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在如何对付中国发展核能力的问题上，我们也考虑过许多可能的方案，其中包括先发制人的打击。

约翰逊自己当选总统以后，他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在 1964 年 11 月成立了一个由第一流成员组成的“核扩散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前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任主席，所以人们将该委员会称为“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原总统裁军事务特别顾问约翰·麦克洛

伊，前北约最高司令官格伦瑟将军，前白宫科学顾问基斯塔科夫斯基等等名人。委员会的办事人员班子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的基尼为首，我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国务院协调员。

作为委员会工作班子里的国务院代表，我负责提供建议和信
息，并就一系列问题撰写备忘录。但我的主要职责是起一种管道
的作用，把国务院各司局的专业知识汇集起来，充分支持委员会
的工作。委员会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有六个方面，我主要负责其中
的四个：欧洲问题（主要是北约核共享安排）；其他地区（尤其
是印度、日本和以色列）；可能达成的多边协议（主要是全面核
禁试，不扩散协议，非核化区域，不首先使用的方针，战略军备
控制）；以及对现有核大国的政策（包括苏联、中国、法国和英
国，尤其是对中国和法国的政策）。国防部负责的主要方面是美
国核武器政策及其实际做法；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和原子能委员会
则主要负责和平利用原子能，核武器技术因素，包括警卫与视
察，核技术转让，及获取裂变物质的可能性。我们还安排著名专
家和官员来通报情况以及向我们各自部门的高级官员通报情况。
我们之间有时意见有分歧，争论激烈，但我们仍相处得很好。

在紧张工作了将近三个月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于
1965年1月21日向总统提交了自己的报告。吉尔帕特里克报告
当时是很机密的（直到1996年才完全解密），这很有道理。我们
当时考虑了一批有可能采取的反扩散措施，其中包括支持无核
区，向印度作军事保证，向日本作出更广泛的承诺，向以色列施
加压力，甚至对中国采取旨在剥夺其核能力的反推行动（rollback
actions），以及向法国施压逼它放弃核武器计划。报告不曾建议
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但要求更加重视防止核扩散，而且软硬兼施
（如一面提供安全保证，一面以撤销安全承诺相威胁）。^①

^① FRUS, 1964—1968, vol.11, pp.121—82; the text of the report appears on pp.173—82.

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什么明显可见的具体成果，然而我认为它的努力是有益的。

在 1964 年末，有人发现我们有半打（half a dozen）的跨部门委员会都在研究中国核试验的涵义与后果。除了上面提到过的汤普森委员会和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以及约翰逊委员会以外，还有以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费希尔为主席的“费希尔委员会”，以副国务卿哈里曼为主席的跨部门心理政治工作组组成的“关于中共核爆炸的特别委员会”。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时为所有这些委员会服务，而且要确保国务院各司局都参与进去，或至少要了解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有一个研究项目，研究中国核试验的军事涵义，我负责代表国务院了解情况。

通向防止核扩散条约（不扩散条约）的道路是漫长的，它虽然不是我们反扩散战略的惟一内容，但从 1961 年起，它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中心问题，直到 1968 年缔结该条约（1970 年批准该条约）为止。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要达成协议也很难，主要障碍在于难以做到既让苏联方面放心，相信我们的北约盟国——首先是德国——不会掌握核武器能力，同时又让我们的盟国——首先是德国，但还有意大利——放心，相信它们不会冻结于永远的劣势之中。关键自然在于，不仅要强化美国对盟国的承诺，而且还要让盟国参加核威慑，其程度要足以让它们放心，而又要让莫斯科不致感觉到这给他们形成一种新的威胁。

为了解决让北约盟国放心的问题，从 1962 年到 1964 年的主要努力是企图就组建多边核力量（MLF）一事达成协议，其具体设想是组建一支海基核力量，其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而又不受任何一国单独控制。约翰逊政府一开始曾使劲支持这一设想，然而到 1964 年底，约翰逊及其多数顾问（尤其是麦克乔治·邦迪）已认定这一设想行不通，但直到 1966 年末才予以放弃。在这期

间，美苏两国一直继续谈判。1966年12月终于出现转折点，美苏达成了初步协议——之所以是初步，是因为我们还需要让它能为盟国所接受。

我认为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腊斯克的功劳，即始终不渝而又谨慎小心地支持了核不扩散条约的谈判。在这方面，最能干而又活跃的人物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费希尔。腊斯克，还有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向对多边核力量的构想不怎么热心，但却致力于不扩散，最终找出了较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请北约盟国参与核计划，一方面又与莫斯科谈成了核不扩散协议。

在这一时期，我除了作为国务院与军备控制方面各委员会的联络渠道以外，还继续担任上文中提到的 NSAM 156 委员会的 执行秘书，处理外层空间情报活动问题。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这一委员会主要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但在 1964 年考虑过一件重要的事，即重新审议是否向外透露我们的卫星摄影侦察能力。1964 年 9 月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我们的代表通报了一些情况，但没有透露我们的侦察卫星的能力。NSAM 156 委员会也讨论过是否透露这种能力用于军备控制的核查。后来的解决办法是笼统地提到“国家技术核查手段”。

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在罗斯托主持下，于 1963 年成立了一个由我牵头的委员会，研究“外层空间 20 世纪 70 年代在国家安全政策规划方面的涵义”。我们于 1963 年底完成了研究，于 1964 年 1 月 30 日提出了研究报告。我们提出美国应“有力地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合适而又必要的军事活动，同时设法防止军备竞赛延伸到外层空间”。我们赞成禁止将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到太空。我们主要的结论之一是证明，利用太空武器攻击地面目标虽是可能的，但成本太高，无法取代陆基导弹，

这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做法，它不会构成真正严重的危险。我们这一研究报告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反对研制反卫星武器系统，甚至还赞成它。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外层空间方面的主要事态发展，是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的谈判。这一条约既重申了 1963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在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又保护了我们在空间的军事支援和情报（侦察）活动。

1967 年 1 月 27 日，我们跟约翰逊总统一起在白宫庆祝外层空间条约的签订。同一天早些时候，我们惊悉阿波罗 1 号登月航天器在肯尼迪角失事、航天员遇难的噩耗，欢乐一下子变成了悲痛。

我的职务是“苏联集团政治军事事务特别助理”，所以我一直积极关心苏联的军事发展，尤其是战略和政治军事方面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不时地向汤普森大使、我的上司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杰夫·基钦和情报研究局局长托姆·休斯谈过我的见解。除了在一系列委员会工作以外，我还时时访问战略空军司令部及其他军事总部。1969 年，我参加过一次专题讨论战术核武器的会议。这几年当中，我参加过好多次军事演习。最有趣的一次是 1964 年 5 月有十多万官兵参加的大规模“沙漠打击”对抗演习。对抗的一方是模拟苏联华沙条约方面的“内佐纳”，在演习中，上级点名让我担任了“内佐纳”战时内阁的“外交部长”。演习持续了 14 天，耗资 6000 万美元，仅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就有 33 人之多。但演习被认为是很成功的。

我继续到国防学院、三军的学院以及加拿大和北约一些军事院校讲授苏联政治军事和美国政策课，并参加了国防系统一些研究项目，例如 1966 年担任海军部长的保罗·尼采请我参加了“海上作战”课题的研究。1966 年 5 月，中央情报局正式请我担任顾问，帮助他们理解苏联的战略方针及其对苏联军事计划的影

响。

1968 年底或 1969 年初，中情局秘密情报部门的人向我征求意见，问他们当时弄到的苏军总参杂志《军事思想》价值如何。当时给他们提供这杂志的人抬高要价，高得过分。我指出这杂志有助于了解苏联战略思想，但这时的版本的价值已低于原先由彭科夫斯基提供的那种绝密版本。能继续弄到它当然好，但不是非要不可。到 1969 年夏天，中情局就甩掉了那个供货人，一年半以后才找到了新的来源。

1966 年 8 月至 9 月，我到欧洲作了范围广泛的访问，出席了五六次会议，开展了别的一些活动。我再次访问了维也纳、布加勒斯特和布拉格，与当地官员讨论了军备控制和欧洲安全问题。在伦敦、波恩和慕尼黑，我与英国和德国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交换了意见。德国人这时正处于思想活跃时期，过去由于东欧国家承认了东德，西德拒绝与它们建交，但这时西德决定要在东欧起积极作用，态度有了转变。我还与德国官员讨论了核不扩散条约方面的谈判进展情形。

在布加勒斯特，我的主要译员是科尔内留·波格丹，当时他是罗马尼亚外交部北美司司长，不久后当了驻美国大使。据我所知，他与罗马尼亚情报部门也有关系。可是，他 1988 年被撤职软禁。在齐奥塞斯库垮台后不久，当波格丹看来即将在新政府任职时，他却在 1990 年 1 月去世了。

在挪威北端的北角，我出席了挪威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一次国际会议，那是一次有趣的访问。我还与出席会议的瑞典高级官员讨论了瑞典当时正在演变之中的对待核武器的想法。接着，我在奥斯陆与挪威副国防大臣伦德等官员讨论了安全问题。

9 月初，在法国东部的埃维昂，我以政治军事学者的身分参加了第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那里，我跟苏联的帕维尔·日林中将等一批军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唇枪舌战激烈争论。一年以

后，在伦敦一次讨论军队与社会的学术会议上，我又遇见了日林将军等苏联和东欧的军事“学者”。

1966年，美国国内发生了关于驻欧美军是否应缩减的争论。在国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等议员要求减少驻欧兵力，向政府施加压力。由于财政预算紧张，美国敦促盟国（尤其是德国）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美国驻军的部分开支，因而与盟国也有磨擦。总统请约翰·麦克洛伊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建议。麦克洛伊找了几个人当帮手，我是其中之一。在我1966年10月14日交给他的备忘录中，我按照他的要求全面列举了减与不减的得失利弊，建议不要作大规模的缩减。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在1967年4月，驻欧美军只作了适度缩减，同时采取了一些部队在欧洲和美国本土之间定期轮换的办法。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苏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就是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谈了至少十年之久。真正的谈判始于1969年底。我们朝这一方向作出的重大努力则是始于1966年底。这是我们头一次认真努力争取与苏联就战略军备竞赛问题举行会谈。我从一开始就置身于这一努力的中心。

这方面的新倡议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一向愿意考虑切实可行的军备控制，尤其迫切希望美国避免作出部署反弹道导弹（ABM）系统的决定。他肯定认为这一举措一旦开始就难以收拾，会促使双方在战略攻防武器之间展开重大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他决心努力防止这种事态发生。他倡议就限制战略武器与苏联进行谈判。国务院的腊斯克等人、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福斯特和费希尔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斯托和基尼都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当时，美苏双方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均已有数年之久，苏联刚着手在莫斯科周围部署有限的反弹道导弹防御。1966年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在复审国防预算时争取为美国大规模部署这

种武器系统提供经费，麦克纳马拉则不予赞成。11月，领导人们在约翰逊总统的得克萨斯牧场几次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最后又在奥斯丁开会，麦克纳马拉终于争取到总统同意只宣布为此作一笔紧急拨款，同时争取苏联同意禁止或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部署，一旦达成协议，美国就不再部署。等到总统1967年1月24日宣布预算时，我方已初步探知苏联谨慎地表示愿考虑限制反弹道导弹及进攻性战略武器。但预算咨文仅宣布打算与苏联谈限制反弹道导弹问题。在2月28日收到柯西金进一步的答复以后，总统才于3月2日宣布苏联原则上同意就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军备竞赛进行会谈。

1966年12月6日和7日，汤普森大使在华盛顿跟多勃雷宁大使作了初步交谈。汤普森于1967年1月底到莫斯科就任美国驻苏大使后，多次与苏方官员，主要是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联系开始谈判事宜。国务卿腊斯克和副国务卿帮办科勒（原驻苏大使）则在华盛顿继续与多勃雷宁保持联系。致汤普森的指示电报，最初还有华盛顿立场文件，均由我起草。整个工作很快就纳入了部门主管人（及副手）委员会的渠道，并由一个三人小组起草多数的文件：除我以外，还有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费希尔和接替尼采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的麦克诺顿。1967年6月，麦克诺顿在一次空难中不幸逝世，接替他的是沃恩克。

1967年1月13日的头一份战略武器立场文件是由我起草，然后在副手委员会传阅。在这一文件中，我建议冻结新攻防战略武器发射场的构筑（已在建者可予以完成），执行情况由各方自己的国家核查手段（主要是摄影侦察卫星）加以核查。战略武器除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外，还包括陆基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当时苏联已部署数百枚针对欧洲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而美国尚无部署）。建议禁止机动弹道导弹，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它们的数量难以核查。在我写的初稿中，还建议全面禁止试

验和部署任何的“新式系统”——这将包括多弹头分导再入大气层飞行器，尽管未加点明。后来把这一条取消了，因为美国在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方面享有显著领先地位，五角大楼决心要予以部署。除此修改外，文件中提出的主张在 1967 年和 1968 年基本上一直是美国的立场。

最初的立场文稿经过推敲和加工后，作为建议文稿提交 3 月 14 日的部门主管人委员会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上将反对冻结反弹道导弹，指出这样一冻结，美国不仅无法对苏联的弹道导弹建立防御，而且也无法对中国的弹道导弹建立防御。他还认为苏联领导人极不可能愿意放弃对导弹防御，说他“无法想象”苏联领导人会仅仅满足于已动工的莫斯科一地的反弹道导弹部署。别的人大多同意他的估计。（后来的谈判表明，他们的看法错了。）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讨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问题，因为麦克纳马拉认为最好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腊斯克接受了科勒和我的意见，表示了同意。总之，3 月的会议未能就美国政府的立场达成协议。

在 3 月会议以前，美国已决定要与北约盟国协商（至少是通的情况）。当盟国获悉美国未先与它们协商就向苏联提出这一问题时，一直对美国与苏联将要进行的谈判表示强烈的关切。整整一年当中，盟国驻美使馆的参赞川流不息地到国务院找我这个“出头人”了解情况。我们决定利用半年一度的北约“裁军专家”会议于 3 月 7—8 日在巴黎开会的机会介绍情况。我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助理署长斯科维尔及国防部的麦克诺顿的副手巴伯一起赴会，巧妙回答了许多问题，并且在讨论中无意间头一次向盟国透露了我们的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计划。盟国主要担心的问题，是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武器是否会包括到美苏谈判之中（我们答复说一定不会），而苏联对付欧洲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是否包括在谈判内（我们回答说一定会）。但盟国最不放心的是两

个并未直接提出过的问题，一是美国这一对苏谈判会不会冲击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一是美苏可能达成的协议会不会减弱或取消美国的战略优势，而一旦出现美苏“势均力敌”，盟国安全所依赖的核威慑力量会不会受到削弱？但许多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军备控制和抑止军备竞赛的前景，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反对。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是有益的，至少消除了盟国的某些担心，而且为盟国间协商开了一个好头，后来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这做法得到了坚持。

尽管部门主管人 3 月 14 日华盛顿会议上意见仍有分歧，汤普森大使仍遵照指示于 3 月 18 日告诉苏联人说，我们准备于 4 月 12 日开始谈判（事实上，已组成了以汤普森为首的代表团，我是代表团中代表国务院的成员）。

我们希望与苏联商定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摸清他们的立场，但进展仍然不顺利。高层交涉的第一次机会是柯西金总理于 6 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由于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升温，柯西金不愿让人看见他到华盛顿，约翰逊总统又不愿屈驾到纽约会见柯西金，所以经过一番曲折，才商定两人到纽约与华盛顿之间恰好半路上的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会晤。会晤了两天（6 月 23 日和 25 日），中间的那一天，柯西金返回纽约的苏联使团驻地通过保密电话跟他的莫斯科同事商量了意见。约翰逊与柯西金会谈的主题是刚刚结束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但约翰逊一心想说服柯西金同意开始谈判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而且派麦克纳马拉来当说客。但柯西金老跟麦克纳马拉兜圈子，始终没有答应早日开始会谈。现在看来，问题在于苏联当时还落后于美国，而且还正在构筑它的导弹发射场，而美国发射场构筑业已完成，已转人通过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系统来增加弹头的阶段。

我们在华盛顿的准备工作一直未停。到 9 月，副国务卿帮办科勒经国务卿腊斯克授权，绕开陷于僵局的部门主管人委员会机

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作为工作班子，成员除我以外还有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费希尔和国防部的沃恩克，实际上就是撇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的任务是对 3 月会议意见分歧的问题提出我们的修改建议，为一旦苏联突然同意会谈时，我们能拿出自己的立场。我们作出的主要修改是放弃了三人原先都赞成的反弹道导弹冻结的主张，改为建议双方保持一个共同商定的数量相等的水平。我最初建议双方都保持 1000 台发射器（美国当时研制的“哨兵式”反弹道导弹计划数量为 672 台发射器）。但麦克纳马拉不同意这一数字，而保留一个笼统的“商定的数量”，这样就可多可少，从 0 到 1000 以上，均有可能。我们起草的立场文件定稿后一直存档，但等到 1968 年 8 月开始谈判时，它仍为我们的谈判立场提供了一个基础。

到 1967 年 9 月，约翰逊总统认为该授权部署反弹道导弹了。他让麦克纳马拉考虑怎样说明这一举措的理由，这说法是：要应付中国的少量导弹的袭击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性的发射，而不说是要应付苏联的全面袭击。我和国务院另外几个人有机会事先阅读麦克纳马拉关于此事的讲话稿，曾设法把防范中国袭击的说法改得软一点，但我们十分支持将这一部署控制在有限范围以内。麦克纳马拉在他的讲话中，还有约翰逊在他致柯西金的信函中，都明确重申了愿与苏联谈判限制军备。由于美国已决定开始部署反弹道导弹，同时苏联的进攻性战略力量已在接近美国的水平，因此，苏联领导人终于在 1968 年年中同意开始会谈。（大约在这时，国务院一位在北约工作的同事鲍勃·马丁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想出了一个缩写词 SALT，这一缩写词代表了以后十年的谈判过程。）

许多间接的迹象表明，莫斯科当时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一是能否与美国进行严肃的谈判，一是苏联该对反弹道导弹作何种部署。一些有影响的苏联科学家开始认真接受一些美国科学家的

论点，即赞成禁止反弹道导弹，以便预防战略军备竞赛的升级。在美国宣布部署反弹道导弹以后，中情局于 10 月获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米哈伊尔·米利翁希科夫院士获准邀请一些美国科学家到莫斯科进行不予公开报道的会谈。这些美国科学家（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多蒂为首，所以非正式地称为“多蒂小组”）与包括米利翁希科夫在内的一些苏联科学家 1957 年在加拿大的帕格沃什一次多边会议期间已有过双边会谈。这一次，这些科学家于 1967 年 12 月 28—30 日在莫斯科会晤。在去那里开会之前，多蒂等人到华盛顿听取了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和白宫的一些官员，其中包括我，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还会见了麦克纳马拉。他们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我们，与苏联科学家谈得很不错。我们还获悉，与会的苏联科学家也认为会谈很成功，使莫斯科在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取得了“概念上的突破”。其中的一位，亚历山大·休金，是在苏联科技界与军事工业委员会之间保持联系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后来还作为军工委员会的代表（但这一身分并不公开）参加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这次会议中，双方都有几个新的人物，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和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他们都是头一次参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非正式接触，后来成了政界学界的重要角色。

1968 年 6 月 21 日，柯西金终于书面通知约翰逊希望开始会谈。7 月 1 日，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时候，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宣布即将开始就“限制和减少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运载系统及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谈判。

7 月，部门主管人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国务卿腊斯克，1968 年初接替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的克利福德，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福斯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执委的工作小组以军备控制与裁军

署副署长费希尔为首，我作为当时已宣布的惟一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团员，参加了工作组。执委于 8 月 7 日和 14 日两次开会，商定了美国的谈判立场。

8 月商定的“基本立场”及相关文件指出，应停止构建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场和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只允许完成已经在建的陆基和海基发射装置。应禁止机动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机动的陆基和海基反弹道导弹。双方保持商定的同等数量的固定基地反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对现有武器系统的质量改进（不言而喻包括采用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不加限制。

对于原先有争议的限制反弹道导弹问题，麦克纳马拉本来主张实行冻结，即允许苏联保留莫斯科周围的 48—64 个发射器，而美国方面为零。苏联部署的那一点东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双方差距明显，在政治上对美国不利，所以我们最后商定只提双方商定一个同等的数量——可以是 1000 或 10000，也可以是 0。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福斯特主张禁止，军方坚决反对。苏联在这种技术研制方面落后于美国，几乎肯定会同意禁止。我们不希望暴露出我们内部的分歧，所以决定不提它，甚至也不推迟预定于 8 月开始的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飞行试验。

几年以后，腊斯克告诉我，他和克利福德及罗斯托当年知道约翰逊总统主张完全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和反弹道导弹，所以他们决定在 1968 年 8 月的立场文件中撇开争议，这样才能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

美苏双方本来安排于 8 月 21 日宣布即将从 9 月 30 日开始在列宁格勒举行两国首脑会晤，约翰逊总统打算亲自开始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时两国代表团于日内瓦开始会谈）。但恰巧在 8 月 20 日，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干涉。约翰逊

一开始还犹豫不决，但最后无可奈何地取消了 8 月 21 日宣布会谈的安排，推迟了会谈。当时我和国务卿腊斯克及国务院多数人一样，认为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开始会谈是不合适的。但约翰逊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四个月里仍然想要举行美苏首脑会晤和亲自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到 11 月大选以后，约翰逊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败给了共和党的尼克松，这时首脑会晤的可能性更渺茫了。但约翰逊仍不死心，于 11 月底让汤普森大使向苏联建议 12 月中旬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谈。而苏联领导人通过当选总统的过渡班子了解到尼克松反对这样做，自然让约翰逊的希望破灭了。

在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三周以后，我觉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会于近期开始，我不必再留在华盛顿，而北约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后果正焦虑不安，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向副国务卿帮办波伦和助理国务卿莱迪提出让我回布鲁塞尔工作，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若有事，我随叫随到。他们同意了。9 月初我返回欧洲后，按照莱迪的要求，先后向美国驻北约大使（我的上司）克利夫兰、驻英大使布鲁斯、驻法大使施赖弗和驻德大使洛奇口头汇报了我们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

约翰逊总统在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举行美苏首脑会谈和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念头以后，依然采取了两个未公开报道的步骤。一个是在 9 月中旬通过罗斯托—多勃雷宁的渠道，向苏联建议商定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目的”，其中主要的目的是“保持稳定的战略威慑”。苏联领导人数周后作了答复，同意了这一条以及次要的几条，并补充说应强调战略攻防武器之间的关系，并主张“同等安全”，任何一方不得占军事优势。

到 1969 年 1 月约翰逊总统的最后一星期，他又采取了一个步骤，把上述的“原则和目的”作了相应修改后，提交给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希望得到盟国的支持，从而使即将上任的尼克松

政府难以置之不理。这时我恰好返回北约总部，见到盟国代表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美国即将卸任的政府为什么会在自己最后时刻采取如此重大事项的一个举动。有些盟国代表并不喜欢这些“原则”，怀疑它们即使不是出于苏联之手，也是未经盟国协商就跟苏联方面谈妥了的——事实正是如此，尽管我们这些在场的美国人不了解情况，无法对他们的怀疑表态。而尼克松政府一上任后，不论是对北约还是对苏联，都宣布那些“原则和目的”统统作废。

美国想在 1967 年和 1968 年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虽然当时未能实现，但这期间为此所作的努力仍为后来成功的会谈打下了基础。尼克松政府是从 1969 年末开始这一会谈，本书将在下文中详谈。

除了谈判核不扩散条约和争取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外，争取较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努力也在继续，但未获成功。在 1966 年，美国政府内部曾考虑对核试验规定一道低的而且易于核查的“门槛”，超过这道“门槛”的试验一律列入禁止的范围，但这一点在美国政府内部都谈不拢，因为国防部强烈希望作进一步的核武器试验，不愿让这些试验被禁止。与此同时，在履行 1963 年有限核禁试条约方面，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

1963 年的条约禁止除地下试验以外的一切核试验。由于当时已认识到地下核试验也会将少量的放射性微粒散射入大气层，所以该条约规定不得让放射性微粒散落到试验国本国的疆域以外。但当时也认识到这一标准可能会遇到问题，因为探测仪器的敏感程度日益提高，而且放射性微粒可能升到大气层的高层而被高空气流带出国界。为了研究如何遵守这一条约义务，按照第 269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 269），成立了一个“NSAM 269 委员会”，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是委员会成员之一。我一开始未参加这项工作，后来美苏之间出了问题，我也就

卷进去了。

在 1965 年和 1966 年，苏联和美国都各有至少两次试验的放射性微粒被发现于国界之外。美国政府并不想对苏联的事大做文章，只想走过场指责一下，同时对自己的事作些辩护。两国显然都不是故意违反条约。然而国会和报界的人，尤其是那些反对军备控制的人，却抓住苏联的技术事故大喊大叫，施加压力。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既不要显得对苏联违反条约的现象视而不见，又不要为我们也在违反的标准辩护。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我忙于冷战战略、航天、军备控制、防核扩散和欧洲安全等事务，很少参与第三世界的事情。但 1965 年的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曾促使我们在内部研究如何运用反扩散措施约束印度获取核武器。汤普森委员会和约翰逊委员会在 1965—1966 年都曾为此花过不小功夫。当时考虑过的方案之一是要不要给印度提供一艘航空母舰，另一个方案是帮助印度在某些非核科技领域（例如航天方面）展现它的威力。

这期间第三世界最重要的一次危机就是 1967 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六日战争。当时我们密切注视苏联的活动，但这场危机中直接涉及美苏两国的事件只有一次，那就是以色列袭击美国的“自由号”通信情报监视舰。美国军界和情报界一致认为，以色列这次对“自由号”的空袭和海上袭击是一次蓄意的和无端的挑衅，但约翰逊总统决定接受以色列姗姗来迟的道歉，说事件的原因是以色列人认错了这艘美国军舰，尽管这种说法根本不能令人置信。在处理这一事件期间，我们曾利用热线通知苏联领导人说，美国派往现场的海军飞机不会参与战争，也不会威胁那里的苏联舰船。

在六日战争末期，以色列军队向北挺进，直逼大马士革，这时苏联人通过几个渠道警告美国说，他们决不会坐视叙利亚被完全击败。但在出现任何苏联干涉的现实可能性之前，以色列就接

受了以叙战线的停火。然而在停火之前，我所认识的苏联驻美大使馆一名外交官（据悉是一名克格勃特务，下文中还将叙及）急促地打电话给我，要求 6 月 10 日（星期六）见面。这一天，他转述了苏联的警告（至少还有另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向另一名美国官员传递了同一信息）。他说明苏联的军事干涉将会是有限的，只限于保卫大马士革。他们希望以色列同意在现有交战线停火，这样，苏联的干涉就可以避免。我立即将这一信息报告了副国务卿帮办科勒，并通过执行秘书处报告了国务卿腊斯克。幸好，就在同一天以色列接受了停火，问题不复存在了。

六日战争以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邦迪要求刚就任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的沃恩克和国务院的我一起提出一项研究报告，探讨美国能有什么办法来限制美国和苏联对阿以冲突双方的军火供应。我们提出了几条建议，但注意力很快转入了一个更大的题目，即如何收拾六日战争的后果，而对苏联政府态度的试探毫无结果。

我对中东地区的惟一另一次接触，是 1968 年 12 月作为旅游者访问开罗。开罗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早在婴儿时期我就随父母离开了，到 1968 年才头一次去到那里。访问非常有趣，有一件小事反映出时代的变化：我是在尼罗河格兹拉岛上的英美医院诞生的，可是在 1968 年，昔日的这个医院变成了苏联军事顾问的俱乐部。而四年之后，苏联人又走开了。

到 1967 年，我已越来越希望到驻外第一线工作以丰富我的经验。我考虑过几种可能性，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美国驻北约使团，它当时是在巴黎，但已预定迁到布鲁塞尔。我们的驻北约代表克利夫兰大使要我去他那里担任政治军事事务参赞。早在他担任助理国务卿时，他和我就彼此很熟悉。我同意了，于是在 1968 年 2 月被派到美国驻北约使团。

这样，从 1961 年末到 1968 年初，我在国务院的处理政治军

事事务的 G/PM 工作了六年多。这期间，我与多数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盟国和中立国的驻美使馆人员的接触日趋频繁。在 1966—1967 年更是如此，因为出现了一系列的军备控制问题，苏联也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事态。我与这些外交官的谈话包括讨论美国对核不扩散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观点和立场，有关苏联各种军事发展的资讯及美国对它们的看法，苏联在中东 1967 年 6 月 6 日战争中的作用，等等。多数使馆自然都希望与国务院保持有用的联系。他们对军备控制和苏联事态日益感兴趣，而这些事情首先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以内，所以跟我的联系多起来了。当时各国使馆中，许多参赞级官员与我联系密切，其中不少人，至少有六七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又到华盛顿当大使。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类联系较少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馆，它们通常都是把联系限制在严格必要的范围以内，而且是跟国务院的相关处室来往。到 1967 年为止，我跟苏联大使馆几位官员打过几次交道，然而其中有几个人后来跟我有过比较重大的关系，他们是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维克托·康普列克托夫、尤利·沃龙佐夫和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他们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都是在多勃雷宁大使手下当参赞和副馆长，后来都在莫斯科当过外交部副部长，科尔尼延科曾是葛罗米柯多年的高级副手，别斯梅尔特内赫还短期当过外交部长。上述四人中的后三位还当过苏联或俄罗斯驻美大使。

这里还可以讲一件小事：1967 年，康普列克托夫向我抱怨说，除了国务院苏联处的官员以外，他不认识别的人，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位“有意思的人”。于是我邀请他跟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共进午餐，我相信他一定会觉得我这位同事很有意思，值得一见。此人就是布热津斯基教授，当时正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兼职。布热津斯基有几篇文章说过苏联算不上一个全球性大国，只算得上一个区域性强国，康普列克托夫对此挺恼火，因此见面

后就有意挑起争论，说除了北约因素以外，美国算不上一个“欧洲强国”。这次午餐挺热闹，尽管布热津斯基和我觉得没有什么收获。过了几年，在布热津斯基当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后，苏联外交部两个人告诉我，当布热津斯基刚就任新职时，苏联外交部一些人曾猜测他在美国对苏政策中会起什么作用，康普列克托夫说他认识布热津斯基，他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强硬。可是后来苏联人觉得布热津斯基既坏又硬，他们就把康普列克托夫的判断失误当作笑料。

60年代后期，苏联大使馆中与我联系较多而且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人，是该使馆二秘鲍里斯·谢多夫。1966年秋季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后就从国务院情报部门了解到，他实际上是一名克格勃情报员。我没有理由因此而不再见他，但我当然也得小心，每次会见后我都向上级作详细报告。从1966年秋到1970年，我的报告就有26次之多（下文中还将谈到此后的会见情形）。谈得最多的事情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会谈开始之前，1967—1968年我与他有关这一话题的交谈就有20次。当然也有别的话题。谢多夫是一个情报人员，他不仅探听莫斯科想要了解的情况，而且有时还传递一些信息或透漏一点风声。我把每次谈话内容写成备忘录，视内容情况分别送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时还分送到中央情报局。谢多夫的谈话值得注意，所以国务院执行秘书处把有关材料编成一套档案，供国务卿腊斯克查阅。我上面谈过的1967年6月中东六日战争苏联准备进行有限军事干涉的那一信息就是谢多夫传递给我的。他还向我谈了苏联方面对于1967年6月柯西金与约翰逊的葛拉斯堡罗会晤的印象，他说那是他从他的朋友、给柯西金当翻译的苏霍德列夫那儿听来的。当然，对于谢多夫提供的信息，每一次都得掂量一下那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或者只是道听途说或他个人的猜测。关于正在恶化的中苏关系，他说过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他也想从我这里打听美国官方

对中国的看法。有一次，苏联内部刊物《军事思想》对中苏论战作了有趣的报道，我把那篇文章公开转载并写了一篇评论，谢多夫感到很好奇，打听我是怎样看到那材料的。（我是从中情局看到，而且经过中情局批准将它公开转载；当然我没有告诉谢多夫，但他猜得八九不离十。）

1967年5月，当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时，谢多夫说这对于安德罗波夫来说似乎是降级。我说恐怕不是，倒像是克格勃地位升了级。谢多夫说他和他在使馆的“朋友们”也有这种猜测。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多夫说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惊奇，但他显得很高兴。我偶尔遇见过他的一两个朋友，其中一人是他的上司、克格勃驻华盛顿的站长索洛马京（当时是克格勃的上校，后来升为少将）。那是在苏联大使馆两次招待会上（一次是1967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一次是同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谢多夫介绍我跟索洛马京见面。从谈话中看出，索洛马京对苏联正规外交官（沃龙佐夫之流）与国务院官员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常与我谈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感到恼火，因为这种交往本来是几乎由他的克格勃官员垄断的，而这种垄断地位遭到了削弱。

我常与谢多夫和沃龙佐夫谈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从交谈中，我在某种程度上看出了苏联方面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有时还看出了什么是克格勃最关心的，什么是职业外交官最关心的）。在1967年，我说服了他们，让他们明白美国将最大限度地依靠本国的核查手段，从而减轻了他们原有的担忧，不再担心美国会故意用他们接受不了的现场视察来让他们难堪。我还让他们明白，美国不会为了保持现有的优势而硬逼他们接受冻结现状的做法。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我说明美国将建议把苏联针对欧洲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包括在内。他们则告诉我，他们会主张把轰炸机也包括在内（在轰炸机方面，美国占决定性优势，我们不打算

对轰炸机实行限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要求把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前沿基地系统也包括进去。谢多夫早在 1967 年 6 月就对我说过这一点,我当然在我写的备忘录中做了充分的报告。可是当苏联人在 1969—1970 年谈判初期提出这些主张时,多数美国人却仍然感到意外。

1968 年,当多数美国官员认为苏联会要求大量部署反弹道导弹时,沃龙佐夫告诉我,最后的结果大概不会是禁止反弹道导弹或大量部署这种导弹,而很可能是允许双方都作少量的部署。尽管我也写了报告,可是当苏联于 1969 年末开始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表明愿作少量反弹道导弹部署时,华盛顿多数人又是感到意外。

我在 1968 年夏季回到华盛顿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准备工作,这时,在 8 月 19 日午餐过程中,沃龙佐夫告诉我和我的同事杰克·肖说,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苏联关于确定会谈开始日期的答复。第二天我们果真收到了。

我跟谢多夫谈话的范围很广,除了工作午餐以外,还闲谈一些社会事务。1967 年,在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出逃到美国后不久,有一次谢多夫跟我闲聊时说到他五岁的女儿奥丽加看了电视转播的“美国小姐”选美活动的盛大壮观场面后十分兴奋,他只好向小女儿解释她长大后不可能当上“美国小姐”。我反问:“为什么不能?既然斯大林的女儿能,任何人都能嘛!”谢多夫并不觉得我这话那么好笑,只是勉强笑了一笑而已。只有这一次我差不多是暗示他也可以叛变过来,他则是一向很小心,从不要求我做任何不恰当的事情。

在约翰逊政府这四年期间,我除了忙公务以外,在 1968 年去布鲁塞尔以前,我还继续积极从事写作,以及出席学术会议和思想库的会议。在斯坦福大学为俄国共产党人执政 50 年举行的讨论会上,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还会见了一个俄国老人亚历山

大·克伦斯基，他在 1917 年曾在俄国一个短命的临时政府当过总理。我在 50 年代初在纽约听过他一次演讲，但只是在 1967 年这一次才跟他交谈，面晤了俄国历史的这活的一页。

1966 年，我发表了一本论述苏联军事政策的书，其内容大多是我早先发表过的文章，同年我还主编了一本论述中苏军事关系的书。写作以外，我还到一些夜校讲课，先是 1962—1963 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苏问题研究所讲课，1963—1967 年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讲课。讲课的内容是苏联政治、苏联对外政策和苏联战略。

1965 年，运作缓慢的评奖机构为表彰我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作的工作，给我颁发了国务院最高荣誉奖。不久后，我又荣获亚瑟·弗莱明奖，该奖每年颁发一次，颁给“联邦政府十佳青年”。获奖自然使我感到欣慰，但更加令我欣慰的还是国务院中令人振奋的工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景，以及在美国驻北约使团这外交工作第一线所面临的挑战。

第十二章

东西方关系的外交

冷战自始至终都涉及美国和它的盟国针对苏联及其集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包括军事措施用以慑止并在必要时防御入侵或进攻，政治和经济措施用以加强西方和非共产主义“自由”世界其他国家，以便预防苏联集团和其他共产党人的侵犯，以及政治的、心理的、经济的、有时候是秘密的措施用以削弱敌人。这些措施有时候是美国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有时候是西方（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采取的集体行动。这些措施虽然性质大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西方单方面采取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同对手进行冷战。

冷战还涉及另外一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最后是军事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至少是部分地为了加强我方和削弱敌方，但是有一个不同的特点：都是同对手一道采取的，至少要求心照不宣，但是往往是明确的、谈妥的条件，每一方都认为对自己有利。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防止冷战过热到全世界空前的核灾难。但是，在心照不宣或有限的合作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同这两个集团的继续对抗同时存在。甚至在联合国坐在一起辩论时，每一笔交易都标志着双方都承认需要考虑让对抗缓和下来，为双方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彼此吻合的利益服务。而且，自始至终都有活跃的外交接触和交流。但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这些外交接触和交流都处在最低水平。因

此，东西方关系的外交既涉及追求一致的利益，也涉及努力进行冷战。

虽然冷战是全球性的，但是它的“中心”战场依然在欧洲。同西方联盟相比，东方的苏联集团被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牢牢地控制着。西方认为，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不过是受莫斯科控制的傀儡政权，因此把它们叫做“卫星国”。这种称呼实际上比一般的理解更加贴切，因为当地的领导并不是机械式的傀儡，而是保持他们自己的利益，并留有追求自己利益的余地，当然严格限制在苏联基本利益划定的范围内。实际上，在这些国家中，有两个国家逃出了苏联控制的范围。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元帅于1949年成功地冲出苏联集团。后来，地理上孤立的阿尔巴尼亚也脱离了苏联集团。

西方国家欢迎铁托的背叛，但是南斯拉夫依旧是一个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加入西方联盟。20世纪5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还采取各种各样秘密的和宣传性的活动，图谋削弱甚至瓦解苏联集团。特别是在1952年美国竞选总统期间，许多人在政治上高谈阔论超出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范围，说什么要解放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但是，1953年6月东德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民众起义时，西方并没有援助示威者，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1956年10—11月苏联军队血腥镇压匈牙利大规模全国性起义时，西方也没有支持“自由战士”（西方对叛乱分子的称呼）。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单靠内部起义不可能推翻苏联集团，西方不会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支援东方的民众起义。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派共产党人政权并不向苏联集团的权威挑战，但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内部自由。即使如此，苏联的领导人仍然认为，这种内部自由是危险的，于是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出兵干涉，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派共产党政权。

冷战初期好战的反共意识形态就这样被实践软化了，变得更

加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共产党人颠覆西方和苏联进攻西方的威胁消退了。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期的失败表明，西方支持颠覆东方的前景也消退了。从来就没有指望过通过西方直接干涉去解放东方，1953 年和 1956 年证实了这种情况。欧洲的分化是冷战世界中新的现实。

在冷战的后半段时间里，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后期，西方通过关系正常化，图谋鼓励包括苏联在内的苏联集团国家逐渐演变。把“卫星国”看成是真正的国家，而不仅仅是莫斯科的傀儡，同时避免可能招致苏联镇压的任何挑衅行为，希望它们实际上会变成比较自治的国家。把它们包括在泛欧机构内，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会变成欧洲国家，而不仅仅是苏联集团的国家。这种做法符合西欧国家的胃口。

美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既鼓励内部自由化，也鼓励对莫斯科闹更大的独立性，奖励认为比较自由的国家（例如波兰）或比较独立的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影响很有限。主要的因素是贸易关系，特别是给或者不给非歧视性最惠国待遇，但是这项政策也适用于文化交流和关系正常化的其他方面。西欧更多地依靠正常化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影响来争取得到希望的效果。美国许多人高谈阔论在东西方之间牵线搭桥，而西欧则注重真正的接触。对于美国来说，苏联集团是一个附属于苏联的联盟。对西欧来说，中欧和东欧的国家虽然处于共产党人的统治下，但是仍然是欧洲的一部分。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政策目标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不同的做法确实引起一些摩擦，这些摩擦是由于在缓和国际关系和构筑泛欧安全合作方面更大的欧洲利益产生的。

因此，对于美国和它的盟国来说，东西方关系的外交不仅包括同东欧集团国家的关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北约内部的

外交。

1968 年初期我去布鲁塞尔的时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准备迎接它的第二十个年头。更加重要的是，1967 年 12 月北约部长级会议通过一份关于这个联盟未来任务的报告，即所谓哈梅尔报告，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该联盟的两个“支柱”是防御和缓和。防御虽然主要依靠联盟成员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也包括威慑和防御所依赖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控制。它的基础作用是加强冷战对抗的防御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缓和虽然同防御是一致的，但是也超出它的范围，要理解东西方关系的外交，避免单纯军事对抗可能引起的危险，以及不断谋求找出同对手利益一致的领域，来补充有效的威慑和防御。缓和的最低目标是保持冷战不变“热”，最高目标是减少和消除冷战的对抗。这两个目标都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缓和的新重点反映出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即东西方关系的外交可能有助于减弱冷战。

与此同时，这个联盟的防御支柱现代化了。1967 年 12 月北约部长级会议还通过一份修改过的军事委员会（MC）指示，代号为“MC—14/3”，用于指导北约的军事计划。美国从 1962 年以来一直都在推动制订的这份新指示，正式把北约的基本军事思想从大规模核报复转变到“灵活反应”，这种反应同敌方进攻的性质有关，最初用常规部队来对付常规进攻。美国并不想在中欧和西欧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不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华沙条约发动一场有限入侵，欧洲盟国也不是真的要美国去扔几千颗原子弹。但是欧洲人感到，扬言立即（或者至少是早一点）使用美国核武器，可以最有效地慑止苏联的进攻。而美国人更加担心的是，威慑一旦稍有失灵，就可能引起一场通过劝说苏联领导人停止有限侵略本来能够避免的核灾难。灵活反应加上一种恰当的支持军事姿态，正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们这些人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也正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从 1961 年以来一直在不

倦地努力奋斗的目标。 MC—14/3 通过时，麦克纳马拉参加了他离开国防部前的最后一次北约会议。在 MC—14/3 中，“灵活反应”是一种折衷办法，使用核武器要等盟国作出明确反应，但是重申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进攻。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种新的思想排除了逐步升级，而美国人对这一点心里非常有数。但是，直到 1990 年冷战结束之前，这种折衷办法一直是防御支柱的主要依靠。

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北约（和美国）的威慑论“起了作用”。来自苏联档案和回忆录的所有证据都证实我们有些人当时的看法，即苏联领导在冷战期间始终没有打算对西方发动军事进攻。因此，威慑充其量不过是加强了苏联的认识，即战争的危险和代价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肯定地说，这种加强认识的作用也许是深谋远虑的。在没有苏联进攻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这种作用有助于阻止可能更加冒险的苏联行为。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威慑政策的主要好处不是劝阻苏联进攻，而是安抚西欧国家。

我在前面一章已经说过，在 1966—1967 年，美国正在全力以赴处理的问题是，维持我们在欧洲的常规部队。需要这样做的原因是，有助于保持灵活反应态势，使得有矛盾心理的盟国不至于通过自己裁军来削弱这一态势。没有办法完全弥补法国收回自己的领土和不参加北约军事计划造成的损失，但是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西德，法国仍然是这个联盟的成员。（法国退出军事委员会才有可能通过 MC—14/3。）在这一章的后面，我将讨论军事和政治因素的结合，这种结合导致把军事力量水平的问题纳入东西方关系的新外交中。

关于北约防御支柱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事态发展是，1966 年底最终放弃了多边核力量的主张，代之以成立核计划小组。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协商机构，满足盟国参加核计划的

兴趣；提供一个论坛，使他能够向盟国的代表通报情况和进行说服。（最初，这个机构被广泛地叫做“麦克纳马拉委员会”。）核计划小组成立后，英国和德国很快就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小国派轮值代表参加核计划小组，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麦克纳马拉参加过核计划小组的头两次会议，一次是 1967 年 4 月在华盛顿，另一次是 1967 年 9 月在安卡拉。我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几次会议，麦克纳马拉在会上极力提供关于美国和苏联核武器和核计划新的、令人感兴趣的详细情报。开展了三项重要的研究。第一项是研究核地雷，它能够沿前线地区布雷（或者在危机或战争时期快速布雷）。土耳其人一开始就很感兴趣。德国人也很感兴趣，但是不希望给人留下东西德永久边界的印象。第二项是研究有限数量战术核武器部署的时间、范围和目标，这是灵活反应和控制升级的核心问题。毫不奇怪的是，这项研究继续了好几年（包括我在布鲁塞尔的时间），但是从来没有完全解决。盟国甚至不愿研究广泛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除了最初要求非常有限的“示范性”使用以显示决心外，对任何事情都是三心二意。最后，我们列出许多一般性选择意见，没有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

核计划小组的第三项研究是反弹道导弹在欧洲可能的部署。这项研究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来的，在安卡拉会议上讨论过，按时结束后递交 1968 年 4 月在海牙举行的核计划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我参加了这项研究，1967 年的身分是专家，1968 年的身分是美国驻北约使团成员。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领导这项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欧洲来说，在可以预见的技术条件下，反弹道导弹防御“目前从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来看都是不值得的”。

核计划小组关于反弹道导弹在欧洲可能的部署这项研究，对考虑在美国部署反弹道导弹以及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都是重要

的。麦克纳马拉以及美国参加核计划小组的人当然都很清楚这种联系，利用它让北约作出我们喜欢的决定，支持华盛顿的立场。1967年9月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决定对中国采取“轻型”防御。核计划小组认为，美国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同欧洲防御没有关系。核计划小组得出的结论说，两个超级大国部署反弹道导弹“不可能打乱它们之间总的战略平衡”，如果保持“轻”部署，那么对可能的军备控制谈判不应该产生严重不良的政治影响。但是，对麦克纳马拉来说，最重要的是，核计划小组的结论说，美国“重”部署反弹道导弹可能会促使北约强烈要求建立欧洲系统，这可能是有争议的，而且是“滥用资源”。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有这种保护而欧洲没有，那么可能会引起怨恨。

麦克纳马拉离职后，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代表美国参加了核计划小组的第三次会议（1968年4月在海牙举行）和第四次会议（1968年10月在波恩举行）。继任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参加了第五次会议（1969年5月在伦敦举行）和第六次会议（1969年11月在弗吉尼亚的沃伦顿举行）。我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海牙、波恩和伦敦举行的会议，然后离开核计划小组以及在北约的大部分其他职务，前往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几届美国政府和几任国防部长的领导下，同军事计划中的灵活反应思想一道，核计划小组证明自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支柱”一个有用的因素。

我发现，核计划小组部长级会议是令人感兴趣的，特别是对于国防部长和参谋周围的附带行动来说，他们同外交部长有共同的保护利益。我喜欢同丹尼斯·希利交谈（不仅因为他曾经对我的一本书写过书评）。同我们的防务官员相比，关于威慑和东西方政治军事关系的性质，他的观点不那么机械。

关于缓和的第二个支柱，北约谨慎行事。许多西方国家已经采取并继续采取行动。戴高乐总统在退出北约军事联盟的同时，

1966 年开始双边努力促进缓和东西方关系。1966 年后期西德组成广泛的联合政府后，开始了以缓和为导向的东方政策。

在美国，约翰逊总统在 1964 年开始但在 1966 年更加一贯地对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采取缓和政策。1964 年 5 月 25 日，约翰逊发表讲话，呼吁同东欧国家“建立桥梁”，但是没有详细阐述或坚持到底。美国对东欧没有政策。一个多星期以后，即 6 月 3 日，发布了国家安全备忘录 NSAM 304，呼吁研究对东欧国家区别对待的标准，作为政策的基础。但是，这项政策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在 1966 年 7 月 8 日发布的 NSAM 352 中明确表达出来。这一次，这项政策已经发展了，而且（主要由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起草了一个讲话。约翰逊总统于 1966 年 10 月 7 日发表的讲话，除了再谈建立桥梁外，还呼吁同东欧国家和苏联“从狭隘的共存思想转变到更加广泛的和平共处”。^①

要求同东欧国家和平共处和建立桥梁，决不是代表一条软弱路线。苏联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东欧的霸权提出挑战，于是立即作出消极反应。这是用缓和来进行冷战。但是，美国的新政策并不排除同苏联缓和紧张关系，至少是间接地鼓励这种可能性。虽然这个讲话不包括这些话，但是这项秘密政策已经确定，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帮助创造一种可能和平解决德国和欧洲分裂的环境”。约翰逊总统于 1967 年 1 月 10 日发表国情咨文，大胆提出目的是结束冷战。

北约在意见越来越一致的时候，委托比利时外交大臣皮埃尔·哈梅尔提出这份报告。前面已经说过，1967 年 12 月 14 日通过了这份最终报告，通常简称“哈梅尔报告”（其实它是集体起

^① On U.S.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including the texts of the two NSAMs cited here, se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vol. 17, *Eastern Europ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 1 - 79; NSAM 304, p. 12, NSAM 352, pp. 54 - 55.

草的，标题是“联盟未来的任务”）。哈梅尔报告说，在联盟建立以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盟已经承担起新的政治任务。”在重申需要威慑和防御的同时，明确规定联盟的其他任务是“争取建立一种更加稳定的关系，使得重大的政治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以便促进缓和东西方关系”并最终解决欧洲问题。^①

就在我们从两个支柱的高谈阔论转向面对我们所说的问题和联盟现在要做的事情时，我来到布鲁塞尔履行新的任务。我已经说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防御支柱的重要新措施正在顺利实施中。但是关于走缓和新路开头采取什么措施，一点也不清楚，或者说意见不一致。我还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務：在美国驻北约使团早就成立的政治小组和军事小组中间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军事小组”，确定我当组长的作用。由于整个使团的工作都是处理政治军事问题，所以要确定我当组长的作用同样也是困难的。关于我和我的新小组应该做些什么，克利夫兰大使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所以我们处事重实效。核计划小组的参谋作用，虽然在有些方面也是政治军事的，但是显然属于防御顾问蒂姆·斯坦利的职责范围（而且他还有“国防部长驻欧洲代表”的头衔）。所以在核计划小组中，他继续正式代表美国，由他的参谋处理大部分工作；而我是候补美国代表，我的参谋也积极参加。大多数“裁军”问题，作为政治顾问委员会的一个协商题目，开头仍在政治小组讨论。但是，这个新的、重大的行动题目指定在我的小组进行讨论：在共同裁减欧洲常规部队问题上确定联盟立场（最初叫共同裁军，但是大约一年以后改称均衡裁军，强调联盟决定任何裁军都必须是“均衡”的）。

我在华盛顿参加了美国对这个题目的开头研究，1967年10

^① The Harmel Report is available in many sources; for example, *NATO Final Communiqués*, 1949–1974 (Brussels: NATO Information Service, 1975), pp.195–202.

月准备了一份文件。但是，对联盟没有提出任何授权的美国立场或建议。我们在北约的工作在 1968 年头几个月刚刚开始。1968 年 6 月，北约部长会议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在没有其他倡议的情况下，尽管当时的准备工作很有限，但是会议决定要求提出“导致共同裁军的过程”，这时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工作虽然在继续，但是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就慢下来了。

关于苏联是否有兴趣谈判共同裁军，联盟中有些人抱有希望，而有些人则是没完没了地担心。但是，这种前景并不是联盟注意这个问题的惟一理由，对许多人来说确实不是主要理由。美国政府和一些盟国认为，提倡共同裁军就是主要目的，不管这种提倡会不会导致谈判，也不管谈判会不会导致达成协议。理由是：可以用联盟支持共同裁军来打消美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单方面裁减美国驻欧洲的部队。实际上，为此目的而提出共同裁军想法的许多人都希望苏联会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华沙条约同量裁军仍然没有理由要北约特别是美国大裁军。1968—1969 年我们在北约的研究是根据按比例裁军；华沙条约现有军队多，就应该多裁。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北约改变主意，仍然要求华沙条约多裁军，以抵消华沙条约在增援方面的地理优势等因素。但是，问题仍然是死死地抱着只考虑军队数量这种狭隘思想，有人把这种狭隘思想讥讽为“数豆子”。

在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大约 3 个月以后，1968 年 11 月 20 日，我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克利夫兰大使。我在备忘录中试图说明一个更加大胆的设想：共同裁军谈判可能在东西方关系外交中起作用；如果早一点进行谈判，那么至少已经起了这样的作用。我在备忘录中是这样写的：

总的趋势认为，这个题目至少有点裁军空想主义的味道。我们对这个题目的分析（特别是但是不仅仅是军

事分析)集中在基本上是细小的危险,完全忽视了可能的重大收益。几乎不知道影响军力对比的两种传统办法(增加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并不是影响力量对比的惟一手段。经过深思熟虑的谈判达成协议,至少是能够想得出来的第三条道路。达成这些协议有没有现实可能性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而且前景也不是非常鼓舞人心。尽管如此,还是要探索有没有一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这是惟一的办法。我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乎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现在不来争论这一点,但如果我们当初同意共同适度限制驻中欧部队,那么在不违反同我们签订的国际协定的条件下,苏联就不可能建立一支侵略军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同美国对抗的危险也许足以阻止苏联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换一种说法,即使我们在北约中央战线增加几个师,也绝对不会打消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念头;但是,如果签订一项协定,冻结苏联军队在每一个国家的数量,包括不在捷克斯洛伐克驻军,那么这项协定早就起作用了。现在谈共同裁军当然太晚了,因为苏联人肯定看透了:如果他们要把自己的集团捏在一起,就不能放弃在自己集团内部选择使用武力。如果我们当初冷静地把共同裁军看成是限制苏联行动自由和稳定东西方均势的一种办法,那么我们实际上也许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相反,大多数提倡者以及大多数怀疑论者普遍认为,共同裁军只对苏联人有好处,限制了我们自己在理论上的行动自由,其实这种行动自由不过是想去建立联盟决不会建立的军队。

在以后的几年里,北约继续研究共同裁军和共同均衡裁军,

但是直到 1972—1973 年才采取真正的行动。从 1973 年到 1989 年，我们在共同均衡裁军问题上进行了毫无结果的对抗性谈判。我并不是说一个更加抱合作态度的西方立场一定会导致缔结协定，很可能不会。苏联更加感兴趣的是，在欧洲保持常规部队数量上的优势，使东欧不同西方作出任何合作安全安排。但是北约也太谨小慎微了。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北约注意的大多数“政治军事”问题还没有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外交，而是涉及西方内部关系的外交以及支持联盟的防御“支柱”。虽然 MC 14/3 中提出的灵活反应论被重新证实了，但是它过去是（而且继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要立即采取行动的问题。法国退出北约联合军事司令部确实需要许多后勤的、基本建设的、军事计划的以及心理上的适应。（北约的政治总部被迫从巴黎迁到布鲁塞尔，也需要结构上和心理上的调整。刚迁址我就到任了，但是也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关于从巴黎迁到布鲁塞尔的心理调整，我的一位欧洲同事狡猾地说：“好像是搬过来同你爱的女人的姐妹住在一起。”）自己在处理这种调整中的直接作用是非常有限而平凡的：我继承的一个“政治军事”问题是，北约被迫迁址，向法国要求经济索赔。其他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包括日常民用紧急计划、北约演习以及设计更好的危机协商程序这种挑战性任务（很快受到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这场危机的考验）。我代表美国参加了地中海安全问题的研究。1967 年 6 月爆发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随后苏联派出一支海军中队常驻地中海，因此地中海安全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其实，美军水平问题很少涉及北约同华沙条约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主要牵涉到我们的欧洲盟国为保持美军在欧洲的水平而提出的支付平衡补偿问题。我还参加制订联盟内部基本权利等问题的谈判政策。首先，政治和军事“协商”是中心。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所有成员国都有一份混合纪录，记载着

建议我们的盟国在外交关系和军事行动方面现在做什么或计划做什么。有时候（不是大多数情况），我们确实事先同我们的盟国商量过，目的是为了在我们作决定前了解他们的反应并听取他们的建议，往往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我们决定要做的事。当我们没有商量时，那么最好是在采取行动前把美国单方面的决定通知我们的盟国。最不满意的是对决定或行动事后作解释或者甚至不作解释。尽管“协商”破裂或失败会产生许多缺点和摩擦，但是北约总的情况仍然很友善。如果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多数双边关系可能会糟糕得多。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和后期，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是核不扩散条约的谈判。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谈判在几个级别上进行，裁军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广泛的多边谈判最引人注目，但是最不重要。关于联盟内部的磋商，一部分在北约进行，但是大部分在北约几个主要国家之间双边进行（特别是美国同德国，还包括美国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还有东西方谈判（主要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同苏联的谈判作为有限的补充，但是不同华沙条约其他国家进行谈判）。核心依然是美苏谈判：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比尔·福斯特和苏联大使阿列克塞·罗什钦在日内瓦谈判，国务卿腊斯克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谈判，以及偶然会见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美国只是一般地向北约通报情况，而向德国和英国的通报要充分得多。但是，直到 1966 年 12 月我们同苏联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同时我们决定放弃多边核力量），美国才真正同我们的盟国商量首先是关于可能的未来欧洲核关系的关键方案。北约内部协商以及双边协商此后一直没有进行，直到 1968 年 7 月签订核不扩散条约为止。

我当然不拿北约在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的协商作为范例，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在东西方外交的真实世界里可行的单方面行动和协商行动的实际结合。在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的协

商过程往往是困难重重的，在美国没有说出全部实情（这是真的）以及也许不保护欧洲利益（情况并非如此）时，就产生摩擦和怀疑，但是首先因为欧洲人自然希望自己来确定他们的利益以及保护他们的方法。然而美国是唯一可行的同苏联认真谈判的对话者。苏联最关心的是，西德如果不通过多边核力量也许会通过其他途径间接获得核武器。德国主要关心的是，不成为欧洲核伙伴英国和法国永久歧视的对象。欧洲普遍关心的是，不排除可以想象的西欧统一，包括继承两个欧洲国家已经享有的核地位。美国希望把苏联和其他国家束缚在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严格协定中。所有这些担心在多边核不扩散条约的协议中最后妥协解决这个问题时都消除了。

打破冷战造成的东西方关系僵局的第二艘破冰船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的缓和旗舰，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当然可以理解，只有美国和苏联才能够谈判各自的战略武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如果达成协议，会是双边的。但是，美国的北约盟国认为：他们的安全首先取决于美国的战略核威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他们和美国同样重要。慑止苏联进攻美国的最终战略威慑肯定是持久的，但是欧洲盟国担心，达成协议的限制可能有点损害欧洲安全所依赖的扩大威慑。因此，欧洲人认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自己的安全利益至少同美国的安全利益一样需要得到可靠的保护。此外，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本身就倾向于承认：即使没有达成协议，也会出现战略核均势。战略分析家和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早就预见到，一种有效威慑均势和相互威慑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西方公众和许多官员还没有习惯这样一种思想：他们很长时间以来能够依赖的美国战略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当然，不管有没有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实际情况都会是这样。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反映美国接受这种转变，似乎承认苏联的战略地位已经提高。

北约盟国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实际上，大多数盟国欢迎这种会谈，因为如果苏联准备达成协议，那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途是实现真正的军备控制，即抑制军备竞赛和使威慑稳定化。有些人还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战略措施，用以补足它们在欧洲安全安排中希望看到的东西。最后，有些人很高兴看到：如果苏联也愿意的话，美国准备开始限制和裁减军备的过程。虽然盟国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态度不同，有的只是接受，有的则热情支持，但是实际上它们全都希望通过真正的协商参加这个过程。核不扩散条约最终取决于欧洲国家的接受，有些欧洲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还需要通过联盟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订的协定将是双边的。美国不需要盟国参加也能够达成并执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当然美国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联盟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的协商程度完全取决于美国决定干什么。

这就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成为联盟协商关键考验的原因。我已经提到过，1967年3月第一次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当时在北大西洋理事会上第一次由专家们介绍情况，很受欢迎。1968年8—9月计划安排的协商停顿下来了，等待美国确定立场并同意开始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推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后，协商又中断了。我还说过，在即将离任的约翰逊政府最后一个星期内，1969年1月，他的继任者取消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原则和目的”的临时协商。因此，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最初几个阶段的协商是很复杂的。1969年6—7月，当美国政府提出研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它的初步立场时，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三次会议上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战略均势问题。我还主持了两整天由高级政治顾问参加的专家会议。1969年11月在赫尔辛基同苏联方面开始初步谈判前，由杰拉德·史密斯大使率领的美国代表团高级成员首先飞到布鲁塞尔，向北大西

洋理事会介绍情况。所有北大西洋理事会常驻代表都欢迎我们的协商，欢迎我们很坦率地说明了美国方面对未来谈判的探索性立场，但是他们也希望在许多问题上听到更加详细的情况。为了满足这种兴趣，我又主持了一次专家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后，代表团写了一份关于会议结果的报告，后来史密斯大使和我前往布鲁塞尔向北约代表介绍情况，我又圆满地回答了北大西洋理事会政治顾问和来访的北约专家提出的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举行了七次会议，在每次会议前后和谈判性质需要时都用这种方式介绍情况。从 1969 年 6 月到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临时协定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签字后的 1972 年 6 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向北大西洋理事会口头或书面联系 45 次，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高级成员向北大西洋理事会介绍情况 22 次，举行详细的专家会议 6 次。我参加了 21 次情况介绍会，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高级代表的身份参加其中的两次情况介绍会（包括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临时协定签字后的最后一次情况介绍会），主持了所有的专家会议。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商是非常成功的。20 世纪 70 年代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中远程核力量谈判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期间，都进行过类似的交流。如今，这个过程是例行的。但是，从 1969 年到 1972 年，很需要建立盟国对美国的信任。关于盟国的特殊利益，实际上美国已经确定或修改了自己的立场以反映他们的偏爱。例如，我们一开始就谋求限制苏联针对欧洲的中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更重要的是，我们拒绝了苏联想限制美国设在欧洲基地的前方系统的一贯企图（在盟国的同意下，为了支持这种立场，我们放弃了把苏联中程导弹包括在内的努力）。

当然，协商过去是（现在还是）双向的。美国和北约盟国都

不准备协商所有的问题，也不准备承诺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行动。但是，双方都准备协商范围广泛的问题，首先是协商联盟目的最核心的问题，这种态度是重要的，有助于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力和成功。1968年12月，我就协商问题写给克利夫兰大使一份备忘录。我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有种种缺陷，包括在协商范围的缺点，但是同任何其他国际的、多边的政治组织相比，肯定它取得的成就更大。”

一个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否应该把协商范围扩大到北约以外？扩大到什么程度？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致同意的意见是，无论从联盟的保护范围还是从协商范围来说，北约都不包括成员国的殖民帝国。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北约成员国，特别是美国，卷入世界事务都同北约有关。越南是一个首要的例子。中东是另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它涉及北约几个国家以及苏联往往是背道而驰的立场。常常使我吃惊的是，许多美国政治人物特别是强硬派认为，所需要的一切是“美国的领导”和行动主义，让联盟超越欧洲地区在全世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便更加有效地进行全球冷战。这些人不知道，欧洲人不想卷入全球讨伐，不想卷入越南战争，或者说得挖苦一点，不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在冷战期间企图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扩大到欧洲地区以外，往往只能削弱而不是加强联盟的团结。

我注意到，除了制订“北约政策”和树立一种联盟观点的精神（以及在盟国外交部培养一批“北约专家”）外，还有一种趋势：不那么明显、不那么自觉地把北约的团结归因于苏联对手。毫无疑问，苏联领导人企图在北约成员国中间挑拨离间，希望削弱这个组织。但是，这不过是苏联的常用战术，而不是苏联的中心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安全，扩大自己的势力。北约是一个对手，是美国势力的主要延伸，经常是苏联行动的障碍。

但是“分裂这个联盟”本身并不是苏联压倒一切的目的。苏联有时候把北约看得并不那么坏，例如，同拥有核武器的西德或者甚至同美—德联盟相比，宁可要北约。

北约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它自身内部的安全。美国政府、北约其他成员国政府以及联盟组织这种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对北约总部及其成员国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渗透。这种情况必然限制向整个联盟提供敏感的情报或政策，但是还没有严重到阻碍协商和提出联盟组织的共同立场或行动。

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对北约进行的大量情报渗透（以及对北约成员国政府进行的许多情报渗透）曾先后得到揭露。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北约总部所在地巴黎的奥利机场武装部队信使中心工作的美国陆军中士罗伯特·约翰逊，把他经手的一切情况都透露出去了，包括柏林应急计划和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位置。后来，另一名美国陆军中士克莱德·李·康拉德在1975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里把许多机密的北约军事文件也透露了出去。让这些低级军事人员接触机密文件，是他们当间谍的关键原因。

当我在布鲁塞尔的时候，北约总部财政部长土耳其人伊姆雷·纳希特，能够从北约中央档案馆弄到许多文件，把它们交给罗马尼亚情报员。1968年9月他被捕时，在他的公文包里竟然发现多达1440件机密的北约文件！我参加了美国和北约对他透露机密文件的性质、范围和后果正式进行的“损失估计”。在审查纳希特透露材料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虽然我们不希望华沙条约得到这些材料，但是这些政治的和军事的文件显然证明，北约确实只打算采取防御行动。由康拉德交给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员的甚至更加敏感的军事文件也说明同样的情况。1990年，匈牙利军事情报的新头目雅诺什·科瓦克斯将军说，情报渗

透实际上有助于改善东西方关系。他说：“令人感兴趣的相反结论是，康拉德的情报有助于证明北约没有进攻计划，这就使头脑清醒的人去重新估计局势，并提出新的措施。”^①

苏联情报机构非常相信文件材料，利用它控制的间谍以及通过东欧情报机构，能够反复核实北约总部及其大多数成员国政府的目标。因此，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用于反复核实情报的、能够信任的系统。

我不能说美国是否通过北约渠道进行过成功的假情报活动，利用多渠道提供假证实。但是，我能够说，我们往往给盟国提供真实的情报，同时意识到莫斯科几乎肯定会知道。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提供的情报肯定会泄漏给苏联情报机构，因为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知道我们打算或准备做什么。我们也知道，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通过秘密手段获得的情报，特别是有效的文件材料。

当然，秘密情报和假情报是双向的。我们主要依靠技术性的情报收集，包括使用飞机和卫星侦察，不那么依靠间谍。我们主要收集苏联和华沙条约军事力量的情报，很少关心他们的意图。

1968年9月我从华盛顿回到布鲁塞尔后发现，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有人担心苏联可能会进一步军事干涉东欧。当然，即使我们认为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干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但是考虑对这种行动采取应急措施是合适的。此外，国务卿腊斯克和其他高级官员警告多勃雷宁大使等人说，这种行动将对美苏关系和东西方关系产生不利的影 响。我积极参加了北约的应变计划和协商。虽然大多数北约官员和他们的政府合理地估计了苏联干涉东欧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仍然过分惊恐，甚至害怕苏联可能对奥地利或西方采取军事行动。这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的过分反应。

^① Cited in “Spy Credited with Improving East - West Ties,” Associated Press release,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1990.

我在 1968 年 11 月 19 日给克利夫兰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叙述了这种惊恐倾向。我对他说，在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部长级会议上，北约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说：“（同华沙条约增加军事力量相比，）更加重要的是，作出入侵最后决定的那种突然的、甚至不顾一切后果的方式引起对未来的深刻担心。我认为，我们现在察觉到一个更大的危险，苏联人冲动的、无理的推进可能对我们大家造成严重的后果。”我坚决反对这种估计。我说：“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作这样的估计是错误的，对苏联未来行为作这样的估计也是错误的。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勉强地、极度痛苦地、深思熟虑地作出决定的结果。从苏联长远利益的立场来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一种错误，但是肯定不是不顾一切后果的、冲动的或无理性的。”我说，北约各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们以及在华盛顿的美国情报分析家们都认为，苏联新的干涉论（很快就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事后努力为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辩解，而不是指导苏联的未来计划和行动。”我的论点是：“苏联领导人现在同过去一样，处处表现出是理性的、谦虚的、谨慎的和克制的。”我用比平常更加挖苦的口气进一步评论说：“当然，我们可以故意夸大苏联的威胁，然后在它没有出现的时候，再来称赞已经防止了它的发生……但是，如果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应该知道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军事威胁的估计也继续被夸大了，虽然没有归因于危险意图这种倾向那么严重，但是助长了全面夸大这种威胁。部分原因是，北约一些伙伴坚持夸大这种威胁，目的是为了支持军事预算。还因为我们谨慎地不提供可能会暴露敏感收集能力的美国情报，除非我们冒着为了说服他们而泄漏情报来源的风险，否则他们是不会接受这些情报的。

在我到达布鲁塞尔以后不久，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以

前，我试图获得秘密发给北约盟国的一些情报，但是遭到了拒绝。特别是，我想得到从盘问捷克高级叛逃者简·塞吉纳少将获得的情报，他起初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后来，为了延长对他透露情报的兴趣，特别是在他公开“暴露”以后，他夸大或捏造西方对话者急于获得的情报。）我知道，形势不利于提供我所要的有限的情报，但是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值得做的。

几个月内，北约回过头来照常工作，开始研究共同裁军。顺便提一下，纳希特的背叛也许至少是一时地误导了苏联人。1968—1969年按比例共同裁军的研究材料就是他交出去的文件之一。但是，1973年开始共同均衡裁军谈判以前很久，按比例裁军的方案早就抛弃了。我肯定，华沙条约继续会获得透露北约改变立场的材料。

当克利夫兰大使和他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人出席1969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部长会议时，我是驻北约使团的临时代办，大约10天时间。也许这是北约总部比较悠闲的一段时间，因为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去庆祝北约成立20周年了。我利用这次机会发出一份电报，详细报告在北约一次临时代表会议上的假想交流（大使是常驻代表）。我在这份几页的电报里，给代表们取了讽刺性的名字，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日常工作进行聪明的巧辩以及大量的讽刺和嘲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而不是过分冒失的话，那么这是做得相当好的。这样做是否恰当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必须承认，这是很成问题的。我以使团代理团长的身分签署的这份电报发给了克利夫兰大使，也发给了国务卿（因为所有的电报都发到国务院）副本发给所有美国驻北约国家首都的大使馆。电报的标题是“美国驻北约总部使团是充满活力的、很健全的，居住在布鲁塞尔”。我发出这份电报供“有限的官员使用”；“不给外国人看”以免把一份不保密的电报泄漏给新闻界或我们的盟国。毫无疑问，我嘲弄别国代表的独特性和倾

向性，一旦泄漏出去就会冒犯一些盟国。令人惊奇的是，这份电报没有泄漏出去（但是，北约在布鲁塞尔的一些同事实际上知道有这份电报）

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上司的申斥。但是，我用不严肃的口气对待严肃的工作，克利夫兰大使对此很不高兴。我知道，国务院有几位高级官员是不欣赏我的做法的。另一方面，许多低级和中级的外交官以及一些高级外交官都对此十分高兴。许多人向我祝贺，甚至在许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

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这件事很可能做得不对（或者说不明智）。但是，我相信，在正确处理通常严肃的问题方面，这件事还可以补救。无论如何，虽然我在发出这份电报时作出的判断也许不是最好，但是我相信，我作为临时代办采取的另一个行动对此作了补偿。国防顾问办事处的一位军官前来见我，他对一个技术性的但是并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表示很担心。如果我们得不到国防部长（当时他正在欧洲旅行）的授权在几天内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就要损失 2500 万美元。这笔钱本来是供北约的一个基本建设项目用于在空军基地建造飞机库（1967 年，以色列空军很容易遭受埃及空军的袭击，于是我们才提出这个计划），但是不准备花了。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美国就不能收回这笔钱。要不是美国使团出面，那么直接同国防部长联系，得到他的批准，根据他的批准行事，不用通过通常规定的渠道，会被认为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有些人会认为我越权了。在这件事上我毫不犹豫，通过信使把这个问题摆到国防部长面前，请他批准，根据他的批准由北约执行。我们没有错过最后期限，为美国政府节省了 2500 万美元。因为这件事，后来我受到了表扬。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二十周年大会，是继续保持北大西洋联盟的机会。这一次不是规定继续十年或二十年，而是联盟无限期延长。甚至法国也不反对。回

想起来，似乎顺理成章的是，1969年北约本来就应该一致重申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从1966年到1968年，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法国的部分“背叛”以及缓和的新动荡是否会使这个联盟的前途很不明确。不管怎么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驱散了残余的疑团，保证联盟顺利地无限期继续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我在北约的工作，虽然在1968年和1969年由于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中断过，但是我发现是值得做的。美国驻北约总部使团，尽管有哈伦·克利夫兰的活跃行动，尽管比大多数大使馆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华盛顿制订政策的过程中不过是一个次要的角色。除了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的直接军事计划外，美国使团参加了北约所有的活动。它同美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以及其余驻布鲁塞尔的非北约外交使团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同盟国代表共事很有兴趣，日常外交比双边大使馆的活动更加广泛。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许多北约盟国同事另有任用，其中有几位担任驻华盛顿大使。我还有机会（特别是因为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直接同北约秘书长曼利奥·布罗西奥共事。我已经说过，使团（和我）参加处理过范围广泛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令人很感兴趣，有些工作很重要。

虽然政策在华盛顿制订，但是体验实地执行政策是很有用的。虽然处理西方联盟内部关系花费了我们的大部分精力（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但是中心问题仍然是东西方关系的外交。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并统治着70年代的新挑战是缓和，这时正式成为北约联盟的“第二根支柱”。我于1968年11月20日写给克利夫兰大使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关于缓和的幻想：从捷克事件吸取的一些教训”，阐述了我的思想。缓和很快就要发展起来，可惜我的备忘录没有起到什么促进作用，但是它精辟地阐述的做法被尼克松总统采纳了，后来称为“强硬的缓和”。我相信它值得引用几段：

缓和倒退了。但是，什么是缓和？对我们来说，缓和“倒退”了是什么意思？

苏联粗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关于苏联致力于缓和的任何幻想。有些人过分着急、过分乐观地指望早日改善东西方关系。实际上，我们在北大西洋理事会偶然听到有些话似乎反映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指望。毫无疑问，这些幻想还会复活。

在我看来，情况似乎是这样，对缓和最普遍的幻想是，倾向于把缓和与有关各方的热情和友好等同起来。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会用惊奇的眼光来看待受苏联人蒙骗的危险。如果这就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那么过去有、现在还会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意识到，对手之间能够冷静地订立所谓缓和措施，而不是一定要朋友拥抱，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避免这些危险。

对我们来说，除了含糊不清地可能改善态度和关系外，过去有、现在还会有缓和的机会。我真的认为，我们已经严重地、不必要地限制自己用使东方失败的方式大力进行缓和。从根本上来说，同北约相比，苏联帝国的基础很不稳固。

关于这一点，苏联人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他们攻击建立桥梁的想法，凶相毕露暴露他们心虚。在我们的眼界很有限的地方，他们把各种玩世不恭的企图都归因于我们。总的来说，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过于保守，看不到缓和政策有进攻潜力的真正可能性。在推行缓和的时候，我们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自信。我们过高估计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力量和狡猾，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例如，西德（尽管最近有变化的倾向）在同东德接触的问题上

过于保守，他们本来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触并压倒东德。同样过分保守的是，一门心思防止对方分裂我们自己的联盟，而不是着手分裂真正脆弱的华沙条约联盟。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次树起推翻东欧共产主义的旗帜。这种话说得越少越好。我想的是，首先我们自己要明确缓和是什么意思，然后悄悄地但是积极地广泛推行结果对我们长期目标有利的相互支持政策。

当然，苏联人会做出反应，强烈反对我们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就代表苏联对东欧民族倾向（不是西方操纵的）作出的这样一种反应。但是，我们至少能够使用最不可能招来武装镇压的方式，鼓励、培养、援助东欧人摆脱莫斯科控制而独立的倾向以及自由化的倾向……过去要求、现在仍然要求制订一个关于缓和的战略。我的意思是说，根据纵观相互关联的各种发展来采取行动。

我首先试图勾画出一种与一般流行观点不同的方法来审视缓和。我们努力让（北约里的）人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看成是两个眼光尖锐和冷静盘算的对手努力去做成一笔互相有利的交易，而不是核超级大国升级的帕格沃什爱情聚会。我们的这种努力是沿着这条路线迈出的的一大步。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多些。

这就是我当时坚持的对缓和相当强硬的看法，特别提到东欧，但是并不排除可能同苏联相互和解，特别是在战略武器控制方面。

两个月后，在华盛顿新政府上台前夕，关于在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如何处理缓和与东西方关系外交二者之间的关系，我的想法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一次，我还是写了一份电报，于 1 月

13 日发往华盛顿。

当我们重新审视 1969 年缓和的前途和意义时，我们可能主要关注西方（首先是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而不是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努力去影响东欧国家内部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局势。这不过是承认：既然莫斯科显然决心对东欧政治运动采取强硬政策，那么影响这种运动的最好办法或许是影响那起控制作用的势力。

既然莫斯科决心使华沙条约成员国紧紧追随它自己的政治形式和政策路线，那么我们鼓励苏联演变而不是直接向它的霸权挑战，就能够最好地影响苏联和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发展。我们的政策从来就不是在苏联或东欧共产党国家之间作出选择，现在也不应该这样做，但是这是轻重缓急的问题。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去改善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但是这种努力现在实际上是影响苏联的努力的附属品，而不是企图让他们脱离苏联。在许多情况下，在苏联容忍范围内，东欧的发展比苏联来得快，走得远。看来有些反馈来自苏联内部的这些发展。但是，现在看来，只要莫斯科把东欧更快的运动看成是一种分裂的威胁，那么苏联对东欧成功演变的反应可能会延缓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发展。

很难同苏联发展有意义的缓和关系。但是，努力这样做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可能是处理对苏联政府和人民生活的安全环境真正能有重要影响的事情。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现在看来是其中最合适、最重要的事情。^①

我还用这份电报强烈要求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在下一章讨论。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于 1969 年秋开始（实际上几个月前就开始了），当时我在华盛顿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从此我很少在布鲁塞尔（通常是为了磋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才去那里）。1970 年，我完全忙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是作为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我常常回到华盛顿处理政治军事领域的其他问题。政治军事事务局是从原先的一个专家小组 G/PM 发展而成的。在以后的三年里，正是这种优越的地位，使我能够观察到同苏联缓和的发展情况，同时又深入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① “SALT and Détente,” USNATO 0130 to SecState, Washington, January 13, 1969 (confidential, 2 pages, declassified February 1, 1996). The telegram was of course sent over the name of the chief of mission, Ambassador Harlan Cleveland.

第十三章

战略武器谈判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在缓和实验中，最雄心勃勃的一件事是，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控制他们的战略军事竞赛。这两个对手打算坐到一起来讨论他们国家安全中最敏感、最关键的问题，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尼克松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呼吁从对抗时代走向谈判时代，于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就成为“开路先锋”。但是，尼克松并不想放弃他（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想法，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能对其他问题产生影响。苏联领导立即表明感兴趣，准备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并不鼓励早日开始，而是认为，苏联迫切要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心情可加以利用，办法是在其他问题（首先是越南问题）的谈判中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苏联援助联系起来。因此，尼克松 1 月 27 日在他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一方面，不应该不管政治解决有没有进展，都要进行武器会谈；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在达成政治解决之前，不举行武器会谈，或者不签订任何协定，而是应该在这两者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他解释说：“我想做的是，保证我们的战略武器会谈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候进行，即如果可能的话，同时促进（解决）突出政治问题的进展。”他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中东和平这个困难问题上的进展是一个例证，但是他最大的兴趣是越南问题。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

楚的例子是：4月上旬，基辛格直截了当地对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说，尼克松准备立即派一名谈判代表去莫斯科，商定限制战略武器的原则，条件是同时在莫斯科会见授权谈判的北越官员。重要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夸大了莫斯科对北越的影响。除此之外，苏联领导人不准备作为哀求者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基辛格说的这个建议甚至没有得到答复，但是苏联领导人从此强调，他们不比美国更需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在国内，尼克松政府 1969 年另有一种担心。虽然准备谈判，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是尼克松政府不希望在保守的支持者面前在对苏关系问题上显得软弱。因此，当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10 月 25 日讲到未来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倡议时，费劲地把它同美国和苏联改善政治关系的兴趣脱钩。他说：“我们不是在谈论缓和或其他什么事情”，仅仅是谈论战略武器控制问题。

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当时所采取的立场，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以为美国在战略稳定方面的利益服务。我在 1969 年 1 月从布鲁塞尔发出的电报中，强调在没有改善政治关系的情况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价值。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努力同苏联领导人讨论限制战略武器的可能性，努力在关键的全球战略问题上进行高级对话，这些努力所根据的设想是：经过多年来加紧卷入越南战争，我们同苏联关系的现状不排除考虑抑制战略武器竞赛的方法。基本上把这个问题看成是诱使苏联领导人承认：除了国际政治环境外，不加控制的战略武器竞赛是徒劳的，危险的。我们已经谋求劝说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抓住时机控制越来越费钱的、危险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得到真正的好处，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敌对或缓和的程度大小。

限制战略武器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的。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政治环境，华盛顿又出现了新政府，这就更增加了这一目的的重要性。限制战略武器（以及关于这种限制的谈判）代表双方重新努力为对手间的共同利益服务。总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能够代表一种认识：即使是在继续政治冲突的时候，也能够追求一种比较安全的世界秩序。^①

问题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战略武器控制并不是很感兴趣。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奉行联系策略，希望影响莫斯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追求这种影响显然是徒劳的，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的前景在美国政界已经成为一笔政治资本，只有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才在 1971—1972 年同意去达成一项协定。

新政府一开始就发出一系列号召，要求进行名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的研究。在第一批备忘录中，有一份是关于军事态势的研究（NSSM-3）。虽然优先研究军事政策是完全合适的，但是相比之下，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份研究直到 3 月才在 NSSM-28 中提出来。在这之前，军事计划包括新的反弹道弹道计划都已经决定下来了。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也许会更好些。

1969 年 6—7 月和 8—9 月，我从布鲁塞尔回到华盛顿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准备工作，被内定为还没有组成的代表团的执行秘书。10—11 月，我回来了，因为代表团准备于 1969 年 11—12 月在赫尔辛基举行初步谈判。1969 年秋，我同苏联大使馆的克格勃官员鲍里斯·谢多夫和多勃雷宁大使领导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尤里·沃龙佐夫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事恢复非正式讨论。

^① “SALT and Détente,” USNATO 0130 to SecState, Washington, January 13, 1969, pp. 1-2 (confidential, declassified February 1, 1996).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能的立场，我同谢多夫一般地相互试探过几次，然后在 1969 年冬和 1970 年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举行了头两次会议。不久，谢多夫离开华盛顿。从 1969 年 11 月到 1972 年 7 月，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会前后，我同沃龙佐夫正式接触 14 次。我们相互试探实质性问题，也处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公事（例如，交换暂定的代表团名单，讨论程序，随后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转达官方立场）。

第一轮会谈于 1969 年 11—12 月在赫尔辛基举行。随后的六轮会谈轮流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1972 年 5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尼克松—勃列日涅夫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定。在两年半期间里，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谈判。

我不打算全面回顾两年半时间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的详情，因为大部分纪录现在都能够得到。^① 谈判内幕也许最令人感兴趣（包括在华盛顿进行的美苏谈判，美国和苏联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进行的谈判，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直接对话）。

1969 年 5—6 月，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提出第一个也是意义最深远的一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建议。这个建议既简单又实用，名叫“就地停止”。美国和苏联大体上势均力敌，各有大约 2200 个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情报部门判断，“就地停止”协定是能够核查的。但是，五角大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强烈反对停止发展军事技术，特别是在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方面已前进了一大步，美国即将大规模部署，而苏联还没有。

回想起来，如果当初能够达成这种协定，那么肯定符合大家

^① 见 John Newhouse, *Cold Dawn: The Story of SALT*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3); Gerard Smith, *Double Talk: The Story of SALT I* (Doubleday, 1980);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 Co., 1979); and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2nd ed. (Brookings, 1994). Many of the actual records of the negotiation are now being declassified and available to scholars.

的利益。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到苏联解体时，美苏两国各自拥有的战略弹头已经从几千个增加到一万多个。今天，希望在 21 世纪初签订削减战略武器第三次会谈条约，也许会使我们回到 1969—1970 年各有大约 2000—2500 个弹头的水平。而在当年，“就地停止”也许能够为签订协定提供很好的基础，可惜被拒绝了。

到代表团动身前往赫尔辛基的前一天，即 11 月 12 日，总统才批准开始试探性会谈的指导思想（我们中有几个人中途在布鲁塞尔停留，向北大西洋理事会通报情况）。前面一章已经说过，北大西洋理事会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协商是 1967 年和 1968 年开始的。当我们同共同的敌人谈判共同的核威慑时，这种协商对减轻盟国可能的担心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在联盟协商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曾陪同史密斯大使，并两次代表他。我还主持过一系列专家会议（通常与北大西洋理事会情况通报会同时举行），以便更加详细地进行讨论。

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轮会谈时，每一方都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后来，我们从苏联代表团成员那里得知，他们向莫斯科汇报了第一轮试探性会谈后，苏联领导才断定：美国对认真谈判感兴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可以继续。我们通过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一场考验。美国政府原来以为，苏联早就决定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了。

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时，华盛顿打算在谈判中采取什么政策和立场的决定，已经有效地集中在白宫亨利·基辛格的手中，并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只要因为达成的任何协定最后必须得到国会和公众的支持，只要因为政治上强大的拥护者支持不同的国防目的和武器控制目的，那么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必须考虑的利益和立场。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只是总统的顾问机构并接受总统指派的任务，但是

在传统上却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最高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开会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大概有 6 次，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考虑谈判细节问题的有效论坛。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亲自参加这个论坛，它的会议偶尔是重要的。但是经常开会核查负责提出、辩论和影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立场的关键机构却是一个名为核查小组的官僚主义特别机构。核查小组于 1969 年 7 月成立，作用是考虑各部门在要求核查遵守协定中武器控制条款这个重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是，它很快就完全取代了名义上合乎逻辑的机构副部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各部的副部长组成，由副国务卿主持。理由很简单：核查小组由亨利·基辛格主持，成员基本上相同：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后来是约翰·欧文、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不知道什么原因要让司法部长参加）。

核查小组开会的次数比国家安全委员会多得多。例如 1971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只开了 2—3 次会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核查小组则开了 12—15 次会。我定期在会前向理查森、后来向欧文介绍情况，并作为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参加核查小组会议。我非常高兴同这两位先生共事。

核查小组工作组由除司法部外所有这些机构的代表（助理部长级）组成，经常开会，反复推敲互相冲突的立场，供核查小组考虑。我参加核查小组工作组，从 1969 年 9 月到 1970 年 9 月的身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执行秘书，此后直到 1973 年 1 月，我还代表国务院。当代表团出国谈判时，由另一个跨部门机构处理同代表团的日常联系。这个跨部门机构名叫支持委员会，由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菲利普·法利主持。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不寻常之处是由总统任命，团长是

一个跨部门代表团的“主席”，而不是带一班子人的谈判代表。代表团主席杰勒德·史密斯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他的副手名义上是菲利普·法利，但是法利很少参加谈判（留在华盛顿领导支持委员会，负责代表团同基辛格和核查小组及其成员的直接联系，同时主管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工作）。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全都是关键部门老练的高级代表：代表国务院的是卢埃林·（汤米）·汤普森大使，后来是格雷厄姆·（杰夫）·帕森斯大使；代表国防部的是保罗·尼采；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是美国空军中将罗亚尔·阿利森；还有不属于任何部门的专家哈罗德·布朗博士，他是一位国防科学家、前高级国防部官员（和未来的国防部长）。

我被选为代表团的执行秘书以及国务院高级顾问。我的副手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悉尼·格雷比尔。我们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国务院、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以分析家的名义作掩护）。由国防部官员帮助尼采，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帮助阿利森，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帮助汤普森（后来是帕森斯），反映了代表团不寻常的性质。

尽管代表团有这种不寻常的性质，但是我们合作得非常有效。这四位高级代表和我同史密斯大使通常每天上午十点钟开会，研究新的指示和其他情报，当约定同苏联代表团开会时，就研究我们提出的方案。当然我们根据需要每天经常开会，而且通常在一起吃午饭。所有我们的会议都在有机玻璃做成的内室里开，这些房间是特别建造的，目的是防止电子窃听。这时，格雷比尔的任务是协调在不同房间代表团班子之间的材料准备。

美国代表团接近 100 人，大约半数做秘书工作和其他支持工作，包括一支海军陆战队，是从各大使馆借来的警卫。代表团的人数超过大多数大使馆（包括驻维也纳和赫尔辛基的大使馆）的人数。

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美国代表团人员素质很高，包括两名未来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政府的戴维·阿伦和里根政府的罗伯特·盖茨）和两名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政府的罗伯特·盖茨和克林顿政府的詹姆斯·伍尔西）。

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轮流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开会，使我们感到有些丰富多彩，但是这种穿梭安排是一种行政负担，很不方便。因为我们提出几个地方，包括赫尔辛基，苏联方面都同意了。但是后来华盛顿喜欢维也纳，所以我们最后同意这两个地方。中立的芬兰和奥地利都很高兴做两个超级大国谈判战略武器控制的东道国，并争相提供款待（例如，在对外安全方面，整个开会期间，每一个高级代表和我都配备了专车，由便衣警察当司机）。但是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接触除苏联代表团外的任何人。

为了对我们的芬兰主人以及对超级大国的合作表示一个小小的姿态，我们的行政官提出做一种纪念领带，上面有芬兰、苏联和美国的国家盾形纹章。我喜欢这个主意，同意他去做了。我甚至没有想到要告诉杰勒德·史密斯，等领带盒送到时，他才知道有这件事。当时我们知道，杰勒德并不很在意这个主意。我决定让芬兰人出面把领带送给两个代表团，好像这个主意完全是他们出的。芬兰人真的很高兴负责送领带。这件事做得很成功，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常常带着领带，但是史密斯从来没有带过（阿利森将军和他地位同等的苏联人也没有带过）。

在赫尔辛基，我们的代表团比大使馆大得多，住在一个叫“渔翁小屋”的相对孤立的、现代化的湖边旅馆里，并租了一座孤立的楼做办公室。在维也纳，我们分住在几个旅馆里，但是办公室在斯特鲁德尔霍夫，这是一座 17 世纪的宫殿，靠近美国大使馆。在我们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块匾，纪念 1914 年 7 月 19 日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在那里签发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审议也许会在历史上留下较好的影

响，那块匾当然为出现这种前景而举杯祝酒提供了材料。

苏联代表团的组成大体上同我们差不多，部分原因是由于任务的性质以及两国政府都有类似的机构。此外，他们事先向我们要美国代表团的组成，我通过尤里·沃龙佐夫同他们保持联系，沃龙佐夫也把苏联代表团的情况告诉我。起更加重要、更加直接作用的是苏联军工联合体，它的代表是：强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亚历山大·休金院士和无线电技术部副部长彼得·普莱沙科夫。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他是一位高级外交官，但是在军备控制问题上没有经验。苏联代表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显然是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上将，他是第一副总参谋长，陪同他的是另一名高级军官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上将。外交部高级官员起初包括乔治·科尔尼延科、奥列格·格里尼奥夫斯基、维克托·卡尔波夫以及后来的罗兰·蒂默巴耶夫。苏联代表团秘书长是外交部官员尼古拉·基希洛夫（但是查明他是苏军总参情报总局的军官）。

1969年11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第一次会谈的初期，保罗·尼采班子的人请他注意一个不祥之兆：已经查明在苏联代表团中大约有十几个人是或者怀疑是情报人员。我说，在我们的代表团里，也有大约相同比例的人现在是或者以前是情报官，我自己和我的副手格雷比尔从前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只有保罗依然有点怀疑。只有一件小事说明这些谈判正在树立一种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头就能够理解的新典范。在赫尔辛基会谈的最初几天里，在苏联代表团中被列为顾问的一名低级情报官接近美国代表团中一名有俄罗斯血统的成员，吹嘘说知道他个人经历的详细情况，这是无理地暗示“他们”在监视他。当我把这件事向我们的高级代表报告后，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我也感到，我们必须向他们讲清楚游戏的基本规则，于是立即向基希洛夫提出抗议，希望不再同我的代表团玩这种游戏。基希洛夫吃了一惊，接受我的抗议

说，他将立即调查这件事。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这位犯错误的“顾问”，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也没有再发生什么事件。

代表团送到华盛顿的所有正式报告都必须经过我的办公室，没有我或格雷比尔的签字，任何电报都不能发。除了报告谈判的正式全体会议外，各种非正式会见，包括正式会议后代表团成员同对方在社交时间进行的个别谈话，都用谈话备忘录的方式向华盛顿报告。谈话备忘录用外交邮袋发送，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两年半的时间里总共发送大约 1000 件。谈话要点和关键的正式声明每天用电报发出。

所有正式联系都通过国务院，由我或格雷比尔签发（最重要的问题还要通过史密斯大使和其他高级代表）。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经常地（国务院、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偶然地）还把秘密信件发给他们在国内的办公室。但是，过分热情的国防部代表几次企图在华盛顿采取迂回战术绕过代表团，造成了困难。

除了向史密斯提供建议和支持、管理代表团的工作班子和向华盛顿报告（包括夜间用保密电话通话）外，我的其他主要工作是处理同苏联代表团的接触。这种接触从一开始就包括一些例行公事，例如同我的对方基希洛夫协商会议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很快就扩大到对讨论的实质问题谨慎地交换意见，谈判“工作计划”，试探和谈判几乎所有的实质问题。我还陪同史密斯参加他同他的对方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所有会见，甚至参加大多数偶然的宴请或其他社交接触。

当我同基希洛夫和奥利格·格里尼奥夫斯基（外交部高级官员、谢苗诺夫最亲近的顾问，也是我的对手）的会见开始越来越涉及实质问题（代表的正式会见越来越变成记录在案的声明）时，有的人对我的作用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特别是强硬的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人，甚至还有阿利森将军（但是我们

的个人关系非常好)。我通常由另一名代表团成员(国务院的杰克·肖,或者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拉里·韦勒,后来是杰夫·帕森斯大使)陪同会见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不满情绪,至少我得到了一些保护,免得有人猜测我也许越权了。1970年5月21日,谢苗诺夫直接来找我,表示担心谈判进展缓慢,他问我希望同谁私下进行试探性会谈,是基希洛夫还是格里尼奥夫斯基?我回答说,随便同哪一个,或者同他们两个,只要他认为合适。如果这件事让别人知道了(只有史密斯大使知道),甚至会产生更多的担心。第二天,基希洛夫前来对我说,谢苗诺夫已经指示他们,他和格里尼奥夫斯基准备随时会见我。这是很少几件事情中的一件,我认为不合适在传阅的谈话备忘录中提到,只是在记录的(和给史密斯大使的)备忘录中提到。使史密斯惊愕的是,谢苗诺夫小心翼翼地亲自参加这些私下试探,但是谢苗诺夫承认私下试探是必要的,我能够代表美国方面,他能够依靠(必要时抛弃)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因此,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中,我们成了出头鸟,首先进入新的领域,或者寻找一条道路通过已知的障碍。在同史密斯会谈中,谢苗诺夫常常说我们是代表团团长的“影子”和“奇才”,因为我们能够解决困难问题。这种非正式的、授权的谈判很起作用。我发现,这些接触在我的工作中是最迷人的部分。

史密斯谋求引起谢苗诺夫的兴趣和理解,给了他一本弗朗西斯·沃尔德的著作《谈判者》,这本书精彩地叙述了16世纪法国在意识形态(宗教)方面敌对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之间的谈判。(基希洛夫向我抱怨说,对他的代表团来说,把这本书翻译成俄文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谢苗诺夫常常引用圣经、古兰经、希腊神话和歌德诗词。有一次,我不得不出来给我们优秀的翻译解围,谢苗诺夫提到一个词把翻译难住了,我知道这个词是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谢苗诺夫说,恩培多克勒相信一种稀

奇古怪的通过机会结合的生物进化论。但是，他说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后来，史密斯建议为宙斯用雷电击毙太阳神之子法厄同干杯，当时法厄同这位鲁莽的青年驾驶太阳车狂奔，失去控制，险些使地球焚烧雾化。史密斯建议，我们应该吸取古希腊人的智慧，努力制服核武器竞赛这辆失去控制的战车。我不愿意只让谢苗诺夫提到恩培多克勒，当我们辩论一项全面协定时，我给史密斯起草了一个讲话说：恩培多克勒曾经说过，宇宙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组成，就我们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宇宙来说，这显然意味着包括陆基导弹、海基导弹、轰炸机和百万吨级炸药。这种哲学上的善意玩笑显然并不直接影响谈判，但是确实有助于在两个代表团之间发展亲善关系。

1971 年和 1972 年，又成立几个正式工作小组，研究特别的技术问题并准备联合草案，最初是研究许多分类的、反映分歧点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甚至代表的正式会议也通常改成“小型全会”。不管是全会还是“小型全会”，所有的正式会议开过后，通常的办法是在休息时把代表和参加会议的幕僚分成许多谈话小组。（我们设法保证让新闻界把这说成是“喝茶休息”，其实标准饮料是美国啤酒和俄国伏特加酒。1973 年初期代表团换人后，接班的美国代表团把饮料换成咖啡和茶，保证新闻界不去猜测美苏双方人员有什么轻率的、过分友好的个人接触，其实我们当初并没有什么困难。）1970—1971 年我同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举行的非正式试探性会谈，除了会后讨论外，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桌上进行的。1972 年他们通常在上午或下午举行谈判会议。25 年以后，我才从格里尼奥夫斯基那里知道，他和基希洛夫一开始就把所有我们的谈话录了音。这是一种安全措施，保证格里尼奥夫斯基和基希洛夫没有泄漏任何保密情报，而不是保证准确记录讨论情况。

长期国际谈判的特色之一是，“跨国的”或“跨代表团的”

伙伴关系发展了，而代表团（和它所代表的国内各部门）内部也许还缺乏一致的看法。例如，一些美国和苏联的谈判代表希望禁止“未来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双方的其他代表却不希望这样做。据我所知，双方都没有不忠于代表团或不忠于指示立场的例子。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一些代表和顾问认真谋求劝说对方代表团成员，而其他代表和顾问却不谋求这样做。

我同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的工作关系非常好，1971—1972年实际上我每天都同他们接触。虽然他们的灵活性比我差得多，但是我们能够对许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供代表团团长或代表团全体成员审批。实际上，到1972年，在最后几个月里，大多数谈判在“四人小组”进行，杰夫·帕森斯陪同我与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谈判。反弹道导弹条约所有待定的关键部分的提纲都是在一个突破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中提出来的。1972年4月，芬兰邀请美国和苏联代表团游览北极圈上拉普兰的罗瓦尼埃米，这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是我在“冻原会谈”中交给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的。在这个例子里，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因为把我们的代表团蒙在鼓里），亨利·基辛格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正在莫斯科秘密会见，为尼克松—勃列日涅夫第一次首脑会议作准备，但我提方案，是抢先了一步。我们后来知道，谢苗诺夫被苏联政府召回莫斯科，提出一个难得的倡议，把我在“冻原会谈”中提出的立场说成是美国的权威建议，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虽然我（和代表团）没有得到授权，我也没有提出正式建议，但是（我从基辛格和史密斯秘密交换意见中知道）这是华盛顿准备接受的建议。因此，当勃列日涅夫向基辛格提出这个妥协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时，基辛格就接受了。

我已经提到，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一些半官方的、但是没有记录的秘密联系。虽然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的很多谈判并不是在正式谈判桌上而是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进行，但仍然是

个代表团之间进行，而且接受代表团和华盛顿跨部门的批准和确认。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空前绝后的一个特点是，1971年1月秘密提出尼克松总统和柯西金总理秘密联系，接着是基辛格和多勃雷宁大使之间的广泛会见和谈判，导致5月突然透露出一个协定：将重新建造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和协定的整个框架。这种“突破”涉及放弃努力签订一项全面条约，包括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战略武器，代之以更容易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的一些（不明确的）临时措施。缩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目的，是因为在哪些进攻性武器才算是“战略武器”因而要受到限制的问题上陷于僵局。

1971年5月20日公布了这项协定，大吹大擂取得了突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突破，但是仅仅是程序性的，而且是一种后退，或者说在我们当时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上降低了眼界。更糟糕的是，谈判在走下坡路，美国几次过早作出让步，不得不在下一年费很大的劲收回来（特别是重新包括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或者不得不放弃。最明显的是，5个月来白宫这种通过秘密渠道谈判以及不理想的谈判结果，美国代表团甚至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是直到这项协定公布前一天才知道。我从基希洛夫和格里尼奥夫斯基言辞谨慎的评论中，知道有一个秘密谈判正在进行，也知道谈判内容的一些迹象。但是，由于通过官方渠道得不到消息，并且受我们自己约束性指示的限制，我们代表团对结果无能为力。

尼克松和基辛格振振有词地说，绕过白宫以外的代表团和整个政府是必要的，目的是取得结果并“挽救”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是，在谈判中出现僵局的原因是美国（和苏联）的立场寸步不让。如果知道可以接受5月20日的那种结果，并使用决策和谈判的正常渠道，那么不仅下一年关于进攻性武器临时协定的谈判很容易进行，而且由此而达成的协定也会更好，不容易遭到

后来对根据 5 月 20 日指示进行谈判达成的协定所遭到的那种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发现，通过避免在执行部门中间产生激烈的斗争，根本改变美国的立场会容易得多。但是结果证明，这种只图方便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1972 年春又使用秘密渠道，但是这一次不是同柯西金，而是同勃列日涅夫，还是主要通过基辛格同多勃雷宁（4 月直接同勃列日涅夫）。最关键的秘密谈判是在莫斯科首脑会议最后几天进行的。1972 年 5 月，尼克松不明智地决定：把美国代表团留在赫尔辛基，而他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谈判，只靠他们自己的助手支持。不出所料，结果不那么令人满意。基辛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秘密渠道也让代表团参加谈判，但是拖延了时间，如果我们也在莫斯科的话，那样联系就会方便得多。有一次，5 月 24 日，史密斯大使不得不在给基辛格发出的一份紧急电报中指出，访问莫斯科的总统代表团即将批准的一份草案会在无意中阻止美国进行最优先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内容是，禁止增加现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但把民兵 I 型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改换成民兵 III 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导弹。在莫斯科的美国谈判代表，在没有专家军事顾问的情况下，如此急于限制苏联导弹，以至于忽视了这样的后果！达成协议后，才急急忙忙把我们召到莫斯科。

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中，达成的主要协议是反弹道导弹条约。美苏两国代表团最初的目的是，谈判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全面协定，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战略武器。实际上，1967 年 1 月，苏联方面就已经坚持包括进攻性的战略武器以及反弹道导弹，这也是美国最初关心的焦点。前面已经说过，1969 年 11 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时，双方大体上有相同数量的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双方各有大约 2200 个），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战略轰炸机。苏联有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则有更多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

炸机。如果仅仅是一个拉平这些主要战略力量的问题，那么很可能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够达成同等水平的协定，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限制在大约 2000 到 2500 个。但是，什么是“战略力量”，给它下个定义就难了，分歧很大。此外，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1969—1970 年人们普遍认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1) 是否能够和应该限制多弹头战略导弹，即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2) 是否能够和应该限制对导弹防御，即反弹道导弹系统。军备控制对战略稳定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同意一项可以核查的禁令，禁止进一步发展和部署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和反弹道导弹。即使没有减少，也会把双方各自所有的可运载战略弹头限制在几千个。在没有对导弹防御的情况下，这样做也会继续提供有充分保证的报复和相互威慑。

对有些人来说，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否满足于相互威慑，是否愿意不再谋求战略优势。对其他人来说，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准备也这样做。这两种看法都有很大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最担心苏联可能谋求战略优势的那些人本来应该最急于尽可能约束他们。但是实际上，对苏联意图和能力最危言耸听的那些人，通常也希望美国国防做出最大努力，指望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领先，使我们即使不是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也要占有一定的优势。更加合乎逻辑的是，赞成军备控制的那些人应该准备放弃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的可能优势，同时让苏联也受到同样的限制。

关于可能增强不受限制的系统的的能力，绕开限制以及可核查性，当然有许多严重的（和其他人为的）问题。此外，还有支持者的直接利益。美国军方一直依靠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刚刚提出一个大规模的部署计划，在下一个 10 年增加我们绝对的和相对的战略打击能力。如果放弃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就意味着只是追求在战略力量数量上的均势。（肯定地说，从长远来看，

苏联也会有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有了威力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苏联在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方面就会有更大的能力。但是，这至少是 10 年以后的事，那时可能会有很多变化。）反弹道导弹的支持者要弱得多。美国在现有技术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苏联已经首先在莫斯科部署了适度防御。根据现有的技术，反弹道导弹系统是费钱的，而且有人怀疑它的有效性。仅仅依靠反弹道导弹不能减少威慑力量，但是会进一步刺激进攻性的军备竞赛。同战略进攻力量已知的（和未知的）进展结合在一起，反弹道导弹可能是不稳定的。军备控制最好的办法是既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又禁止反弹道导弹。禁止或严格限制反弹道导弹会减少不稳定性，减少刺激战略武器竞赛。但是，仅仅限制反弹道导弹是否真的会抑制军备竞赛，将决定于美苏两国的克制。勉强抑制进攻性武器可能有帮助，但仅仅是勉强的。

1970 年春，美国政府开始在它希望限制什么样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问题上确定自己的立场。亨利·基辛格后来描绘这种局面时说，即使是在核查小组举行过五次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后，“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不一致的声音喋喋不休。”尼克松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实质性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感兴趣，他让基辛格来选择意见和确定立场。3 月 27 日，基辛格以总统的名义发出一项指示，“要求各部门把这种混乱减少到四种意见，供总统决断”。但是，现有的机构太庞大了，所以决定必须由一个人整理主要意见，于是就指定我来执行这项任务。根据总统的指示把四种意见交给我，但是我必须提出完整的立场并协调结果，使得赞成这样那样意见的各部门都会支持它。这四种意见是：（1）允许建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和一个全国性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允许建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但是把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国家指挥当局（即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防御范围内；（3）禁止建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把反弹道导弹

限制在国家指挥当局的防御范围内或者禁止反弹道导弹；（4）允许建立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但是大大削减战略进攻运载工具（特别是苏联大型洲际弹道导弹），把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国家指挥当局的防御范围内或者禁止反弹道导弹。第一种意见是最低限度的军备控制，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国防部特别是保罗·尼采赞成第四种意见。史密斯和我以及国务院、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中央情报局都支持第三种意见，这是最大限度的军备控制。看来没有人赞成第二种意见，这是大家的第二种选择。尼克松总统（实际上是基辛格）决定，代表团4月份在维也纳向苏联人同时提出第三种和第四种意见。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这两种意见都会遭到苏联人的拒绝，其实基辛格是在等待出现第二种意见（这是大家的第二种选择，但是却是基辛格的第一种选择）。

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三天（偶然在同国务院隔街相望的一个旅馆房间里休息一下），准备82页的文件，详细提出这四种意见。这四种意见于4月8日递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基辛格把这次会议贴切地描述为“日本传统的歌舞伎戏”。他说：“在一位厌烦得要消遣的总统面前表演所有软绵绵的姿势。他那无神的表情说明，他认为大多数论点是深奥的垃圾。他正在试图估计各种意见的政治影响和可接受性，其中只有大纲才使他感兴趣。”基辛格承认，他当时决定先提出第三种和第四种意见，然后根据我的草案再修改某些方面。基辛格还承认：“在我的任期内，同任何其他决定相比，这一次我更多地受到了官僚机构和政治考虑的影响。”但是，他在别的地方骄傲地说：“我们的谈判立场不反映官僚机构的妥协，而是反映细心分析后果和目的，”并提供“明确的选择”，供总统决断。

那年夏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高级代表在白宫会见总统。我

① These quotations are from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541-43 and 149. See also Smith, *Doubletalk*, pp.117-20; a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154-62.

惊奇地发现，尼克松竟然不很了解我们谈判立场的主要方面。我认为，他除了知道军方领导强烈反对外，对是否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毫无兴趣。当提交国会批准而需要获得必要的支持时，他不希望受到军方掣肘。

基辛格对我的草案作了两处重要的修改。第一，取消了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建议，在第二、第三和第四种意见中保留了限于国家指挥当局的防御。第二，在第三种意见中，他增加了实地检查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而且，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这一条包括禁止试验、发展和部署，但是不禁止生产。这两处修改使得苏联方面肯定会拒绝我们提出的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建议，这正是基辛格所希望的。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希望实地检查，但是我没有把这一要求包括在内，因为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都相信：禁止发展性试验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就足以核实了。苏联还没有开始这样的试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监视这种试验。另一方面，美国已经完成这种试验，正在进行生产，即将开始大规模部署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后来，当苏联方面强烈反对我们删除禁止生产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时，代表团谋求在不削弱任何其他条款甚至包括实地检查的情况下增加这一条，但是得不到授权。苏联方面怀疑，美国会生产和储存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只是还没有部署而已。苏联因为还没有试验和发展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所以还谈不上生产和储存。实际上，基辛格所以要删除禁止生产并增加实地检查的条款，不过是想确保苏联人会拒绝这项建议而已。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我的对手奥列格·格里尼奥夫斯基倾听我们介绍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建议，然后放下笔停止记录。他在会后对我说：“我们一直希望你们会提出一个认真的关于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建议。”谁也不知道苏联领

领导人是否会同意公正地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或者说表现出对这样的建议感兴趣

“削减方案”即第四种意见也没有显示它的重要性。苏联方面对不按比例地削减他们最有效的、可能作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感兴趣。美国则可以削减封存的 B-52 轰炸机，并全力按计划扩充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苏联方面不一定反对共同裁减，但是华盛顿的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只看到苏联对“削减”的消极反应。

由于第三种和第四种意见遭到拒绝，代表团就想出一个“维也纳方案”，这是从第二种意见变化而来。1970年7月下旬，代表团得到授权提出这个方案。但是，我们的人依然争吵，特别是在限制进攻力量问题上，直到1971年5月放弃谈判一个全面协定为止

反弹道导弹条约当然缔结了，这是一个重大成就。它的谈判虽然不是岌岌可危，但是道路也是曲折的。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在认真进行前，1969年3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国防政策。1969年后期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时，根据这个政策，在给我们的指示中一个直截了当的声明重申，总统赞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稀疏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能够保卫这个国家，使之不受小规模进攻或意外发射的伤害。1970年3月要我整理四种意见时，基辛格负责把国家指挥当局（即美苏两国的首都）的防御作为一种意见提出来。在修改第三种和第四种意见准备送交苏联方面时，撤销了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这种选择办法。因此，1970年4月当我们提出禁止或削减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时，这两种方案都包含同样的建议，把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国家指挥当局的防御范围内。

种种迹象表明，基辛格（后来他不满意自己提出的国家指挥

当局防御建议)和尼克松都认为,苏联方面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稀疏的防御系统,因此他们自己提出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促使美国参议院支持我们自己的部署。但是在我们中间跟踪这件事的人都知道,国家指挥当局(即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是苏联领导人的首选方案。这个方案允许他们保持他们已经在莫斯科部署的防御,并把我们将限制在最低水平。基辛格和尼克松准备放弃全国性反弹道导弹防御并最终确定非常有限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主要理由是国会已经表明,它不会支持广泛的部署,更不会支持全国范围的部署。

1970年4月我们提出把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国家指挥当局防御范围内后一个星期,苏联代表团就接受了这项建议。美国代表团当时被不断变化的指示弄得晕头转向,这时又被要求用两年时间摆脱我们自己的建议。第一步肯定是提出禁止反弹道导弹作为替代方案。苏联方面在赫尔辛基第一次接触时就已经申明,他们准备考虑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但是一旦我们提出让他们保持莫斯科的部署后,再让他们同意取消显然就难了。当谢苗诺夫后来私下说莫斯科的兴趣在考虑禁止反弹道导弹时,白宫指示我们放弃这种想法,让莫斯科同意一种片面的交易:为了保卫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而建立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美国同苏联的比例是四比一,很快就放弃这种要求,改成三比一,然后又改为二比一。提出这些不中用建议的惟一目的是:白宫可以在国会说,它要求经费建立三个或四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同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是一致的。

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清楚,反弹道导弹最后不是限制在二比二,就是限制在一比一。最后,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美苏双方各有两个发射场,一个用于国家指挥当局防御,一个用于保卫洲际弹道导弹。在尼克松政府发现国会不支持反弹道导弹防御华盛顿后,在1974年签署的条约修正议定书中,削减

成双方各有一个发射场。

前面已经说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开始就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给“战略”力量下定义。苏联方面坚持把美苏双边军备控制中的“战略”力量定义为能够打击苏联和美国的武器。他们坚持要清点或者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考虑美国能够打击苏联目标的、拥有核武器的大量前方基地系统。大多数美国人倾向于不理睬“前方基地系统”这个问题，最初把它看成不过是分散注意力的企图或谈判伎俩，最糟糕的是把它看成苏联企图同我们的盟国捣乱并取得战略优势。美国最初谋求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包括苏联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但是 1970 年征得我们盟国的同意后放弃了这种想法，主要是为不包括我们的前方基地系统加强我们的论据。但是前方基地系统问题不是一种谈判战术。苏联方面的一种论点说：美国大约有 1000 个核弹头运载工具，主要是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部署在海外的空军基地或航空母舰上，能够狠狠打击苏联的目标。情况确实是这样，1972 年美国国防部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仅仅依靠前方基地系统的这些力量发动第一次打击，就能够消灭苏联人口的 25%，或者摧毁苏联所有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 90%，或者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和中程及中远程弹道导弹综合力量的 20%。^①这不是想使用这些力量，而是说明从战略均势方面考虑，苏联军事计划人员为什么必须考虑这些力量。

我们拒绝了苏联的论点，非常合理的理由是：限制美国的前方基地系统，而不限制针对美国前方基地系统以及针对我们欧洲和亚洲盟国的苏联战区核力量，将意味着给苏联方面一个很大的优势。并不是苏联不让步，真正的问题是，双方都有正当的考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for the Verification Panel Working Group, “FBS and Other non - Central Systems in SALT TWO,” October 20, 1972, pp.28 - 29 (secret, declassified December 31, 1980).

虑，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结果，1970年苏联方面提议：抛开在战略进攻力量问题上的僵局，首先同意反弹道导弹条约。当时看来，反弹道导弹条约离达成协议要近得多。

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美国代表团以及华盛顿各机构都不急于跟苏联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因为我们会失去对进攻问题的影响。代表团得到指示要“坚持”我们最新提出的综合建议，从1970年8月到1971年5月确实这样做了。突然，白宫秘密谈判达成的1971年5月20日协议公开了，要求签订一个反弹道导弹协议，同时对限制进攻性武器采取“某些措施”（究竟采取哪些措施，没有具体说明）。

1969年秋，苏联开始单方面暂停增加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但是没有公开宣布这一消息，希望能够推动我们达成协议。在1971年5月协议前，苏联方面对进攻性武器问题上的僵局和长期拖延表现不耐烦，第一次开始建造80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包括30个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5月后，继续建造这80个发射器，但是没有增加新的发射器。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两年半时间里，由于苏联单方面限制，只增加了8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而在上一个两年半时间里，苏联就增加了65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临时协定签字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数量当然没有再增加。苏联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在谈判期间继续制造能够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但达成协议以后，就在临时协定限制的范围内。

对“某些措施”的理解含糊其辞，例如，是否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跟洲际弹道导弹一样包括在内？如果包括在内，那么限制到什么水平？协定将采取什么形式？这些都成了下一年的棘手问题。

在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史密斯和尼采在看匆匆忙忙删

除机密内容的文件时竟然发现，基辛格在谈判 5 月 20 日协议中关于将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排除在外的非正式协议没有告诉美国政府（几乎肯定也包括尼克松总统）。使基辛格吃惊的是，美国政府实际上一致同意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内，这样就使谈判变得非常困难。苏联方面相信，基辛格早先的承诺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基辛格劝说苏联人，美国政府必须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内，但是可以做得使这种限制不会真正影响苏联打算增加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总之，可以设法使华盛顿的官员满意这种限制，但是并不真正限制苏联人计划要做的事情。基辛格估计，苏联最多能够增加到 950 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作为他们能够增加的最高限制，然后把这一点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向华盛顿提出来，满足美国对包括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要求。他说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增加得更多（基辛格得到海军上将穆勒的同意，利用军方爱好过高估计的潜在威胁对他有利）。这样耍手腕遗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却起了作用。

反弹道导弹条约是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成功结束的标志。争论得更多但是并不那么重要的临时协定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通常叫做“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定”。而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的意图则是，更加广泛地限制战略进攻武器。

“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是一个为期 5 年的行政协定，而反弹道导弹条约则是无限期的。这个协定基本上冻结了战略导弹发射器的水平，限制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来代替陈旧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对任何一方来说肯定都是有利的，但是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考虑到它只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发射器，不包括战略轰炸机（或前方基地系统），这种数量上的不相等对美国不利，美国有 1710 个发射器，而苏联有 2258 个发射器。这是合适的，因为它只是

冻结现有水平的导弹发射器。但是在美国，不等数量引起了批评。

毫无疑问，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没有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限制在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的继续竞赛。首先应责备美国甚至没有认真企图限制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但是，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谈中，美苏两国甚至都没有企图商定本来应该被看成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一种均衡的、深远的限制。双方都过多地考虑保持取得优势的公开选择和努力。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本来应该吸取的一个关键教训是，争取战略均势边缘上的优势在军事上是不能用的，在政治上是不值得的。战略武器控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现实，在 80 年代后 5 年又恢复了，但是它从来没有对降低冷战的代价、缓和冷战的紧张关系、减少冷战的危险作出本来能够作出的贡献，因为双方领导人都不准备给它一个机会，即使是用谨慎的核查来保证双方遵守的机会都没有。

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中还达成两个专门的协定。一个协定是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通常简称“事故措施协定”，目的是防止意外发生一场非故意核战争。这个协定由两国代表团举行谈判，美国方面主要由帕森斯大使参加，1971 年 9 月 30 日由国务卿罗杰斯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签字。同时签字的另一项协定是关于改进美苏直接联系的措施，使 1963 年建立的直接联系线路现代化。这项技术性协定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代表团主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专家参加谈判。这些协定对战略稳定作了不大的但是有益的贡献。^①

^① For the most complete discussion of these agreements, see Raymond L. Garthoff, "The Accident Measures Agreement," and Sally K. Horn, "The hotline," in *Avoiding War in the Nuclear Age: Confidence - Building Measures for Crisis Stability*, edited by John Borawski, pp. 56 - 71 and 43 - 55 (Westview Press, 1986).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最重要的贡献或许是举行会谈这个事实本身。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说明，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承认无限制军备竞赛是徒劳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建立战略均势，但是确实反映了这一均势的存在。它还涉及开始战略对话，我认为人们低估了战略对话的价值，现在我要回头来谈这个问题。除了这些正式协定的具体条款和作用外，战略武器控制还列入美苏两国的国家安全计划。它涉及政治和军事的最高领导人，还涉及较低级政治军事人员合作研究许多新问题，在莫斯科开辟了新领域，在华盛顿加强了合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反映出美苏两国的政治判断：谈判和同意限制的风险可能小于无限制竞赛的风险（和代价）。对战略武器竞赛所加的限制虽然不够，但是总算有了一些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是一个重大的成就，但是没有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使得该条约损失了很多价值，使得对进攻性武器的限制显得软弱无力。

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是一个政治成就，有助于减缓紧张局势和增强战略稳定。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单靠战略武器控制显然不能维持缓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达成的协议，1972年在政治上夸大了它们的价值，然后特别是在1979年公众不支持后又贬低了它们的价值。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达成的协议甚至产生一些消极后果，因为真正的、模棱两可的、想象出来的回避和破坏引起对竞争对手和战略武器控制的怀疑。但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缓和时代对美苏关系（和东西方关系）作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

我已经提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促进战略对话的作用，但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潜力。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前，非官方的和保密官方的有限对话早在1967—1968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尼克松政府没有继续下去。尼克松和基辛格实际上反对

战略对话，因为他们认为会分散注意力，还因为他们不相信对手之间对话中的“抽象”概念。1972年首脑会议签订美国和苏联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1973年首脑会议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当尼克松和基辛格确实同意利用这样的声明时，不过是用他们认为无害的但是基本上毫无价值的言词来安抚苏联。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开始，我们几个人就努力支持战略对话。我们主要的“成就”是，就在美国代表团动身前往赫尔辛基时，1969年11月13日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一个讲话。他肯定存在相互威慑，并且说：“相互毁灭的能力导致相互有兴趣停止战略武器竞赛。”他呼吁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关系进行“对话”。他强调说：归根到底，“在战略武器会谈中面临的问题是，掌握发展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先进知识的社会是否有智慧控制和削减这些武器。”^①这是一个很好的讲话，但是对白宫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代表团对开始对话作出了贡献，但是，最重要的是，苏联方面也对开始对话作出了贡献。谢苗诺夫的第一次讲话使美国方面的许多人大开眼界。他明确表态赞成相互威慑：

即使一方首先受到攻击，毫无疑问它还会有能力用毁灭性打击来进行报复。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对双方来说都会是灾难。对决定发动这场战争的一方来说，等于是自杀。

谢苗诺夫私下证实，他的讲话是莫斯科政治军事最高领导人同意的了。

顺便说一下，在美苏两个代表团举行第一次实质性会议后

^①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address by Secretary Rogers, November 13, 1969,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61, no.1588 (December 1, 1969), pp.465 – 68. pp.465 – 68.

我把史密斯大使的一份讲话稿交给基希洛夫，他把谢苗诺夫的一份讲话稿交给我。以后为了保证准确报告，我们都交换代表团团长准备好的讲话。我们的讲话照例都是机密的，因此我提供给苏联代表团的文本也是机密的。他们的第一个讲话没有划分密级，但是从此以后所有他们的讲话也都标明“机密”。汤普森大使后来对我说，我把我们的做法“升级”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照例把它交给苏联方面的文件标明“秘密”，但是在美国处理时大多数文件标有较高的密级。美国安全分类早就包括特别的说明，例如对只同某些亲密的盟国分享的文件标明“只给美国和英国看”等等。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分类“只给美国和苏联看”。

在赫尔辛基举行初步会谈的头两个星期后，史密斯请四位高级代表和我准备写备忘录，谈我们个人对会谈的初步印象和对未来前景的看法。除了许多比较具体的印象和结论外，我还提到苏联承认相互威慑，以及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我们双方对战略稳定的态度的意义。我认为在这里值得提一下我当时说过的话，因为它反映我一些时间以来一直表达的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的战略主题，而且对于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最初交流提供更加清晰的情况。

我认为，苏联接受相互威慑的概念是认真的，是朝着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迈出的重要一步。与大多数同事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种立场并不是令人吃惊的，或者说，在苏联思想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出发点。

一个类似的出发点并不总是意味着我们将到达一个类似的目的地，并不是说他们总是会在特别希望的限制上得出同我们已经得出的同样结论。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不真诚，不是虚伪，不是圈套。实际上，我得出的结

论是，鉴于美国很担心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脆弱性，苏联立场的基础很可能是指望出现一个比我们的指望更加持久的相互威慑的形势。关于限制进攻力量，倒是我们更加有保留，更加“困难”……

关于理论问题，事情也很清楚，苏联对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态度，更多地受政治判断的支配，而不是根据机械式的计算，况且政治判断又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能够知道，我们担心脆弱性引起打击的“刺激”，在支持他们的立场时，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这些论点（总是正确地把它归因于我们先提到这种可能性）。但是，我相信，苏联制订政策的人倾向于认为，像美国和苏联这样明事理的大国不会把用计算尺得出来的打击“刺激”当成发动热核战争的重要因素。（苏联先发制人的思想同我们相比要有限得多，它直接关系到在敌人打击成功前抓住最后一分钟的战术主动权，但是当无法避免战争时，它不扩大成在危机中更加一般的打击“刺激”，因为有一个降格的得到保证的消灭程度。当然，我们可以教育他们，这是更加冒战争危险的，只要因为他们可以得出我们得出的结论。）

当然，我不埋怨我们谨慎地权衡对我们威慑完整性的潜在危险，也不埋怨我们努力找出可以谈判减少这些危险的限制，但是在劝说苏联人方面存在一种危险，即我们过分担心这些事情。总的说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正在成功地支持我们关注促进危机不稳定性的因素，而不对美国倾向于在危机中做出的过分反应引起惊恐。但是，正是我们回到 1959 年“微妙的恐怖均势”会谈，苏联的立场坚持 20 世纪 60 年代的传统。我们很可能是比较老练的军事技术分析家，而他们很可能是比

较好的政治历史学家。

美苏两国代表团当然都强调我们所希望实行的限制对于潜在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是世俗利益和技术或地缘战略优势的产物）。但是总的说来，关于战略稳定性的讲话和辩论增加了这一稳定性的分量，即使我们的具体立场往往暗含着对己方有利的因素。关于战略考虑几乎没有真正的分歧意见。有两点值得提一下：一点是关于战略学说和实践的问题，另一点是政治问题。

1970年4月27日，谢苗诺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改进早期警报系统，“由于有早期警报系统，当敌人企图攻击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时，发射井可能是空的，里面的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已经发射在飞行途中。”这显然是指美国人所说的“根据警报发射”，意思是说，不等遭到毁灭就发射自己的导弹，防止敌人攻击成功。危险当然在于警报系统可能出错，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安排的防御措施可能就会变成错误地认为已经遭到攻击的一方发动出于无心的第一次攻击。两个星期以后，史密斯大使提出谢苗诺夫的话，问他是否实际上是在说“根据警报发射”的思想，我们认为这是危险的。（奥加尔科夫将军在谢苗诺夫耳边说了几句话后，谢苗诺夫就没有立即回答。）谢苗诺夫在下一次会上回答说，他指的是美国讨论这样一种思想。我们举出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最近声明拒绝依靠“根据警报发射”，问苏联方面是否能够提供一种类似的官方保证。他们没有理睬这种请求，后来结束讨论时感谢我们澄清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后来出版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某些报道提到，奥加尔科夫将军向阿利森将军抱怨说，不应该在文职人员面前讨论具体的军事情报。实际上，他是针对“根据警报发射”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他所说的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不应该提出这些问

题，阿利森将军“作为一个军人应该知道对根据警报发射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一方面，美苏两国都承认，“根据警报发射”有引起意外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美苏两国的军事机构在整个冷战期间都继续发展这样一些思想：即使不是为了“根据警报发射”，也是为了“受到攻击时发射”，也许在第一阵爆炸后，肯定敌方正在进行一场攻击，于是立即发射导弹（并出动轰炸机和采取其他措施）。当初这仍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今天危险的程度减少了一些。

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产生的另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采取可能的措施避免第三国（例如中国）冒充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挑衅性的进攻”，把它们卷入双方都不想发动的核战争。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开始，美苏两国代表团就提到意外的、非授权的或第三国发动的挑衅性进攻的危险，特别是在权衡反弹道导弹防御的意图时作为一种考虑，而且考虑其他可能的战略武器控制。前面已经说过，在 1971 年 9 月签署的事故措施协定中，包括采取许多措施减少这种进攻或事故危险的协议。

苏联探索防止挑衅性进攻的措施，使有些人首先是基辛格感到非常吃惊（基辛格当时正在想方设法打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谢苗诺夫首先对我、后来对史密斯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然后在两国代表团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说这一点就够了：基辛格在同多勃雷宁的秘密联系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种思想，但是没有通知美国政府的其他人，美国政府仍然在进行研究，最后建议拒绝，11 月白宫正式作出拒绝的决定，最后授权代表团在 12 月的记录中拒绝这项建议（当时苏联方面已经不再提了）。^①

苏联方面只有一次提出一个“政治”问题，1970 年 12 月，谢苗诺夫首先同我、然后同史密斯私下会谈中，建议相互保证不

^① The full story on the provocative attack issue is more complex, and interesting. It is spelled out in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198 - 205.

首先使用核武器。史密斯和我都当场就拒绝了。基辛格在秘密联系中也拒绝了 this 建议，但是没有通知美国政府的其他人。我从会谈中了解到，苏联代表团将不再提这件事。我还对沃龙佐夫说，我们拒绝这种想法（毫无疑问，他从基辛格同多勃雷宁的会谈中知道了）。在核查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基辛格在提出这个问题时说，如果苏联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准备坚决反对。我说，请核查小组放心，苏联代表团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了（他们真的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基辛格大吃一惊，我居然能够信心十足地知道他们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迹象：前方渠道，尤其是我，卷入太深了。当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给我一个奇怪的脸色。基辛格不过是在摆姿态，对他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不会提出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目的是为了表现他的坚强，很遗憾我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我无意地破坏了他正在谋求的这种效果。

在尼克松的白宫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单方面的竞争甚至妒忌，上面所说的不过是其中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而已。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基辛格一手造成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反复产生的怀疑作证说，尼克松觉得史密斯大使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所赢得的称赞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他甚至认为我们正在谋求得到这种称赞。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态度，因为我们当然是他的政府的一部分，由他责令进行谈判，我们完成的任何任务都是为尼克松政府争光。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敌对的实体，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去做有损于尼克松总统本人责任和声誉的事情。

1972 年 5 月下旬，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为了在首脑会议上签署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定，在最后几周乱哄哄的谈判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事情。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的同时，4 月下旬首先由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会

谈，然后由基辛格和尼克松带几名助手同整个苏联领导班子和专家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议。

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把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美国代表团留在赫尔辛基继续谈判无数细节和几个重大问题，而他们则在莫斯科解决同样的这些问题，这是头等重大的错误。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尼克松想抛开史密斯大使和代表团独自出风头，甚至想表明他和他的白宫班子能够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的所作所为是添乱，结果产生一些不希望产生的问题（尼克松本人作出一种让步，虽然并不重要，但是很不利，他用书面形式秘密承诺：当苏联打算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发射器去代替老式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时，美国不会履行它同样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我不在这里回顾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详细叙述过了。^①

我只简要地说说首脑会议。5月26日，协定签字前几小时，才允许史密斯、尼采、阿利森将军和我（同苏联代表团一起）飞往莫斯科。在飞往莫斯科途中，我们还在飞机上工作，确认协定的英文本和俄文本。（实际上，我们后来才发现，还有两个细小的技术错误，需要重新打印和第二天再签字，但是不再举行仪式）。

关于我们到达莫斯科和在那里的活动，还有许多引人发笑的、至少是不能预见的事。首先，有一辆车来接走史密斯大使，美国空军武官接走阿利森将军，除此之外，没有人来接尼采和我。我同苏联代表团的一些人直接去了苏联外交部，以便对马上就要签字的文本做最后更正。我并不知道尼采已经离开，自己照顾自己去了。他进了城，但是不能进入美国大使馆，尼克松总统在那里举行的正式宴会正要结束。最后，苏联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认

^① See Garthoff,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176 - 95; and Smith, *Doubletalk*, pp.364 - 440.

出了这位前美国国防部长帮办，帮助他进入克里姆林宫参加签字仪式。同时，我发现外交部没有我携带的电动打字机用的电接头，也没有我指定的美国大使馆一名年轻女士可以用的英文打字机，因此无法更正，我们只好带着原来的文本匆匆赶往克里姆林宫。

签字仪式在圣弗拉基米尔厅举行，没有节外生枝。接着，苏联领导举行招待会。在首脑会议前夕，美国加强轰炸北越。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员（彼得·谢列斯特）反对首脑会议。我记得，在招待会上，我同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也同谢列斯特握手。但是，他起初同大家一道举杯祝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他的同事亚历山大·谢列平不厌其烦地劝他，他才举起杯来。

史密斯一到莫斯科，基辛格就请他匆匆忙忙地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基辛格不满意史密斯谨慎的、他认为不够热情的回答。在签字仪式后，基辛格又急忙在莫斯科国际旅行社饭店夜总会举行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史密斯非常厌恶对待代表团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结论的方式，决定我们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因此，虽然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但是结局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史密斯想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后就退休，但是我认为，他希望总统会劝他留下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对待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方式，最突出地表现在非常混乱的最后时刻的莫斯科谈判，以及最后时刻把我们召到莫斯科在那里遇到的滑稽可笑的几个小时，史密斯受够了。他通过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说，他打算辞职，但是愿意留下来参加秋季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第一次会议（这就是说，直到总统选举以后）。但是尼克松总统没有请他留下来。

但是，在莫斯科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临时协定，并不是说

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结束了。美国参议院还有待于批准反弹道导弹条约，参议院和众议院还有待于通过临时协定作为国会通过的行政协定。有几位参议员在维也纳访问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但是国会对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的兴趣是淡薄的。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特别是在 1971 年 3 月看来美国政府会同意反弹道导弹条约时，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举行了非正式的听证会。他特地邀请我参加这次听证会，并问我能否接受“苏联单纯的反弹道导弹建议”，还问我是否支持部署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和为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坚固的发射场。我回答说，我赞成研究和发展坚固发射场防御，支持继续保卫未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发展的目标，但是不赞成接受苏联单纯的反弹道导弹建议。（我对杰克逊略知一二，早些时候他认为我是一个有见识的苏联问题专家。他的助手理查德·珀尔在国务院的一些朋友，特别是赛·韦斯，强烈赞成部署反弹道导弹，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软弱的，所以故意让杰克逊逼我回答这些问题。）

当美国政府向国会第一次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时，没有请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任何人参加。代表团团长、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史密斯大使甚至不能为他的妻子在参议院走廊里获得一个座位。后来，美国政府同参议员杰克逊做了一笔秘密交易，接受他提出来的一个修正本，含蓄地批评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临时协定，要求在随后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中坚持对等水平的洲际战略力量。

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的听证会上，参议员杰克逊再次要求我就苏联大型洲际弹道导弹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了冲突，但是没有产生特别的后果。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请我劝说某些参议员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我照办了，全是光明正大的。可是杰克逊的人在白宫向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抱怨这件事，好像一名官员支持政府是不对的，真是莫

名其妙。

9月，国会终于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顺便说一下，在白宫举行庆祝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的招待会上，我忙于同多勃雷宁大使的副手尤里·沃龙佐夫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斯珀吉翁·基尼交谈，这时候亨利·基辛格过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关于我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出的贡献，基辛格发表了一些补充评论，但是当沃龙佐夫也说了一些话赞扬我的作用时，基辛格就调皮地说，他始终弄不清楚我究竟站在哪一边。沃龙佐夫说，他们始终都知道我为哪一边效劳。他的口气说明，毫无疑问，他们指的是美国方面。基辛格欣赏过自己开的带刺的玩笑后走开了。

我们回到华盛顿以后不久，史密斯大使要我到布鲁塞尔去，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关于现在已经完成的会谈和协议的最终报告。我感到很荣幸和很高兴去做这件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参加了代表团向北大西洋理事会递交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所有报告（惟一的例外是，帕森斯大使递交了一份关于事故措施协定的报告）。1971年10月第五次会议结束时，我代表代表团向北大西洋理事会介绍情况。6月16日，除了向北大西洋理事会各国大使们汇报外，我还举行了另外一次专家会议，在那里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讨论。这两次会议进行得都很好，我认为：我们提供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的报告是简明易懂、毫无偏见的，大大消除了北约盟国的疑虑，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初秋的几个月，我们筹备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的第一次会议。通过苏联大使馆的尤里·沃龙佐夫，我安排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的所有会议都在日内瓦举行，结束了早先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轮流举行的做法。

在筹备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的第一次会议期间，国务卿罗杰斯任命我为国务院代表，取代已经退休的杰夫·帕森斯大使。

这个职位是大使级，而大使头衔应该由总统任命。但是，在国务院宣布对我的任命后，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亚历山大·黑格打电话给国务院说，尼克松总统不想在选举前对代表团作任何改变。当时看来这样做似乎非常奇怪，但是几个月后理由就变得非常清楚了。总之，我作为国务院代表前往日内瓦，但缺少总统任命和大使头衔。

日内瓦举行过很多国际会议，有很多常驻国际组织。在日内瓦外交的湖里，我们不过是一条小鱼。薇拉和我很喜欢又到那里去，即使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美苏两国代表团在人员组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时间是从 1972 年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显然，全面限制战略进攻武器的障碍仍然很大。我们成立了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中要求成立的常务协商委员会。（第一任美国专员是我的同事格雷比尔，苏联方面选了一位将军。）

我的克格勃老相识鲍里斯·谢多夫又在日内瓦露面了。从 1970 年春以来，我们两人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我同他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见面是中央情报局驻日内瓦基地鼓励我去的。我们的谈话通常是生动的，但是不是非常有用。

我们从日内瓦回来，准备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的下一次会议。不久，许多事情突然发生了。首先，1973 年 1 月 4 日，杰勒德·史密斯大使按计划辞去限制战略武器代表团（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职务。接替他的是我在国务院的老上司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亚历克西斯非常能干，但是也非常谨慎。显然，代表团将受到严密的束缚。第二件事是，实际上整个代表团全换了。我首先获悉，我将要离开代表团。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把我叫去谈话，他对我说，为了我自己的事业，我应该离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说得很清楚，就他个人来说，非常喜欢我留下来，但是我需要从事更加经常的外交活动。虽然当时他没有告诉我，

但是我很快就知道，白宫已经命令更换整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高级成员，特别包括我。这是一次彻底“清洗”。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总统第二次就职。紧接着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冷淡地要求整个内阁和白宫高级官员书面辞职。虽然大多数人留下来了，但是他炫耀了自己的权力，显示了他们的脆弱性。他计划清洗整个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并采取最初几项措施后，水门丑闻开始揭发出来，尼克松停止了大清洗。但是，1月份已首先清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在华盛顿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团体”以及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17个最高职位中只有3个人留任几个月。基辛格不是发起清洗的人，但是，当问他谁应该留在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时，他只推荐副署长菲尔·法利一个人。但是，所有菲尔的同事都被赶走了，菲尔觉得留下来很不是滋味，所以也退休离开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预算和规模都缩小了，还给它安了一个保守的领导。

尼克松一方面决定撤换整个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另一方面重新安排国务院和其他单位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支持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虽然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大约6个月的时间直到我接受新的任务，但是从1月中旬以后我不仅离开了代表团，而且还离开了所有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工作。

至少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及时通知我说，我就要离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是起初他没有说明原因。我已经得知，意图是换一个全新的代表团。亚历克西斯证实，白宫认为换一个“新班子”是个好主意。几个星期以后，我知道罗亚尔·阿利森将军仍然在做出差计划，并正在为参加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下一轮会议给他手下的人分配工作任务，不知道正要调动他的工作。菲尔·法利劝阿利森去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核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就告诉阿利森说，他的工作要换了。给阿利森换了一个同他的军衔不相称的职位，于是他退休了。哈罗德·布朗对代

代表团作出了非常有用的贡献，但是因为他不代表华盛顿的支持者，所以被忽视了，没有列入要撤换的“打击名单”上。另一方面，亚历克西斯起初告诉保罗·尼采，他在支持工作方面可以起有用的作用，但是他在代表团的工作要撤换，以便换一套新班子。但是，尼采反对这个决定，并得到国会许多朋友的支持，终于被允许留下来。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清洗目标，而史密斯、阿利森和我则是清洗对象。

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换一套“新班子”，尼克松也许有他自己的理由，基辛格也许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是，推动这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全面清洗的人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同杰克逊在玫瑰园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中，尼克松同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换一套新班子。尼克松接受杰克逊关于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中相同战略力量水平的修正意见，以换取杰克逊不仅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而且也不再反对三叉戟潜艇计划。归根到底，杰克逊得到了更多的东西，在两个三叉戟潜艇基地中，有一个基地从海军喜欢的加利福尼亚州迁到杰克逊的华盛顿州。但是，清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和削弱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也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①

对于这次清洗来说，还有更多的情况。赛·韦斯和国务院的另一些人同他们的朋友串通一气，这些朋友是杰克逊手下的理查德·珀尔、白宫人事处的弗雷德·马利克、白宫立法处的约翰·莱曼，很可能还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议会关系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黑格。参议员杰克逊和强硬派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长期的作用是削弱支持军备控制的势力，使得基辛格更难（最终不可

^① The purge of SALT and ACDA has been partially told in several published accounts, including Peter J. Ognibene, *Scoop: The Life and Politics of Henry M. Jackson* (Stein & Day, 1975), pp. 199–216; and Elizabeth Drew, “A Reporter at Large: An Argument Over Survival,” *New Yorker* (April 4, 1977), pp. 109–12.

能)在强硬派和软弱派之间耍花招,他再也不能占据平衡地位的中心支点,而是必须面对和输给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1975—1976年福特政府中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强硬观点。

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签字一年后,1973年年中,约翰·纽豪斯出版了《寒冷的黎明》,详细叙述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这是一本很有见识的书,是一项不偏不倚、有根有据的研究,但是倾向于基辛格和白宫关于谈判的观点,因为白宫特别允许作者查阅关于谈判的资料,首先是华盛顿的所有决策。纽豪斯后来向我证实,他能查阅很机密的文件,完全是亨利·基辛格的赏赐。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知道纽豪斯正在写一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书,华盛顿提醒我们:谈判是保密的。史密斯谨小慎微地避免同纽豪斯(和新闻界)接触,整个代表团也避免任何接触。但是,保罗·尼采和我确实对这本书提供过一些帮助,提出我们代表团的看法。顺便说一下,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有人向新闻界透露过许多情况,有些是从国防部透露出去的,有些是从国务院透露出去的,但是所有最重要的情况都是从白宫的基辛格办公室透露出去的。

1973年1月标志着6年过程的结束,这个过程从1966年12月—1967年1月我们最初提出战略武器会谈建议,到1972年5月成功结束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和同年早些时候开始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经验包括了冷战开始以来最深入细致、最激动人心、最富有开拓性的谈判。肯定地说,在范围广泛得多的问题上进行高层领导接触和谈判是最重要的,同时也在发展缓和方面经历了最剧烈的发展。从这种观点来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过是一个大得多的计划的一部分而已,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从直接涉及冷战对抗核心的政治军事问题的立场来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这个镶嵌图中独

特而重要的一部分。它对苏联思想产生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华盛顿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在我的外交谈判、政策执行和机构调动的生涯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起着最认真、最直接的作用。就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责任来说，就作出肯定的贡献来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我经历中的亮点。它是激动人心的，甚至是令人振奋的。我和我的同事虽然突然被调走，但是至少我们已成功地开始和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谈判。

协议刚刚签署，1972年6月8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扬我作出的努力，我深为感动。他写道：

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莫斯科签字了，我想给你写封信，承认你对导致这次历史性事件的工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过去的三年里，你担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代表团秘书长，表现卓越，受到国务院同事们的钦佩。你遵守纪律献身于成功的结果，你掌握问题的复杂细节，你巧妙地寻找谈判僵局的解脱办法，你讲一口熟练的俄语，你独一无二地能够同你的苏联对手发展坦率和信任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有助于在莫斯科的结局。

这些协议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成就之一，而你是这些协议的一位主要设计师和建造者，你有权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杰勒德·史密斯大使也给我写了一封类似的信。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结果作出的独特贡献……代表团中谁也没有对这些谈判作出更大的贡献……协议中几乎没有一项条款不反映出你的辛劳。”我的顶头上司政治军事事务局局长罗恩·

施皮尔斯同史密斯一道后来向国务卿建议，应该给我颁发国务院最高的杰出荣誉奖，他同意了。直到通知我去领奖时，我才知道有这个建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3年1月，通知我领奖以表彰我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作出的贡献，同告诉我要调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竟是在同一个星期！当时还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匆匆忙忙地安排亲自发奖，以避免在白宫调动我的工作时，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务院发给我最高荣誉奖以表彰我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工作这种不协调的尴尬局面。两个星期后，罗杰斯给已退休的史密斯大使颁发了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杰出荣誉奖。

国务卿在杰出荣誉奖的嘉奖令中写道：

作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代表团的执行秘书，为和平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加特霍夫博士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每一个阶段，通过个人的倡议、迅速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对提出可能的美国立场供总统决断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同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协商导致了盟国接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过程，他那不倦的坚持特别有效地支持了我们在协商中的立场。

他掌握技术性很强、很敏感的问题，他非常了解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政策和理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他有精明的、革新的谈判意识，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达成历史性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

有机会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中起关键作用，而且至少有些人赞赏我作出的贡献，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第十四章

在美苏关系中发展缓和

我们已经看到，冷战的过程时紧时松，时而对抗，时而缓和。斯大林去世后，从 1953 年到 1956 年这段时间里，紧张关系第一次明显缓和。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和重新对柏林施加压力使关系恶化了，接着发生 1961 年的柏林危机和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3—1964 年出现了新的缓和。但是，1968 年发生越南战争和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关系又紧张起来了。

理查德·尼克松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从政以来，一直以强硬的反共分子而著称。但是，他在 1969 年就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用“谈判时代”取代对抗时代，发誓要建设“一个和平大厦”。^①后来，尼克松提出“一个新的和平战略”，有意无意地重弹肯尼迪总统 1963 年 6 月在美利坚大学讲话的老调。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和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使用“缓和”这个词，但是这种思想是很明显的。尼克松总统第一次发表公开演说，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内情。尼克松在演说里好像例行公事地说，“所有的国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的联系线路是敞开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无关痛痒，但是却是总统新的国家安全

^①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Richard Milhouse Nixon” January 20, 1969,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 5, January 27, 1969, pp. 152 - 53. I have examined the American - and Soviet - conceptions of détente, and the entire course of US - Soviet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from 1969 through 1980, in some detail in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 -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 ed. (Brookings, 1994).

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插进去的，目的是为了向莫斯科发出一个秘密信号。很多年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透露说，因为他是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的随从人员之一，所以有机会偶然同苏联大使馆的官员鲍里斯·谢多夫接触。基辛格知道，谢多夫实际上是克格勃军官。（读者也许还记得，从 1966 年以来，谢多夫还一直同我保持定期接触。）谢多夫强烈要求基辛格让尼克松把向莫斯科敞开联系线路这句话写进就职演说中去。谢多夫说，这样写，莫斯科很容易接受。（这样写也增加了基辛格的资本，向苏联领导显示他能够影响总统。对谢多夫来说，向莫斯科表明他能够通过基辛格成为直通新总统的一条渠道。）2 月 17 日，尼克松总统在第一次会见多勃雷宁大使时又提到敞开联系线路，并私下对他说，特别重要、特别敏感的问题只应该同基辛格讨论，不要同国务院联系。一条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作为尼克松政府同苏联领导之间的主要联系。^①

莫斯科、盟国首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际上还有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代表团）都摸不透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方向，所以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尼克松总统就职仅仅一个月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到西欧，第一站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他在那里的讲话很受欢迎。

在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中，亨利·基辛格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是否对同他在华盛顿共事感兴趣。当时几乎没有时间交谈，他请我同他的助手拉里·伊格尔伯格进一步讨论，他已经同伊格尔伯格说过此事了。拉里是老实人，但是不能回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也没有告诉我基辛格想吸纳我的原因是

^① See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30-31 and 79-82. 谢多夫此后自然被甩开了，基辛格和多勃雷宁都不想在他们之外另有一条渠道。附带说一下，基辛格在 1979 年回忆录中公开透露了谢多夫的克格勃身分和作用，就断送了谢多夫的前程，使他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到西方工作。

他同他的老朋友赫尔穆特（哈尔）·索南费尔特不和，这种不和已经影响处理苏联事务的班子。当时我给基辛格写了一封信，他回答说，他同哈尔已经消除分歧，没有什么裂痕了。

更早些时候，刚担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我的老朋友杰勒德·史密斯同我联系，请我做他的局长助理，负责国际事务，这个职务相当于助理国务卿。我接受了，但是史密斯突然打电话向我道歉说，他发现不能给我这个职位，因为比尔·罗杰斯对他说，需要我在国务院做重要的事情。罗杰斯和我当时还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从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使他阻止我到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工作。也许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告诉过我，我应该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1月，约翰逊曾对我说，像1967年和1968年所预料的那样，我应该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

前面已经说过，我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工作时间，形式上是直到1970年8月，但是实际上只到1969年中期以后不久。1970年9月，我担任新的工作，成为政治军事事务局两名副局长之一，受我的老同事罗纳德·施皮尔斯的领导（另一名副局长是汤姆·皮克林）。

我在政治军事事务局的主要工作是：每当代表团在华盛顿时，处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准备工作；每当谈判进行时，在史密斯的领导下管理代表团。我在这里要指出：我从1970年到1973年在政治军事事务局和从1973年到1975年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看到美苏关系的缓和有了更大的发展。

从1969年到1972年，美国政策主要是研究如何从越南脱身的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严重依赖在我们有力量的问题上的影响去推动在我们不那么有力量的领域内的事情。这不是一种新的政策手法（顺便提一下，我在1968年的备忘录中就已经建议实行缓和战略）。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夸大了他们用这种手法所

能达到的期望。特别是，他们希望利用苏联对缓和紧张局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贸易的兴趣作为手段，引诱苏联领导人压北越满足我们体面地结束战争的要求。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也希望缓和紧张局势、限制战略武器和贸易，因此没有很多力量去推动苏联人做更多的事情，必须相互让步才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第二个问题是，苏联领导人对越南人的影响很有限。1971—1972年，当我们能够在三角外交中对苏联领导人打中国牌的时候，运用影响就比较成功，包括从越南脱身的问题。政治军事事务局卷入了越南纠葛，但是谢天谢地我没有卷入，而是参加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从1969年到1972年，在缓和的道路上，第三世界发生了几件大事。1970年一年就发生四起对抗事件：我们报复性入侵柬埔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叙利亚—约旦吵架、埃及—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空战、在古巴潜艇基地问题上同苏联闹了一下对抗。1971年爆发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也涉及美苏紧张关系。在这些事件中，只有一件直接涉及苏联责任和直接涉及美苏关系，这起事件就是1970年苏联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湾建设潜艇基地问题上的有限对抗。

1970年9月中旬，美国U-2侦察机发现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湾正在建设潜艇基地，证实了最近从苏联运来潜艇设备引起的怀疑。在尼克松总统访问欧洲的前夕，政府把这个发现透露给新闻界，并由五角大楼和基辛格（以匿名的“白宫人士”身分）介绍背景情况，把这件事变成华盛顿的一次小危机，然后找机会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苏联通过多勃雷宁大使转达，保证在古巴不建苏联潜艇基地，莫斯科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华盛顿也由国务院发言人出面讲话，公开重申遵守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时达成的谅解，从而避免了这场政治危机。

实际上，苏联考验了“谅解”的极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们不应该在古巴建造潜艇基地。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除了白宫少数几个人外，甚至美国政府也不知道。美国发现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湾正在建设潜艇基地前不久，苏联临时代办尤里·沃龙佐夫于 8 月上旬拜会了基辛格，出人意外地提出重申 1962 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肯尼迪—赫鲁晓夫谅解。为什么苏联竟然要提出这个倾向于束缚自己手脚的问题呢，基辛格对此有点弄糊涂了（甚至在若干年后，当他在回忆录中第一次透露沃龙佐夫的这种做法时，也还没有弄明白）。不管怎么说，基辛格还是谨慎地要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为他提供 1962 年的记录，约翰逊又请雷·克莱因（1962 年主管情报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这时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和我去找这些记录，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照办了。基辛格看过这些材料后，告诉尼克松说，1962 年的谅解“从来没有正式弄清楚”。“现在弄清楚了，从协议的意义来说，不管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都没有正式谅解。”情况确实是这样，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不去约束美国不入侵古巴的含糊承诺。但是，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同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别的什么人商量，就决定利用这个出人意外的机会，通过新的相互保证来束缚苏联的承诺。8 月，他们做出了相互保证。这些新的保证成为 10 月西恩富戈斯湾事件结束后公开重申谅解的基础。

苏联人为什么在 8 月提出这样的问题？基辛格仍然莫名其妙，因为他认为这是苏联单方面重申他们的承诺。若干年后，我问沃龙佐夫，他作了解释。卡斯特罗担心尼克松新政府可能会进攻古巴。苏联情报没有证实这种危险，但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去引出美国的重申，以便能够安抚卡斯特罗，让他知道：苏联人已经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能够得到美国不进攻古巴的保证。

基辛格和尼克松没有“重申”、“澄清”和“引申”1962 年的谅解，而是达成一项 1962 年故意没有达成的新协议。或许当

初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不管怎么说，苏联不再企图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也不再入侵古巴。但是，新的秘密外交甚至没有考虑肯尼迪政府为什么不正式作出承诺的原因。

1972年，对1970年的这些事件有几种反响。首先，1972年初期，基辛格一方面关注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议，另一方面正式要求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 144中对苏联在加勒比海的海军部署进行跨部门的政策研究。这项任务交给跨部门政治军事小组，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正式工作小组，助理部长级。我是跨部门政治军事小组组长，负责这项研究。但是，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这项绝密研究，却拒绝我们接触1970年的材料。我强烈反对，坚持要求查看记录，但是遭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怒斥。我呈交了跨部门政治军事小组一致同意的最终报告，指出如果我们不看材料，就无法判定苏联的随后行动是否违反了1970年的谅解。

在跨部门政治军事小组进行研究后，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举行前，苏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派遣一艘G级用柴油机推动的导弹潜艇到古巴，考验同意限制的范围。尼克松总统没有在莫斯科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甚至更加明确的迹象，说明美国立场的坚定性。苏联导弹潜艇在古巴（在尼佩，不是在西恩富戈斯）短暂停留期间，几艘美国监视船离岸只有6英里。当苏联潜艇离开时，这几艘美国船和P-3海军巡逻飞机不断地发出声纳，迫使苏联潜艇一再浮出水面，直到深入大西洋为止。毫无疑问，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海军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但是，甚至在事发以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他们没有能力完全控制政策。

1972年秋和1973年初，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给国务卿罗杰斯写信，强烈要求抗议两架苏联图-95D级北极熊式涡轮推进海军侦察机从摩尔曼斯克飞到古巴，然后又飞回苏联。实际

上，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找出任何根据用于指责苏联违反 1962 年和 1970 年的谅解。但是，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基辛格口头指示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扣下”莱尔德的要求。苏联北极熊式侦察机从来就没有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问题，但是国防部责备国务院没有采取行动，损害了协调政策制度的信心。^①

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于 1972 年 5 月在莫斯科和 1973 年 6 月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这两次首脑会议标志着美苏两国之间新缓和的高涨点。在美苏两国，特别是在美国，在缓和过程正在顺利进行后，就要来详细阐述缓和的思想和计划。而且，尼克松尽管呼吁开创“谈判的时代”，但是甚至在第一次首脑会议前夕就准备提出轰炸河内来危害它。尽管有迹象说明尼克松处于优势地位，但是苏联对缓和更加浓厚的兴趣使他们沿着缓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政治缓和的开路先锋，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关于战略进攻武器的临时协定是 1972 年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标志着在军备控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次首脑会议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在首脑会议最后一天签署了名为“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的文件。它代表一种缓和宪章。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是苏联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重大成果。尼克松和基辛格、美国政府和公众都很不重视这个文件，认为它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这个文件是根据尼克松的命令由基辛格和他的班子秘密谈判的，连国务院都不知道，他们认为这个文件不过是对苏联的纠缠不休作出没有害处的让步而已。

美苏关系基本原则与其说是代表两国行为准则的现实基础，不如说是代表两国的抱负。美国政界批评得最多的条款是承认

^① For more on these Cuba-related events of 1970-72, see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 87-95, and 338-41, although I have added a few details here.

“和平共处”是处理关系的基础，当然不是因为希望战争，而是因为这是苏联长期以来的宣传口号。最玩世不恭的是双方承诺不谋求“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实际上，美苏两国一直都在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因此，当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行动是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单方面的优势时，就指责另一方违反美苏关系基本原则。但是，关于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的协议至少是承认，双方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该采取克制的、文明的行为。遗憾的是，对于一方认为可以接受而另一方则认为不能接受的行为，没有寻求理解上的差异。如果寻求理解上的差异，那么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本来能够起更加有益的作用，而不是在对方没有按协议中不切实际的词藻行事时成为批评对方的理由。

一年以后，1973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在会上达成的主要新协议是详细阐述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的某些内容，这是美苏两国防止核战争的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是苏联首先提出来并一直坚持的，双方领导人决心把这次首脑会议说成是发展关系的新胜利。这项协议的目的和条款出人意料，很值得称赞，内容是采取行动防止爆发核战争。美苏两国都承诺不向对方或它的盟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并就“可能涉及核冲突危险”的局势进行磋商。关于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因为这项协议涉及意图和目的，所以它的意义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完全取决于怎样解释和怎样应用它。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双方的态度明显不同，苏联是主动提出并高度赞扬，而美国是态度勉强和评价不高。对北约来说，这项协议引起相当大的苦恼。某些盟国觉得，这项协议似乎侵犯美国承担的联盟义务，代表走向超级大国“共管”的一步棋。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协议，除少数例外，事先竟没有同盟国商量或征求意见。

或许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超级大国新的“谈判时代”及其在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具体体现，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心。战略均势和相互威慑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苏缓和的基础。这是承认现状，如果一方首先发起进攻，那么另一方仍然有能力摧毁对方。尼克松了解并接受这种现实。基辛格也心中有数，他说：“时代的挑战是，要我们把竞争的现实性同共处的必要性结合起来。”当然，苏联承认均势比较容易（因为同美国优势相比，均势标志着重大的进步），而美国承认均势比较困难（容易遭到国内政治上反对派的批评）。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设想，他们的任务是“控制苏联势力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美国要承认苏联扩大势力和出现战略均势的现实。但是，它还意味着美国要采取一种战略去遏制苏联的势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指望利用缓和把苏联约束在白宫编织的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的关系网中。在这种新的、相互依靠的关系中，迫使苏联领导人面临“对缓和的刺激和对不妥协的惩罚”。

当然，苏联领导人对缓和有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且希望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上，“设法”使美国从优势过渡到均势。

回想起来，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协议和防止核战争协议对影响冷战的过程及其结局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没有像有些批评家所担心的那样对美国或西方的决心或行为起削弱作用，当双方继续进行冷战时也没有节制任何一方追求优势和估计风险。但是总的说来，企图建立抑制战争危险的缓和宪章很可能是正确的，也许比能够肯定的作用更加有用。但是，缓和显然不能靠词藻和宣言来实现，美苏两国必须拿出实际政策来。20 世纪 70 年代，虽然双方宁愿缓和而不愿放纵对抗，但是仍然处在冷战范围内。缓和是进行冷战的一种更加老练的、不那么好战的做法，而不是取代

冷战。^①

1972 年第一次首脑会议以后，尼克松总统的行为很好地说明，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缓和的掩盖下继续竞争。^② 尼克松直接从苏联飞到伊朗，企图根据尼克松主义把伊朗国王树立成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总督。伊朗国王要什么武器，美国实际上就答应给什么武器。尽管有缓和，但是美国仍然企图在苏联周围建立地区性的实力地位。此外，尼克松总统在德黑兰接受伊朗国王的建议，秘密武装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伊拉克刚刚同苏联签订一项友好条约）。因此，库尔德人就变成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代理人。后来美国倡议，伊朗国王引诱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在 1975—1978 年间脱离同苏联的紧密联盟，改善同巴基斯坦的关系，镇压阿富汗左派。1978 年 4 月，达乌德逮捕了共产党领导人塔拉基、卡尔马尔、阿明等人，导致卡尔奇军事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把政权移交给人民民主（共产）党，导致阿富汗内战，最终引起苏联干涉。

尼克松总统从伊朗飞到波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959 年他访问波兰时也受到热烈欢迎），不仅说明美国支持多多少少有不结盟倾向的共产党政权（尼克松于 1969 年访问罗马尼亚，1970 年访问南斯拉夫，1972 年访问中国），而且也说明在缓和的掩盖下，苏联联盟的任何部分都仍在美国的利益范围内。

在这次谈缓和的首脑会议上，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已经同美国秘密接触的安瓦尔·萨达特 6 个星期后把两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和苏联侦察机）驱逐出埃及。

^① See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especially chapters 1, 2, 9, 10 and 28. Détente as understood and practiced by Nixon and Kissinger in the 1970s was very much akin to détente as I had described it in my memorandum of November 20, 1968, cited above, pp. 239 - 42.

^② The paragraphs that follow are drawn from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p. 1135 - 37.

几个月后，1972年9月，在美国的鼓励下，中国同日本恢复外交关系。12月，在中苏边界发生新的武装冲突。

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完首脑会议后，一回到华盛顿就立即要求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而且还要求增加战略武器。国防部长莱尔德甚至要求，他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条件是国会批准新的军事计划。他说，新的军事计划是必要的，以便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

我不是说苏联认为美国应该对缓和的失败负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也不是说美国同苏联竞争是错误的。但是必须承认，20世纪70年代，苏联和美国都在努力“推行缓和”，苏联没有违反美国坚持的重要标准。关于在1972年协议中宣布的“不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谋求单方面的优势”这种基本原则，每一方都用双重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和对方的行为。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在执行现实的缓和政策。但是，每一方都在谋求让对方接受自己理想的缓和观点，结果是每一方都对对方的行动感到失望而加以批评。

在阐明缓和的意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政策中应用不一致，而且双方还难以向各自的政治机关和全国的公众解释：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缓和紧张关系时，为什么还要增强实力提高警惕继续同它竞争。其实，在增强实力提高警惕同谋求缓和紧张局势这二者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但是，缓和的对手可以说，模糊敌人的形象至少会侵蚀国民的决心。

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发表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关于外交政策战略和成绩的年度报告，来迎接这种挑战，要求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在外交关系方面建立自己的声誉。这种思想是好的，总的来说，这些报告也写得很好。这些报告由基辛格的班子起草，基辛格本人审阅，尼克松总统签字。虽然尼克松在编写这些报告中实际上没有起什么直接的作用，但是这些报告确实体现了他的外交

政策战略。虽然尼克松非常依赖基辛格，但是他在制订外交政策战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发表了四个报告，第一个报告是在 1970 年 2 月 18 日发表的，其余三个报告是在以后三年中每年的年初发表。（第五个报告计划在 1974 年初发表，已经起草但是从来没有发表，因为发生了水门事件。）所有这些报告使用的总标题是“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每个报告使用一个强调和平的标题：“和平的新战略”、“缔造和平”、“正在出现的和平大厦”和“正在形成的持久和平”。虽然缓和战略形成了，但是直到 1973 年的报告才正式使用缓和这个词来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此小心翼翼地公开宣称缓和，以及美国政策许多特点的自我服务性质，都破坏了这些报告要起的作用。这些报告的公开影响是很小的，没有成功地建立起对缓和战略的真正理解。

前面已经说过，基辛格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这些报告的起草工作，勉强地允许国务院和国防部看这些报告。我有幸成为国务院中能够看这些报告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还能够证实基辛格的班子非常不愿意修改这些报告，除非出现明显的事实错误。

国务院，或者说得更加精确一点，是国务院中的一些高级官员，早就觉得：原先那种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惟一重大的报告是国防部的年度报告的看法是错误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不仅包括国防活动，而且还包括政治军事政策。白宫关于外交政策战略的报告一出现，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但是国务院却更加受到排斥。因此，关于美国的外交关系，国务院努力去写一份更加全面的报告。1971 年 2 月下旬发表第二份白宫报告后，国务院几个星期后发表第一份报告，标题是“1969—1970 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国务卿的报告”，呈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本上相同于国防部长年度报告的习惯做法）。它的篇幅是白宫报告的四倍，共 600 多页，但是它基本上是我们外交关系的一份目录，几乎是总统关于政策和战略报告的附录。1972 年和 1973 年，第二份和

第三份国务院报告也都是在白宫报告后发表的。但是，1973年基辛格取代罗杰斯担任国务卿后，国务院的系列报告就中断了。

虽然使缓和幻想破灭的种子一开始就存在，但是1972—1973年美苏两国领导人仍然很乐意强调积极赞成缓和紧张局势。

对缓和的第一次打击是1973—1974年水门事件严重削弱尼克松总统的地位。虽然没有间接涉及缓和政策，但是尼克松的政治地位削弱说明他不能积极地奉行缓和政策或防止后来破坏缓和的行动，例如国会加强努力控制美苏关系。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从1972—1973年开始努力控制贸易政策和军备控制政策，1974—1975年阻止尼克松政府和继任的福特政府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阻止贸易正常化，扼杀了美苏贸易协定。1973年10月爆发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使有些人不支持改善美苏关系。美国政府又使用双重标准说，苏联在1975—1976年的安哥拉内战中支持一方是同缓和行为背道而驰（但是美国也卷入安哥拉内战，支持比较弱的另一方）。美苏缓和走下坡路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这是后面第十七章要讨论的问题。

只有以欧洲为中心的多边缓和才能继续取得成功。西欧带头在欧洲奉行东西方缓和，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总统戴高乐首先这样做了，接着是70年代初期西德总理勃兰特也这样做了。这些事情对美国政策产生了影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运用同苏联和中国关系中的影响来执行自己的缓和政策，但是他们谨防西欧的缓和倡议，主要因为他们无法控制。1973年初期，基辛格公开提出1973年是“欧洲年”。但是，美国人奉送“欧洲年”并没有取悦欧洲人，整个倡议烟消云散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认识到，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勉勉强强接受欧洲的东西方缓和，以便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并更好地控制缓和的进程。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福特和卡特再也不能控制缓和进程，

美苏缓和削弱并崩溃了，而欧洲缓和却欣欣向荣。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后期这段时间里，美国对东欧政策的基础是实际上接受共产党统治的现实。美国在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中执行“区别对待”政策，对有迹象表明内部自由化或不那么依赖莫斯科的国家提供若干贸易和其他刺激。这些国家的灵活性和美国施加影响的手段都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施加影响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西欧国家更加倾向于使贸易和其他关系正常化，而不是非常注意推敲“区别对待”，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尽管在政治上分割开来，但是欧洲仍然是欧洲。

多边外交也帮了忙。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和北约要求共同均衡裁军，而苏联和华沙条约则提出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大会。在 1972 年的首脑会议上做成的交易是：如果苏联同意举行共同均衡裁军谈判，那么尼克松就同意举行欧洲安全和合作大会谈判。1975 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多边首脑会议上签字的欧洲安全和合作大会胜利结束，但是经过努力仍然没有打破共同均衡裁军的僵局。西方这时觉得共同均衡裁军是一个包袱，而欧洲安全和合作大会则是东西方外交的一次胜利。

1973 年 1 月共同均衡裁军初步会谈开始时，我刚刚离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但是仍然是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而且受命主持跨部门的共同均衡裁军工作小组，支持在维也纳的美国代表团。我必须努力使华盛顿各机构的代表统一意见，然后帮助在维也纳会谈的美国代表乔纳森·迪安在北约代表中统一意见，默许苏联意欲把匈牙利排除在假定的限制之外。采取这种立场有许多正确的理由，但是不容易论证我们不应该要求极大地削弱华沙条约。真正的理由是，在基辛格与多勃雷宁（没有向我们的盟国甚至华盛顿的机构透露的）初步会谈中，基辛格已经向多勃雷宁大使作了这一让步。（虽然我们的某些盟国很怀疑，但是直到 1985 年我第一次透露出来，才向他们和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我参加共同均衡裁军谈判的时间很短。1970年起，我一直在监督国务院的有关准备工作。1973年初期我在华盛顿起支持作用几个星期后，我（去日内瓦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作几乎是秘密的私人访问途中）到维也纳短暂访问了共同均衡裁军代表团。以后不久，副国务卿约翰·欧文不能参加核查小组在白宫讨论共同均衡裁军的一次会议时，我不得不代表国务院。以前我作为欧文班子的顾问参加过这些会议，但是当我以国务院临时代表的身分出现时，基辛格大发脾气（当环境迫使他同不属于他自己的班子、级别又低于副国务卿的人打交道时，他总是发脾气）。基辛格当时是否采取行动，或者叫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来采取行动，我不知道。但是结果来得很快，也很明显：建议国务院把加特霍夫调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调离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和其他任何同东西方问题有关的事情。

因此，我再也不能起政治军事事务局副局长的作用了，这个职位是代表国务院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和其他东西方问题的。现在，我不仅需要得到一份新的工作，而且还需要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做些事情。首先，美国新闻署早就要求一位有见识的美国官员去访问日本，同日本官员、学术人士和新闻界代表讨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我接受了这个要求。日本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美苏战略关系很感兴趣，但是也有点焦虑。我从来没有到过日本，所以我在四月份去日本几个星期，走访了几个城市，同几个小组交谈。我回到美国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外事学院进修法语。与此同时，外事学院决定成立高级进修班。一位副国务卿（不再是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他这时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团长）把我叫去，向我解释说：（白宫）“把我调离火线”也许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不会忘记我，一年后，事情就会冷下来，我就能够起更加积极和合适的作用。我心存疑虑，

但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

高级进修班于 1957 年开办，相当于军事学院的外事班，为中级官员提供一学年的进修机会，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高级官员。它是一个设想得非常完美的机构，为提升中级外事官员提供机会，典型的情况是，为在国外的代表团和在国内的国务院工作超过 20 年的官员提供机会，用 10 个月的时间研究范围广泛的问题，不是研究外交或外交政策，而是研究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政府同外交关系的总关系。这是一个精彩的经验，使外事官员适应我们自己正在变化的社会的一种极好的方法。学员们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实地考察，参观工厂、农场、研究实验室、监狱、大学和军事设施，同商人领袖、工人领袖、农民、法官、地方官员、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交谈。虽然我们大家的经历不同，但是这种社会接触使我们的眼界很开阔。1973—1974 年，我被选为第 16 届高级进修班主席，因为我是高级成员，这个班里的头号外事官员。

我要指出高级进修班的另一个特点：每个成员都有一个研究项目。我选择去写五个国家外交部政策计划的比较研究，访问了巴黎、伦敦、罗马、波恩和莫斯科，会见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计划官员。结果证明这是件令人感兴趣的、有用的事情。我向苏联外交部许多政策计划官员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他们告诉我的东西比他们应该告诉我的东西要多得多）。顺便说一下，苏联政策计划班子是“计划外交政策措施的理事会”，反映苏联的观点；国家政策目的由更高一级来决定，但是特殊的外交政策措施是外交部注意的合适题目。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我的发现很感兴趣。

我从“火线”调到高级进修班对别的人都不重要，但是反映在同苏联的缓和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参加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的专家代表团全部撤换了，代之以由亚历克西斯·约翰逊领

导的一个有能力但是不积极的执行小组。在莫斯科，杰克·比姆大使于 1973 年初回国后，隔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派出他的继任者（沃尔特·斯托塞尔，一位有经验的但是谨慎的专家）。因此，在华盛顿首脑会议和阿拉伯—以色列十月战争期间，美国在莫斯科没有大使。1973 年 10 月，威廉·罗杰斯走了，亨利·基辛格成为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正常渠道被“秘密渠道”代替了。

缓和在进行，但是由两个人负责。1973—1974 年水门事件以后，理查德·尼克松下台了，基辛格四面楚歌，虽然得到下届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支持，但是他的地位大大削弱了。

第十五章

视察美国驻外使团工作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使我得以审视冷战年代驻外人员的作用和工作。它是外事人员指派任务的结果。因为指派任务通常是在竞争职位的人中间事先早就决定了的，所以我在高级进修班的那一年就已经在为以后“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基辛格已经成为国务卿，许诺我“不会被忘记”的副国务卿离开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件事被他说中了，我的确没有被忘记。当外事局局长推荐我做驻毛里塔尼亚大使，后来又推荐我到另一个小使馆去时，都被国务卿办公室否定了。事情很清楚，基辛格不会批准我主管任何使团工作。这时，我偶然遇到一位旧友吉姆·萨特林，他那时担任国务院视察长。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高级视察官，他说，这是一项比大多数官员的想象要有趣得多的工作。我仅仅是礼貌地回答要考虑一下。但是，几个月后，我的确开始考虑这件事了，这项工作似乎越来越吸引我。我坚持我的想法，1974 年被派到视察署工作。

我在那里的第一份工作是“特殊检查”，不是例行视察驻外使团，而是详细研究国务院工作的一个特殊方面，即国务院最高层指派任务和确保执行的程序。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是关键的中心环节，确保“首长”和“局”在国务院内的垂直和平行联系。“首长”是指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局”是指按地理或职能划分的执行机构，例如欧洲事务局和政治军事事务局，每个局的局

长都由一位助理国务卿或相当职位的人担任。负责管理的副国务卿帮办要求督察长检查首长和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对各局的工作分配过程以及各局的反应，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这个系统的运行并未达到应有的那么好。他还可能意识到，出现这些缺点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首长包括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并未按照既定程序办事。如果能够由督察长办公室提出这个结论，那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可能容易些。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检查这个过程的主要发现之一。

首长要求的以及各局呈送给首长的行动备忘录和研究报告的总数，每天大约 100 件，一年大约 35000 件。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在于国务院内部工作的处理情况。（不包括每天从 100 多个大使馆和使团收到的数千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以及每天要求起草和授权发出的同等数量的电报。1974 年，国务院在国务卿名下发出和收到 100 多万份电报。）

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能够指导或监督工作安排，确保需要参加的人参加，确保完成指派的工作，条件是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知道指派的工作以便把各项工作输入它的监督计算机。这个系统运行状态良好，但是绕过这个系统越多，就越不可能保证最好的结果。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常规渠道外的要求可能使一位首长做出决定并且按此决定行事，而总部和控制系统或其他首长都不知情，甚至出现两位首长作出的决定背道而驰。因为情况紧急，走捷径可以节省时间，所以往往不使用常规渠道。国务卿（或其他首长）给助理国务卿（或其他人）的口头要求或指示，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常常不知道，除非有人通知他们。此外，口头要求通常是不精确和不清楚的，有时是通过电话，在各局中间用各种各样的特别方法来处理。有时，口头要求是故意的，以此来减少外人参与，使得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在某些情况下，绕过秘书处是正常的（例如对华政策），但在其他情

况下则是特殊的和不一致的。同样，从 1973 年中期到 1974 年中期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限制发行的特殊目录的次数达到了以前的 4 倍，目的是使知道情况的人越少越好。

没有必要在此详细叙述我的报告。许多程序上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但是最敏感的问题，首先是国务卿倾向于绕过国务院系统的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小心谨慎，主要依靠各局确保国务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知晓任务安排，国务卿明确要求保密的情况例外。

在很有兴趣地评估了国务院管理功能的这一个重要方面后，我花了 3 年时间进行 8 项“关系处理”的视察，目的是评估美国对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及其管理和执行。一个视察小组开始在负责该国的局办公室或委员会工作，熟悉该地的工作和问题、相关的政策文件、跨部门的和国务院内部的协调、国务院和该地区各职位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检查该局办公室主管的国家或地区里的职位的工作。结果是视察和评估了美国处理同一个特定国家关系的所有方面：包括政策的制订和衔接、国务院内部的协调、国务院与其他机构的协调、国务院该局和该地各使馆间的协调、驻外使团内部的管理、该地各职位执行政策的情况。

每一个视察小组都由一名高级视察官任组长，组员通常有 3—5 名视察官。根据国务院的规定，“高级视察官”相当于使团团长。因为他必须评估大使的表现，所以最好他从前也当过使团团长，但是并非我们当中的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高级视察官当然要负责整个小组的工作，对每个受视察的职务负责写出全套视察报告。因为必须评估每个岗位的所有职能，所以对政治、经济、领事和行政都要有一定的经验和专长。视察官必须是合格的金融审计员，在其他管理功能方面也应该有经验。对某些岗位来说，在商业关系、经济援助计划或政治军事事务方面也需要有专长。因此，每个小组的人数和资格都要根据受检查职务的性质来

决定。

我对关系处理进行的 8 项视察始于 1974 年，结束于 1977 年，其中包括当时最大的 3 个大使馆（巴黎、马尼拉和曼谷），每个大使馆都有大约 500 名美国人和多达 1500 名当地人。中等和大型的大使馆（50 到 100 多名美国人）包括罗马、渥太华、特拉维夫、马德里、里斯本、利马、基多和仰光。我们还视察了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小使馆以及在那些国家的 20 多个领事馆。

这次视察得出了对全球范围总的看法，提出了很多问题。例如，1975 年春我在曼谷，当时我们在南越西贡和柬埔寨金边的大使馆都被侵占了，美国在泰国和菲律宾大量驻军的前景堪忧。1976 年，在近东和平进程穿梭外交的间隙时间，我视察了美国驻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的大使馆以及驻伊拉克的办事处。1976 年，在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这些北约国家里，出现了左倾倾向，甚至当地一些共产党恢复了活跃的政治活动，引起华盛顿的担忧，这对美国处理对外关系提出了许多问题。

视察过程有许多有趣之处，但我集中谈谈同冷战有关的内容。

我第一次视察的目标是非洲中部的几个小使团。视察前不久发生的事情生动地反映了那里的问题。美国在赤道几内亚的马拉博仅维持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大使馆，委派的常任大使驻邻国喀麦隆。赤道几内亚的专制独裁迫使大多数外国使团离开马拉博，但是我们决定留下两个人坚守岗位。突然间，我们没有那两个人的音讯了，于是派一个官员去了解情况，才得知其中一个人疯了，杀死了另一个人。没有派人去替换他们。我并不是仅仅从这一次事件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来说，我们很可以修改往每一个国家派一个常任大使和使馆班子的政策，而应该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委任一位大使管辖几个非洲小国。但是在 1974 年，美国希望往每一个国家都派大使，好像它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尤其是监视

苏联代表的活动。苏联为了威望和渗透，当时几乎在非洲每一个国家也都开设常驻大使馆（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关闭了其中的大部分使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美国在非洲搞情报主要是监视苏联外交官（往往是情报官）的行动，如果可能的话收买他们。苏联也同样这样做。

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还同几个非洲独裁者有联系并付给他们定金，最臭名昭著的是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当我们视察工作时，中央情报局开始关闭它在非洲一些小的情报站（包括过早地关闭了罗安达情报站，几年后安哥拉独立，成为冷战竞争的一个地区）。但是，中央情报局在非洲的情报网仍然很广泛。（顺便说一下，大多数非洲中部国家首都坐落在河畔，河流是主要的运输线，通常也是国境线。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注意到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的身分通常是很容易识破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只有他们才拥有同样的高速汽艇。）

位于泰国西北部靠近缅甸和老挝的清迈的领事馆是个有趣的机构。该地是中央情报局支持前国民党将军的大本营，这些前国民党将军已经成为当地的军阀，从事“金三角”的海洛因贸易。原来以为可以利用这些非正规军部队来骚扰共产党中国，但是这种想法落空了。美国秘密情报机构支持的准军事行动在我们开展视察工作几年前就结束了，但是缅甸、泰国和老挝的敌对的军阀、部族和军队仍在当地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毒品交易。我乘坐直升机观察了海洛因罂粟田。1975 年，我们的领事馆主要任务是监视该地区的这些活动（我们在山那边的缅甸曼德勒领事馆主要任务也是如此，我也视察了那个领事馆）。

我的儿子亚历山大在清迈度过了 19 岁生日，他陪伴我走过泰国—缅甸视察旅程的一部分。几周后，他返回美国，途中同朋友一道在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作短暂停留，几个星期后南越政权垮

台。他有一次死里逃生。他从曼谷到西贡，可以直飞，也可以在老挝的万象作短暂停留。最后，他决定直飞。假如他选择另一条航线的话，那么他打算乘坐的那架飞机在南越上空被击落，机上所有的人都死了，这是在战争中被击落的惟一的一架民航客机。他回到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把死里逃生的事告诉薇拉。

在准备视察泰国和菲律宾两地的工作时，我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听取过情况介绍。在飞赴这两地途中，我都在檀香山作短暂停留，向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咨询美国在这些国家大规模驻军的利弊。在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在泰国的视察结束后，我基本上根据国防部和美军司令部的计划，建议裁减美国驻军的种种办法。不久，泰国新政府决定要求美军全部撤出。后来在菲律宾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在菲律宾，我发现美军希望撤出储存在那里两个重要军事基地的核武器，但是被华盛顿制止了。在视察报告中，我没有提及这个敏感的非外事问题。回到华盛顿后，我调查了这件事，发现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制止五角大楼计划撤出核武器。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费迪南·马科斯总统那里得到些什么，作为“同意”撤出核武器的条件。实际上，马科斯希望把核武器留在菲律宾，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菲律宾对美国更重要，美国就会为此掏更多的钱。两年多一点时间后，我们撤出了核武器，双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得失。

在我的视察旅行中，偶尔出现不期而遇的机会去追求其他的兴趣。最有吸引力的机会是会见我以前就认识的一名苏联外交官。我就不提时间和地点了，也不提除涉及苏联政策制定外的其他兴趣。但是这次会面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位苏联外交官竟然主动提出通过中央情报局在当地的情报站同我见面！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一名军官告诉我，同他们有联系的这名苏联外交官得

知我到达后（毫无疑问他是从中央情报局人员那里知道的），要求情报站安排他同我见面以便恢复我们以前的对话。情报站显然在安排这次接触，目的是想招募他。他们鼓励我去见他，我很高兴这样做，既是为了帮助他们，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会见中我觉得他愿意提供信息，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结果这名苏联外交官同我愉快地共进晚餐（可能有窃听装置），由中央情报局安排和掏钱。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对话。我后来汇报了谈话的内容，但是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兴趣在于发展同这名苏联外交官的联系，而不是他告诉我关于苏联政策制订的内容。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从此我再也没有得到这名苏联外交官的消息，我猜想他现在已经退休，不再为苏联（和美国？）服务了。

尽管我没有视察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但是 1975 年我在回国途中的确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天。我受到理查德·赫尔姆斯大使的慷慨接待。他以前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卸任后尼克松总统给他安排了驻伊朗大使这个职位作为安慰（尼克松原来曾想让他担任驻莫斯科大使！）。他使我有机会四处走走，了解伊朗的情况。尽管我没有预见到 4 年后伊朗会发生巨变，但是根据我的观察，伊朗巨变并没有使我感到吃惊。

在华盛顿的其他机构和驻外使馆中其他机构的代表，当然直接涉及“关系的处理”以及国务院和对外事务。尽管我们不评估其他机构在这个领域的行动，但是我们评估它们同各大使馆和美国大使全面领导的协调和关系。尽管大使是总统委任的代表，在驻在国负责处理所有的美国官方活动，但是实际上他对其他机构所有活动的控制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一个国家，大使告诉我他完全了解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行动。但是几天后，我会见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

美国在一些国家（例如泰国和菲律宾）有军事基地，在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有单独的使团。除此之外，

所有其他驻外机构都是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在大多数国家里，外事局派出的人（包括支持人员）占不到大使馆总人数的一半，其他人则包括美国新闻处（美国新闻署的海外机构，现在又合并入国务院）的官员、国防部的官员和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官员，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国际开发署（现在又合并入国务院）官员和毒品管理局官员，偶尔还有其他部门的官员。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美国海外使团服务的美国人总共大约23000人，其中大约只有5000人是国务院外事局派出的，国际开发署派出的人在数量上大体相同，国防部派出的人比这多半倍，美国新闻署大约派出1400人，其余的人由很多其他机构派出，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国务院和国防部派出的身分作掩护。

外事局派出的男男女女对国家幸福和安全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从前，一些恶毒的批评家丑化外交官的形象，说他们是穿着条纹裤泡在宴会社交中混日子的人。现在，外交官的形象变成在国外服务的官僚。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都深深地误解和低估了外交官员所起的作用。从重要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协议的谈判，报告世界各地事态的发展，到帮助在海外的美国人摆脱麻烦的日常工作，他们都代表美国的利益并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外交人员当中有许多非常聪明而坚强的男男女女，他们必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危险的使命。

外交人员同我们的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一道，站在冷战的前线。几乎没有人知道，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期间，大使在任上遇害的人数超过将军。在五位遇害的大使中，就有三位是我的朋友。

罗杰·戴维斯于1974年8月在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大使馆遇害，弗朗西斯·梅洛伊于1976年6月在黎巴嫩的贝鲁特被绑架谋杀，阿道夫·达布斯于1979年2月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被绑架枪杀。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级别的外交人员被害。

在这里，我不打算回顾历次视察的发现，但仅举一例也许是

有用的。1976 年我们视察了美国同西欧国家关系的处理情况。

美国同西欧盟国的关系历经三年动荡后，我们的政策处在关键时刻。1974 年 7 月葡萄牙左派军事集团夺取政权后，国务卿基辛格变得非常悲观，认为难以阻止共产党执政。实际上，他的主要努力放在警告北约其他国家或许也会左倾，而且不让葡萄牙完全参加北约的事务。（基辛格的应急计划甚至扩大到美国谨慎地同公认的葡萄牙分裂主义者接触。如果里斯本成立共产党政府，他们就准备宣布亚速尔群岛独立，确保美国继续控制在亚速尔群岛上拉杰斯重要的美国空军基地，使它不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驻里斯本大使弗兰克·卡卢奇很不赞成就这样把葡萄牙一笔勾销，幸亏西欧社会党介入，加强了一种非共产党替代办法。就在我视察后不久，1976 年 7 月，一个由安东尼奥·拉马尔霍·埃尼斯领导的温和政府稳定了局势。同时，1975 年 11 月，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帅去世，人们担心继任政府的稳定性。在 1975 年和 1976 年的意大利大选中，共产党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出现不那么闹宗派主义的、比较受欢迎的“欧洲共产主义”，使得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很紧张（但是，我后来讥讽说，这种欧洲左派“与其说是阴险的，不如说是笨拙的”）。这种形势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问题。

这些关于我们政策和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同关于我们处理关系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说明，当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包括希腊和塞浦路斯）内部发生危机时，或者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处理同一个国家例如法国的重要问题时，总是由国务卿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直接控制。我们在视察中发现，国务院西欧司和我们在西欧的大使馆在工作上受到牵制，因为他们“不总是能够听到国务卿等高级官员的意见和决定”。正如我们指出的：“尽管在实践中可能会发现其他优点，但是这种情况

无助于顺利地、一贯地处理关系，也不能最有效地利用国务院有关司局或大使馆。”

国务卿有权制定和执行他认为合适的政策，我并不是向他的这种权威挑战，但是我真的认为应该考虑这样做的代价，应该考虑改变某些做法以减少不利因素，同时保守机密和控制政策。因此，我的报告继续写道：

显然，国务院最高管理层已经决定，保密高于一切，宁愿为了保密而不让大家参加政策制订，不让有关机构了解有关政策的情报。但是我们建议，应该让大家都来参加基本的政策评估和完善过程，把跨部门批准的政策指示建立在华盛顿检查大使馆评估的基础上，用另外发给大使的机密指示作为必要的补充。

国务卿和几名受到信任的助手严格控制，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这种额外的负担本来是可以免除的。“因为政策制定及执行的一些重要方面甚至在国务院内部也是由高级官员严密控制的，所以有关各种问题的大量信息都必须通过第 7 层楼的首长，他们熟悉错综复杂的政策和高层交流。如果办公室主任也知情的话，他就可以使信息流动通畅，就不会有现在的安排引起的使整个系统负担沉重和拖拖拉拉。”

我还发现，高层交流保密的过程会对其他官员充分发挥作用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我们的官员在同法国官员交换情报时有时处于不利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欧洲局和巴黎大使馆在重要问题上向国务院首长提供幕僚支持。”

最后，缺乏正式指导使政策难以执行。例如 1976 年在法国，我们发现，大使馆官员不清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同社会党成员保持接触。华盛顿的指示草案甚至含糊其辞，一会儿说“尽可能离

间社会党和共产党”，但是又说“我们缺乏这样做的办法”，一会儿又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有可能伤及自身”。这种政策指导太不清楚了。

当然，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外事视察官是否应该注意国务卿行为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在我视察西欧后举行的年度视察会议上，国务卿说他希望视察工作更多地集中在政策执行而不是政策制订的有效性上。他的亲密助手拉里·伊格尔伯格后来在 1991 年短期担任过国务卿职务。拉里私下告诉我说，对我的报告，基辛格最初的反应是暴跳如雷，要打电话取消视察署！相反，几个月后，下届政府查阅记录，把国务院最高荣誉奖颁发给视察署，以表彰我们从 1975 年 4 月到 1977 年 3 月这两年的工作。

在以前一次比较友好的相遇中，亨利·基辛格曾经对我说：“你会大有前途的，雷，你会大有前途的。”我在几次走遍世界进行视察工作后，感到弄懂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作为外事人员中的一名高级视察官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益的经历。总视察官鲍勃·塞尔大使在他对我的评价报告中说：“加特霍夫先生担负的视察任务不是容易做到的，肯定需要高超的机智、坚韧和专业判断，而不是只需要一点点勇气。正是由于钦佩他这种不同寻常的表现，我才强烈推荐他担任美国驻一个东欧国家的大使。”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第十六章

驻保加利亚大使

1977年4月中旬，我视察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刚刚回国，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务卿推荐我做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我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国务卿已经批准，还意味着白宫也同意了，但是还需要经过几个月的确认程序。

我很高兴。薇拉也很高兴。1963年我短暂访问索非亚时，这个国家特别是索非亚保存完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建筑把我迷住了。我感兴趣的是巴尔干半岛上这个斯拉夫小国的历史以及苏联集团在东欧的政治现状。当然，保加利亚是一个“铁幕”国家，冷战现实的种种因素限制了美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

参议院对提名我的听证会于7月25日进行，这是一次简短的例行公事。只有新泽西参议员克里福德·凯斯提出了问题，这是故意安排的，目的是证明我对保加利亚很了解，也说明美国的政策是谨慎的，不是敌对的。一些助手立即提出了有关问题，如保加利亚的历史和经济，我轻松地作了回答。但是，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除非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不论我说什么都无所谓，甚至没有人注意。8月5日，在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主持下，我宣誓就职。

同时，7—8月间我的主要准备工作是在外交学院上7周的保加利亚语课程，这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还翻阅了东欧司有关保加利亚的档案，使自己熟悉索非亚大使馆的交往记录、工作范围

和存在的问题。我还访问了其他与保加利亚有关的机构以及在索非亚大使馆派驻有工作人员的一些单位。

我例行要求会见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我询问过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维斯特，对我有什么政策指示。他回答说，“雷，你比我更了解这个国家和问题，我没有任何指示给你。”这就是我从国务院得到的政策指示。（我从白宫也没有得到任何政策指示，但是我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欧事务的工作人员那里摸了底。）9月份，就在我起身前往索非亚时，一个新的、正式的关于东欧的政策指示得到了批准，这就是总统指示 PD—21。在我听到的情况介绍中很少提起这个指示。

美国对中欧和东欧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总统指示 PD—21 并不表示这种政策有很大的改变。这种政策有两条标准，一条是这些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条是他们在国内的自由化程度，这两条标准在苏联集团的控制下都是可行的。^① 执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鼓励更大的独立性（比如罗马尼亚）和自由化（像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一些人倡议要求这些国家在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改革（例如，罗马尼亚是国内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但是这样做会过分限制美国鼓励改革的回旋余地。此外，这个新指示对这些国家放松了过分严格的等级划分。老的指示规定，只有等到美国对等级高的国家全都采取一项措施（例如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后，才可以对等级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采取类似措施。实际上，卡特政府所作的惟一改变是把匈牙利提升到同波兰和罗马尼亚同样的等级。

^① For background on the evolu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a concise review is given in my chapter “Eastern Europe in the Context of U.S. – Soviet Relations”, in *Soviet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Sarah M. Terry, pp.315 – 48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for detailed accounts dealing with the 1970s and 1980s, see the relevant chapters in my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 –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Brookings, 1994) and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 – 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rookings, 1994), respectively.

要的诱因是归还匈牙利皇冠和珠宝（这些物品是 1945 年由逃离苏联占领区的匈牙利官员出于安全考虑交给美国军队保管的），后来在 1978 年，匈牙利得到了最惠国无歧视贸易地位。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政策修改的主要人物。修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行他在约翰逊政府短暂供职期间就主张的“和平相交”（“peaceful engagement”）策略，但是对抗的方式比以往的“建立桥梁”策略要温和些。基辛格则试图主要依靠把苏联拉进一张关系网，让苏联更多地维持现状，而不是破坏现状。他不太重视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布热津斯基更加强强调促使苏联发生积极的变化，一部分措施是鼓励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这也是美国打算同时实现的一个目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务院倾向于把内部演变和自由化看成是希望得到的缓和成果，而不是在美国的影响非常有限时更加积极努力推动内部演变的目的。

不管怎么说，美国东欧政策有限运用范围的变化是可有可无的，美国的影响也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即使是放弃从未发表过的等级划分也是不知不觉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 1978 年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诙谐地问我，美国在东欧是否最不重视同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关系。同样，1979 年，在联合国大会年会的外围，国务卿万斯会见了每一个东欧国家的外交部长，唯独没有会见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保加利亚人对此十分敏感。其实那不过是未经安排的临时决定，但是保加利亚人不太相信这种解释。

在我动身前往保加利亚时，改善关系的机会不大，但是至少两国的利益冲突也很小。当然，严重的现实是我们站在冷战街垒的对立面。

1977 年 9 月 14 日，我抵达索非亚。在 48 小时内而不是通常等一个星期左右，我就向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共产党第

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递交了大使国书仪式非常热闹，参加仪仗队的保加利亚士兵身材高大，穿着 19 世纪末的巴尔干制服，一点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样子，而是地地道道的保加利亚人。我们俩人都简短地发表了准备好了的正式讲话，表达了互相的愿望和两国政府改善关系的期望，然后转入随意交谈。在日夫科夫的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没有料到他会说出一句挑衅性的话，说我是著名的苏联导弹专家，但是，我不会在保加利亚发现这些导弹。我安慰日夫科夫说，我是来寻找改善美国同保加利亚关系道路的，而不是来寻找谁的导弹的。美保关系并不坏，但是，尽管双方都有礼貌地保证愿意改善关系，然而在大环境下显然双方的关系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日夫科夫说，只要我提出要求，他随时都可以见我，但是这不过是外交辞令。在以后的两年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同他简短交谈，更别提实质性的讨论了，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我同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倒是有过几次认真交换意见，几次提出真正有关两国关系的问题。

和我打交道最多的主要官员有外交部长彼得·姆拉德诺夫、副外长鲍里斯·茨维特科夫、副总理安德烈·卢卡诺夫和大使柳本·戈采夫。姆拉德诺夫虽然只有 41 岁，但是已经当了 6 年外长，最近又提拔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卢卡诺夫只有 39 岁，刚刚当副总理，负责保加利亚的对外经济关系。戈采夫大使当时是外交部第四司（处理同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关系）很能干的司长。我同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建立了良好关系。薇拉和我同戈采夫夫妇和姆拉德诺夫夫妇也有令人愉快的社交往来（经常同戈采夫夫妇见面，自然不那么经常同姆拉德诺夫夫妇见面）。例如，每逢薇拉生日，姆拉德诺夫都没有忘记给她送玫瑰花。当然我们没有向外交界的同事提过这件事，（当然除了苏联大使外）他们中没有人同外长及其夫人有这种私交。

在索非亚的美国大使馆规模相当小，只有 61 个人，其中 26

人是美国人，35人是保加利亚人。关键人物是非常能干的代表团副团长查尔斯·马吉。我对大使馆人员很满意，他们表现出色，工作团结。在代表团内部，没有严重的摩擦或缺点。

就在我抵达索非亚前，这个大使馆（还有驻东欧的其他6个大使馆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大使馆）的地位已经从3级降到4级。这是国务院的内部分类，并不影响我们大使馆的实际工作，但却承认现实降低这些大使馆的行政级别这种比较例行的建议确实引起一种有趣的政策干涉。国务院欧洲司官员接受了推荐这种改变的视察报告，但是要求做一修改：保留布加勒斯特大使馆的3级地位，希望改善同罗马尼亚的关系也许会证明适当扩大布加勒斯特大使馆是正确的。国务院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这确实标志着由视察建议引起的变化，所以在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备忘录上做出有色标记。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欧事务的官员向他的上司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汇报了这件事。布热津斯基急于鼓励东欧出现离开莫斯科的独立迹象，决定尽管有严格的内部规定，但是还是应该更加重视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因此他建议，不是把布加勒斯特大使馆保持在现在的级别，而是应该提升到2级，和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同等规模，比维也纳大使馆规模大。欧洲司本来就不希望降低布加勒斯特大使馆的级别，现在也不希望提升它的级别。但是布热津斯基很坚决，国务院就没有反对提升级别（从来就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务卿万斯那里去解决）。所以把布加勒斯特大使馆升到2级，而把其他的大使馆降到4级。

尽管索非亚大使馆很小，我们的工作也很平凡，但是仅1978年这一年，我们就向国务院发出3200份电报（大约每天10份），收到国务院发出的11000份电报，大约每月平均收发1300份电报。如果说索非亚大使馆一年发给国务院3000多份电报似乎过多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个月，比如1978年3月，国务院从世界各地共收到106478份电报。

有一个行政上的问题也许值得作简要评论，这就是在冷战期间美国驻共产党国家大使馆的安全问题。一方面，这些国家严格的内部控制说明，防范刑事犯罪和恐怖行动普遍做得很好（我们的确受到过一些威胁和警告，但是保加利亚当局非常重视）。主要问题当然是我们行动的安全性，要避免保加利亚特工人员的注意。某些形式的监视是例行公事，必须牢记。我们从不认为办公室是安全的（一个特殊的保密会议室除外），但是美国安全人员带着特殊仪器定期前来“检查”我们的办公室和住所。意料之中的是，当地的保加利亚雇员也许会泄露所见所闻。例如，我的保加利亚司机西米恩总是开车把我和薇拉送去参加各种官方活动和社交活动，以及去各地旅行。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所以我们根本不去想他肯定会经常汇报我的全部活动。

我们在保加利亚没有遇到过什么安全风险。但是同一时期在东欧的其他国家，发现有人偷偷地在美国大使的一只鞋后跟里安装了扩音器，企图让他把扩音器带进“保密”会议室。在一个东欧国家，当地司机勾引了美国大使夫人，当然怀疑这个司机是该国特工人员，但是不知道是否已经泄漏了机密文件（这回不是出于勒索，而几年来在莫斯科一名法国大使和其他几名西欧外交官却受到过勒索）。实际上，我们不得不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举一动都有目共睹，毫无隐秘可言，只是不太注意这种情况只管干自己的事情罢了。

北约国家驻索非亚的大使们在非共产党使团内部组成一个社交核心。我们每月举办一次午餐会，轮流做东，但是不谈政治，我也就视其为社交场合。由西方外交官和倾向西方的外交官组成的社交圈子构成了他们在索非亚的活动中心。这个社交圈子实际上不接触保加利亚人。在这个社交圈子里，几乎没有真正的东欧专家或共产党事务专家，但是法国大使克里斯蒂安尼·马利特钦科、奥地利大使迪特里希·布科什以及南斯拉夫大使拉多范·乌罗

塞夫是例外。我和马利特钦科在华盛顿相识。布科什是一位语言学家，以前曾任职于莫斯科和北京。乌罗塞夫对保加利亚内政了如指掌，仅次于苏联大使。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派有很好的代表，但不是该地区的专家。

苏联大使是弗拉基米尔·巴索夫斯基。苏联驻东欧共产党盟国的大使通常是职业党务工作者，而不是职业外交官。西欧大使（和我的前任）同巴索夫斯基和他的大使馆很少接触。但是我发现同他接触是令人愉快和富有成果的。我和薇拉都能讲俄语，同他易沟通，甚至偶尔单独会面。关于苏联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和保加利亚的内政，我从他那里了解的情况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了解的情况都多（除了从南斯拉夫大使那里了解保加利亚的内政）。巴索夫斯基是一位友好的、极认真的苏联人，又是一个厌倦了的职业共产党官员。相反，他的妻子却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我认为她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少数人中间的一个。我还认识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参赞鲍里斯·皮亚德舍夫，我们俩都对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军事事务感兴趣。我熟悉他的著作（大部分用笔名鲍里斯·德米特里耶夫发表），包括对我的一本书的批判性评论。（今天，他是受到尊敬的俄罗斯杂志《国际事务》的总编辑。）

1979 年初，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索非亚。陪同他访问的有：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新近提拔到政治局，他是第一次访问保加利亚；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刚提拔到党的书记处。大多数外国国家元首来访，照例要邀请外交使团前往迎接，但是这次却没有邀请我们迎接勃列日涅夫，所以我们只能从报纸上跟踪这次访问。但是从我同巴索夫斯基的交谈中，得知他和日夫科夫都非常密切注意契尔年科这个人。他们同契尔年科没有见过面，但是知道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同事，认为契尔年科可能是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结果，他们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到戈

尔巴乔夫。（我很好奇地向华盛顿索要了一些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参考资料，因为我们大使馆里没有。）

巴索夫斯基在索非亚任职 7 年，早就该调动工作了。勃列日涅夫在访问期间告诉他，将把他调回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职位。巴索夫斯基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但是几天后，他无奈地对我说，他将担任驻外干部部的副部长，而不是国际部的副部长。驻外干部部负责处理高层人事问题，比如委派大使和其他高级驻外代表。巴索夫斯基早已过了壮年，只是弄不清楚他的任命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他根本不在乎这样一种二流任命。巴索夫斯基的下一任是尼基塔·托卢别耶夫大使。他到任几个星期后我就离开索非亚了。他先前是驻古巴大使，我同他只有一次真正的交谈，内容是谈苏联同古巴的关系。

作为苏联驻保加利亚的代表，巴索夫斯基大使有一种特殊地位。他不仅很有影响，并且实际上就是保加利亚领导层的附加成员。他并不是殖民地总督，但是显然也不仅仅是一个“老大哥”盟邦的使节。他甚至公开出现在游行的检阅台上，置身于站立在日夫科夫两旁的保加利亚政治局委员中间，而不是出现在为外交使团准备的次要得多的位置上。（同时反映游行特殊性的还有：游行高悬的画像有现任保加利亚政治局委员，有时候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还有当前苏联政治局委员。）

有几个外交使节我们从未接触过，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大使、古巴大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大使以及 1978 年底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这样做并不止我们一家。当时阿尔巴尼亚在外交上同美国和苏联都保持距离，在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在巴基斯坦大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阿尔巴尼亚临时代办得知我的副手也在场时，他立即拂袖而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事先已经询问

了有没有苏联外交官在场，但是没有问有没有美国外交官在场。

美国和中国将于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公布，中国大使孟岳就在一次招待会上感情外露地接近我。1 月 5 日我正式拜访他（因为他在外交圈子里资历深）。我们在晚宴上见过几次面，但是没有真正在外交工作上交换过意见，只有一次小小的例外。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即将访问越南的消息还没有公布我就知道了，并且清楚美国现在希望修复同中国的关系，于是我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中国大使。看来他的感激超过了我的想象，但是这是件好事。从我们的谈话中明显地看出，中国大使在索非亚的联系甚少，即使是在外交圈子里也是这样。在美国承认中国后，我在苏联大使馆的朋友鲍里斯·皮亚德舍夫对我说：“轮到你们美国了，祝好运！”

偶尔也邀请在索非亚的外交使团会见来访的国家元首。最有趣的是 1978 年 8 月会见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几个月后他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以及会见利比亚的卡扎菲。我在同伊朗元首简短交谈中，为伊朗驻索非亚大使说了不少好话（伊朗驻索非亚大使担心，这次访问是否能一切顺利，他送给伊朗国王、王后和皇家代表团成员的贵重礼物是否恰当）。伊朗国王平淡地回答说：“噢，他起码会说俄语，不是吗？”显然他对这点印象最深。我安慰他说，伊朗大使的俄语讲得很流利，很好地代表了国王和伊朗的利益。（后来，这位大使设法携家眷逃离伊朗，大部分家产没有带走。最后，他在加利福尼亚经营一家餐馆。）我与卡扎菲的见面只限于站在接待线里同他握了握手。当介绍我是美国大使时，我发现他的目光刚强。

除了极少数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美国来访者以及外国显要的短暂访问外，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其他来访者。但是，到保加利亚来访问的众多苏联人中，我同两位有过短暂接触。我在华盛顿多年的克格勃老相识鲍里斯·谢多夫 1979 年两度来索非亚同我联系。

他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同我恢复接触。8月份，他曾经问我，苏联该如何帮助美国政府让国会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该条约在参议院显然遇到了麻烦，当时关于苏联在古巴驻扎一个旅的吵闹使得批准条约更加前景未卜。

另一位苏联来访者，即阿尔巴托夫，我以前没有见过，但是我很了解他，在以后几年里经常见到他。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大约12年前成立以来，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一直担任所长。据我了解，他与高级官员联系密切，包括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鲍里斯·皮亚德舍夫曾经在研究所短暂工作过，当阿尔巴托夫来保加利亚海边度假时，皮亚德舍夫建议我们见见面。我接受了这个建议，1979年9月初薇拉和我邀请阿尔巴托夫和皮亚德舍夫共进午餐。我劝阿尔巴托夫说，关于古巴苏军旅这个严重的不幸意外事件，完全是由于运气不好和华盛顿处理不当，并不代表反对缓和的人故意破坏缓和以及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虽然我的劝说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美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当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但国际关系是一张非常复杂的关系网，即使很小的成分也是全局的一部分。因此，内行的做法是努力做好有限责任要求做好和机会允许做好的每一件事。

至于美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许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松动，以后若干年里也不会有所松动。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1950年，保加利亚政府指控美国公使是间谍并同已被处决的一名保加利亚政治反对派人士有过接触，美国遂断绝同保加利亚的关系。1959年恢复关系。1966年美国最后几个“公使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代错误），包括驻保加利亚公使馆，才升到“大使馆”地位。1976年签订一项领事协定。在我抵达保加利亚前不久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定。

我抵达保加利亚几个月后，1977年11月，签订了一份协定，保加利亚取消对美国外交官的歧视性旅行限制，美国也取消对保加利亚外交官的歧视性旅行限制。美国同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这类协定，抹去了严酷时代的痕迹，同保加利亚签订的协定是最后一个，只有美国同苏联之间还存在这种歧视性旅行限制。（顺便说一下，由于苏联限制美国外交官的旅行自由，所以美国也限制苏联外交官的旅行自由。由于东欧武官和外交官充当苏联外交官的代理人，所以10年前美国首先对保加利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外交官施加歧视性旅行限制。）1975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达成的赫尔辛基协定呼吁人民行动自由。根据欧洲缓和中的这一重大举措，取消了对外交官行动的残余限制。

取消旅行限制后，对我们关系的新挑战几乎立即就产生了。三年前，由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首脑会议，所以保加利亚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的广播。但是，1977年11月和12月，我们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保加利亚恢复了对美国之音广播的系统干扰。通过美国在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的监听，确认我们自己的监听属实后，12月14日我第一次向国务院汇报了这件事。我写道，我打算“要求紧急会见外交部长，抗议这种干扰，指出它是美国同保加利亚关系中意想不到的、没有根据的和倒退的行为，违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内容和精神。”国务院回电同意，包括具体引用最后文件。12月22日，我会见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递交了我的抗议书。当我告诉他美国之音的广播受干扰时，他尽管身为政治局委员，好像并不知情。他谨慎地答应尽早回复我。12月28日，外交部把我叫去说，不会再有干扰了。当天我给国务院发电报说：“题目：圣诞节第四天，保加利亚停止干扰美国之音。”

作为制止全球毒品交易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与保加利亚商谈后，发现可以合作。保加利亚地处从土耳其通往中欧和西欧的主

干道上，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人和其他国家的旅行者都走这条道。所以保加利亚在阻断毒品交易方面可以起关键作用。这种合作最初只限于在各自的海关秘密进行，后来发展到在海关和毒品管理局同保加利亚人更加密切的合作。1977年9月和1978年9月，由美国和保加利亚两国共同主办的两次国际会议都在保加利亚举行。我为1978年举行的那次国际会议致开幕词。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两国也有新的合作，包括逮捕和引渡4名德国恐怖分子到西德。

但是，保加利亚在毒品交易、恐怖主义和秘密武器运输方面的合作是毁誉参半的。尽管有新的合作，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保加利亚人秘密参加这些活动。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制止毒品交易方面的合作是为了消灭竞争。受保加利亚安全部门秘密控制的一家保加利亚出口公司参加非法武器交易，很可能还参加毒品交易。

至于支持恐怖主义，保加利亚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早就包括资金援助、准军事训练以及庇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非洲激进的反政府运动。此外，1978年，在伦敦有人用雨伞接触发射一颗有毒子弹暗杀了保加利亚反共的流亡者格奥尔基·马尔科夫，在巴黎也发生类似的未遂暗杀。当时就有明显的证据说明，这两起事件是保加利亚安全部门（实际上是日夫科夫）干的，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后，这一点已从保加利亚安全档案和前保加利亚和克格勃安全人员那里得到了证实。

我离开保加利亚后，1981年5月有人企图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尽管企图进行暗杀的凶手梅赫梅特·阿里·阿格卡声称是保加利亚指使的，但是在意大利进行的审讯和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查阅保加利亚安全部门档案都令人信服地表明，保加利亚和克格勃都没有阴谋暗杀教皇。阿格卡同被称为“灰狼”的右翼土耳其恐怖集团有联系，他也许通过这种联系同保加利亚安全部门有过

接触，但是这次暗杀阴谋同保加利亚没有关系。

真正有进展的是执行文化交流协定和采取人道主义行动解决离散家庭问题。保加利亚的离散家庭相当少，只有二三十家（这个数字不断发生变化，因为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在有些东欧国家，离散家庭数以百计，尽管数量少，我们还是给予充分重视。

有一件事说明，有许多问题涉及帮助在国外的美国人，有时候可以采取特殊措施来解决。一天晚上，我们的一位领事官员给我打电话说，一个美国旅游者从蒙古打猎回美国，途经保加利亚时在索非亚机场被拘留，因为他带着火力很大的猎枪和弹药。薇拉和我只好去见一位有趣的保加利亚人克里斯托·卢斯科夫中将与他的妻子。他们两位都热爱歌剧。卢斯科夫从军队退休后担任保加利亚狩猎和钓鱼协会主席。他还是日夫科夫在战时打游击的老朋友，这也是我与他交往的原因。他和他当医生的妻子也是很有魅力的社交人物。卢斯科夫将军很高兴帮助我，很快安排释放了那个美国猎人，并把猎枪和弹药还给他（但是几本《花花公子》杂志没有还给他，没收后就神秘地消失了）。

安德烈·卢卡诺夫是年轻的副总理，非常能干，主管对外贸易。我十分深入地、富有成效地同他全面讨论了保加利亚的经济和贸易问题。他是前外长卡洛·卢卡诺夫的儿子，我于 1962 年在日内瓦认识卡洛·卢卡诺夫。1989 年日夫科夫下台，共产党统治变成社会党统治，安德烈·卢卡诺夫成了总理（姆拉德诺夫成了总统）。安德烈·卢卡诺夫计划于 1997 年访问华盛顿，我将能够再次同他见面。但是，就在计划出访前几个星期，他在索非亚被人暗杀了。

在讨论贸易问题方面，薇拉和我有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① See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pp.92 - 95.

1978 年中期，同戈采夫大使以及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阿塔纳斯·吉涅夫举行的一次气氛轻松的非正式午餐会上，薇拉令人信服地提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西方市场上销售保加利亚的化妆品会很有前途。我们随后参观了普罗夫迪夫一家著名的保加利亚化妆品工厂。他们有优质的材料，产品在保加利亚、苏联和东欧销售的价格非常便宜。如果营销得当的话，这些产品销售的价格可以高得多，而且还可以赚到硬通货。保加利亚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他们不懂得需要营销目标、包装和广告。突然，吉涅夫非常认真地提议让薇拉负责此事。他说可以给薇拉特许经营权，在西方销售保加利亚化妆品。很明显，他不是开玩笑。我们有点吃惊。薇拉不是美国政府的雇员，对她的法律限制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肯定美国大使夫人为保加利亚政府从事商业活动至少是不合适的。我们拒绝了。顺便说一下，我在 2000 年访问保加利亚时得知，这家化妆品工厂是普罗夫迪夫惟一盈利的企业，并且正在私有化。

美国和保加利亚之间一直没有特别的政治磋商。当然，作为大使，我偶尔会奉命为美国的立场游说（比如，对联合国要求美国使波多黎各“非殖民化”的议案，说服保加利亚投反对票，至少是弃权）。但是这几乎不是政治磋商。有几次我同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讨论政治问题，尽力解释美国的立场。但是这也不是正式磋商。第一次正式磋商发生在 1979 年初，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吉姆·古德拜访问索非亚（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首都），目的是为筹备 1980 年在马德里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交换意见。把东欧共产党国家作为独立的国家来对待，这种做法早该实行了，而且我认为很有必要。这样做也许不会改变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在任何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有助于为这些国家十年后变成真正的独立国家铺平道路。1975 年在赫尔辛基和 1977 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前，我们没有进

行过此类磋商。但是 1979 年以后，磋商变成新的惯常做法。

至于同华盛顿保持联系，除了定期发电报和通过信使递送函件外，国务院官员有过几次来访。1978 年中期，所有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举行一次会议，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其他主要官员都来参加了。这类会议每隔两三年举行一次，是保持接触的一种有效方式。上一次这类会议于 1976 年举行，国务卿基辛格出席了。那次会议不幸泄漏了议员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说的话，据说他呼吁美国接受东欧国家和苏联之间“有机关系”的现实，他的这种说法被称为“索南费尔特主义”。当然，他并没有鼓动美国默认永远的东方集团，在东欧地区政策问题上他甚至是一个保守分子。但是，他的话模棱两可，产生某些误解。这些误解遭到了反驳，基辛格的反驳最激烈，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宣布一个新主义，你认为我会让索南费尔特出名吗？”

1978 年 6 月在伦敦举行驻欧洲使团团长会议，会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泄露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得知一些新的情况，包括当年早些时候可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了磋商，1978 年秋我前往华盛顿呆了一个月左右，1979 年夏我又去了一次。不出所料，制定政策的官员对磋商美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毫无兴趣。但是，国务院国际关系局和中央情报局分析保加利亚、巴尔干和苏联集团事务的专家倒是热衷于听取我们的报告，当我在华盛顿时，他们积极地前来会见我。

我们大使馆的大多数活动，除了领事、文化和商业支持作用外，还包括所谓代表和汇报。“代表”是指在驻在国代表美国处理美国政府同驻在国政府的关系，更加广泛的是作为美国的代表：代表美国政府，站在欢迎队伍中轮流同驻在国国家元首或另外一个国家来访的国家元首握手，在每年 7 月 4 日的国庆招待会上欢迎来宾，参加其他国家的国庆招待会以及东道国举办的各种庆典。有时候利用这些机会同当地官员或第三国的外交官进行富

有成果的交谈是可能的，甚至是方便的。

同样，当访问驻在国其他城市或地区时，在大使汽车上插着美国国旗代表美国。在两年时间里，我 11 次正式访问索非亚以外的保加利亚地区。例如，我访问过维丁，它是多瑙河上的一座历史名城，位于保加利亚西北角，靠近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是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的故乡。维丁市长告诉我说，我是访问这个城市的第一个美国大使。正式访问有时候很有意思，总是会遇到一些新鲜事。通过这些正式访问，我们会了解这个国家的许多情况，不仅是当地的历史和生产统计数字，还有当地人民的兴趣和情绪。我发现，同当地报纸编辑谈话了解到的群众情绪总是比当地官员说的内容多（比他们自己报纸上登的东西更要多）。

我代表美国访问保加利亚全国各地的次数比大多数其他大使多得多。苏联大使的访问实际上是作为保加利亚领导层的附加成员而不是作为外国大使（有一件事例外，他在保加利亚 7 年，硬是没有学会说保加利亚语）。我能够用保加利亚语交谈和祝酒，保加利亚人欣赏一个外国大使努力学说他们的语言和访问他们。

汇报是工作的主要部分。我们希望了解和汇报的情况很多，例如关于保加利亚和邻国的摩擦，关于政治局内部的分歧，关于保加利亚和苏联集团在对外事务方面的计划和活动。但是我们能够了解和汇报的内容却很少，主要是关于保加利亚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华盛顿对此几乎不感兴趣，几乎不用。在这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大使馆的报告主要是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自己撰写。也有年度报告和国务院要求的项目报告（偶尔是专门发给我们的大使馆，但是主要是发给所有的大使馆至少是东欧的大使馆的指示）。因此，我们递交报告的内容涉及经济、贸易、人权、外交政策、同苏联的关系、特别是同东方集团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具体的内容还包括宗教活动、人民情绪、保加利亚政府内部的现状等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保加利亚，实际上看不到什么不同政见。任何迹象的不同政见都会立即遭到镇压，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也很少。与苏联相比，保加利亚的艺术和文学有较大的自由。但是在政治方面就没有这么多的自由。几年后才第一次出现不满意见。1978 年 4 月，一名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在维也纳发表宣言，叫做“78 宣言”，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它在保加利亚有什么根源，我也不知道后来是否揭露出什么成功隐藏的不同政见。有一个人突然造访大使馆，自称是不同政见者，显然是精神失常了。当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得出没有政治不满的结论，但是我们无法对此作出评估。十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迹象，最初主要是出于生态上的担心。

尽管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严加镇压，但是正如在大多数独裁国家一样，政治幽默暗地里很活跃。例如，有一则笑话这样说：托多尔·日夫科夫的年迈农民母亲到索非亚来看望儿子，日夫科夫骄傲地炫耀他的奔驰牌汽车以及在波亚纳的豪宅庄园等等。他的母亲看后印象很深，但是显得担心起来。当日夫科夫问为什么担心时，母亲回答说：“噢，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共产党掌权，怎么办呢？”在苏联集团里，罗马尼亚是镇压最严厉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大使把这个政治笑话告诉我后评论说：“讲这个笑话的人要判 5 年徒刑。”看到我笑了，他又说：“听这个笑话的人要判 3 年徒刑。”这不过是笑话，当然不是真的，但是在保加利亚人中间，这种略加遮掩的政治批评说得很多。即使在保加利亚官员中间，也常常通过讽刺性的幽默泄泄闷气。

关于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分析。保加利亚紧跟苏联的政策，大多数观察家都满足于这一点认识。实际上，保加利亚虽然选择紧跟苏联并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但是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利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保加利亚那样依赖苏联，成为苏联的亲密盟友，在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

方面与苏联如此接近。但是，保加利亚并不完全是一个傀儡。而且，保加利亚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有差别，有分歧，特别是在经济关系方面。但是，这些差别几乎没有人认识到，部分原因是因为苏联和保加利亚都不想让人知道有这些差别。我了解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也知道发生磨擦的许多具体事例。这些情况主要来自我同巴索夫斯基大使的交谈，他对我相当坦诚；他谈的事情，我又在同保加利亚官员谨慎的讨论中得到了证实。苏联领导人试图限制日夫科夫实现工业化的愿望（例如，在使用石油产品的工业中，保加利亚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苏联获得原料，而苏联则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保加利亚获得产品）。日夫科夫两次对西方领导人私下说，应该把保加利亚看成是一个殖民国，因为保加利亚从它的殖民地（苏联）获取原料，然后把产品卖给苏联。据我了解，苏联至少两次拒绝为一家保加利亚工厂提供资金，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不明智，但是保加利亚坚持要建这座工厂，从日本和德国获得了资金。

保加利亚同苏联的贸易严重逆差，依靠同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顺差来弥补。20世纪7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进口70%的能源，其中90%来自苏联。保加利亚的外贸大约有80%是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成交的。但是，保加利亚的经济依赖性处理得不错，在技术援助、贷款和原料方面，得到的远远多于给出的，主要来自苏联。

与罗马尼亚不同，保加利亚宣扬并利用而不是破坏和抗拒同苏联的盟友关系。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在有分歧的具体问题上悄悄地自行其是。简而言之，虽然在一个大国和一个小的卫星国之间是一种亲密盟友的关系，尽管有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有政治和军事联盟，有很大的但并非完全的经济依赖，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民族利益。这两个国家的内外安全利益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不同之处

是：苏联的活动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保加利亚的活动范围是以欧洲和巴尔干为中心。

从历史上来看，保加利亚在获得民族独立以来的一个世纪里，虽然在俄罗斯和德国两大国的监护之间摇摆，但是在其内心深处一直希望团结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1878年，俄罗斯和土耳其发生战争，在解放保加利亚的战役中，几千俄罗斯人战死沙场，当然他们是为俄罗斯的利益效命，但也是为保加利亚的利益效命。1978年的百年庆典掀起了真正的公众热情，许多官员当时都佩带着一枚纪念章。

发生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当时在外交使团中只有苏联大使才有这种纪念章，但是我也得到一枚。苏联大使有纪念章，而其他大使都没有，他感到格外荣耀。他佩带着纪念章出席公众纪念会时，我嘲弄地对他抱怨说，我从来没有机会表达我对这个历史时刻的崇敬之情。巴索夫斯基大使立刻叫来一个保加利亚官员，告诉他我也应该得到一枚纪念章。我真的得到了！在冷战中，苏联大使下令给美国大使发保加利亚纪念章，真是一个奇怪的小插曲！

保加利亚的巴尔干政策仅次于同苏联的亲密关系，但是有更深的历史渊源。说得婉转些，华盛顿对巴尔干事务毫无兴趣（除了希腊—土耳其—塞浦路斯关系的不同情况外）。1977年后期，我向国务院发出一份电报，谈巴尔干外交的发展，布加勒斯特大使馆和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同事也签了名，主要内容是猜测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我们的看法是，不会立即发生危机，这种判断后来得到了证实。我不能说我们当时就预见到十多年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预见到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首先是冷战结束，接着是共产党统治首先在东欧然后在苏联垮台，最后是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我们在巴尔干的三个大使馆的人兴致盎然地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务院（或

华盛顿的其他机构)对此有丝毫兴趣。

1979年春,索非亚大使馆应该接受视察了。当然,我已经仔细阅读过前些年的视察报告,然后才来到索非亚,并利用我自己的视察经验。不像有些同事,我实际上盼望这次视察。视察进行得很顺利,因为除了环境因素外,我们没有真正的问题。视察报告评价很高,对我的表现是这样评价的:

大使处理东欧事务有能力、有经验,对大使馆领导有方。馆员钦佩他的智慧、分析能力和为人正直。他以身作则,树立了高标准,并且期待馆员工作有优异表现。大使喜欢通过树立榜样和建立一般原则来领导工作,正确地把大使馆的日常协调工作让精力充沛的使团副团长查尔斯·马吉来处理。代表团正副团长互相配合默契。仁慈宽厚、慷慨大方地代表了美国政府,出色地完成了来访官员的接待任务。

视察官们还认为,大使馆的报告“非常全面”,除了政治经济综合小组的报告外,“大使馆官员特别是大使的努力大大增加了高质量报告的数量”。视察官们并未指出,索非亚大使馆递交的报告比国务院真正感兴趣的要多得多。

6月,我和薇拉回到华盛顿述职并探亲。那时我得知国务院希望对任职两年以上的大使进行轮换,以便让更多的高级职业外交官有机会出任大使。结果,当年晚些时候我就要离开索非亚了。

5月下旬,就在我即将启程去华盛顿前不久,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接见了。我想这是在我离开前的一次正常交换意见,两人都认为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但是实际上远不止这一点。姆拉德诺夫和我谈了三个小时(用俄文谈,不用翻译,只有戈采夫

大使在场)，讨论的问题范围广泛，包括比通常更加全面地讨论世界时局以及保加利亚同美国的关系。

我们对美国同保加利亚关系的回顾是彻底和富有成效的。姆拉德诺夫重点谈了保加利亚已经完成的事情和美国可以做的事情，我也说了一些正面的话，但是我们两人都对对方的讲话作了建设性的答复，并且提出一些新的可能性。姆拉德诺夫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商业，但是也强调：在政治关系方面，尽管保加利亚有许多部长级官员造访美国，但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没有派官员访问保加利亚。姆拉德诺夫强调，保加利亚希望解决所有尚待解决的人道主义领事案件，并交给我五个新批准的案件。我们曾经提出，委派驻布加勒斯特的常驻科学专员兼任驻保加利亚的非常驻科学专员，可以随时访问保加利亚，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保加利亚的拒绝。当我对此表示惊讶和遗憾时，原来姆拉德诺夫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就像 1977 年干扰美国之音案件一样。很明显，虽然姆拉德诺夫身为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但是安全当局作出的决定却不让他知道。戈采夫对姆拉德诺夫拙劣地解释说，作出不增加非常驻外交官人数的决定后，才会把事情完整地通知外长。同样，当我提到无法在索非亚看到任何西方非共产党报纸时，姆拉德诺夫恼怒了，他告诉戈采夫应该照顾。我还抱怨说，大使馆外的警卫恐吓一些保加利亚人，不让他们到我们大使馆对公众开放的小图书馆来。

我们还讨论了许多当前的国际问题，包括欧洲安全，中东和平进程，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最近签署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保加利亚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和马其顿问题。我不想细谈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只想说姆拉德诺夫非常坦诚。后来，戈采夫评论说，姆拉德诺夫很信任我，他从来没有如此坦诚地同其他大使交谈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坦诚地同以前的美国大使交谈过。（最近，我从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得到了解密的关于

此次谈话的记录。根据记录，姆拉德诺夫对我说，从保加利亚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整整 20 年里，我是在发展美保关系方面起了“最富建设性作用”的美国大使。我对此赞美深表感激，但是没有把这些话包括在我写的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因为我不希望华盛顿有人认为是我同驻在国过于接近，是个过分强调局部而忽视全局的外交官。）

重要的不是我和姆拉德诺夫之间关系融洽，甚至也不是他在处理美保关系中采取一种平衡的、前瞻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值得鼓励、值得欢迎的。在后来由戈采夫大使倡议安排的一次密谈中，我得知姆拉德诺夫事先同日夫科夫讨论了他将要和我举行的密谈，并且得到特别授权谋求更加密切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戈采夫告诉我，姆拉德诺夫在同我密谈后对他说，“我希望美国人明白，我已经伸出了手，希望美国能握住它”。

戈采夫评论说：“美国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但是他又说，保加利亚与苏联关系非常密切，并且不希望改变这种关系。同时，一些保加利亚领导人，包括日夫科夫和姆拉德诺夫，希望加强保加利亚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当然不抱任何幻想，只是起一个小国的有限作用。他说，通过与西方增加接触，他们已经非常成功地同西德和日本改善了政治和经济关系。结果，在保加利亚领导层中出现了西德和日本的“说客”，但是还没有出现“美国说客”的基础。戈采夫说，每当考虑同西方国家做一笔大生意时，日夫科夫总要询问同美国相比的技术质量。

戈采夫坦率地回顾了保加利亚努力想从美国获得最惠国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他直截了当地说，保加利亚希望先于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获得最惠国地位。保加利亚已经解决了我们提出来的所有问题，比如美国债券持有人问题，正在解决所有离散家庭问题。没有财政要求或其他纠纷。没有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移民问题。我说，根据现行的美国法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已经有

资格获得最惠国地位了。我直率地问戈采夫一个“非外交”问题：在雇用美国律师事务所（莫尔斯）调查最惠国要求和前景之前，在向我和其他美国官员表示保加利亚对可能以“匈牙利方式”获得最惠国地位感兴趣之前，保加利亚是否征求过苏联的意见？

戈采夫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表示兴趣要根据保加利亚领导层的判断。他们认为，“出于政治经济原因”，从美国获得最惠国地位符合保加利亚的利益。同时，他们希望“考虑周到地、不慌不忙地”进行，不希望“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前”（显然是指苏联）显示自己的兴趣然后遭到美国的拒绝。他说，“匈牙利方式”（由于接受杰克逊—瓦尼克标准而使苏联大为恼火）并非不可能。但是在 1978 年，保加利亚人从我的协商获悉的情况，戈采夫和茨维特科夫访问华盛顿的结果以及“莫尔斯报告”全都认为，美国还不准备把最惠国地位给保加利亚。此时他们希望，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形势也许能使这件事成为可能。戈采夫坦白地说，保加利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答应我们早先提出的所有条件。他说，一些保加利亚领导人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戈采夫说，姆拉德诺夫认为，日夫科夫也同意，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回国述职是试探美国反应的最好机会，姆拉德诺夫兴致勃勃地等待着我的回音。

我向华盛顿汇报了姆拉德诺夫和戈采夫的谈话情况（我说，戈采夫的做法“显然是特地安排的非正式阐述”，“因为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不可能以这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说话”）。我说，他们两人一唱一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求美国回答”。我没有说出自己的评论和建议，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国述职。

我担心美国可能不会握住那只伸出来的手。尽管我们实际上毫无所失而且还可能有所得，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会公开

利用反苏措施争取更大的独立或自由化，因此也就没有理由把它升级到根据总统指示 PD—21 同美国友好的东欧国家行列。我相信还有可能性，但是并不是用尽办法使保加利亚脱离同苏联的紧密联盟或脱离日夫科夫的独裁统治，而是削弱保加利亚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把重点从阻断毒品贸易等问题转移到走更加有建设性的道路上来。但是那些可能性并不是我有把握能提出来的，也不是在改善和发展关系这一过程的开始阶段就能出现的。

我向乔治·维斯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非常精明能干。但是不出所料，他认为提出把保加利亚的关系升级这个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甚至不是一个向国务卿万斯提出的问题。我遗憾地接受了乔治对华盛顿形势的判断（当时正纠缠在“发现”古巴苏联旅的问题上）。

这个否定的回答实际上标志着我两年来改善美国同保加利亚关系的努力结束。两年来，我在东西方政治关系大局的夹缝中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这种夹缝是保加利亚政府造成的，而此时则甚至更多的是美国政府造成的。这最后一点最大的限制是意想不到的不幸因素。在以后的 10 年里，美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继续滑坡，没有任何重大改变，直到冷战结束。

7 月底，我回到索非亚。我约见了戈采夫，没有约见姆拉德诺夫。那是第一个信号。我告诉他，根据我回国述职的情况，我可以这样说，美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寻求改善关系。戈采夫的脸耷拉了下来，他说：“一如既往”显然意味着美国没有握住姆拉德诺夫两个月前伸出的友谊之手。我还悄悄告诉戈采夫，秋天我就要离任了，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同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见过几次面。在我离任前，他和夫人邀请我和薇拉到他们的住所参加私人午宴，只有我们四个人，

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虽然 9 月下旬我告辞时我们讨论了总的政治形势，但是已经没有基础再来真正讨论美国同保加利亚的关系了。

难以理解的是，10 年后，姆拉德诺夫会见我的继任者的安排几次被取消，引发了他同日夫科夫之间的争执和不和，导致姆拉德诺夫辞职。不久，姆拉德诺夫在政治局里成功地向日夫科夫挑战并且把他赶下了台。1989—1990 年，在索非亚成立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届短命的过渡政府，姆拉德诺夫任“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卢卡诺夫任总理，我的朋友柳本·戈采夫任外交部长。

当我准备离任时，得知保加利亚当局希望授予我马达拉一级骑士勋章，这是授予外国贵宾的最高荣誉。这种勋章常常（但是并不总是）授予即将离任的外国大使，但是往往不是“一级”的（例如，我的前任也得了这种勋章，但是二级的）。他们希望这样做，我当然很高兴。按照规定的要求，我通知了国务院，请求授权接受这枚勋章。这种批准在正常情况下照例是会给的，但是华盛顿一直没有答复。我谨慎地秘密打听，得知有一个办公室（不知是否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扣押了批准的电报，理由是美国同意接受这个荣誉也许会暗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太“正常”友好了。我认为这很可笑，我在国务院的单位也这样想。我想接受这枚勋章，但是更重要的是，拒绝接受这枚勋章将是无缘无故地侮辱保加利亚人。然后我想，如果批准的电报作废（谁也不想把这件事捅到上一级去解决），那么也应该有拒绝接受的电报。所以我又发了一封电报说，时间紧迫，如果我收不到拒绝接受勋章的指示，那么我就认为得到了批准。华盛顿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因此我接受了这枚勋章。（这种认为不拒绝就是批准的表态是对付官僚衙门的一种办法，我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已经使用过这种办法，毫无疑问其他活跃的使节和谈判者也使用过这种办法。）

我们向保加利亚官员辞行，参加外交界为我们举行的告别聚会，然后于 10 月 9 日离开索非亚回国。在年底退休前的三个月里，我写了一份关于美国同东欧关系的报告，实际上是为了对这个问题和几个朋友宣泄一下我自己的情绪，因为我知道这份报告命里注定只会躺在国务院的“档案”堆里。

虽然我担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的这一段经历结束了我的外交和政府工作生涯，但是我决不是退出国际关系领域，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一章里叙述。

第十七章

20 世纪 70 年代缓和的衰退和没落

如前所述，尽管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呼吁转向“谈判时代”，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苏关系缓和并非出现在尼克松政府初期。然而直到 1972 年 5 月的莫斯科首脑会议和 1973 年 6 月的华盛顿首脑会议，人们才开始大吹大擂缓和国际关系。尽管美苏两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实行缓和政策，尽管这种做法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缓和政策很快就开始遇到困难。原因之一是，华盛顿和莫斯科奉行缓和政策的原因虽然是相吻合的，但不完全相同，缓和本身的概念也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是，美苏两国政府都对其民众过分吹嘘缓和，并把实现缓和的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当现实没能实现这些夸大之辞时，美苏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实现理想的承诺，同时用比较现实的标准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缓和的反对者自然更加批评对方的表现，美国反对缓和的人也批评他们自己的领导上了对方的当，在采纳缓和方面先走了一步。因为政治体制不同，所以发生在美苏两国的情况也不同。在美国，缓和的反对者自由地大声疾呼他们的主张，要求更换政府。而在苏联，对缓和谨慎小心的人不能公开批评他们的领导，甚至不能公开对缓和多加评论，只能要求采取不支持缓和的特殊政策，同时直接攻击美国不实行缓和。因此，在苏联，虽然缓和本身仍然占上风，但是有些政策实际上倾向于破坏缓和，同时把缓和的衰败归罪于美国。而在美国，缓和本身受到攻击，最终信

誉扫地，人们不但谴责苏联，而且还怪罪于支持缓和的美国领导人

甚至在 1972 年缓和正风光无限时，就已经有人对缓和产生种种怀疑。那一年，美苏两国签订了“关系基本原则”协定，这是一种行为准则，协定规定：美苏两国保证不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身优势（这从来不是双方现实的或者真诚的承诺）。那一年美苏两国还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协议。但是在当时，除少数人怀疑外，大家都认为这些协议是美苏关系中取得的真正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对缓和的疑虑确实大都来自它的成功。尽管 1972 年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所规定的限制不足以防止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但是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苏两国的行动自由。有些人喜欢完全行动自由，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对方也有行动自由，他们也宁愿这样做，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就足以使他们感到不安。提防缓和、提防苏联的那些人不欢迎实质性的军备控制步骤。

1973 年 10 月的中东战争使缓和的幻想第一次受到重大怀疑。尽管缓和没能阻止美苏两国在 1973 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援助各自的老朋友，但是双方合作实现了停火。其中最戏剧性的事件是一场虚惊，华盛顿把苏联的措辞和行动误解为可能单方面采取军事干涉把停火强加给交战双方，从而使美国不必要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战备状态。但是更重要的事态发展是美苏合作促成停火。缓和的这次成功使许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预感到，可能会出现美苏共管，迫使以色列解决同阿拉伯人的分歧。^①

美苏双方的其他行动破坏了缓和。前面一章在谈到发展中的缓和时就已经指出，美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努力削弱苏联在世界上

^① See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 -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 ed. (Brookings, 1994), pp.404 - 57, esp. pp.454 - 57.

的影响，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苏联亦是如此，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后期，苏联在非洲（1975—1976 年在安哥拉，1977—1978 年在埃塞俄比亚），以及苏联盟友（1975 年北越占领南越）和当地的共产党人（1979 年在尼加拉瓜，以及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同苏联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冒险相比，更为重要得多的是，1978 年美国在反苏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关系。美苏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批评对方的行为同缓和不一致。

尼克松和基辛格许诺给苏联领导人提供缓和带来的经济好处，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从 1972 年到 1975 年一直都在努力想要提供这种好处，但是美国国会把美国提供经济好处跟苏联放松移民限制“挂钩”，从而破坏了这种努力。

最后，缓和在美国衰退，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美国越来越担心在战略武器竞争中，苏联正在赢，美国正在输，这时才意识到战略均势已经取代了美国在核时代所占有的优势。军备控制可以稳定平衡的观点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公众的看法是，有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有一个“脆弱的窗口”，而苏联却有一个“机会的窗口”，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利用起来会使美国陷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这种战略上的威胁，这种担心是由许多战略分析家激发起来的。大多数战略分析家反对缓和，反对军备控制，希望美国恢复战略优势。毫无疑问，许多战略分析家在不同程度上都相信他们自己可怕的预测，认为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大。但是，这些警告也被视为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加强防御努力的惟一办法。有些政治人士还认为，这条进攻路线是把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卡特和万斯这些缓和的支持者赶下台的最好办法。

在这里无需详述从 1975 年到 1980 年反映和推动这种倾向的

事件。1976—1977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第一次认为应该增加国防费用。1976 年 1 月，福特总统仍然维护缓和，但是到了 3 月（在挑战者罗纳德·里根在初选早期表现不俗后），他在竞选中就不用缓和这个词了。甚至民主党的挑战者吉米·卡特在竞选期间对缓和也含糊其辞，后来成为总统后仍是如此。

1976 年 11 月，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在以后的十年里一直在起作用。实际上，从 1976 年初以来就一直在组建这个委员会，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两党联合机构，所以创建人决定等到选举结束后再正式公开宣布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的领导小组由著名的“冷酷战士”组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经在各届政府的内阁任职，其中包括保罗·尼采、尤金·罗斯托、罗纳德·里根、道格拉斯·狄龙、迪安·腊斯克、戴维·帕卡德、亨利·福勒、詹姆斯·施莱辛格、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莱恩·柯克兰、威廉·凯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理查德·珀尔、马克斯·坎珀尔曼、本·瓦滕伯格、理查德·派普斯、诺曼·波德霍雷茨和理查德·艾伦。参加这个委员会领导小组的人来自各方面，其中包括共和党保守派、民主党“新保守派”，“军工联合体”以及仅仅提防缓和和提防苏联的人。迪安·腊斯克等人很快就退出了，但是保罗·尼采、尤金·罗斯托等人发起了一场重大的运动，主要目的是使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失败，加强美国的力量准备同苏联对抗。^①5 年后，许多人在里根政府里当高官，其他人则继续批评里根政府没有尽力巩固国防。

在发动公众运动反对缓和并反对战略武器控制的同时，在估计这种威胁方面，一个稀奇古怪的“竞争性分析试验”结果透露

^① A compilation of most of the alarmist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ittee has been published; see *Altering America: The Paper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edited by Charles Tyroler (Pergamon - Brassey's, 1984). The main theme was reflected in one early paper titled "Is America Becoming Number 2?"; they argued it was, and to our peril.

给新闻界。“B 小组”成立了，由“外部的专家”组成，批评政府对战略能力和目标作出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对苏联威胁提出一种更加危言耸听的观点。

B 小组成立的由来是，总统的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里一些鹰派人物认为，在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中提出的对苏联战略力量威胁的估计过于乐观，他们对此很不满意。总统的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建议，外部专家小组对苏联威胁持更强硬的观点，应该让他们看官方估计人员所能看到的情报资料，让他们毫无拘束地准备作出不那么乐观的估计。当该建议于 1975 年第一次提出时，被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挡住了。但是，1976 年初，他的短期继任者乔治·布什批准了此项不同寻常的程序。外部专家提出不同意见的想法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措辞应该清楚，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比较乐观，一种比较悲观，应该成立 B、C 两个小组。

B 小组由十位前官员和学术人物组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对苏联威胁有“更加清醒”的看法。该小组由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领导，提出一些研究苏联战略力量的具体问题。该小组提交报告的主要作用是，在关于苏联目标和意图的问题上提出同国家情报估计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更加阴暗的情景。

1992 年，关于苏联战略力量的 B 小组报告和国家情报估计（A 小组估计）报告得以解密并且公之于众。很显然，B 小组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在关于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长期目标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仍然是一个学术问题。

在几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B 小组错误地批评和“纠正”了官方的估计，总是倾向于夸大危险和威胁。例如，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苏联“逆火式”中型轰炸机的航程，从而导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陷入严重的僵局，因为苏联认为这种轰炸机不是洲际轰炸

机，自然也就拒绝了美国希望在协议中将它囊括进去的企图。此外，B 小组把苏联在 1984 年拥有“逆火式”轰炸机的数量过高估计了一倍多（B 小组估计苏联拥有 500 架，而实际上苏联只有 235 架）。B 小组还严重地过高估计了 SS—19 洲际弹道导弹的准确性，从而引起毫无根据地担心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威慑力量出现“脆弱窗口”。B 小组估计苏联将部署移动式反弹道导弹系统，实际上苏联并没有这样做。B 小组认为，没有取得关于苏联发展无声反潜艇战争能力的情报是不祥之兆，而不是可以让人放心，这就又引起担心，出现一种子虚乌有的威胁。B 小组“严重担心”苏联可能把移动式中远程导弹 SS—20 升级为洲际弹道导弹，批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认为 SS—16 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仍然是小的。其实苏联并没有部署 SS—16 导弹，SS—20 导弹也没有升级为洲际弹道导弹。至于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奇异技术，B 小组批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没有更加重视苏联研制带电粒子束定向能拦截器的威胁。B 小组说，难以用非常危言耸听的话来过高估计苏联努力的程度（的确，在这方面苏联可能有意用蒙骗让我们产生恐惧，而 B 小组无意中助长了这种恐惧）。B 小组还说，大规模但无效的苏联民防努力是苏联企图打赢一场核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B 小组甚至难以置信地提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助于苏联领导人“追求确保苏联生存、确保消灭主要敌手的目标”。

B 小组报告了苏联“核部队和常规部队紧张的军事集结”，并且批评官方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没有足够地描述苏联军事努力的规模。准确地说，当时官方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已经作了修改，指出苏联的军费开支每年增长 5%。此外，情报部门在 1983 年得出结论说，从 1976 年开始，苏联军费开支的年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2—3%，武器采购的年增长率没有上升。当 B 小组估计苏联继续加速扩军时，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已经削减军费开支，至少

7 年内不会增加。苏联肯定继续花费大量军费，但是并不是无限制扩军，像 B 小组所说的那样为了追求打赢战争的能力。B 小组甚至进一步认为，对民用经济的要求没有限制作用，攻击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提出经济考虑也许会限制苏联的军事发展。B 小组声称：“苏联的战略力量并未反映民用经济竞争的限制作用，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这样做。”^① 官方没有反驳 B 小组成员透露出来的内容，使公众越来越担心不祥的日益增加的苏联威胁。

从 1974 年到 1979 年，也就是国际关系缓和的衰落阶段，我任职高级视察官，后来又任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在此期间我一直饶有兴趣地（但是感到沮丧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美苏之间继续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很需要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但是显而易见的是，紧张关系加剧，很多是不必要的，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危言耸听地夸大军事威胁尤其有害，不仅加剧了不必要的军备竞赛，而且歪曲了公众的理解和国家的政策。

尽管我不能在苏联威胁和美国对策问题上直接参与政府策划或公开辩论，但是我也尽了微薄之力。首先，在视察工作期间，在中断了近 10 年后，我又恢复为出版物写文章。从 1975 年到 1978 年，我就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及其协议发表了 4 篇重要文章尽管我没有对 B 小组提出苏联威胁的情报估计直接参加公开辩论，但是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论估计和推断意图》），试图用长远目光看待这个问题，并且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指导方针。

我不认为力量和能力是“客观的”，容易比较的，不认为所

^① Se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xperiment in Competitive Analysis, *Soviet Strategic Objective, An Alternative View, Report of Team B* (Washington: CIA, December 1976), 55 pp. (top secret, declassified October 8, 1992). This quotation is from P.22; other references throughout. For an excellent review in depth of the Team B episode, and the context of strategic alarms in the 1970s, see Anne Cahn, *Killing Détente: The Right Attacks the C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有 these 问题是“能力”而不是“意图”，也不认为可以从能力中推断出意图。例如，在讨论美苏战略核力量对比时，说明每一件下列“事实”都是同样正确的：苏联拥有更多的导弹吨位，美国拥有更多的战略吨位（包括轰炸机和导弹运载工具）；苏联有更大的导弹发射重量，美国有更大的导弹精确性；苏联拥有更多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在拥有更多的距目标不远、能随时打击目标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苏联拥有射程最远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拥有射程最远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力量（平均而言，美国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射程更远）；苏联拥有更多的战略运载工具（当时苏联大约有 2500 个，美国有 2150 个），美国拥有更多的分导再入弹头和炸弹（当时美国超过 9500 个，苏联有 3500 个）；如此等等。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些事实”的灵活性：美国国防部声称，从 1965 年至 1975 年，苏联建造了 205 艘“大型战舰”，而美国只建造了 165 艘。这个声明本身没有错，但是它起了误导作用。它没有说清楚，“大型战舰”的定义已经延伸到包括所有 1000 吨以上的军舰；如果把低定义域提高到 3000 吨，那么从 1960 年以来，美国建造了 122 艘，苏联建造了 57 艘（因为苏联出于海岸防卫的需要，建造了 1000 吨至 3000 吨的小型军舰 83 艘，而美国只建造了 2 艘）。国防部还声称，苏联海军在 1975 年时只有 253 艘潜水艇，但是现在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潜艇舰队”。这也没错，但是如果说苏联在 1975 年时所拥有的潜艇数量只是其在 1955 年时的一半，那么也是正确的。当然，虽然苏联潜艇在 1975 年数量上减少了，但是同 20 年前相比作战能力却提高了。尽管美国潜艇的数量少，但是作战能力却比苏联潜艇强。兵力数量上的比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有意义，并不是那样“客观的”事实，而是更容易刻意歪曲其意义。①

① Raymond L. Garthoff, “On Estimating and Imputing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 no. 3 (Winter 1978), pp. 22 – 32, esp. p. 30.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许多关于苏联威胁的危言耸听的表述使用了“坚持不懈的”、“史无前例的”和“无可比拟的”等词。例如，B 小组的报告说：或许除了纳粹德国外，“目前苏联在和平时期扩军的深度和广度在 20 世纪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① 当前危险委员会不断重复同样的话，特别强调苏联扩充战略导弹。苏联战略力量的扩充的确是很可观的。到 1972 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临时协定冻结战略武器水平为止的 5 年中，苏联增加了 1050 个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发射器。但是这个数字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或无可比拟的。从 1963 年到 1967 年这 5 年中，美国增加了 1060 个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同样，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苏联最多每年大约增加 1000 个分导再入弹头，但是这不足以影响美国分导再入弹头的优势，因为美国这种弹头的扩充 5 年前就已经开始了。1980 年，美国拥有 9200 个战略炸弹和弹头，苏联只有 6000 个，美国在数量上仍占优势。事实上，尽管苏联“坚持不懈地增加”战略弹头，但是从未赶上过美国。在苏联解体前一年，1990 年 9 月削减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条约签字时，美苏双方的战略弹头数量最接近。那时，（使用削减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条约规定的统计方法，对战略轰炸机的装载量计数不足，对美国有利）官方公布的总数是，美国有 10563 个战略弹头，苏联有 10271 个。1990—1991 年的实际数字是，美国大约有 12700 个，苏联大约有 10700 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所谓苏联“无可比拟的”扩军就这么多。^②

同兵力和能力的评估相比，意图的问题当然更难估计，更容

^① *Report of Team “B”*, p.46.

^② See Raymond L. Garthoff, *Perspectives on the Strategic Balance* (Brookings, 1983), p.8, for the figures above, excepting those for 1990–91, which are given in *Arms Control Today*, December 1994, p.29, and November 1995, p.30.

易有意无意地主观歪曲和出错。 B 小组的主要报告集中于苏联的目标和意图，描绘出一幅没有根据的不祥图画。 B 小组毫无理由、毫无根据地断言，苏联扩军“肯定超过了互相威慑的需要”，这就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出于威慑目的竟要建立更大的战略力量？ B 小组企图论证苏联在极端危险地谋求世界霸权并且准备使用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 B 小组在一篇显然不正确的声明中说：“在苏联领导人的理论文章和行动中，找不出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他们已经赞同美国的确有把握相互毁灭的理论。在苏联的军事思想中，核稳定、战略极限或战略均势都不起明显的作用。”此外，B 小组还断言：“苏联一方面希望用非军事手段粉碎‘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却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仿佛这是不可避免的。”B 小组说，莫斯科认为，军事力量是“一种工具，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决定性时刻，利用这种工具可以预防性地压制、或者在必要时主动地破坏美国的报复力量。”最后，B 小组特意用斜体字强调：

在国家估计报告所展望的 10 年时间内，苏联可能会很好地指望获得一定程度的军事优势，更加咄咄逼人地追求霸权目的，包括直接向十分重要的西方利益发起军事挑战，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迫使西方低头，或者说，可以打赢任何水平的军事对抗。^①

1976 年，有关苏联的目标和估计还有辩论的余地。但是很显然，在当时和现在看来，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并不是争论是否应奉行强硬政策的地方。在这个时期和以后的时期，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总是错误地过高估计苏联的军事威胁。

^① *Report of Team "B"*, pp.14, 46-47.

B 小组非常大胆，竟然建议，在估计的此后 10 年时间里，同苏联进行至关重要的军事对抗。但是，10 年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苏联相信自己的军事优势，扬言或发动全球核战争，以达到它统治世界的目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益软弱的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激进的、修正主义的苏联领导强烈要求彻底裁军，开始一系列妥协性谈判，并采取单方面措施毅然决然地压缩军备竞赛和结束冷战。

在回顾历史时，有一点很清楚，1976 年需要的不是强硬的 B 小组，而是更富想象力，更具前瞻性的“C 小组”。即使在当时也不难看出，苏联已经接受相互威慑的事实，并且正在饱受军备竞赛带来的经济困难。这两点就足以使苏联看到军备控制的价值，从而拒绝军备竞赛。

苏联和美国都在进行战略武器竞赛，其水平远远超出相互威慑的实际需要。这两个国家都过于谨慎，以至于只肯接受一点点军备控制的限制。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后期，美国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接受更多的限制。当缓和的成果在美苏两国似乎已经不复存在时，合作的余地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

当然，我没有直接参与 B 小组的所作所为。但是 1975 年 11 月，中央情报局要求我担任研究苏联战略目标的顾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因此，在 B 小组前后，我为中央情报局提供相关问题的咨询。（顺便提一下，A 小组有名无实，根本就不成其为小组。它是正常的跨部门情报估计委员会，包括一些鹰派人物，例如乔治·基根少将领导的空军情报局的代表。）1977 年 6 月，中央情报局致信对我表示感谢说：“在估计苏联意图问题上，您同我们进行了考虑周到的、信息丰富的讨论，”特别是对过高估计只能导致鲁莽从事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更正”。

派普斯教授于 1977 年 7 月在《评论》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苏联相信它能打赢一场核战争》，而且他还把这

样一种荒谬的想法引进 B 小组的评估报告。我不能同派普斯教授公开辩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在研究苏联在核战争问题上的军事思想。在没有提及派普斯教授文章（当然也没有提及 B 小组的绝密报告）的情况下，我向国务院说明自己的看法，并且在 1978 年夏季一期的《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政策中的相互威慑和限制战略武器》。我在文章中引用过去保密的苏联军事文章以及其他资料，说明苏联的政治、军事思想不符合派普斯教授（以及 B 小组）认为苏联相信它能打赢一场核战争的论点。^① 派普斯教授及其同僚认为，苏联领导人意欲获取赢得战争的能力，不接受相互威慑、战略均势或战略稳定。对这种论点，A 小组决定不予理睬，不同他争论。但是我却同派普斯教授进行较量，在驳斥中准确引用他宣称支持其论点的那种保密的苏联军事资料。我的文章在从事安全研究的学术界颇得好评，其原版和后来的修订版在论苏联战略思想的几本书里被翻印了，但是这篇文章对大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奇怪的是，派普斯教授选择准备在 4 年后才对我的文章进行攻击，那时我已经退休，而他在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正要结束两年的工作。他对我的攻击如此激烈，以至于《国家安全》季刊拒绝刊登他的文章。派普斯教授转而把他的文章投向一家保守派杂志《战略评论》，该杂志的主编同我联系，告诉我说，只要我同意他翻印我的原文（作一点节略）并同意写一篇反驳文章，他就刊登派普斯教授的文章。我欣然应允，结果在 1982 年秋，我的文章、派普斯教授的批评文章以及我的反驳文章同时出现在该杂志上，大标题是《加特霍夫同派普斯辩论苏联战略思想》。（1981 年，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研究小组中，我和派普斯教授有过一次不期而遇的激烈舌战，那次他占了上

^① Raymond L. Garthoff, "Mutual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in Soviet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 no.1 (Summer 1978), pp.112 - 47.

风，而我则表现欠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我充满信心，相信我在这次笔战中占上风，因为即使许多强硬派人物也都承认了这一点。)①

让我们再回到 1977 年，关于苏联威胁的性质以及军备控制和缓和的作用正在进行大辩论时，卡特政府上台了，而我的视察旅行也接近尾声。我的第一选择是回去参加战略武器控制，也许会担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要谈判者，或是负其他的责任。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新任局长莱斯·盖尔布建议我担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国务院代表，重新拾起 4 年前我离开的职位。但是，保罗·沃恩克在国会听证会上遭遇一场严酷的论战（同意的人数不足签订一项武器条约所需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使得所有这一切可能都烟消云散了。这时再考虑由我担任军备控制领域的任何职位，特别是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这种想法不再是明智的了。

1977 年 2 月赴渥太华视察前，我敦促国务院的同僚坚持在 1975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协定的基础上达成低调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不要过于野心勃勃。虽然我的想法同国务院工作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事情到了高层决策者那里就没有通过。结果美国决定争取签订一个走得更远的协议，即使后来做出一定的让步，苏联也没有接受。1977 年 3 月，万斯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失败告终，谈判推迟了一年。

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他向我建议：在我等待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期间，可以参加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帮助重新评价战略关系。这项研究是根据总统检查备忘录 PRM—10 于 1977 年 2 月开始的，8 月终于得出关于战略政策的总统决定 PD—18。我虽然对这个题

① “A Garthoff - Pipes Debate on Soviet Strategic Doctrine”, *Strategic Review*, vol.10, no.4 (Fall 1982), pp.36 - 63.

目很感兴趣，但是对能否影响结果仍然心存疑虑。我对任何临时性的工作非常小心谨慎，国务院管人事的头头们会认为我是“受照顾的”，很可能在早期决定中就把我删除了。因此，我拒绝了这个建议。

如前所述，1977年4月，任命我为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我欣然接受。否则的话，给我的另一个职位可能也会使我感兴趣。我的同事约翰·惠特曼退休后，他在中央情报局主管苏联问题的国家情报官职位就空缺了。重返情报评估领域本来会给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我对外交工作更加感兴趣。

我在索非亚任职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对美苏战略关系从事官方或非官方的分析。我参加过国防部组织的两次军事演习，一次是1978年在德国，另一次是1979年夏在华盛顿。我还同一些在华盛顿更加直接参与有关研究工作的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但总的来说，正如我在前面一章所述，我专心研究从索非亚所看到的世界。我意识到美苏关系正在走下坡路，尽管吉米·卡特总统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举行过首脑会议，尽管1979年6月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但是这些都是缓和的最后一搏。^①

1979年春当我还在索非亚的时候，我接到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负责人约翰·斯坦布鲁纳的一封信。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有时间参加他们的工作，无论是向国务院请假期间或者是其他时间都可以。那时我刚好年届五十，再加上在美国政府工作已经20多年，有资格提早退休。不久我得知，国务院打算调动许多驻外使团团团长，其中就包括我。因此，我有一个自然的机会提早做出选择。

^① 关于20世纪70年代缓和的衰退和陨落，较详细的论述见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chapters 11 through 29.

布鲁金斯学会是首要的智囊团，不仅资历深，而且水平高、素质好，我很感兴趣。6月，当我回华盛顿述职并请假回家时，见到了约翰·斯坦布鲁纳和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布鲁斯·麦克劳里。布鲁金斯学会对我研究美苏关系和安全政策很感兴趣，同我想做的事一拍即合。我同意到布鲁金斯学会去，也许从下一年开始，担任对外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告诉国务院我想退休。国务院向我建议几个新的职位，其中包括国防大学副校长（该校核心是著名的国防学院），这一职位历来由高级外事官员担任。当然，以我的政治军事经历，这也许是一个理所当然并且令人愉快的任命。后来我才知道，乔治·维斯特还推荐我当美国驻维也纳大使，但是这个职位给了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我的朋友菲尔·凯泽，我在索非亚任职期间，他在布达佩斯当美国大使）。我没有找新的工作，准备在那一年的年底就退休。

当我在1979年12月底退休时，苏联对阿富汗发动军事干涉，卡特总统对此事件作出了反应。在许多人看来，这种不祥的威胁似乎代表20世纪70年代脆弱的缓和大厦的坍塌。因此，我离开政府部门，从参加冷战转向反思和研究冷战，这件事同冷战本身从缓和转向重新对抗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时间上不谋而合。

第十八章

目睹冷战的结束：1980—1990

1979 年底我从政府部门退休并不意味着我退出冷战舞台。我尽管不再直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仍然非常积极地参加学术和政治机构研究东西方关系和冷战的活动。从 1980 到 1981 年这两年里，我正式担任国务院顾问，但是并不积极。以后，我继续以非正式的、特别的身份担任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在美国国家安全系统服务了三十来年后，我这时处身于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同官方的政策有完全不同的关系。作为美国公民和学者，我努力对政策辩论做出贡献，方式是从事研究和发表文章，直接向媒体投稿，同国会接触和作证，参与公众机构，直接接触访问美国的俄国人，特别是我自己经常访问苏联，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式。

布鲁金斯学会是致力于帮助公众理解外交政策和其他问题的最老、最受尊敬的私人研究机构之一。与 20 世纪 50 年代我所在的兰德公司以及大多数战后成立的思想库不同，布鲁金斯学会不研究安全机密，也不为政府作研究工作。它依靠自己的资金来源，通过独立的学术研究，促进和提升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它是一个非常令人惬意和颇具吸引力的工作场所，支持无党派的独立思考。在冷战的最后几个阶段，我一直都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对外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直到 1994 年退休），在讨论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参加与冷战有关的活动前，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年来事

态进程也许是有用的。

如前所述，随着 1979 年 12 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和美国作出反应，脆弱的美苏缓和大厦倒塌了。吉米·卡特总统立即对苏联发动讨伐性的政治反击。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受到卡特政府的谴责，这种谴责由卡特本人的反应引发，由布热津斯基领头。然而与此同时，卡特政府误解了苏联行动的原因，宣布“卡特主义”，为中东提供保护伞，以防所谓的苏联的威胁。苏联的档案材料清楚地表明，决定干涉阿富汗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只限于支持已经陷入内战的阿富汗共产党的统治，苏联还害怕美国插手危及苏联边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叶利钦政府公布了这些档案文件，目的是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 1979 年的行为，但是那些文件也清楚地说明，美国官方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是多么错误。）^①

1980 年初美苏关系急转直下，不仅因为卡特政府在其任期的剩余的时间里对美苏关系采取搁置态度，而且还因为继任的里根政府采取强硬的反苏姿态，使恢复美苏关系的企图又推迟了 4 年。到了第二届里根政府，特别是苏联出现一位很不相同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后，双方才得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恢复缓和并结束冷战。

我刚刚退休并在布鲁金斯学会安顿下来，1980 年初期就应美国新闻署的要求撰写了一篇评论，支持美国指责苏联干涉阿富汗的立场，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是苏联针对美国发动重大进攻的一部分。我还主张不放弃缓和，即使受美国谴责的苏联行动引起紧张局势升级，但是也不会“使继续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价值黯然失色，相反，紧张局势升级会使关系更难缓和，这种情况说明更

^① For a full examination, see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 -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 ed. (Brookings 1994), pp.977 - 1046 ; and on the American reaction, see pp.1046 - 75.

有必要缓和。”我问道：“同缓和相抵触的行动难道不应该坚决反对而要放弃缓和吗？”我还说：“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并直接干涉其内政，不能用动机来为其行动辩护，这些动机可能同合适的反应和缓和能否有前途这个问题都有关系。”最后我指出，大多数美国盟友的反应要克制得多，而华盛顿则表现得很恼怒。我说，我们应该“作出一切努力尽可能使我们的行动保持一致”，不仅为了维护联盟的团结和使得制裁更加有效，而且因为“磋商可以帮助我们找出最好的行动方针”，还因为“共同的立场往往能够最好地为共同的利益服务”。我用下面这些话来结束我的分析：

“缓和”是指全面缓和紧张局势，而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引起的紧张局势升级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通过外交和谈判努力扩大安全，控制和限制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扩散，显然是很需要的。如果我们不是对手，那么就不需要缓和。

政治家风度以及公众理解和支持的困难和挑战，在于把下面这两种情况结合起来：一方面，西方坚决反对苏联再使用武力；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如果把缓和理解为消除紧张局势是一个错误概念，如果把缓和理解为全面缓和紧张局势现时不再流行，那么把缓和理解为遏制和约束紧张局势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保持缓和尚未奏效时，放弃这种努力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损害大家的利益。

现在看来，这种评估在当时本该值得信赖，但是不适合1980年美国的情绪。让我感到有点惊讶的是，美国新闻署居然把我的文章向其海外机构广为散发，受到我的许多欧洲朋友的热

烈欢迎。该文被收录在广泛使用的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教材中。^①但是，美国新闻署没有要求我再写什么评论文章。

记者询问我有关问题，偶尔文章里引用我的观点，我还曾出现在几个电视节目中。所有这些对我都意味着新的开始，因为在我原先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避免公开评论现行政策。

另一个不太习惯的公众角色是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开始工作几个星期后，就让我参加第一次听证会，讨论的问题是苏联的战略力量。这次听证会于 1980 年 2 月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众议员莱斯·阿斯平小组委员会召开，理查德·派普斯也出席作证。尽管我们在苏联战略问题上的估计有很大分歧，但是我们差不多都认为，情报估计人员应该更加重视比较难以获得的有关苏联军事思想的“软”情报，而不是严重依赖可以通过技术情报收集获得的军事“硬”情报，即武器和兵力。

6 个月后，我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的亚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作证，讨论美国对苏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马尔科姆·图恩也出席作证。尽管我们两人在对苏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始终不一致，但是都提出了同样的警告：美国应该实事求是地而不是在共同反苏基础上发展对华关系。为什么不能在共同反苏基础上发展对华关系呢？因为如果美苏或中苏紧张关系将来有所改变的话，那么这样做会损害未来的中美关系。在上述以及后来的场合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总共大约在 11 次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我因为过去的经验而被称为专家。在以后的大多数场合，我都是就军备控制问题作证。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还开始同几位国会议员断断续续地通信并偶尔见面，总是他们主动，这些议员当中包括参议员艾伯

^① As a chapter titled “Afghanistan and Détente”, it appeared in *The Conduct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Erik P. Hoffman and Frederic J. Fleron Jr., 2nd ed. (Aldine, 1980).

特·戈尔和爱德华·肯尼迪以及众议员阿斯平，主要是讨论军备控制问题。

我在华盛顿、各大学和海外参加大量的学术会议，积极参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大西洋理事会召集的许多研究小组以及非官方机构组织的各种论坛。这些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的主题大都是美苏关系、苏联政策和东西方军备控制问题，包括战略武器的削减、中远程导弹的部署以及后来的军备会谈、反弹道导弹和空间（反卫星）军备控制。我还经常在各大学、国防大学（及其国防学院）等官方机构以及国务院外交学院组织的高级研讨会和一些会议上就这些问题作客座演讲。在我所参加的国际会议中，有几次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会、帕格沃什国际科学家会议以及有关苏联和东欧研究的国际代表大会。

我参加了一些机构，比如军备控制协会和美国东西方协调委员会（后来更名为美苏关系委员会）。偶尔，我在一些组织发表讲话，例如在华盛顿的妇女领袖大会和妇女全国民主俱乐部。我甚至在 1985 年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年会的一个小组（讨论美苏关系问题）。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举行的一次研究美苏关系的会议，由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于 1985 年春联合主持。

布鲁金斯学会欢迎这些外部的活动，我对这些活动做出了贡献，并从中接触了各方面的人，扩大了我的认识。但是，我作为对外政策研究方面的高级研究员，中心任务和主要兴趣仍然集中在我的研究上。约翰·斯坦布鲁纳和布鲁斯·麦克劳里批准了我的提议：让我全面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十年的美苏关系，这段时间标志着缓和的兴起以及后来在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时期缓和的衰退和没落。在 5 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缓和与对抗：从尼克松到里根时期的美苏关系》于 1985 年完成和出版了，这本书共计 1147 页。

20 世纪 80 年代的前 5 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研究从 1969 年到 1980 年这段时间美苏关系的所有方面，包括全世界范围内的敌对和纠葛，以及政治、军事（包括军备控制）、经济、宣传和情报方面的相互作用，当然还包括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制订政策方面的国内根源和各个方面，以及这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盟友的关系。

基本的方法不过是谨慎而彻底地搜集和分析与该题目许多方面有关的所有事实，除了收集可以公开获得的书面记录外，还努力扩大资料库。在发生这些事件以后，利用这两国政府的大量保密文件显然还不到时候，但是也有少数例外。但是，我有两个明显的优势。首先，在那十年，我在美国政府，当时虽然没有做研究工作，也没有写点什么，但是我经历过这些事情，而且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详细地看过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方面的全部记录，也知道大多数其他方面的许多情况。其次，我还认识美苏两国许多主要人物和次要角色。由于我通晓俄语，在阅读公开文件和会见过去或现在仍在政府工作的有识之士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同时适用于苏联和美国。此外，大多数主要的美国有关人士（包括尼克松、基辛格、福特、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都写了那个时期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直接透露了许多情况，非常有用，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问题。

除了我对 20 世纪 70 年代的研究外，在整个 80 年代，我一直都在从事“同时代研究”，收集资料，考虑 80 年代发生的事情，这项工作是我以后主要研究的基础。1994 年出版了《重大转变：美苏关系和冷战结束》，这是《缓和与对抗》一书的续篇，深入研究了从 1981 年到 1991 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不再有直接在政府里研究这个问题的优势，但是我一直同政府内的相关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1994 年，我

还修订和再版了《缓和与对抗》一书。

尽管 1980 年卡特政府抛弃了缓和，但是 1981 年里根政府上台给华盛顿带来了许多变化，并且极大地影响了美苏关系。我相信，罗纳德·里根本人和他的一些随从人员确实认为，美国已经在军事力量、政治能动性和掌握主动权方面落后于苏联。在当前危险委员会成员中，大概 50 人左右担任新政府的高层职位，他们认为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已经退居“老二”，尽管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夸大其词。里根认为，美国需要采取大胆的对立立场，动员美国（和“自由世界”）作出更大的努力，不仅要制止而且还要击退共产主义主宰世界。这种实力地位的新主张大多是浮夸姿态，但是也不是毫无意义。其实，在第一届里根政府期间持续大量扩军，做的比说的要多得多，造成巨大的军费开支，美国的国债翻了一番，使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在此我无需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邪恶帝国”之说的甚嚣尘上，这种情况大都是由里根本人造成的。但是这种做法对政府内部的估计和政策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以牙还牙”政策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 1986 年伊朗反政府武装丑闻中揭露出非法行动。1981 年，我获知还有更早的此类事件。

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 1981 年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发起一场运动，反对所谓苏联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我知道，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告诉他说，情报不能证明他的观点，他同意要求全体情报部门提供一份正式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黑格和中央情报局雄心勃勃的新局长威廉·凯西都信心十足地认为，苏联肯定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人都引用了克莱尔·斯特林的新书《恐怖网络》中的内容。当时有人告诉他们，中央情报局为斯特林提供了编造的假情报用于公开宣传，那本书不仅不可信而且“有害”。国家情报估计报告草稿根据情报宣布苏联“不鼓励其第三世界伙

伴使用恐怖手段”，但是遭到凯西的拒绝。最后，经过白热化的辩论和数次修改，一份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出台了，捏造事实说，苏联“支持全世界的革命暴力”，苏联“直接或间接”支持但是并不控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造反活动经常“进行恐怖活动作为他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情报估计报告本来应该用尽可能客观的预报来支持政策制订，因此看到情报估计报告一心为宣传目的服务，对整个情报界以及我们这些了解内幕的人来说是令人沮丧的。^①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研究美苏关系的途径之一是，与熟悉苏美关系的苏联官员建立或重新建立联系。我与大多数涉及60年代和70年代苏美关系的苏联外交官是熟人，因此我可以与他们接触，他们也可以自由发表评论。对我的研究接触而言，最有用的是由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领导的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

如前所述，我在保加利亚就见过阿尔巴托夫，几年来在国际战略研究所会议上又认识他的副手维塔利·茹尔金和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其他几位研究人员。阿尔巴托夫在得知我退休和去布鲁金斯学会后，立即正式邀请我访问他的美国研究所，还答应帮助安排我在莫斯科会见其他人（以及安排我在苏联观光）。邀请美国学者和前公众人物是该研究所的老规矩。许多美国官员怀疑阿尔巴托夫和他的研究所是“苏联路线”的提供者。但是，美国专家访问苏联也提供机会转达美国的观点。当然，访问苏联的美国学者不受纪律约束，或者说不奉旨转达官方的“美国路线”，但是各种各样的美国观点有助于使苏联的“美国问题专家”更好地了解美国生活的多样化。从长远来讲，让莫斯科更加准确地了解美国对我们有利。虽然阿尔巴托夫（他同克格勃有

^① See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 - 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rookings, 1994), chapter 1, especially pp.23 - 25 on the NIE

联系)和他的研究所通过他们的出版物和联系为苏联的宣传利益服务,但是由于他们越来越老练,对美国政策也给苏联领导提供越来越现实的估计。这决不是单向的,我相信,总的来说,这有助于美苏两国增进了解和改善关系。这些接触也间接地促使形成“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后来使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很快结束冷战。

1980年9—10月间,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除了会晤美国研究所和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许多苏联学者外,我还同几位外交部高级官员进行了良好的交谈,其中包括葛罗米柯的高级助手科尔尼延科(20世纪60年代他在华盛顿工作时我就认识他),康普列克托夫(我是在华盛顿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认识他的)和格里尼奥夫斯基(也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认识的)。美国驻苏大使托马斯·沃森为我的到访举行了午宴,在那里我会见了许多苏联官员和学者。(我非常感谢沃森慷慨的款待,同时我也意识到,在那些年代里,美国驻苏大使馆非常欢迎有机会为来访者邀请合适的苏联官员,否则的话,他们没有适当的理由接触苏联官员。)阿尔巴托夫还安排我会晤了瓦迪姆·扎格拉金,他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第一副部长。我发现我同科尔尼延科和扎格拉金的交流特别有用。此后,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同这两人有过一系列的接触。

我的儿子亚历克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他陪伴我访问苏联。苏联方面还安排我们很快地访问了列宁格勒、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对我来说,故地重游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对亚历克斯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们见到了阿尔巴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他同我的儿子亚历克斯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到了90年代,他成为俄罗斯杜马(议会)及其国防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1980年我访问莫斯科附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多少有点不

受欢迎的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克格勃老相识鲍里斯·谢多夫的再次出现。谢多夫从来没有直接试探我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招募，但在 1980 年和 1983 年（我第二次访问苏联），他似乎在试探我是否愿意超越讨论目前局势的范围（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像对待任何苏联官员那样同他打交道）。谢多夫竟然建议我写一篇评论当前美苏关系的文章，据他说是为苏联报刊写的，由他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同事付给我稿费。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通过正常的方式为苏联报刊写文章（实际上几年后我的确这样做了），但是我不准备为克格勃秘密付稿费写任何东西。（我还知道，克格勃的一贯伎俩是，请人写文章，然后得寸进尺提出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我回到华盛顿后，向国务院安全办公室如实汇报了谢多夫在莫斯科同我接触的情况（我当时还是国务院的顾问）。根据他们的决定，以后我需要向联邦调查局汇报类似的会晤。联邦调查局按惯例作纪录，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出格的事。我同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外交官保持联系，定期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他们发现这些情况还是有用的。我还同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讨论过我在莫斯科交谈中的发现。

此次莫斯科之行是富有成效的，主要是同苏联学者建立了许多新的联系，同我已经认识的一些苏联外交官和官员恢复了非官方的接触。他们对于美苏关系的看法是悲观的。毫不奇怪，实际上所有的官员和学者都支持苏联的官方路线，认为美苏关系的严重恶化是美国的过错，但是也有一些人显然对此缺乏热情和信心，少数人私下里谨慎地承认苏联也有错误（特别是在武力干涉阿富汗问题上）。我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新的信息，但是这次访问有助于为今后更有成效的接触奠定基础。

里根执政的头三年，在美苏关系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且大多数行动是敌对的。甚至在 1986 年里根正式废弃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以前，特别是在 1983 年他宣布一个新的倡议以后，军备控制就已经瘫痪了。里根的新倡议是，研制并部署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俗称“星球大战计划”，威胁反弹道导弹条约。

那些年最突出的事态发展是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美国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作为北约欧洲战区核力量的一部分。我给报刊写了几篇文章，谈苏联决定部署 SS—20 中远程导弹和北约决定部署战区核力量。我还在国会的两个委员会作证。我担心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升级，但是比军备控制搁浅更使我担心的是，处理美苏关系没有什么战略。

处理美苏关系，苏联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战略，只是在西欧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极力阻止北约部署战区核力量，而这种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1983 年秋，苏联停止了断断续续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同时进行的中远程核力量会谈。

那时是美苏关系的低潮。尽管如此，实际上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种情况，我还是选择那个时候访问莫斯科，那是 1983 年 9—10 月间的事情。我是在阿尔巴托夫的美国研究所安排下去的，除了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外，我还在谢尔盖·罗戈夫的陪同下去了伏尔加格勒（以前叫斯大林格勒）、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罗戈夫已被内定派往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担任美国研究所代表（10 年后，他接替阿尔巴托夫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在第比利斯，我应邀就美苏关系现状在格鲁吉亚科学院一次大型秘密会议上发表演讲。我用俄语演讲（很抱歉，我不能用格鲁吉亚语演讲），坦率地批评了美苏两国政府采取的诸多立场。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韩国航空公司客机 KAL—007 事件。整个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同格鲁吉亚朋友有密切关系的一位俄罗斯教授告诉我，我的演讲曾经一度成为第比利斯的“城市话题”。

我还会晤了 1980 年曾见过面的许多学者和官员，以及一些新朋友，包括总参谋部负责军备控制的头头尼古拉·切尔沃夫上将。尽管当时两国关系不佳，但是我和他仍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详尽的讨论。我还会晤了资深的外交部副部长科尔尼延科以及国际部的扎格拉金。苏联曾经企图阻止北约部署战区核力量，扎格拉金在这种企图中起过重要作用。

我在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于 9 月 28 日发表一个著名的宣言说：“如果有人幻想现任美国政府的政策还有可能改善的话，那么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① 在他所指的事件中，主要有两件。一件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 KAL—007 莫名其妙地迷失方向，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击落，美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另一件是：美国在欧洲开始部署中远程导弹。其实在这以前，里根总统就已经把苏联说成是“邪恶帝国”和“所有邪恶的中心”，号召“讨伐”苏联，紧跟着加强已经在进行的大规模扩军，发展空间防御的“星球大战”计划。KAL 事件后，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我在同《真理报》副主编谢尔盖·维什涅夫斯基谈话时，他坦率地告诉我，苏联共产党对《真理报》发表有利于美国的文章规定有一个“限额”，这个限额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关系缓和全盛期的 60%—80% 下降到 0。他所说的情况不管是否属实，都的确反映了总的变化。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在苏联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和学术机构的接触是非常令人沮丧的，有时是令人吃惊的。

我在偶然会晤俄罗斯老百姓时，遇到了人们真正的担心。最

^① “Statement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 of the CPSU, Chairman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Yu. V. Andropov”, *Pravda*, September 29, 1983. For a more full account of the heightened tensions in relations in 1983, see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pp. 85 - 141.

令我震惊的是格鲁吉亚农村克瓦雷利的情绪，那里当地党的负责人告诉我，一位妇女哭哭啼啼地来找他，害怕叫她的儿子去打仗。我回来后，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苏联官方和民间这种异乎寻常的惊恐。^①

1983年的秋天不仅是美苏关系的低潮期，而且还是紧张局势的高潮阶段。后来我们得知，1983年11月上旬北约军事司令部举行演习使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引起莫斯科高度警惕，以为美国可能发动核战争。当美国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潜伏在克格勃里的英国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上校），里根总统于1984年1月16日发表一篇讲话，提出了一种新的比较克制和温和的政策。

我于1983年10月回到华盛顿后，向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朋友作了通报。此外，中央情报局国内联系办公室建立了一种更加系统的关系，听取我汇报情报部门各环节感兴趣的问题。尽管几易其名，但是那个办公室一直负责收集美国公民出国旅行获得的有价值的情报。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每次访问苏联后，或是有机会接触有价值的情报时，都会向这个办公室汇报。我既了解情报部门的兴趣，又同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有联系，所以能够提供许多有用的情报。我还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办公室保持非正式联系，讨论苏联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

1983年，我在莫斯科还异常成功地获得了苏联的军事出版物。我带回100多期总参谋部的秘密刊物《军事思想》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直到70年代中期。其中半数以上没有在美国出现过。这简直就是奇迹。尽管这些材料有点过时了，但是对研究苏联军事仍有很大价值。仅举一例，我们第一次得知，

^① See Garthoff, "Now Get Ready for the Real Crisi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1983;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7-8, 1983.

^② See Garthoff, *The Great Transition*, pp. 139-42.

早在 1970 年，苏联就在构想有限使用核武器，用以对付北约首先有限使用核武器，谋求避免升级到全面核战争，这同苏联的公开立场是相反的。

我除了参加许多会议和其他活动外，当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广泛研究美苏关系的许多方面。在我完成《缓和与对抗》一书后，鉴于苏联和美苏关系都在起变化，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更加频繁地访问苏联，同时我在华盛顿起更加积极的作用。

1984—1985 年，我从苏联文章的一些细微变化中，甚至更多地是从与苏联来访学者的接触中，开始意识到“新思维”正在侵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定模式和传统观念。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几位年轻的苏联学者于 1985 年 6 月访问美国时，急切地提出了许多新的甚至是激进的问题，这特别是因为其中两位是苏联共产党著名正统人士的儿子。1984—1985 年，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前，几位苏联资深学者就已经在小心翼翼地提到这种“新思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几位领导人的讲话里开始出现这种真正的新思想。

在我看来，真正的转折点是 1986 年 2 月底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第 26 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那次党代会把新思维确定为党的路线。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以及他的几位前任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修改的党纲仍然积极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拒绝它的“僵化教条”），而且严厉批评“帝国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保留旧思想的残余，而是大胆地甚至是惊人地提出新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抛弃作为冷战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这种教条认为，两个世界或两种制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冲突是历史注定的，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这种两个世界不可避免的斗争使双方的关系无法调和，结果只能是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斯大林去世后，即使苏联承认在核时代必须和平共处，避免战争，而且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超过西方当

时的认识，但是西方仍然认为，苏联的这种认识不过是修修改改而不是彻底抛弃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基本的阶级斗争。但是现在，戈尔巴乔夫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他不是讲两个相互斗争的阵营，而是讲“正在形成一个互相依赖、在许多方面是整体的世界”。一个世界，而不是两个世界。他甚至超出承认全球互相依赖的范围，呼吁在军事、经济、政治、人道主义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创造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戈尔巴乔夫还认为，无论是在防御方面，还是在威慑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再依靠军事力量谋求安全，相反，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并在各国共同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安全。^①

这些非凡的观点是由一位苏联领导人提出来的，毫不奇怪不会受到许多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欢迎，因为他们没有戈尔巴乔夫这种开明的新思想。但是，这些非凡的观点不仅提供了进一步政策声明的基础，而且还构成了未来 5 年采取实际政策和具体行动的基础。在那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用了两周时间访问莫斯科，我的苏联朋友畅所欲言，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新思想。

我回到美国后不久，参加一个由许多著名苏联事务专家出席的会议。我惊奇地发现，在我的同事中，几乎没有人重视戈尔巴乔夫的那次讲话，似乎没有人充分认识到那种巨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促使我考虑写一篇文章，谈“戈尔巴乔夫的秘密报告”。我想列出所有惊人的新观点，好像它们是在一次秘密讲话中说出来的。到文章结束时，我才说明那些新观点不过是戈尔巴乔夫在党代会上公开讲话的摘要。这是一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没能坚持到底去完成它。）

我在早些时候同一些“新思想家”的讨论，特别是在那次党代会之后进行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认识这一步的重要性，而大

^① See *ibid.*, pp.253 - 65,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nd the source references to questions above.

家只是后来才逐渐地认识它的意义。我继续发展同许多学者和官员的对话。同我进行长时间讨论的有：科尔尼延科、苏联外交部其他官员（包括副部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他是一名“新思想家”），中央委员会的扎格拉金（顺便提一下，他的儿子名叫尼基塔，是我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就见过的年轻“新思想家”之一），还有国防部的契尔沃夫将军。我发现他们越来越讲求实际，包括认识到一些西方敌意观点起因于苏联的行动，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行动，这是前进了一步。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美国和苏联看成是具有重要共同利益的对手，而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阵营的领袖。其他人在接受新的安全思想的同时，继续为意识形态辩护（例如，发现列宁早就预见到在国际上会越来越互相依赖，越来越需要和平共处）。重大的变化显然正在进行过程中。

1986年3月13日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黑海的两艘美国战舰打破过去的规矩，故意进入苏联领海，离克里米亚半岛海岸不到6海里，对苏联发出的退出警告信号不予理睬。这样做的目的是坚持无害通过权的新解释。从我的交谈中，苏联高级官员（包括切尔沃夫将军，他告知我详细情况）显然认为这是挑衅行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附近的别墅休息，这大概是美国海军始料不及的）。我当然完全不知情况，但是争辩说，如果这次行动是故意的，大概是战术决定。我肯定它不是政治路线变得更加强硬的迹象（今天，我已经得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海军故意从悄悄接近苏联近海的舰队上出动攻击机飞向苏联领空，“哄骗”苏联海岸防空力量。我知道这种情况后，就不那么肯定了）。五角大楼官员很快向记者证实，深入苏联领海的目的是实行无害通过，其他目的是收集情报（顺便说一下，根据国际法，收集情报同“无害通过”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还说，在今后的几天里，美国海军还要在利比亚的锡德拉湾举行类似的演习。 3

月 24 日，美国海军进入锡德拉湾（主舰是“卡伦号”，一艘特制的情报收集驱逐舰，刚从黑海驶来，是入侵克里米亚的两艘战舰之一），同利比亚巡逻艇发生冲突，美国对利比亚进行报复性空袭。苏联对克里米亚入侵的挑衅性质的怀疑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在莫斯科当然主要讨论是否有可能改善美苏关系这个关键问题苏联官员和学者都认为，改善美苏关系主要指望华盛顿。他们对有意义的军备控制的前景特别感兴趣。

薇拉陪同我进行这次访问。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我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进行内部改革的一些迹象。例如，一个艺术展览会展出抽象派的画，这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时代是禁止的。一些穿军服的年轻士兵自觉地和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但是开放的迹象是有限的。

正在缓慢地发生变化的事情包括无所不在的保安当局。就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刚到莫斯科不久就接到一个电话。这次不是鲍里斯·谢多夫而是他的一位克格勃同事打来的，要求见面。我尽管有点累，但是还是见了这位“阿纳托利”。他希望能为我提供帮助，比如帮我买不好找的书，并替我付款。我开始思考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利用他的这番“好意”，并且想出一个主意。如前所述，在 1983 年，我设法弄到了大量过期的总参谋部秘密刊物《军事思想》。现在，当阿纳托利提出愿意提供帮助时，我提出了要求：“你能不能帮我弄到最近几期的《军事思想》杂志？”阿纳托利严肃地说，试试看吧。一两天后，他答复说：他无法帮我弄到完整的原版杂志（每月一期，大概有 8 篇文章，共 100 页左右，封面上盖着印章，标明“专供苏联陆海军将领和军官阅读”的字样），但是他可以帮我复印我感兴趣的文章。他给我带来最近一期的几篇文章。我告诉他，要确定我感兴趣的题目，实在太难了，至少我要看过最近几期的目录后才能作出决定。在过去几

年里，每年 12 月出版的杂志都有全年的题目索引。不出所料，他给我带来了最近几期的目录和 1985 年全年的题目索引（全年题目索引本身就很有价值）。我标出了我最感兴趣的文章。在我离开前，我搞到了许多文章，并在最近几年的全年题目索引上做了记号，准备将来使用。1987 年、1988 年和 1989 年我三次访问莫斯科，都作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

我回到华盛顿后，除了向中央情报局国内联系办公室代表汇报有价值的情报外，还同作战部苏联东欧处处长直接联系。正如我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和军事分析家对《军事思想》杂志很感兴趣，他们缺少许多期《军事思想》杂志，也很希望继续获得这种杂志。我拿出了我在苏联获得的杂志，并且说明对将来继续获得杂志很感兴趣。为了我能够在日后集中获取军事分析家更感兴趣的材料，并避免重复已经获得的杂志，作为交换条件，我获准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中央情报局已经拥有的《军事思想》杂志的内容。这是一种互利行为，当然，我声明将尽可能提供此类材料。

1987 年 2 月我受到几处不同的邀请，又一次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决定举办一个国际论坛，主题是“为了无核世界，为了人类生存”，他要亲自发表演说。这在公众外交方面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倡议，它同苏联过去举办的“国际青年联欢节”等和平宣传活动在两个重要方面显著不同：其一，戈尔巴乔夫的确在利用这次论坛向全世界宣传关于国际事务的新思维，同时也是为了促进苏联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把苏联的事态发展说成“基本上是革命性的变化”，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二，这次论坛总共邀请大约 1000 人，不仅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和争取和平的人士，而且还有持各种观点的人，包括怀疑和批评改革和裁军的人，以及文化界和政治界的知识分子。邀请我的人不是阿尔巴托夫（他的确发出了一些邀请），而

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10年后，他成为俄罗斯总理）。戈尔巴乔夫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说，苏联准备放弃核超级大国的地位，转而依赖共同国际安全。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在：1986年1月他第一次提出重大的裁军建议，谋求建立一个无核世界；1986年8月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上同里根总统就销毁所有核武器问题接近达成协议。

戈尔巴乔夫讲话后，在克里姆林宫为论坛举行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当人们围着戈尔巴乔夫欢呼时，在他身边的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的密友）以及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这两人都在一年前党代会上从政治局候选人中退了下来）。于是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库兹涅佐夫显得特别苍老。波诺马廖夫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也颇显岁月沧桑，我决定走过去问他几个关于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他显得很高兴，开始兴奋地叙述在前共产国际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44年离开莫斯科返回保加利亚的时候，他和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是怎样在新组建的国际部里处理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他党的关系的。

顺便说一下，我还意外地发现，对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非常薄弱，特别是1000名外国人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里自由行动。

我在莫斯科参加论坛期间，有机会继续同在职官员对话，其中包括几位将军、科尔尼延科和瓦连京·法林。科尔尼延科这时是国际部长多勃雷宁的高级助手。法林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大约一年后从多勃雷宁手里接管了国际部。

当然，我还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1987年2月最惊人的例子是，一部名为《悔恨》的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该片于1年前在格鲁吉亚拍摄，得到当时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的默许。虽然他默许拍摄该片，但

是还不能公开放映。现在开禁了，该片在莫斯科一家剧院放映，那天晚上我和一位年轻的格鲁吉亚朋友观看了这部影片，观众（包括我本人在内）都看得入迷了。当我们离开剧院时，与以往散场时那种喧闹声截然不同，剧场里一片寂静，人们都沉浸在电影的回味中。影片叙述了几代人在专制统治下历尽沧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种专制统治立即使人想起斯大林时期最恐怖的日子（对格鲁吉亚人来说，当然也会想起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该片还具有明显的宗教暗示作用。这部电影在艺术上颇有建树，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影响和对苏联人的个人影响。

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在苏联和世界上产生影响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华盛顿却还在用冷战的眼光看待美苏关系的许多方面。

例如在1985年和1986年，我同许多退休的高级官员和将军参加过不少“危机模拟”，即政治军事演习，有些是由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20世纪50年代在兰德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多次政治演习中，以及1964年在名为“沙漠打击”的一次实兵演习中，我都发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军政人士也难以制定对实现政治目标是关键的决定和战略，而到了80年代中期，依然如此。1987年，我在国务院外交学院参加两次苏联外交决策的模拟，扮演总书记的角色（其他人扮演“政治局”军政要人）。但是，大多数专家仍然不准备承认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外交政策路线是真的。1986年，我参加外交学院的一次大型会议，分析首脑会议所起的作用。在该院一次研究谈判的小型讨论会上，我阐述了美国谈判风格的许多特点。我说，虽然整个讨论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谈判是达成协议的一种手段，但是有时候一方或另一方进行谈判根本不想达成协议，而是另有所图。我的这种说法使参加讨论会的一些人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这种认识是常识。但是当我发现：对参加讨论会的一些人来说，这种认识是

一种新的思想，就轮到我不吃一惊了，我原来以为他们会比我认识得更加深刻些的。

这些年来我还参加过另一些许多大会和讨论会，我想应该提一下其中的两次工作会议，是从 1985 年到 1987 年由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一次是讨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由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主持，最后于 1988 年中期出版《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一个长期的西方观点，1987—2000》。另一次是讨论战略稳定、军备控制和展望未来，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詹姆斯·伍尔西共同主持，其文集的题目是《保卫和平和自由：走向 2000 年的战略稳定》，也是在 1988 年中期发表的。这两项研究都包括许多讨论会和文件起草，邀请许多经验丰富的人士参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两项研究都完全没有预见到苏联改革的可能后果。我甚至曾想退出这两项研究，最后我写了一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随同第二项研究文集一起发表。这篇文章说：

这个政策文件是一种平衡的、温和的评估和设想，旨在通过加强威慑来巩固稳定。它作出许多合乎情理的观察和建议。这个政策文件在过去的 10 年里本来可以随时写出来，只是需要稍加修改而已。如果当初在它设想的基础上来执行美国的政策，那么我们的情况毫无疑问会好得多。

我提出不同意见的原因是：这项研究的框架集中在 2000 年，而不是 1965 年、1975 年和 1985 年。我认为：它没有认识到熟悉的威慑理论隐藏着的种种危险，没有认识到苏联新领导的思想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我并不是说莫斯科的新思想会保证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也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安全放在这种希望上……但是，如果我们不马上开始大力确定

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向着分享和平认真努力，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加强我们共同安全的可能性。在军备控制和发展政治关系方面，都应该作出那样的努力，当然，我们在追求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也要谨慎地保卫自己的立场。

这个文件是一个坚实的、保守的讲台；遗憾的是，它没有让我们看到 2000 年将会出现的种种可能性。^①

现在看来，我的观点还是很保守的。当然，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苏联会在几年后解体。但是，这项研究完成于 1987 年后期，发表于 1988 年 7 月。它本来应该更多地研究正在出现的现实和进一步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的主要问题是，根据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美国追求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星球大战”计划是 1983 年提出来的，成为美国新的扩军中心，当时美国正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以解决北约战区核力量的问题。“星球大战”计划尽管在美国国内有争论，美国盟友也只是勉勉强强地、最小限度地予以支持，但是里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对于苏联领导人而言，“星球大战”计划代表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的一次重大的升级，迫使苏联非常艰难应战。对某些苏联领导人来说，“星球大战”计划意味着美国可能发动军事打击的威胁，或者至少意味着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拒绝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条约，从 1981 年以来美国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中一直采取强硬立场。苏联领导人认为，“星球大战”计划比这些走得更远，完全取消了继续进行战略武器控制的任何可能性。苏联人使用我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

^① See *Defending Peace and Freedom: Towar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Year 2000*, edited by Brent Scowcroft and R. James Woolse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pp.47 - 49.

后期提出的论据，徒劳地争辩说，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是密不可分的。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虽然没能阻止继续进行战略进攻武器竞赛，但是有助于它的控制。现在，“星球大战”计划意味着彻底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大大地促使美苏双方保持和加强战略进攻能力，以达到互相威慑的目的。里根总统梦想依靠一种防御盾牌就能够拦截所有来犯的核导弹，使它们打不中目标。虽然苏联（和西方的）科学家几乎一致反对这种想法，但是有些军事策划者确实相信战略防御的这种可行性，他们认为，在对方突然首先发动强大的导弹袭击后，依靠“星球大战”计划仍然能够进行报复性打击。因此，“星球大战”计划增加了战略不稳定性，排斥了战略武器控制和削减进攻性武器。

对于美国的意图和“星球大战”计划的潜在能力，一些苏联领导人深为惊恐。正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开始形成势头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班子上台了，他们开始苦苦思索对策。戈尔巴乔夫决心结束军备竞赛和冷战对抗，但是“星球大战”计划成了最大的障碍，阻止戈尔巴乔夫在前进的道路上采取新的措施。1985年12月在日内瓦和1986年8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首脑会议后，戈尔巴乔夫断定，里根真的一心想搞他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有采取重大的新措施以及苏联作出让步才能克服“星球大战”计划这个障碍。因此，苏联作出重大让步，导致1987年达成中远程核力量条约，销毁所有中远程以下的弹道导弹（苏联拥有的中远程以下弹道导弹比美国多得多）。

归根到底，戈尔巴乔夫战胜了苏联领导层中的保守分子，不仅签署了中远程核力量条约，而且还削减了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但是，从1985年到1987年，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困难。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著名的苏联科学家评价“星球大战”计划，想出了对策。倘若是在过去，苏联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会仿效美国，制定“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当然，他们同美国一样

一直在进行研究)，同时加强进攻导弹的力量，确保报复性打击能力。

但是，同“星球大战”计划的一些倡导者的愿望相反，同许多美国人的印象相反，“星球大战”计划并没有迫使苏联大大增加防御开支，从而使本已紧张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苏联担心，“星球大战”计划也许会起这种作用。但是苏联研究了对策，并没有制定新的军事计划。根据苏联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苏联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决定：只有当“星球大战”计划形成了真正的具体的军事威胁时，才采取适当的，花钱较少的“非对称”反措施来对付它。作为一种具体的军事技术挑战，“星球大战”计划究竟会如何发展，尚不明确，因此现时不需要甚至不可能采取恰当的反措施。“星球大战”计划并没能增加苏联的军事负担，更不用说置苏联于死地了。它也没能迫使戈尔巴乔夫在军备控制方面做出政治让步，也没有对结束冷战做出重大贡献。

从 1984 年到 1987 年这几年里，许多苏联科学家（主要是叶夫根尼·韦利霍夫、罗阿尔德·萨格杰耶夫和安德烈·科科申）开始同美国科学家进行半官方和非正式的会议，由科学家联合会和国家科学院等美国机构主办。我参加了许多这样的会议，发现苏联科学家同西方科学家和军备控制专家之间的交流是十分有趣和重要的。

里根政府竭力推出“星球大战”计划，错误地企图让“星球大战”计划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单方面“重新解释”禁止研制和试验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组件的这些条款。美国政府曲解了谈判记录，要求“广泛解释”，声称如果以空间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根据新的物理原理建造的，那么就该允许研制和试验。这种为美国服务的解释并没有在政府内部经过彻底审查和通过，就被国家安全顾问巴德·麦克法兰于 1985 年 10 月在电视讲话中过早地说出来了。在以后的两年里，美国

国内就此争论不休，直到克林顿政府 1994 年正式否定这种所谓的广泛解释，这场风波才得以完全平息下来。

从 1971 年到 1972 年，我亲自参加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相关内容的谈判，因此有能力驳斥那些杜撰广泛解释的人。这件事在参议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终于在 1987 年通过一个决定，重申传统的解释是“星球大战”计划发展的基础，从而解决了这件事。1987 年 3 月 11 日，我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共同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我指出，1972 年在参议院批准反弹道导弹条约听证会上的证词和谈判记录，都明确支持现在所说的传统解释，而不是新的所谓广泛解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小组的成员除一人外全都赞同传统解释是正确的。这个惟一不同意的人就是保罗·尼采大使，他原来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后来被政府成员说服了，他们认为，在记录中有关苏联的看法有许多不确定之处，足以证明广泛解释是有道理的。他和其他政府发言人都没有说明：如果苏联的解释或正确的解释存在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不首先对另一个条约签字国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再单方面宣布一种新的解释。

我同其他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谈判者一起，在几封信里和几篇文章里支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特别是抨击所谓新的“广泛”解释。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四位前国防部长）发起一个全国运动，以挽救反弹道导弹条约。

我撰写了一本字数不很多的书，深入剖析谈判纪录，指出新解释是没有根据的。这本书叫做《政策和法律：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重新解释》，出版后影响很大。书中对那种新的解释作了有力抨击，不过这并不过分，因为新解释非常严重地公然歪曲历史记录和损害美国的法律责任。^①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布鲁斯·麦克劳里在这本

^① See Garthoff, *Policy versus the Law: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BM Treaty* (Brookings, 1987).

书的序言中写道：“对于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过程的运作，对于本国法律和国际义务如何得到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重新解释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这件事显然应该得到最细致的研究和公开讨论。”我查阅过许多谈判纪录，引用了反弹道导弹谈判中的许多关键文件，而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法官递交给国务院的官方分析中却删除了这些文件。索费尔让保罗·尼采批准这个新解释，但是没有同其他谈判者商量，甚至没有全面研究谈判纪录。对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言，这样做是很拙劣的。

我的书出版后，索费尔法官扬言要抗议。布鲁斯·麦克劳里邀请他吃午饭，我们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索费尔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我完全根据文件作出的分析否定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他也就没有再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

1988年4—5月我再到苏联，这一次还是美国研究所邀请的。我同往常一样同苏联官员和学者轮流交谈。当然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多勃雷宁和科尔尼延科这时是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阿尔巴托夫的前首席副手维塔利·茹尔金这时是新的欧洲研究所所长。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大多数国际问题学术专家这时兴致勃勃地、非常激动地讨论苏联日新月异的国内发展。

当地电视台继续播放宣传性节目以及教育性和艺术性节目，但是这些节目这时都要同美国的肥皂剧开展竞争了。在舞台上，除了一些苏联现代戏外，我还看到了比洛克西人勃鲁斯歌曲的表演。在开放下全新的莫斯科娱乐节目中，正在评选“1988年莫斯科小姐”（到了1990年，选美活动层出不穷，有“莫斯科小姐”，“苏联小姐”，甚至还有“克格勃小姐”！）。

我去了几家新开的私营“合作”餐厅，那里的服务、格调和食物都比标准的苏联餐馆好得多。我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名叫“鹤”，播放的背景音乐从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到蒂娜特纳，还有很棒的鲑鱼。一次我独自在那里用餐时，一位迷人的年轻女子

我可否坐下，这在拥挤的苏联餐馆是普遍现象。一开始，我们的谈话还颇为热烈，但是由于兴趣不同越来越明显，我们也就越来越没话可说了。我的兴趣在于我的专业，更多地了解苏联年轻人的态度和想法。她的兴趣也很“专业”，但有很大不同。过了一会她就告辞，继续寻找对她的专业更感兴趣的人去了。

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最令人感兴趣的场合是庆祝五一节。传统的在红场举行的遵守纪律的游行（以及正式的大规模阅兵）没有了，代之以规模小得多的游行，与其说是游行，不如说是一种街头表演。各种口号都有：有“和平”、“劳动”甚至“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还有“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等。传统的谴责西方的标语没有了，不仅改成“核时代的新思维”和“消灭核武器”，而且还有美苏国旗共同飘扬，“不要”这两个国家的导弹，“要”友谊和合作的握手。

我的通行证可以让我站在靠近列宁墓的观礼台上一个特别区域里，当然比高高在上的苏联领导人低得多。在周围的人群中，我惊奇地发现了去年秋天在最高领导层丢官的鲍里斯·叶利钦。

对我而言，这次访问的高潮是有一次独特的机会去亲眼目睹离莫斯科几百英里的俄罗斯中心地区的基层生活。在阿尔巴托夫的帮助下，我去了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革命前称辛比尔斯克），看望薇拉姥姥家祖先庄园所在地。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当地官员向我介绍了共产党和当地政府的业绩，当地报纸还采访我（后来发表一篇文章，几乎同我的谈话面目全非）。他们为我请了当地博物馆馆长，并派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送我去的地方必须走非常糟糕的路。尽管两个庄园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我还能辨认出其中一个庄园残留的地基。这些死气沉沉的村庄同 70 年前革命时代的样子没有多大变化，不同的是几辆几乎不能用的卡车和拖拉机代替了能用的马。好奇和尊敬的目光迎接了我。对于这些遥远的村庄来说，我不仅是第一个从美国来的访问者，而且

还是多年来第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客人！每个村长都在他们的家里尽力款待我，炫耀可怜的当地图书馆（大部分书籍是落满灰尘的列宁著作），并且急于寻求听到几句鼓励的话。这场景很令人感慨，我尽量表现得令人愉快，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从未听说过改革，如果有人今天回到那里去，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知道苏联的解体！（顺便说一下，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是俄罗斯最不发达、最讲共产主义的地方之一。）40年来，我遍访苏联各地，但是从未如此深入俄罗斯广大农村真正落后的地区。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

我回到莫斯科后，除了专业讨论和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外，还继续会见那位阿纳托利，提出新的要求，得到《军事思想》杂志上的文章。此外，我还独立地找到一位新人，通过他我也能够得到这些文章。

在华盛顿，苏联客人源源不断而来，大多数是学者。1988年11月，召开了有趣的“美苏年轻领导人首脑会议”，其中的一个小组会见了我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些同事。总的来说，美苏的非官方接触，特别是学者间的交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增长。除了继续进行帕格沃什会议和裁军会谈外，还举行一系列的“达特默思会议”，这虽然是美苏两国学者的非正式接触，但是却往往有良好的联系。“达特默思会议”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在促进苏联“新思维”方面。有些会议甚至直接探讨相互认识的问题。

在描述1989年初期我下一次访问莫斯科和参加会议前，我必须回顾美苏两国最雄心勃勃、最广泛地企图重新考虑冷战中一次重大危机的努力的开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最紧张、大概也是最危险的对抗。1987年，值此事件25周年之际，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讨论这次危机。总共有5次重大会议和3次其他会议，先后延续了大约10年时间。恰巧我是

惟一参加所有这些会议的人。美、苏和古巴三个国家的事件亲历者和历史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档案文件集中起来的过程，不仅使古巴导弹危机成为研究得最彻底的事件，而且还因为新的信息越来越多，各方观点不断集合，使历史真相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说明参与者、分析家和历史文件汇集在一起的重要性。一些事件亲历者已经去世，包括安德烈·葛罗米柯在 1989 年莫斯科会议开过几个月后去世，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最近去世。

参加 1989 年初期的莫斯科会议还使我有机会在其他问题上扩大接触面。我又见到了切尔沃夫将军，通过他见到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我同他们进行了最令人感兴趣的讨论。此外，我还在会议上和后来在他的研究所见到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当时他是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

1989 年初期的莫斯科之行还标志着我同克格勃接触（以及通过这条渠道不断获得苏联军事文章）的结束。鲍里斯·谢多夫和阿纳托利又出现了，显然他们是在重新评估同我的接触。虽然我认为谢多夫已经知道把《军事思想》杂志上的文章给我这种安排，但是当阿纳托利把我以前所要的文章给我时，谢多夫似乎对我获得文章的数量感到惊讶。虽然我又交给阿纳托利一张索要文章的题目单，但是它石沉大海毫无音信。实际上，1989 年 2 月上旬的那次会面是我同谢多夫和阿纳托利的最后一次接触。从 1980 年开始，每次我访问苏联，一到达，他们马上都会同我联系，显然是监视发放签证的克格勃通知了他们。从 1990 年中期我下一次访问苏联开始，就不再有接触了。使我惊讶的是，从 1980 年到 1989 年我六次访问苏联，他们都费心招待我，尤其是从 1986 年到 1989 年，我从他们那里挤出了几百篇保密的苏联军事文章，他们竟没有提出任何交换条件。所以，这种接触的停止并不比早先的继续接触更令我惊讶。

从 1988 年初期到 1989 年初期这一年里，莫斯科的气氛恶化

了。我的司机尖锐地批评整个苏联领导层，一个一个地批评，就是没有批评鲍里斯·叶利钦。他甚至说，其他人全都应该排队站在墙根下枪毙。虽然这句话有些极端，但是还有许多话说明公众厌倦了苏联领导层的窝里斗，对改革没有带来进一步繁荣表示不满。苏联第一次有了竞选的氛围，一些人希望选举产生新的立法机构，另一些人则无动于衷。1985年和1986年开始的、1987年到1988年发展的乐观情绪正在减退。

除了苏联本身的潜在革命性变化（但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性变化还不明显）外，最重要的变化当然是苏联同美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全面转变。如前所述，我在1986年3月早就知道，苏联的激进变革正在发展，可能导致结束冷战。在这种变革中最重要的是安全关系，包括军事和武器。虽然这些不是驱动因素，但是它们是最明显的。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军备控制依赖于相互作出决定和协议，最初是美国抛出“星球大战”计划从中作梗，直到戈尔巴乔夫找到一种克服这个障碍的办法。在军备控制、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的激进改革需要“新思维”，也需要苏联军事领导接受这些大胆的改变。

步骤之一是改正最近几年的纪录。从1977年到1983年这7年中，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的防务发言人都一直在警告“苏联坚持不懈地扩军”，由此而产生“军费支出差距”，证据是苏联军费开支每年增长大约4—5%，远远超过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1982年和1983年甚至放弃了美苏双方战略力量的惯例比较，代之以描述全面军费支出的曲线图。着重军费开支而不着重军事能力，这种防御分析是有问题的，它犯了一个更加基本的错误。所有这些比较都立足于对苏联军费开支的情报估计。1983年秋，令里根政府不舒服的是，国防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报告说，根据新的情报和重新分析，现在得出的结论是，1976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夸大了对苏联军费支出的估

计，当时曾经说年增长率为 4—5%，现在看来实际上只有 2%，比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少，苏联的武器采购甚至保持稳定。的确，苏联的军费开支和采购仍然很高。但是，现在看得很清楚，“苏联坚持不懈地扩军”主要反映美国错在估计上，而不是错在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所说的“令人不安的苏联能力和苏联意图”上。布朗的话曾经被广泛引用，特别是被强硬派的国防倡导者引用，作为这样一种遁词：“当我们加强军事力量时，苏联也在加强；当我们停止时，苏联还在加强。”但是，这种说法不正确地暗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美国停止加强军事力量。虚构的“军费支出差距”可以用一种更加贴切的话来表达：“当苏联加强军事力量时，我们就说他们在加强军事力量；当苏联不加强军事力量时，我们还是说他们在加强军事力量。”

尽管勉强承认没有军费支出差距，但是美国依然在加强军事力量，下一个国防预算要求实际增加 13%，而苏联仍然只增加 2%。惟一的变化是不再根据苏联的军费开支来进行比较。此外，这种惊人的新闻只是偷偷地塞进日常的证词，并没有得到重视，因此起初公众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我提醒华盛顿邮报的史蒂夫·罗森菲尔德注意这件事，他立即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第一次让公众注意这种变化。紧接着，我也为《原子科学家公报》的读者写了一篇文章。^①

在这期间，情报部门和连续三届政府都过高估计了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但是却过低估计了军费开支对苏联经济的负担（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16%），因为大大过高估计了整个苏联

^① Se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e of Soviet Analysis, *USSR: Economic Trends and Policy Development*,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Briefing Paper, September 14, 1983, pp. 8–11, 18, presented to a subcommittee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Congress, September 20, 1983. See Garthoff, “The Spending Gap”, i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40, no. 5 (May 1984), pp. 5–6; and Stephen Rosenfeld, “Knockdown of a Soviet Buildup”,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1983.

经济的规模和生产率。

压低支出差距只能起一点点作用。关键问题是苏联政治领导的军事思想和苏联军事政策、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都在发生变化。美国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军事理论的理解以及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认识，在这里也需要作一些重要的修改。所以我开始从各个方面收集和回顾新的材料，包括美国一些新解密的苏联材料，以及我新得到的《军事思想》杂志上的文章，开始写一本关于苏联军事思想正在发生变化的书。新来源之一是《伏罗希洛夫文件》，这是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学院 1974—1975 年课程的详细笔记，是由一位在那里接受秘密训练的阿富汗上校记的，他把笔记偷偷地带出苏联，终于在 1989—1990 年于美国由国防大学分两卷出版，包括我应邀写的解释性序言。^①

1987 年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专家会议，讨论苏联军事问题。我在会上发表一篇论文，谈苏联军事理论的“新思维”。这篇论文动用了我所有的材料，包括最近几期《军事思想》杂志上的一些关键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在美国发表了。^②

（在会上和文章发表后，我的一些同事抱怨中央情报局偏向我，为我提供了那些文章。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些文章是我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他们更想不到是克格勃提供给我的！）

来自某些方面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军事机关，首先是国防部高层官员，他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可能不会把追求军事力量（在他们看来是追求军事优势）放在苏联总政策的中心地位。1988 年 7 月我参加国防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不是一次模拟或演习，而是一次讨论，讨论的题目是《军事演习中的红色思

^① *The Voroshilov Lecture, Materials from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cademy*, vols.1 and 2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89 and 1990); introductions by Raymond L. Garthoff.

^② Garthoff, "New Thinking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1, no.3 (Summer 1988), pp.131 - 58.

想》。遗憾的是，大多数军方参加者仍然认为是“深红色”，导致我同国防情报局一位研究苏联军事的专家发生一场激烈的辩论。我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政策方面推行重大的改革。我预言，苏联将会大大地单方面削减部署在欧洲的部队。这个预言遭到那位国防情报局同事的怒斥。我说，我在莫斯科的情报来源告诉我，苏联正在考虑从东德撤出一个坦克集团军，那位同事竟然对此冷嘲热讽。5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宣布大裁军50万人，包括单方面撤退和解散驻东欧的6个坦克师。其中包括从东德撤走4个坦克师（一个坦克集团军）。显然，国防情报局深陷“旧思维”的泥潭，以至于看不到新的证据（当然情报机构有更好的消息来源。1988年4—5月我访问苏联回国后，立即把我了解的情况向情报部门作了汇报）。

1990年中期我写的《威慑与苏联军事理论的革命》一书出版，标志着我研究苏联军事理论的变化得出了一个结论。^①正如书名所示，我集中精力分析苏联（和美国）关于威慑、预防和结束战争以及战争理论的思想。尽管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从1986年到1990年间苏联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转变，但是我也重新审视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主要发展。由于得到了全套的《军事思想》杂志，这时对所有这些发展就更加了解了。

1989年中期，苏联当局撤销了对发行《军事思想》杂志的限制，而过去甚至禁止公开出版物引用该杂志的名称。从1990年1月起，该杂志就可以公开订阅了。1989—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雄心勃勃的研究生肯特·李对苏联军事问题感兴趣，和我成了好朋友，他想直接接触《军事思想》杂志的编辑，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去找。结果他成功了，不仅得到了全套的《军事思想》杂志，而且还得到了许多以前保密的其他苏联军事出版

^① Garthoff, *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Brookings, 1990).

物，包括总参学院的出版物。

1990年夏我访问莫斯科时，见到了《军事思想》杂志的总编辑阿列克谢·巴热诺夫少将。我希望他能支持李的研究。1991年春，巴热诺夫第一次应邀访美。我在布鲁金斯学会为他举行晚餐讨论会，有十几名说俄语的研究苏联军事问题的专家参加。（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人。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如实地作了介绍。我的一位同事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会使巴热诺夫将军感到尴尬和拘束，但是这种不必要的担忧迅速消散了，因为巴热诺夫喜欢华盛顿的专家们注意他。）巴热诺夫将军在早些时候曾经邀请我给他现在已经公开的《军事思想》杂志投稿。1991年8月一期的《军事思想》杂志刊登了我的一篇论威慑的文章（题目是《一个美国专家对当代安全问题的看法》），这是美国人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顺便说一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在几本苏联杂志上，主要是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大约发表了5—6篇文章，大部分是美国人第一次写的。《一个美国专家对当代安全问题的看法》不过是其中最轰动的一篇。）

1990年夏我访问莫斯科是美国国防部操办的，主要是参加美国、英国和苏联专家举行的一次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正在出现的战略未来》，其实主要讨论苏联的军事改革，人们承认这个题目早就应该讨论了，但是几乎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在以后的10年里，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题目的研究仍实在太少了）。在与会的苏联专家中，有一些新的激进的军事改革家，有一些老的保守派，还有一些中间派只是试图探探路。他们竟然欢迎外国人一起来讨论这些有争议的安全问题，这是变化的一个标志。

尽管会议很有趣，但是我觉得最有成果的还是与苏联军界人士的单独接触，包括同总参学院一些军人的会晤。那年夏季我进

行过些这样的会见，几个月后我再次访问莫斯科以及后来一些苏联军人访问西方时也提供了会见的机会。其中有些人是著名的苏联军事理论家，例如总参学院退休教授瓦连京·拉里奥诺夫少将以及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委员会主任和后来担任副总参谋长的马赫穆特·加列耶夫大将。还有先在防空军后转入军事情报部门的退役上校格奥尔基·米哈伊洛夫，1960年五一节击落美国U—2飞机后，他曾亲自审问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旧的政治意识和军事思想都在迅速变化时，思考政策、理论和战略的苏联军人（在每个国家都有少数这样的人）特别难以调整自己的思想。总参学院军事科学研究室主任弗拉基米尔·斯利普钦科少将等人试图用进化的政治改革来衡量军事技术革命的巨大变化。他认为，未来一代的先进核武器和空间武器是决定性因素。1990年7月，在我们的讨论中，他建议综合考虑军事战略中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军事战略可能产生苏联—西方联合军事理论。总参学院军事“政治学”系（1989年前叫马列主义和战争系）主任伊格纳季·丹尼连科少将等人认为，需要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加强稳定，这是巨大的挑战。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重新保证不使用武力迎接（他以新马尔萨斯论提出的）世界人口状况变化等新的挑战。几个月后，在11月我又同他进行过一次长谈，在谈话中他更加关心军事政治，还在寻找某种全面的理论（以代替马列主义）。他说，他打算设计一个像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的军事—政治框架。但是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丹尼连科相信，在苏联的支持下，美国需要迎接未来的危机，就像迎接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引起的海湾危机那样。丹尼连科将军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他认为，冷战的原因是斯大林的世界革命和权力野心、美国拥有原子弹以及由此而产生美苏这两个对手发生“对抗的逻辑”。他承认苏联在冷战中有明显错误。他还认为，美国军事知识分子造成许多错误，然后又对结果

不满意。

当没有接受新思想的一些苏联军事战略家和理论家继续担心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空间战争时，他们中很多人越来越担心1989—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随后退回到17世纪俄罗斯边界产生的影响。军事担忧越来越集中在地区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世纪的密探行当。

冷战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演变成一个新的、现实的地缘政治对抗范式一些人希望美国和俄罗斯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是主要竞争对手，有些人甚至认为美国是俄罗斯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障碍。1990年11月，丹尼连科将军向我表达了他的担忧，他担心美国继续通过北约谋求稳定，而不是通过包括苏联（俄罗斯）在内的更大的欧洲框架。他还认为，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坚持对抗的话，那么我们这两个国家都会完蛋。

这些年来，我并未涉足华盛顿的政策制定，即使是最外围的参与也没有但是我继续就苏联事务提供咨询意见，比如我在1990年7月参加国防部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军方举行非正式会谈。

中央情报局多次邀请我参加特别的研讨会或其他会议。其中一些是公开的论坛，由中央情报局分析家和学术专家讨论苏联问题。偶尔还特别批准我参加中央情报局的保密会议。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绝密会议，听取关于由一位苏联总参谋部高层人士提供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材料汇报。（理查德·派普斯也与会，以便保证对苏联战略的看法不偏不倚。不出所料，我们对材料的看法很不相同）那时我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们也不知道，有人怀疑这些材料是苏联反情报机构提供的。这个提供材料的苏联人士实际上是已经成为克格勃“密探”的中央情报局军官奥尔德里奇·艾姆斯泄漏的材料来源之一。当这种情况后来公之于众

后，中央情报局因为在没有警告材料可能有掺假的情况下就散发材料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决定散发材料的行动部苏联东欧组组长肯定苏联总参谋部的材料是真实的。我也相信这种说法。情报机关通常会把有效的情报提供给一个双料间谍以便建立他的可信度。尽管如此，当散发材料时，还是应该标示出间谍受控制和材料被掺假的可能性。

1990年11月我访问莫斯科的确是“冷战后”的第一次访问，尽管那时苏联这个国家还存在。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巴黎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宪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后者很快就要解散）的成员宣布他们“不再是对手”，并且庄严宣布冷战的“分裂和对抗时代结束”。这样就巩固了这一年从柏林墙的拆除，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到德国的统一这样一些成果。

这次莫斯科之行是去参加由美国研究所主办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苏联席会议。此次会议也回顾了冷战历史的一部分（正如1989年1月举行的讨论古巴导弹危机的美苏联席会议一样）。我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后来扩展成一篇专题文章出版了，题目用的是《评估对手：艾森豪威尔政府评估苏联的意图和能力》。^①我在书中利用了当时已解密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和其他文件，并用我收集的材料作补充。我以前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第一次在莫斯科讨论中公开了。在阿尔巴托夫为我们举行的晚宴上，当人们频频举杯为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等人祝酒时，我提议为艾伦·杜勒斯干杯来扩大冷战后开放的范围。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显然认为我有点过头了。但是当我继续祝酒词时，很清楚，这种行为本身为冷战后的历史传达了一个合适的信息。我回忆说，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华盛顿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他介绍了许多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领导人，其中包括艾

^① Garthoff, *Assessing the Adversary: Estimates by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of Soviet Intention and Capabilities* (Brookings, 1991).

伦·杜勒斯。停顿片刻后，赫鲁晓夫说：“我知道你是谁。你雇佣许多人刺探我们的情报，我们也雇佣许多人刺探你们的情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只给他们付一次费用了。”杜勒斯友善地表示赞同。我认为，情报工作虽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有助于基本上如实地评估对手，起了有价值的作用。现在，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共同努力，查阅两国的档案，可以比从前更加如实地评价双方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我想可能是有好处的。

阿尔巴托夫后来在同我的谈话中，虽然是谨慎地，但是还是暗暗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尽管他不得不应付某些要求，但是已经成功地使他的研究所独立了。他没有提到这样一件事：最近，他开除了他的一名副手，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在克格勃的一名高级官员，名字叫拉多米尔·波格丹诺夫（顺便说一下，在研究所的谈话中，我发现那个人是一个有趣的对话者）。同样，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提到这样一件事：在他的研究所里，已经发现至少有三个人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

在这里，我应该说明，在美国研究所里有一个人名叫谢尔盖·费德连科，在 1983 年和 1986 年，我遇见过他，发现他是一个有趣而精明的人。后来才得知，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来源之一。谢尔盖·费德连科是外交部高级官员尼古拉·费德连科大使的养子。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尼古拉·费德连科在纽约任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那时谢尔盖·费德连科在纽约是联合国裁军班子的低级官员。奇怪的是，谢尔盖·费德连科在纽约的中央情报局上司是奥尔德里奇·艾姆斯。他们两人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当艾姆斯于 80 年代中期投靠苏联情报机构后，谢尔盖回到莫斯科的美国研究所。艾姆斯尽管同谢尔盖·费德连科有友谊，但是还是向克格勃如实报告说：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谢尔盖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但不是

招募的、受到控制的“间谍”。谢尔盖很聪明地把他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的条件确定为：他只能在国外这样做，在莫斯科就不能这样做。克格勃当然对他进行了监控，但是没有发现他进行任何秘密活动。谢尔盖是高级官员之子，克格勃不能单凭自己的间谍艾姆斯的话就逮捕他。克格勃不许谢尔盖·费德连科出国，继续监视他，但没有逮捕他。1989—1990年苏联实行改革，才允许他出国。苏联解体后，1992年他决定定居美国，美国允许他政治避难。谢尔盖·费德连科尽管发现艾姆斯被捕后供出他出卖过自己，但是仍然视他为朋友。美国一些反情报专家仍然怀疑谢尔盖从未被捕的事实，但是其他人接受了他的解释。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关系是冷战间谍史上最奇怪的小故事之一。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是苏联的革命性变革仍然在进行。最吸引人的是，1990年每天晚上电视转播白天最高苏维埃的政治辩论。1917年布尔什维克用过的旧标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现在又搬了出来，但是赋予全新的意义。70年来，最高苏维埃曾是共产党手里毫无用处的工具，但这时情况不一样了。我在那里时，俄罗斯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接着是几乎所有其他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拒绝接受苏联最高苏维埃制定的关于提高价格的法律，并且胜利了。

11月7日，苏联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73周年，这也是最后一次官方的庆祝活动，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出席（但是叶利钦领导了单独的“人民游行”）。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呼吁建立一个文明社会和法制国家，呼吁民主和市场。但是，这是一次奇特的庆祝，有些人庆祝十月革命，有些人宣告它的死亡。甚至电视评论员也在评论这次庆祝时说：“一些人认为是胜利，一些人认为是悲剧。”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各自组织小规模游行。我看见大约有40个“年轻的俄罗斯君主主义者”身穿破烂的革命前制服游行。民主联盟打着革命前俄罗斯的“白、蓝、红”三

色旗。一名 38 岁的列宁格勒人（以前当过工人），在红场边上放自动步枪，明显瞄准领导席。（我看到了骚乱，但当时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许多迹象表明，人们正在摆脱苏联独裁主义政权的束缚而争取新的自由。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由买卖。所有以往的禁忌都消失了，最明显的是，有关宗教、性、资本管理和革命前俄罗斯（包括皇室甚至白军军官的照片）等全新主题的书籍杂志都能够找到。从前陈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几乎卖不出去）的书店现在陈列着《营销基本原理》（卖得很快）。西式时装和化妆品商店开门营业。

变革正在实实在在地进行，但是它是否在控制之中，或者说是否能够加以控制，还是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试图驾驭事态发展的进程，但是最终连他自己的政府都控制不了。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的领导人试图至少保存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的外表，但是失败了。他们害怕发生的事情很快发生了。戈尔巴乔夫因他的改革失败而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谴责。他在结束冷战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在国内改革方面却遭到了惊人的失败。在保守的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再也不能控制局面，再也不能打败鲍里斯·叶利钦领导的反政变。叶利钦成功地利用他在俄罗斯的权力基础推翻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联，代价是大多数共和国不再有机会组成较松散的联盟。

1991 年底苏联解体时，我正在华盛顿。12 月 19 日，我参加了苏联大使维克托·康普列克托夫举行的圣诞节招待会（在 45 年的冷战期间，我认识他长达 30 年）。这是苏联大使举行的第一个圣诞节庆祝活动，也是苏联大使馆在华盛顿举行的最后一个招待会。12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了苏联国旗，升起了白、蓝、红三色旗。一年前，我看到一小股游行队伍打出了这样的旗帜，这在几年前是会招致立即逮捕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其余的时间里，我 6 次访问莫斯科，那时已经是俄罗斯，不再是苏联了，3 次参加讨论冷战的会议，有 5 次查阅前苏联档案，对冷战进行研究。我还在国外参加了另一些国际会议（1994 年在布拉格回顾苏联镇压 1968 年布拉格之春，1996 年在布达佩斯回顾苏联镇压 1956 年群众起义，1997 年在华沙回顾最终导致戒严令的 1980—1981 年危机，1999 年在布达佩斯参加 1989 年革命十周年活动，1999 年在柏林回顾从 1945 年到 1961 年柏林情报冷战，2000 年在保加利亚的普洛夫迪夫回顾冷战时期的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前苏联官员也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其他会议，我们大家都在寻找更多的记录，以便能够查阅从前的秘密档案和文件以及参与者收集的材料。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又看到了从前的对手和同事，比如 25 年前我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对手格里尼奥夫斯基大使、前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第一副外长科尔尼延科和尤里·沃龙佐夫、戈尔巴乔夫前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又会见了前苏联领导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999 年，我甚至会见了 1991 年未遂政变的大多数领导人。

顺便提一下，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我获得特殊兴趣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 1994 年。当时我正在前苏共中央档案室做研究工作，找到了克格勃在 1985 年、1986 年、1988 年和 1989 年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绝密年度报告副本。这些都是情报工作求之不得的宝贵材料。^①

冷战后，我的旅行和研究走得更远了。如前所述，关于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举行过一系列的三方会议，其中的一次会议于 1992 年 1 月苏联解体几天后在古巴的哈瓦那举行。我的一些美国同事对于去哈瓦那有些顾虑，我向副国务卿拉里·伊

^① 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报道了这些报告的内容：Garthoff, “The KGB Reports to Gorbachev . . .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 . . vol.11. no.2 (April 1996), pp.224 - 44.

格尔伯格作了汇报，认为这次会议是很值得参加的。我们访问的时间太短了，忙于参加工作会议，只能粗略地看一下 1992 年哈瓦那的生活。要想充分了解取消苏联补贴贸易的影响为时过早，况且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贸易封锁政策。但是卡斯特罗明确表示了古巴坚持到底的决心。顺便说一下，哈瓦那滨海区一个有趣的特色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过去的历史转到了现在。在哈瓦那海滩的一处著名度假胜地，矗立着一枚 75 英尺高的 SS-4 中程弹道导弹，就是 1962 年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的那种。（当然，这个导弹不能发射，也不是 1962 年遗留下的。美国同苏联于 1987 年签订中远程核力量条约，规定从两国现役武器库中销毁那种导弹，但是允许在博物馆展览。）

几个星期以后，我于 1992 年初第一次访问中国。我还没有提到的是，20 世纪整个 80 年代，我同中国官员一起参加过许多会议，1981 年的布鲁金斯会议是其中的第一次。（在 80 年代中期，我还几次私下会见过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是由我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西里尔·布莱克慎重安排的。）此次中国之行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安排的，邀请了四位苏联问题专家，包括马歇尔·舒尔曼和我，去会见中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我的中国之行非常有趣，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同中国接触，直接去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而且还因为我很想了解中国方面对几个星期前苏联解体的反应。我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研究苏联问题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就俄罗斯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交换意见。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当然很感兴趣。他们没有恐慌，但是确实担心俄罗斯未来政治进程的不确定性，担心同新疆接壤的中亚地区出现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还只能猜测该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统治突然倒台中吸取什么教训。他们认为，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产生的结果，证明他们自己逐步实行经济改革同时由共产党继续加强

政治控制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表面平静，但是对未来的发展显然没有把握。我在上海还碰巧参加了上海公报 20 周年庆祝晚宴。

冷战的岁月让位给冷战后的时代，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两个重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当然是展望未来，判断美国、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将会走什么道路和应该走什么道路。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苏联解体后其他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的问题，包括确定自身身份、国内发展以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二个挑战是回顾过去，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见识来重新审视冷战。我将在最后一章里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简单回顾冷战结束阶段后，我愿自豪地引用母校耶鲁大学于 1992 年 5 月给我颁发威尔伯·卢修斯十字勋章嘉奖令中所说的话：

你是学者、外交官和十分权威的苏联问题专家。你的经历综合了学术研究和政府服务。你写的 40 多本书和 100 多篇文章涵盖了各方面的问题，包括苏联的军事安全政策，苏联和中国的军事紧张局势，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苏关系缓和的起落，重新评价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所作的情报估计，以及你努力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对里根政府为了推动“星球大战”计划而做出的错误解释。

在冷战中，你是杰出的参与者和观察家。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你作为卓越的当代历史学家，你那人道的、客观的学术成就将永存。

第十九章

对冷战的反思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客观历史。但是，如果说没有主观真理，那么对理解和评价真理，包括历史（即经历、感受和分析历史现象），一定既有客观的方法也有主观的方法。

现在，冷战是历史分析的课题。这意味着分析历史事件及其原因、谁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分析影响甚至决定事件进程的因素。主观考虑（包括历史进程关键参与者的目的、感觉和价值观）是（或者至少应该是）客观分析现象的一部分。充其量来说，可以探求对历史人物（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已确认身份的历史人物）的爱憎好恶。

冷战是最近的历史，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当然这是指所有 25 岁以上的人，只是经历的程度和方式大不相同而已。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经历冷战时间的长短，而且还在于它对我们的影响和我们对它认识的程度。我们中有些人不仅经历过冷战时期，而且还是参与者或观察家。我写这本回忆录，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人的冷战经历可能使没有同样经历的人感兴趣，而且，即使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也不会完全相同。

经历过冷战的一代人，当年曾“创造”战后的世界，迪安·艾奇逊的著名表述是：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一个无法忽视的挑战，在这个挑战中，我们命中注定要成为主角。很少有美国人怀疑这种挑战的现实性或迎接挑战的宿命论。认为另一个主角

会同时把这种挑战看成是机会的人当然就更少了。

在冷战中，美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故意过分简化关系（不是无意识或未认识到的偏见和歪曲）是一种政治需要。用艾奇逊生动的表述来说，描述冷战对手的威胁，这是“比事实还要清楚”的一种需要。^①但是，美国领导人把遏制真正的威胁看成是一种真正的挑战和真正的责任。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就在挑战这样一种传统观点，这种传统观点认为，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一直在领导西方世界迎战和遏制（并最终打败）苏联统治世界的追求。实际上，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常常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美国为了谋求世界霸权，发动了一场本来不该发生的冷战，美国纠集一帮盟友对付虚构的苏联威胁，只不过是给动员西方世界支持美国发动冷战披上合法的外衣。

今天，感谢日益公开的历史纪录和回忆，“后修正主义”的一代历史学家视冷战为一种复杂得多的现象，很难把冷战完全归咎于苏联或美国之中的任何一方。

当我们在思考冷战的历史时，应该努力对非常复杂的事实作细致的、平衡的描述。“平衡”当然不是说对历史责任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要努力权衡各方面的考虑。

我深信不疑的是，说什么美国领导自由世界反对咄咄逼人的邪恶帝国这种神话，是太简单、太明显了。这种神话虽然不能完全准确或足够地表述以后的竞争，但是仍然比修正主义者颠倒主角的责任要正确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冷战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是意识形态。

冷战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和美国当年都日益深信，由于历史

^① See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 W. Norton, 1969), p.375, referring to NSC - 68 in 1950. Acheson had earlier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broad depiction of the threat in the Truman Doctrine in 1947.

原因，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领导人相信，共产主义将最终统治世界，而苏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锋。他们还认为，历史决定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将与之敌对。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决心不择手段增强国力，实行扩张政策，以实现由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世界。双方都认为，正是对方的存在才迫使自己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一方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对方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双方都认为，冷战的历史正在证实自己的观点。

西方流行一些错误的观点，例如：认为克里姆林宫是主谋；相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苏联领导人只进不退；夸大共产主义颠覆自由世界的的能力；认为苏联官员视军事力量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最后手段。但是，西方有一种观点并没有错：认为苏联领导人是投身于历史赋予的两个世界之间的斗争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的其他动机、利益和目标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包括国家目的、体制利益，甚至个人的内心思考。但是，这些影响倾向于以加强而不是削弱意识形态框架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每一方的行动都与对方意识形态上的预期相当吻合，因而每一方都长期相信自己的世界观有理。

可以肯定地说，冷战是延伸到国际关系各个方面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一场地缘政治斗争。但是，冷战被认为而且继续被认为是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一种二元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产生出一种二元论的反共产主义世界观。每一方都给对方强加了最终统治世界的无限目标。此外，每一方的行动准则都指望实现自己的长期抱负（或历史命运），因此产生无限期的冲突。

尽管双方都设想无限期冲突，而且决策也是重实效的，并考虑风险得失，但是总有失算的危险。冷战同核时代的头半个世纪发生历史巧合，这就特别危险。威胁世界文明的核武器极大地加剧了这个时代的紧张局势，而且这种利害关系是绝无先例的、完

全无法想象的。当然，这也并不是否定核武器的好处，它有助于使冷战保持在“冷”状态，防止了 20 世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核武器尽管有可怕的威力，但是并不引起、防止或结束冷战。如果从来就没有核武器，冷战还是会发生的。但是，强调意识形态是造成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竞赛的部分原因。

当机会和克制使双方都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时，冷战和核军备竞赛就会减弱。另一方面，放弃意识形态基础，冷战和核军备竞赛就可能结束。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了，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现实世界的进程和威胁，最终深深修改了政治目的。

冷战的“胜利”不是只靠西方地缘政治遏制和军事威慑得来的，也肯定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靠里根扩军和里根主义得来的。只有在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的国内制度是多么糟糕，对外政策是多么失败，首先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并不反映现实时，冷战才得以结束。西方的遏制确实成功地封杀了莫斯科推行苏联霸权的企图。40 多年来，西方的遏制起了牵制苏联的历史作用，直到苏联内部的破坏种子成熟为止。从这一点上来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

我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或任何一方的个别领导人决定了历史。历史决定的问题是，只有苏联领导人能够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结束冷战。为什么？因为冷战的发生完全由于双方都认为，两种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制度注定要一决高下。而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两种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地缘政治的和军事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敌对的，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世界霸权。只有当苏联领导人能够承认这样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并在抛弃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时，美国和西方的领导人才能（起初是谨慎地）承认有可能采取

乔治·布什总统所说的“遏制以外”的行动。美国遏制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威胁的冷战指导思想，是苏联认为两种制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的衍生物。只有当苏联领导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恰逢戈尔巴乔夫当政）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认识并否定荒谬的冷战基础时，西方领导人才会认识到，遏制一种对自由世界不再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已经不再有意义了。

以上所说的对于冷战的起源和性质及其结束的这种看法，是我现在得出的结论，但也提供了适当的背景，供我对冷战进行反思，回顾我当年经历冷战，尤其是经历冷战早期时的一些看法。

苏联的威胁，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想象出来的，正是这种威胁使美国决心进行冷战，由此产生遏制和威慑的政策。当时（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期）我同意这种看法。1953 年斯大林去世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说：“苏联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对受苏联统治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关系的看法，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但是……使苏联政策总有一天起变化的惟一手段是，自由世界决心不让共产党人发动任何形式的侵略，建立并保持使这种决心说到做到的力量。”^①

苏联政策的思想基础同苏联之前的俄国和苏联之后的俄罗斯有本质上的区别。多年期间，我在几篇文章里指出，革命前的俄罗斯承认世界政治秩序，而苏联则根本不同。1966 年我写道：“当苏联继续同世界各国共同存在时，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动力已经减退，可能性质也会改变。但是，到目前为止，苏联的看法还没有承认世界秩序。”^②1960 年，陆军学院一位教员问我苏联为什么不同于非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出我同样的

^① Raymond L. Garthoff, “Ideological Concepts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2, no.5 (September - October 1953), p.8, It was written in late 1952.

^②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Policy: A Historical Analysis* (Frederick A. Praeger, 1966), p.27.

看法。我强调说：苏联不接受基本的国家制度，相信世界会起历史性变化，无限制扩张共产主义，因此增加了战争的危險。

但是在当时，特别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1953 年斯大林统治结束，我对冷战起源和早期冷战的看法主要表现在：我们这些在政界和学术界处理和研究美国安全利益、世界事务及苏联事务的人，几乎都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大力进行冷战才能避免核战争。在斯大林死后，这种看法多多少少依然继续在起作用。

我们中间有些人完成了正规教育（许多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后重新入学而完成的），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期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吸引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迎接正在出现的冷战的挑战。当然，大多数人去干商业或民用事业了。但是仍有许多人一心想搞国际事务或国家安全，不仅投身于战后重建外交或军事，而且还急于抓住新的冷战机会，从学术上研究共产主义和苏联，到研究和分析政治、情报和军事，直到秘密收集情报和从事隐蔽活动，包括宣传和政治战。

我当然也选择了这条道路，先是在原型的冷战思想库，即兰德公司，从事学术研究，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进行保密的调研和分析，同时与美国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然后进中央情报局的各国国力估计处工作，随后又到国务院先后担任一些不同的职务，重点则是处理美国与苏联及苏欧集团各国的关系。我的同事却大多稳定在他们所选择的某一职业，或从事外交，或从事中情局秘密工作，或工作于某一军种，或工作于学术界，但冷战活动的多样性涉及美国政策的许许多多的方面，因而各种工作往往彼此重叠和交叉。而且，许多冷战活动不仅涉及政府部门，同时也涉及私营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和学术机构。

总之，我的冷战之旅是独一无二的，但又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典型。首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前五年，不管政

府采取什么必要的方式进行冷战，都很好地取得一致意见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一致的意见，公众的支持也减退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在越南战争以后，军事上的幻想破灭了，中央情报局的暗杀阴谋和另一些越轨之举被揭露出来了。

由于越南战争公众不支持林登·约翰逊总统，由于水门事件公众不支持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由于举措无力公众不支持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由于十优柔寡断和伊朗人质问题公众不支持吉米·卡特总统，由于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公众不支持罗纳德·里根总统。

这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政治的素描，但它是非常不完整的，仅仅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公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发生这种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同苏联关系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肯定地说，从艾森豪威尔、里根到布什，历届美国总统实际上都在实行遏制政策企图平息冷战冲突，同时也在谋求缓和国际关系。另一方面，斯大林去世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也都在这样做。但是，美苏双方都未能找到一个维持稳定缓和的基础，并且还在继续进行地缘政治竞赛以寻求各自的优势。第一次坚持不懈并且成果卓著的努力发生在尼克松—福特时代，但是最终也失败了。最后的努力发生在里根—布什时代，由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方向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冷战结束了，而不仅仅是缓和了国际关系。

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冷战起源及其迅速成形的相关责任，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冷战迅速化解的功劳，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仍然争论不休。冷战持续了那么久，其间，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直到 80 年代中期，各方面的相关责任如何，也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考虑到政治竞赛和军备竞赛的动态，特别是美苏

双方的冷战历程，那么我不相信美苏两国错过了早日结束冷战许多绝好机会的说法，但是有些紧张关系本来是能够而且应当避免或缓和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冷战的结束首先需要出现这样一位苏联领导人，他的世界观发生深刻变化，从而结束一种根本的意识形态信仰，不再认为两种世界制度间的冲突是历史注定的。但是，这种世界观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竞争对手的理解，美苏双方本来都能够并且应该比较开放一些，本来都能够并且应该执行可能更早改变对手看法的政策。

拿我的情况来说，作为学者、研究员、情报分析员和估计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我既坚信确实存在着充满敌意的苏联，美国确实有必要实行遏制政策，同时也坚信我们的政策应该立足于对敌人最精确、最完整的了解。夸大敌人的缺点以及过高估计他们对美国的威胁也许是政治战的需要，但是国家的政策应该立足于现实，越接近现实越好。20 世纪 60 年代及其之后，我逐渐看到苏联政策越来越可能有助于建立共同的利益，同时也看到，在苏联直接挑战的地方，我们继续同它竞争，继续同它对抗。因此就有了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立场，必要时用军事行动，但在可能时靠外交压力，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类似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已经标出了那里的轰炸机，轰炸机也必须撤出。但是我反对这样一种主张：在危机期间改变我们的目标而提出更多的要求，企图一举动摇苏联在古巴的存在或推倒卡斯特罗的统治。我欢迎 20 世纪 60 年代走向缓和的细小步骤，欢迎 70 年代尼克松的缓和，但也没指望这将意味着结束冷战的对立。

冷战是对抗和合作的混合物，一方或另一方相对升升降降，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消失。这就是这本回忆录既写竞争也讲共存的原因。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审

议和文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要反映出公开的对抗词藻。被称为“冷战宪章”的 1950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68 号文件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凯南和波伦当时就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苏联国内政策言论以及公众言论中在意识形态上根深蒂固的敌意，当时要减缓冷战对抗看来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在以后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国集中进行反对“邪恶帝国”的政治战，使得甚至 70 年代的有限缓和也得不到支持了。20 世纪 70 年代的缓和并没能阻止尼克松和基辛格（或者苏联方面）停止地缘政治竞赛和遏制。但是，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遗留产物，政治战优先，甚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导致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削弱敌人，往往否认或者忽视建立共同利益的机会。协调政策的核心机构，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就叫做心理战略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是行动协调委员会，起着更加广泛的协调作用，采用比较中性的名称）。心理战和隐蔽行动只是削弱和颠覆对手的极端例子。大力采用的手段则是周围联盟集团的经济封锁和其他政治战手段。

冷战初期，敌对状态背后的驱动因素之一是害怕战争。从 1948 年直到 1953 年，是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笼罩着柏林的“战争恐慌”，随后是封锁柏林，苏联试验原子弹，以及爆发朝鲜战争，都令人极为担忧。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叶，战时联盟迅速变成了冷战冲突，同时大量揭露了斯大林的专制，使公众担心斯大林也许很快就会发动战争。而政府机构中专业人员的担心则普遍集中在稍后一段时期内苏联可能会增强军事力量。（幸运的是，早先预言的危险没有发生时，最危险的时期看来总是会后退几年。）我们这些人即使不认为战争会立即爆发，但是也毫不怀疑它可能会在某一时刻爆发。除了长时间的艰难对抗和需要遏制这种威胁外，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一方面，官方的（和官方鼓励的）警告以及动员公众支持遏制；另一方面，公众不仅担心来自苏联的军事危险，而且还担心内部的共产党颠覆危险，在这两者之间当然也有联系。

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那些年里，公众的担心有所缓解，但是对苏联的军事发展既有真正的惊恐，也有言过其实的担心，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轰炸机差距”和 50 年代后期到 1961 年的“导弹差距”不过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即使在我们努力确定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挑战时，我和其他专职分析这些威胁的人也都受到夸张言论的困扰。我们中有些人甚至认识到，苏联领导人明白自己的能力和缺点，只会认为美国在故意夸大苏联的能力（以及军国主义的意图），目的是为美国自己追求发展军事优势作辩护。实际上，尽管美国担心的原因决不止这一种考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就是这么回事。美苏双方都在推行军事计划（并为之辩护），目的是威慑对方，在战略关系中取得尽可能有利的地位。惟独缺乏对对手作出评价的影响。

我们武断地进行政治战，还有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当时被完全忽视了，甚至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所反映。谁也没有真正考虑过美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期那些咄咄逼人行动，例如美国飞机在苏联西部地区上空飞行，空投间谍、支持游击队的分裂主义运动，这些行动会对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国家安全机构产生什么影响，会让他们对美国的政策目的有何观感。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这种因素的考虑不可能是惟一的或者甚至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是它本来是能够而且应当加以考虑的。虽然我当时没有参与决策过程，但我同心理战略委员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工作的朋友有联系。而且，我们现在有广泛的（仍然是不完整的）高层审议的解密纪录。显然当时广泛盛行的观点是，我们在进行一场自卫性质的冷战，敌人会利用一切手段推进他的阵地，我们是被迫这样做的。

1954年7月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詹姆斯·杜利特尔中将准备了一份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活动的绝密报告。这种冷战哲学在报告里得到了非常明确的阐述。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统治世界的死敌。在这场游戏中没有规则可言。一切迄今为止可以接受的人类行为规范都不适用。如果美国要生存下去，那么必须重新考虑“公平游戏”这一传统的美国概念。我们必须发展有效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必须学会使用比敌人更聪明、更先进、更有效的办法去颠覆、破坏和消灭我们的敌人。^①

报告虽然承认，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根本令人反感的哲学”，但是还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采取“攻击性的”秘密行动，“必要时比敌人更加无情”。这一想法，多多少少也盛行于美国政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冷战早期。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也在影响苏联对美国目的的看法。不论我们的行动看起来是多么合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采取准军事行动和秘密行动侵犯苏联主权和挑战其合法性方面，实际上我们比敌人走得更远。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诉诸同样的手段时，难道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把我们的目的看成是反映我们认为他们的目的吗？

肯定地说，苏联领导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一心想消灭他们。后来，人们有时候在争论我们不应该向苏联方面挑衅时，脱口而出的反驳是，他们

^① Cited by John Ranelagh, *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Simon & Schuster, 1986), pp.276 - 77.

已经尽可能与我们为敌，并且尽一切可能来削弱我们。丝毫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仅有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会随着冷战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根本没有考虑这样的事实：西方一贯的敌视政策看来只能使苏联更加坚守他们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谋求引导他们怀疑自己的意识形态并约束自己的行为。

回想起来，事后批评当然比当时办事更容易。我相信，遏制政策的主要路线是正确的、成功的。即使回想起来，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可能以及何时才可能有更多的平衡，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初期，实际上确实没有同苏联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机会。后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虽然来得有点缓慢和谨慎，但是这两个国家里有些人终究越来越认识到，存在着缓和紧张局势和进行有限合作的机会和愿望。当尼克松政府和勃列日涅夫政府都转向缓和时，双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片面地描述缓和过程以及让公众产生过多的企盼，而过多的公众企盼导致后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期的失望和幻想破灭。

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和苏联虽然还是对手，但是双方都在逐步探索可能的有限合作，尽管道路是艰难的。

甚至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和中情局各国国力估计处的一些同事就已经通过我们对苏联政策的情报估计，来谋求证实存在着共存甚至有限合作的基础，同时也存在着继续遏制和威慑的需要。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既倾向于扩大其影响，也看到需要安全。首先，他们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需要避免核战争，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行动。我们的这些观点在当今研究冷战的人中间是很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却遭到某些人的强烈谴责，这些人认为，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保持（后来又说“重新获得”）军事优势，进行坚持不懈的冷战，并且认为苏联的目的完全是谋求优

势和最终获得军事胜利。

在苏联军事威胁不断增长这一观点的最坚定拥护者中间，有许多是军人，包括军事情报机构中的许多（并非所有）人。一些人强调苏联间谍和颠覆威胁，包括欺诈。实际上，凡是同一贯敌视和威胁相矛盾的任何苏联外交和其他政策措施，都可能被而且的确被鼓吹对抗的那些人说成是欺骗性的、危险的假情报。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有意见分歧。那些一直专门秘密从事间谍“游戏”的人，只看到同竞争对手之间尖锐的对立，对他们来说，美苏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自然是最重要的。对那些献身于政治战和秘密行动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情报分析员和估计专家则是面对着更加多元化的现实。军事策划者、司令官和参谋人员自然集中精力准备应付潜在的军事冲突以及最危险的紧急事件。而外交官则另有看法，他们往往在第三国和多边外交论坛同苏联对手作艰苦的竞争，以及应付双边关系中的挫折，但有时候也要进行谈判，在外交上困难地追求共同目标。

我们大家都（在军事、情报、经济、政治、宣传和外交领域）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同苏联交往的情形有所不同，有时候大不相同，对于敌手的看法也是如此。此外，全球政治状况以及美苏领导的立场也在变化。冷战期间，我有幸有机会利用我在政府任职的各种有利条件来评价这些不同的看法。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发展有限合作方面，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是军备控制和裁军。实际上，军备控制和裁军至少包括美苏两国的三个共同目标。第一，至少从时间上来说，通过禁止核试验和不扩散条约，努力防止其他国家核扩散，这是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利益。第二，减少两国战略武器竞赛的危险。除了“热线”和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关于避免意外或非故意战争的一系列协议外，主要的成就是 1972 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条约通过有保证的相互威慑来减少寻求战略优势的刺激。与反对者的论

点相反，该条约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像许多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结束继续扩充更加先进的战略进攻武器。尽管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同意防止将来在反弹道导弹系统方面的竞赛，但是并不准备停止他们现有的完善和建立战略进攻武器的计划。

最初，也就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我一直怀疑军备控制的可能性，尤其是裁军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基于共同利益，采取一些有限步骤的基础是存在的。在第一份关于苏联对裁军和军备控制态度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中，我就是这样说的。该文件是 1958 年由我起草的。20 世纪 60 年代我在国务院参与这个领域工作期间，又发展了这种理解。

到 60 年代结束时，由于出现均势和不稳定的、昂贵的弹道导弹防御竞赛的前景，美苏双方都准备开始小心翼翼地认真地互相试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我是早期的参与者和倡导者。后来，我有机会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起关键作用，导致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中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最初的战略武器协议。我不会去重复前面已经表述过的内容，但是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说明：从 1967 年至 1972 年，我不仅参加而且还真正影响了美国制订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策，特别是实施了同苏联方面的谈判，这种机会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我政府生涯的辉煌阶段。虽然后来我到了外围，但是在战略武器控制的突破性阶段，我又幸运地站在了舞台的中央。

战略武器控制肯定起着一种不太大然而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在冷战的后半段时间内维持局势稳定，也有助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期促进有限缓和，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在这两个方面发挥本来可以发挥的更大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军备控制的努力对冷战过程的影响更加模棱两可。双方坚持强硬的、保守的军备控制立场，一方面至少是部分地说成是

对付敌人的正确的谈判技术，另一方面也倾向于加强盛行的敌对关系概念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夸大敌对倾向的误解，以谋取优势和最大限度地扩大权力，以便继续竞争，这就是冷战的特征。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军备控制三个共同目标中的两个。第三个目标是拒绝军备竞赛，削减军备并开始部分裁军。这是美国许多民间机构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热烈追求的目标（不包括苏联及其集团，因为那里的宣传指责西方“帝国主义”阻碍裁军）。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总统才真正开始寻求削减军备，至少在1987年成功地开始中远程核力量条约的谈判过程。在这之前，美国和苏联实际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功，甚至可以说都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中远程核力量条约是重要的，有助于减缓冷战，并为军备控制提供新的动力。

从1987年到1990年，冷战临近结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达成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990年举行削减战略武器第一次会谈）和削减常规武器条约（1990年举行欧洲常规兵力谈判），主要通过苏联在谈判中作出不对称的让步和单方面裁减。这一过程在冷战结束后仍在进行，1991—1992年相互作出让步（1992年举行削减战略武器第二次会谈）以及双方都采取单边行动（1991年举行关于战术核武器和海上核武器的谈判）。只有在冷战结束时，战略武器控制才明确地有助于达成政治协议。

军备控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要求双方，首先是两个主要对手，共同处理至少是军事竞赛中的某些方面，触及一个敏感的安全区域。它还在美苏政治关系中发挥作用。尽管如此，它仍然局限于冷战整个地缘政治舞台的外围。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后期，当欧洲战后的政治秩序把这个大陆明显地分隔开来时，冷战就产生了。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当“铁幕降临”时，苏联巩固了它在东欧的霸权，而美国则同西

方国家一道创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军事同盟，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来，西德也参加进来。在亚洲和中东，美国也采取行动，创建了其他几个地区性的和双边的同盟。最初，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把它的同盟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但是没有牵涉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后来，在 50 年代后期、60 年代和 70 年代，苏联进一步冒险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联系，寻求当地的代理人。

由于欧洲的形势在 40 年代后期基本上已成“定局”，同时由于朝鲜战争巩固了原来的战后界线以后，东北亚的形势也基本“定局”，最容易发生变化的地区转移到东南亚、中东、殖民地后的非洲、南亚以及加勒比地区。转移的机会导致苏联和西方的主动权或大或小变化不定，导致地缘政治和政治优势亦起变化。个别情况的发生和得失，尽管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始终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但是却使第三世界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看起来比应该起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并不是说，所有第三世界的冲突对美国 and 苏联来说都不重要，但是更加普遍的观察是，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比第三世界冲突对冷战的影响更加重要。冷战导致严重过分简化我们对世界政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治和地区政治）的看法。今天，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有一点变得格外清晰：世界（和第三世界）政治是很复杂的。事实一直如此，但是在冷战期间，由于戴着冷战眼镜看一切事物，我们使国际政治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了，只专注于美苏全球对抗的结果。

阿富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旦苏联在 1979 年 12 月直接插手，美国在 80 年代的政策就简化为一个目的，让苏联在阿富汗流血，让苏联人在世界面前出丑，而不管巴基斯坦（我们的盟友）或其他国家的作用如何，不管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动态如何，也不管苏联撤出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果则是同样流血的内战（在苏联插手前早就开始了，在苏联撤出后还在继续），在阿富汗

出现一个甚至更加厉害地实行镇压的政权，以及大量恐怖分子的外流。我们帮助武装和训练了这些恐怖分子，但是现在他们却威胁美国的利益以及总的世界秩序。

即使在欧洲，过分简化冷战导致美国政治适应在反苏政策中领导北大西洋联盟，甚至在这一点不再合适时也是如此。幸运的是，我们的盟友在欧洲处理东西方关系时没有像美国那样受这种做法的牵制，他们带头采取重要措施，例如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20世纪70年代，欧洲人带头谋求缓和东西方关系，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促使美国勉强加入以免完全失去对这个过程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苏联都厌恶甚至恐惧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威胁到冷战欧洲清晰的分界线。

北大西洋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巨大的成功。受马歇尔计划刺激的经济复苏以及后来西欧走向欧洲联盟也是巨大的成功。东欧注定要继续受苏联霸权的控制，直到一个苏联领导班子鼓励真正的独立并准备接受那导致共产党统治、东方军事联盟、经济协调和政治集团彻底崩溃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虽然没有直接带来改变，但是它的促进作用甚至超过最强大的缓和倡导者的期望。在西欧力量薄弱而苏联似乎强大并咄咄逼人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西欧提供了重要保护。但是，东德在1953年，匈牙利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和波兰在1980—1981年发生群众起义或要求独立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却无能为力。只有莫斯科的政治演变和冷战结束才使东欧获得了自由。

我观察了东西欧走向缓和的演变，并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和70年代后期在保加利亚工作期间是如此。但是，对我来说最明显和对同事们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关键在美国和西方同苏联的关系，特别

是莫斯科的事态发展。那才真正是结束冷战的关键。

我坚决支持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关于缓和的主要政策路线。我认为，即使是在冷战中，在坚决保卫西方利益，反对苏联挑战的同时，仍然存在利益一致的方面和减少对抗的机会。尽管我批评尼克松—基辛格时代执行政策的某些做法，但是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人毫无根据地或夸大其词地担心军事力量对比以及所谓苏联滥用缓和，据此大肆攻击缓和，我对此特别感到惊讶。这种攻击挫败了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在第一届里根政府时期更是嚣张一时。我坚决反对在宣传和政策中使用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使得我们不可能采取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利益的行动。我欢迎第二届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回到缓和的道路上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回应戈尔巴乔夫的非凡创举，并接受一种基本的关系转变，这种转变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就在 1990 年结束了冷战。

一些美国官员在美国的冷战政策中起过作用，有些时候起过重大作用，今天来回顾他们观点的差异是十分有趣的。一方面有证明自己正确的冷战斗士，他们肯定地认为，他们坚决支持遏制和威慑，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没有别的道路能够提早结束冷战。1950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68 文件的主要作者保罗·尼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因为他主张谨慎的军备控制，所以受到“极端分子”的否定）。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则是用比较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复杂性，不知道重新审查历史后会不会看出还可以走其他一些道路。在我看起来，已故的麦乔治·邦迪在这另一类冷战斗士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冷战老手都认为，在冷战中，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和威胁，美国采取遏制和威慑政策是必要的、恰当的。大多数（但决不是所有的）研究冷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以一种回顾的眼光看，经历过这几十年风风雨雨

的许多人现在认为，人们严重地夸大了苏联的军事威胁，也严重地夸大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和颠覆的危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部分受莫斯科的指示和控制。但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麦卡锡主义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显然是太过分。后来，1948年苏联开除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这些严重分歧的证据本来应该使我们解除对中苏集团和国际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担心。首先，虽然苏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可能准备“尽一切力量”扩大势力范围，但是它采取谨慎的政策，显然不准备“不顾一切”。斯大林去世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本来就应该看清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只有最死硬的共产党人和最死硬的反共人士才仍然认为，共产主义（和苏联）真的在沿着冷战道路走向胜利。在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苏联共产党人对我说“历史将会作出决定”，那么我会回答：我们应该让历史来作决定。我们这样做了，历史已经作出了决定。

冷战最危险的方面之一是，朝鲜战争后黩武主义加强了，后来又陷入军备竞赛。但是，危险并不在于苏联将取得优势并进攻我们（也不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巨大优势在还没有被相互威慑不可避免的推进消除之前就使用起来），而是在于军备竞赛的动态和随之而来的双方的担心可能导致鲁莽行为和打错算盘。幸运的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经验使双方领导人都不会进一步企图冒战争危险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对战争或者对承担巨大的战争危险来说，核武器确实是一种威慑。

遗憾的是，双方都未能从古巴导弹危机或其他地缘政治对抗中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继续军备竞赛对威慑来说不是必要的。双方领导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刺激去考虑在核时代蓄意发动战争，可是威慑理论非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费尽心机为无

限制扩大和完善战略核武器辩护，以便满足完全不现实的情况所产生的“需要”，这种完全不现实的情况是在双方第二次或第三次“互相发射”数万枚热核武器以后仍能“占上风”。任何武器计划都可以用“加强威慑”来辩护。当然，还没有丧失明智的政治判断，我们安全地度过了冷战。但是，由于对立双方过分军事化，由于过分依赖可能出错的预警技术和通信技术，由于用机械的威慑“要求”（这里是指导弹“有效负荷”）来代替战略和政治思想，不必要地增加了风险和代价。

保持军事（和威慑）平衡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因为始终都存在在一个不确定的边缘状态，每一方都想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方不利。但是，人们对军事—威慑平衡的现实认识不够，也不认为对军事平衡和政治关系的看法是关键。威慑的基础是双方彼此承认对方有能力报复。安抚盟国也取决于他们对我们为了他们而使用威慑的力量和意志的看法（这一点也要求优势的一种边缘状态）。因此，除了满足保证真正的军事—威慑力量的要求外，威慑理论认为，还必须保证敌友双方都感觉到这种力量，以便维持威慑敌人和安慰盟国的信誉和有效性。但是，经受敌人一次进攻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够以类似的手段进行报复的能力必须非常强大，如果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是会很有威胁性的。

尽管在政治缓和时期战争的威胁明显地减少了，但是这种“威胁”仍始终存在，因为威胁的定义是双方的“能力”而不是“意图”，而且在不现实的所谓威慑要求的辩护下，双方的能力确实一直在加强，直到冷战结束。谨慎考虑之下所产生的威慑，发展到要产生非常不谨慎的后果。^①

军事威慑力量的关系虽然是遏制政策的中心，但是后者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全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也在起作用。

^① 详见 Garthoff, *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Brookings, 1990), pp. 6 - 16 and 24 - 38.

例如，美国威慑或遏制苏联在欧洲挑战的意志导致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了安抚盟友以及遏制共产主义扩散，美国还必须依靠自己的常规军事力量。

回头来看冷战地缘政治竞赛的重大决定，大概没有那次重大的对抗是能够避免的。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在 1950 年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因为他错误地估计美国不会插手，北朝鲜会很快取得胜利。杜鲁门决定美国出兵干涉，至少部分原因是错误地判断斯大林在试探西方的决心。有这些错误的想法，朝鲜战争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结果对西方有利，成功地加强了北约联盟和遏制，导致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反，从 1964 年到 1973 年，美国直接参加越南战争是出于当时已经普遍认识到的种种错误，但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显然对西方不利，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这次干涉付出的代价比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失去越南所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如果让印度支那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陷于当地共产党的统治，那么盟国和敌人大概都不会因此而认为美国遏制或威慑苏联的决心是软弱的。但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第三世界其他所谓“代理人”战争，都没有对冷战的进程和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在欧洲稳定现实的条件下）地缘政治竞赛最重要的影响很可能在于全球政治经济对抗的意识形态根源的心理方面。

如果我对这两个例子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说明：即使在冷战竞赛的现实条件下，冷战的许多较小战斗也都是不必要的；而且还提出一些问题：是否有机会提早结束冷战。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迹象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苏联领导人一直在透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世界，使他们不能正视如何真正结束冷战。当戈尔巴乔夫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寻求结束冷战时，只有等到他单方面不断采取重大行动和让步后，西方领导人才准备接受这个事实。

只有等到冷战结束后，事情才变得明朗起来：正是敌对关系的这种意识形态基础阻止了缓和时期成为一种通向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的跳板。缓和是一种办法，用以缓冲继续竞争的危险，缓冲那最终决定斗争结果的历史力量的作用。缓和的确起到了这种历史作用。但是，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缓和时期公开宣称缓和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而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策的记录则明确认为缓和是隐蔽形式的遏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是这样夸耀的）。

地缘政治竞争的现实为双方提供了足够的现实的理由，不仅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让对方产生真正的怀疑和恐惧。重要的是要认识这种情况：地缘政治竞争的过程不仅造成恶意的宣传和公众的见解，而且还影响直至控制领导人的判断和信念。这是互相抱偏见和互相指责中最险恶的因素。此外，一方面（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只是出于无意识的花招），可以把现实解释成支持敌人的形象，支持永久冲突；另一方面，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为整个冷战建立必要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现象的观念，从而使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这样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构成了苏联思想和政策的基础。不倦地注视着世界共产主义的西方领导人，如果有时候错误地把这种世界观理解为苏联的行动作用，那么显然就会认为苏联是敌人。虽然没有反映出来，但是也不会加以否认的一点是，西方将这一世界观归结到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头上，这也就构成西方反共政策的基础。西方认为必须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因为这种扩张被认为是苏联领导人的驱动力。

美苏双方彼此认为，苏联受共产主义的支持，美国受反共遏制政策的支持，因此即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也会采取可能采取的国家政策行动。此外，虽然（在对抗和缓

和交替出现的阶段)西方基本上仍然采取遏制政策,但是西方的许多人的想法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的论据是,西方为什么只应该继续采取遏制政策,而这种遏制政策如果成功了就可能无限期继续下去,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失败。为什么不结束共产主义,打败和摧毁苏联帝国,何必仅仅遏制它进一步扩张呢。为什么不打败和摧毁共产主义呢?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虽然有时候在国内政治宣传中措辞强硬,有时候抑制缓和之类的辩解,但是这种极端反共理论从未成为西方的国策。西方的遏制政策有摩尼教的思想基础,这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后期西方行动思想和政策的核心。

还要注意的是,冷战的意识形态驱动力也严重影响每个国家的国内生活,特别是苏联(首先在斯大林时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也是例子。有些人说,这样做的结果加强了“国家安全”。

归根到底,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共有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导致不可避免的竞争,这是冷战的显著特点。用西方分析家的话来说,冷战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的得益必然等于另一方的损失,没有真正的妥协、和解和共同利益,除了压倒对方外,采取任何措施都不能解决冲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来说,冷战的问题是“谁战胜谁?”用分析家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的论点是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其重要特征是,任何时刻一定的关系都是个变量,最终结果不是静态平衡,而是最终决定性地打破相互关系,一方取得胜利。西方几乎不承认这种思想,几乎总是说军事力量平衡,这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当然军事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但是它既不是历史的驱动力也不是最终的仲裁者)。

“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观点是神话和现实的一种混合体。双方都不是要用对手所归罪的那种明确、强烈、一贯或狠毒来“统治世界”。但是双方领导人都认为敌人注

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所以预见到并且试图去应付对手所作出的努力。此外，双方领导人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的确都预见到并且试图去推进自己制度的世界霸权。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美国领导的反共思想不只受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指导。西方非常信仰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主义：“为了民主，使世界安全”，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使反对多元化和人权等“世界大家庭”属性的意识形态没有存在的地方。（《时代》周刊甚至说，世界现在生活在“美国世纪”。）

由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共有的世界观引起的全球对抗意味着：其他目标和价值观都屈从于进行冷战并取得胜利的最高任务；甚至意味着：由于安全利益，国内正常的自由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还意味着：把同其他国家关系中的其他考虑都排挤到从属地位，在描述反共联盟是“自由世界”时，忽略了一些相当大的反常现象。反共联盟国家里的许多人甚至比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公民更加缺乏人权和政治权利。

这是受意识形态支持的冷战的一个重大特点，不同于以往的地缘政治对抗，例如 19 世纪英国和俄国在西南亚和中亚所玩的密探行当。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方得益必然等于另一方损失的“零和游戏”走向一个两极世界的全球对抗，也使 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国均势引起渐变的影响被排挤到从属地位。

冷战留下的一个特别有害的遗产，就是有些人谴责别人在判断冷战两方的行动时搞“道义对等”。例如，在意大利 1948 年的选举中，苏联和美国都曾经给对立的党派秘密提供资金。从冷战的角度来看，苏联是资助意共在意大利搞颠覆，而美国则是支持民主。因此，只要说到双方都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就会受到谴责，说那是把苏联和美国的行动在道义上对等起来。同样，只要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作为对手相提并论，那就被谴责为将一个自由国家的联盟与一个苏联控制之下的卫星国集团

对等起来，让后者享有道义上的对等地位，就是有罪的。冷战双方的目的及道义目标完全不同，因此，如果说双方采用了相同的手段，那就是一大疏忽（或是更糟）。然而，在冷战的地缘政治对抗中，双方的手法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只能希望在冷战业已结束之后的世界上的气氛中，将会有可能作出比较客观一些的判断。

说冷战双方采用的手段有相似之处甚至相同之处，决不会意味着把两种制度在道义上等同起来。在冷战中，一种制度是建立在选择权的基础之上，另一种是建立在独裁的基础之上，二者之间有着重大的道义差别（其实际结果也大不相同）。然而与此同时，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像冷战期间人们常说的那样，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正确，而苏联所做的一切都不对。

近年来，美国、前苏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档案中解密文件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有可能更多地了解当时有关各方对形势的看法以及所采取的行动，据此来审视冷战地缘政治对抗中的许多事件。但是，“事实”不会自己说话，还需要考虑当时的各种因素，比方说，当时各种事件的背景以及各方决策者对这件事所了解到的程度。还需要客观地看待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要用冷战观点和老眼光来过早地判断行动。

对冷战的反思不仅涉及最近的历史，而且还关系到将来。我希望，叙述一个人冷战之旅的这本书也能激发读者反思。